

北京文博
文丛

2025 年

第一辑

北京市文物局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文博文丛. 2025. 第1辑 / 北京市文物局编.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25. 12. -- ISBN 978-7-5402-7724-6

I. G269.271-5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5PB9025 号



北京文博文丛·2025·第1辑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琉璃厂西街20号 100052

责任编辑: 梁 萌

版式设计: 黄晓飞

印 刷: 北京兰星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9.25

字 数: 289千字

版 次: 202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2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02-7724-6

定 价: 114.00元

北京文博



2025年(总第113期)

北京史地

- 1 四众共建:从碑刻看明清上方山佛教的发展..... 安大伟
- 7 京西模式口承恩寺庙产变迁探析..... 苗天娥
- 16 延庆旗人、旗庄与八旗驻防探源..... 杨程斌
- 25 颐和园宝云阁沿革考..... 孙 萌
- 30 北京故宫宁寿宫花园的园林意趣..... 安 非 金 超 孙艳群
- 35 北京海淀“永山宅院”名称考述..... 马明杉 王承浩 杨逸帆
- 39 日伪统治时期北海公园的“献铜”运动..... 郭 妍 陈春萌

文物研究

- 44 丰台区唐墓出土的“重五”镜——兼论“江心镜”..... 孙 勳 张智勇
- 48 辽代墓志十二生肖纹饰探析..... 王晓颖
- 52 金代韩景□神道碑补考..... 孙建权
- 57 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藏明本《西厢记》版本浅述..... 张胜磊
- 61 《敕建护国万佛延寿寺永远传代香火碑》考释..... 谢 欣
- 65 对《新获清吏部尚书马希纳墓志考》的补充考释..... 陈 康
- 73 从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所藏几组清代房契看清代北京城区房产交易
..... 张晶晶
- 82 《燕京烬余录》价值初探..... 韩建识
- 88 《五四在北大》内容揭示和版本比较研究..... 董思彬

考古研究

- 96 北京市海淀区祁家村辽金时期遗存考古发掘简报.....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 110 绿松石文物光谱分析技术的应用探讨..... 郑王文元

《北京文博》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吕济民

主任

李伯谦

副主任

张立新 白 杰

舒小峰 孔繁峙

王世仁 齐 心

马希桂 信立祥

靳枫毅 郭小凌

主编

张洪刚

副主编

孙 永

执行主编

韩建识

本辑编辑

高智伟 康乃瑶

侯海洋 王维珂

张晶晶 张中仁

高丽丽

博物馆研究

115 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再社会化路径研究
——以北京地区早期铁路车站为例 左 什 陈思粤 贾丰源

122 启民智之先
——新文化精英的博物馆建设理念与实践 刘 欣

128 融媒体时代公众考古大众传播的探索与实践
——以北京市考古传播工作为例 白燕飞

131 新时代博物馆社教活动品牌的创立和实施
——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太学·寻迹”主题社教活动为例 燕 京

139 “博物馆之城”建设视阈下北京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面临的问题与发展路径
刍议 王业鑫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主办单位

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

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

邮箱

bjwb1995@126.com

四众共建：从碑刻看明清上方山佛教的发展

安大伟

上方山，位于北京房山区南部，为太行山余脉、大房山支脉。“古称大房山，最称奇秀，古碑云‘幽燕奥室’。”^①北魏永熙年间，百咏南禅师来山结茅，是为上方山建寺之始^②。上方山经历代建造新寺，修扩旧刹，隋唐时已成为京畿佛教圣地。明清时期上方山有七十二庵，其中以兜率寺最为有名。此前学界对上方山佛教已有所关注^③，而2023年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整理出版《上方山访碑录》，提供了研究上方山历史文化的最新材料。这些碑刻是珍贵的文化遗存和原始史料，记载了明清皇室、宦官、僧人、地方官绅和民众在上方山的崇佛建寺活动，从中可以窥见明清京畿地区佛教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明朝皇室、宦官对上方山寺的扶植

（一）皇室的提倡

明朝皇权（包括皇帝、后妃、宦官）对佛教的支持力度大，将北京地区的佛教发展推向繁盛，寺庙政治规格之高、建筑规模之大，为全国之冠。佛教与宫廷政治之间的互动，是明清北京佛教发展的特点。

明朝宫廷对佛教的护持，体现在敕建寺庙，向寺院布施钱财和佛经、佛像等宗教用品几个方面。弘治六年（1493）正月，御用监太监王瑞奉命往石经山佛寺布施，“行至房山兜率寺，见其佛刹创于往昔，而寺前路通四远，顾乃崎岖陡峻，一至辄有修砌开辟之念，抑欲将顺圣意波及途人也……各监太监若秦公德辈，闻风翕然助缘，则又因公之善念，皆有感触其心焉。于是取木石于山，鳩工于民，不劳余力，砌成天梯千余步，宽展垣夷，有若平地，来往之人，啧啧称颂”^④。出帑金修建上方山天梯，又得到了各监太监的响应。宦官是皇帝的代言人和皇权的组成部分。宦官负责经办皇室佛教事务，迎合了皇室对佛教的崇尚。

明神宗生母李太后笃信佛教，是晚明佛教勃兴的重要推动因素。李太后自封“观音菩萨”“九莲菩萨”，兼檀越与偶像于一身，是其时全国最大的佛教护法。《明史·后妃传》记载：“（李太后）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巨刹，动费数万，帝亦助施无算。”^⑤明神宗积极支持李太后的崇佛活动，斥巨资兴建佛教寺塔，使北京佛教繁盛一时。

北京地区寺庙多有李太后布施史迹。万历四年（1576）李太后赐永亨庵（后称永慈寺）“藏经一藏，计五千四十八函”^⑥。万历十四年（1586）李太后又赐上方山永慈寺经藏，明神宗亲撰《钦赐永慈寺护持碑记》记其事。碑文中写道：

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无助。兹者圣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命工刊印，续入藏经四十一函，并旧刻



图一 国家图书馆藏《兜率寺香火院地契碑》拓片

藏经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颁布本寺。尔等务须庄严持诵，尊奉珍藏，不许诸色人等故行褻玩，致有遗失损坏。特赐护持，以垂永久。^⑦

明神宗将新刻、旧刻藏经共计六百七十八函颁给永慈寺。明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扶持，主要缘于看重佛教具有教化民众、稳定社会秩序、维护政权统治的功用。

国家图书馆藏《兜率寺香火院地契碑》拓片（图一），颇为珍贵。记载了万历三十二年（1604）上方山兜率寺田产纠纷事件，住持惠住委托太监陈儒、姜绶上奏。李太后得知此事后，“钦发内帑银二百二十两整，以还原价。齐栋公同栗可仕收完不欠，除照旧给予常住惠住等，分给百门僧众永为香火之资，以后再无争执”^⑧。拨内帑补偿地方士绅而平息争端。普通僧人无法直接向朝廷奏事，同样持有奉佛立场的宦官们，以其亲近皇帝的特殊身份，在皇室与佛寺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二）宦官的营建

明代宦官崇佛信僧之风浓厚，宦官与佛寺僧团之间保持着密切关系。明代宦官刘若愚在《酌中志》中写道：“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⑨宦官因为无法享受今生的幸福，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来世，通过修建佛寺的方式来为来世积累功德。明代宦官出家的现象屡见不鲜。万历年间孤山圆银禅师，俗李姓，武清人。“少侍内庭银作局，管理公务之余，留心内典。”出家后隐居上方山，构筑朝阳庵^⑩。明季司礼监太监郭公信浮屠说，“未从释时，即以郭佛称之”。明亡之后，入上方山寺出家，法号湛白^⑪。

宦官扶持佛教势力，是明代佛教发展的特点。明代宦官集中于北京，热衷捐资建寺，促进了京师及周边地区佛教的发展。清高宗称：“至今京城内外以及西山琳宫梵宇，大珰修建者十居八九。”^⑫北京佛寺大多为明代宫廷太监所修建。明代宦官群体在上方山诸寺庙庵观的建修上起到决定性作用。据《上方山访碑录》的记载，将明代宦官修建上方山寺事迹整理如表一。

表一 明代宦官修建上方山寺事迹表

时间	姓名	事迹	史料来源
永乐年间	向福善、倪忠	修建弥陀宝殿、石梯	《重修上方兜率寺接引弥陀殿碑》《重修上方兜率寺天梯碑》
弘治六年（1493）	王瑞	修缮石梯	《重砌上方兜率寺天梯路碑》《重修上方兜率寺天梯碑》
嘉靖十一年（1532）	刘鉴贯等	修缮兜率寺塔	《重修上方兜率寺塔碑》
嘉靖二十三年（1544）	顾圆梅等	助凿井泉	《甲辰新凿井泉碑》
嘉靖二十九年（1550）	李悦等	助凿井泉	《庚戌新凿井泉碑》
嘉靖三十五年（1556）	李中轩	修缮兜率寺	《重修兜率禅寺碑》
万历四年（1576）	冯保	修缮接引佛殿、净业堂、石梯，创建永亨庵	《冯保施财修接引殿碑》《冯保施财创建永亨庵碑》
	孙秀等	助修永亨庵	《太监孙秀等助修永亨庵碑》
万历年间	张楨等	修缮兜率寺山门	《重修兜率寺山门碑》
	冯保、李志义	修缮接待庵	《重修接待庵碑》
	李志义	修缮观音阁、文殊殿	《重修文殊殿碑》

从上表可知，宦官在上方山寺的布施活动贯穿明代始终。永乐年间，便有内官监太监向福善资助僧人修缮梯道、创建接引弥陀殿，是为有记录的明代宦官上方山寺布施活动之始。

嘉靖三十五年（1556）司礼监太监李中轩大规模修缮兜率寺。碑文记载：

捐俸金购材，鸠工以兴，未逾年而告成，殿前增天王者四，有殿宇以覆之。又增弥勒伽蓝祖师别殿，置大藏尊经。并其殿屋中殿，虽仍其旧，而焕然一新。僧房廊庑森然相对，继以金檀作菩萨像，端严妙丽，具慈悯性。虽钟虞不移，而规模大备，寺貌较前弘峙改观，一时刻漏修行之辈，咸杖锡于此。^⑬

这次修建活动使得兜率寺“规模大备”，且于弥陀阁尊藏《大藏经》。由于皇室与内廷宦官频繁捐资修建上方山寺，

明中叶上方山寺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嘉靖年间，上方山“上下四旁，僧房罗列，殆九十余座，诚西山第一之境，可佳可乐也。四方老幼，□其善名。敬信之络绎于山径之蹊壑，登临参拜，士夫闻之，亦往观焉”^⑭。万历年间，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提督两司房、司礼监掌监事冯保为上方山佛教事业做了突出贡献。万历四年（1576），冯保大规模修建上方山寺，“施财修建接引佛殿、静夜堂、石梯等处”，并“施财创建永亨庵正殿两廊庑及藏经殿，内安橱柜八座”^⑮，安置《大藏经》。并手书《佛说四十二章经》，刻于兜率寺主殿后壁。这些举措促使上方山佛教发展到鼎盛阶段。

宦官修建寺庙有的是接受了皇命，代表朝廷。但也有很多属于个人行为，施舍的是个人俸禄。宦官不仅营造殿宇，还帮助寺院开凿井泉。《甲辰新凿井泉碑》中记载：“上方山兜率寺有石井一区，其水浅且取之易涸。”嘉靖二十三年（1544）三月内府宦官顾圆梅“捐资乐助，易石若干丈，凡此杂石等项悉皆备之”。“先时石井浅狭者，今则加以锤凿深抵丈六，及其泉而止焉。”^⑯嘉靖二十九年（1550），又有“内府杨公等捐资乐助”，“命工穿凿石井一座，深汲三丈有余，抵泉而止”，便于山寺僧众生活取水。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宦官修建上方山寺，为其作碑记者多为京师官员。如《重修上方兜率寺天梯碑》为赐进士第、亚中大夫、太仆寺卿彭礼撰。《重砌上方兜率寺天梯路碑》为中宪大夫、太常寺少卿李璋撰。《重修上方兜率寺塔碑》为将仕郎、庐州府庐江县主簿纪恕撰。《一斗泉岩前建观音殿碑》为恩赐冠带信官赵时用撰。《重修兜率禅寺碑》为赐进士第、观吏部政行人司行人杨霆撰。冯保书《四十二章经》石碑为进士、观察大夫都人刘效祖跋。碑文中，题写者对宦官功德大加赞颂，呈现出明代部分士大夫群体趋附宦官势力的倾向。

二、清代地方官府对上方山寺的护持

与明朝不同的是，清朝廷较少直接捐资修建上方山寺。清代上方山佛教的发展有赖于地方官府、邑会组织、寺院僧人、绅民信众等多方力量的护持和捐助。

清代房山地方官员对佛教的支持，首先表现在经济捐助方面。顺治二年（1645）房山知县张应召为三圣庵（观音殿）僧众拨给田产，“为申请户部按亩拨补”，“将勦卫非官等地照数拨补，合行给帖”。将原兴州中屯卫、永宁左卫粮头所属二百三十三亩地划拨山寺，以为供佛香火之资。并立《上方山三圣庵置田供众碑》，其中言道：“经言：福田能生善种，大藏论诸天人第一福田，推此义也。其非仅仅供养僧众之说也，抑以因果为下根说法。”^⑰张应召深信佛教的“福田”和“因果”思想，本人的信仰是其支持当地佛教发展的动因。

地方官主导的善举，往往能够带动其他乡绅和民众施舍钱财。乾隆二十六年（1761）房山知县李冕“即官俸所得，聊与捐助，特念升斗之水，难济辙鲋，乃谋诸同官，同官曰然。又告诸邑中之有力而乐施者，凡十余人，各出余资，共襄盛举，计置田一顷八十余亩，田在上方山下之孤山口，地甚近，殊便僧也”^⑱。李冕协同房山县官员，并联络县民，共同为山寺捐资置田，供养僧众。

现存上方山碑刻大多是功德纪事碑和高僧塔铭，但也有三通珍贵的政府公文碑。官府通过立碑公布的告示，警示破坏、盗卖寺院田产的行为。现存最早的为刻立于金崇庆元年（1212）的《天开寺奉先县禁山榜示碑》。

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房山知县王御立《涿州房山县禁约碑》于大悲庵旁，规定：“嗣后如有仍前故违，借称游山樵采私行小路，及捎带枪刀弓箭什物者，许该地方保甲、接待庵、云水洞僧人协同拿赴本县，即以不轨治罪。”^⑲

同治七年（1868）六月，顺天府立《谕禁告示碑》，出示谕禁上方山各寺僧人并附近乡民人等“嗣后倘敢偷伐上方山树株，以及勾引不肖匪徒在寺酗酒骚扰，一经兜率寺方丈真轮查知或被告发，即行严拿惩办。如系僧人故犯，立即勒令还俗；若系乡民藐法定，即加等治罪”。

顺天府及房山县屡次颁布示禁碑，立于山寺之侧，明令禁止百姓偷伐林木、滋扰寺院，保护祝圣道场，令僧众得以清净梵修。

三、清代民间对方山寺的施助

顺天府民众的捐赠布施活动，是清代上方山寺重要的经济来源。其中既有士绅，也有一般民众；既有旗人，也有民人；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朝山进香者。

乾隆二十六年（1761）房山知县李冕称：“是山旧结庵七十二处，僧众住持其间岁入不敷，率以募缘为生活。”^②可见清代上方山寺院经济比较拮据，其生存发展需要仰仗民间帮助。

碑刻记录了清代民间自发捐助上方山寺的事迹，僧人在碑文中表达了对功德主捐资舍地的感激之情。另外，功德碑和契约一样，也是一种捐赠凭证，避免后世发生僧俗之间的田产纠纷。康熙六十一年（1722），宛平县善信邵世贵将自置旗地壹段计地肆拾亩“施舍于上方山众僧承管，屡年起租，均散合山以为供佛永远香火之资。自舍之后，恐有亲眷户族人等争竞者，故此舍契文约，永远存照为证”^①。

雍正三年（1725），有故山会末李氏捐地一百二十亩，每年租二十六石，供上方山合山大众^②。嘉庆四年（1799），上方山遭遇凶年，诸寺僧众云散、置卖田产，“诸大檀越念其山中僧人资助淡薄勤苦，情愿将典当价值，悉作布施。”^③光绪十六年（1890），善人王九成“捐银贰拾金，并萧官营会首善人李公昆合会共捐钱陆拾余千”^④，修红桥庵。光绪年间，善信韩密寿来山进香，舍银三百两重修兜率寺斋堂、舍六百余金重修舍利殿^⑤。

康熙年间京师民间自发形成了佛教慈善公益组织——华严米面圣会。米会专为供众斋僧，捐金置田、施散米面，构成了清代上方寺院经营的特色。康熙五十二年（1713），“京都善人把君米会之倡始者也。爰结同心，捐金积米”是为华严米面圣会创建之始。雍正十一年（1733），“续有崔君步把后程，董理其事”^⑥。组织设有会首，董理会务。

乾隆年间，米会捐资上方山寺尤为频繁。乾隆十二年（1747），信女赵罗氏、李刘氏及面会众善，捐资为水月禅师行实建塔，以表其德^⑦。十五年（1750），“会中众善始行捐金置田，计地壹顷捌十二亩”^⑧。二十一年（1756），京都贾人张鹤施面以济，马士禄等好善者踵而行之，又有黄父子暨诸好善者置地若干^⑨。二十九年（1764），善士鲁圣教、崔璵、费宁者三友登山，复置地叁拾捌亩^⑩。四十年（1775）春，金台善人来上方山上香，“将自置田地贰顷拾亩，坐落顺义县南廊家地方，情愿喜舍上方，永远供众”^⑪。清前期米会舍地斋僧，对于上方山佛教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四、清代僧众对方山寺的营建

高僧辈出是明清上方山佛教发展的重要表现。现存明清时期上方山高僧塔铭碑近30通，记载了上方山佛教法脉传承和高僧懿行事迹。如明中叶天香修道禅师，为雪峰正宗第五代法孙，“勤参苦究，洞晓真宗。京师人民，悉蒙教益”^⑫。清乾隆年间水月禅师“凡高僧羽流无不与师互相印证，以故师名著京师达官”^⑬。闻名京师，影响广泛。

除了世俗力量的营建，清代上方山佛教的延续与发展，离不开本山僧众的奋力经营。尤其在乾隆年间，本山多位住持带领僧人捐资修建寺院、购置田亩，立碑为证。他们将所置地亩每年所得之租，作为供养众僧之资，为各寺常供香火。

康熙十五年（1676），观音殿住持道目禅师捐衣钵重建殿宇，造款龙桥，重葺山门，开铺大道，使得“丛林规模约略可观”^⑭。乾隆三年（1738）药师殿住持穆然禅师同徒及徒孙，“捐银贰佰柒拾伍两肆钱，契置旗地，东西贰段壹顷陆拾亩，坐落涿州西北杨胡屯，岁取租钱捌拾吊，均散阖山供众”。乾隆十五年（1750）伏魔庵住持先泉自捐囊财“率徒宗鼎努力同建大殿三间，兼造伏魔圣像，前后禅房焕重新”。又“置买镶红旗满洲都兴左领下领催纪兰泰本身地……计地两顷五十亩，价银五百两”^⑮。乾隆二十一年（1756）心安、林果、源汇、法然、见空、月三诸禅师“各出其所有之银四百两，置正黄旗何常明之地五段一顷六十七亩一分五厘……每年所获之租制钱八十千”。宝山禅师“出银一百置地五十亩”^⑯。乾隆二十二年（1757）胜修禅师将所置田产二项，“一段九十亩，

坐落次洛村，系买正黄旗包衣刘灏佐领下张浩老圈地，价银一百九十八两；又两段四十亩，坐落王家庄，系民人陈宪仁自种学田，地价银八十两”^⑦。乾隆二十四年（1759），心安禅师置地一段，“每年起租清钱二十六千六百文”^⑧。碑文中的记载表明，至少在清乾隆年间，上方山佛教寺院经济仍然具有一定的规模。在土地经营方面，山寺以租佃制的形式，将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地租作为寺庙的主要收入。

结语

晚明到清前期是北京佛寺兴建、重修的高潮阶段。皇室、宦官对佛教的崇奉，是晚明时期佛教复兴的重要推动因素。晚明时期，上方山寺在皇权的支持下走向繁盛。清朝虽然没有大规模支持上方山修寺建庙之举，但是顺天府和房山县地方官员对寺院多有护持。清前期，京师华严米面圣会，有组织地捐助上方山寺，表现出清代京师地方民众的佛教慈善活动已经走向组织化。山寺僧人捐资修寺，置田收租，勤于经营。多方力量共同努力，推动了明清上方山佛教的发展。

- ① [清]孙承泽著,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卷六十八《岩麓》,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1323页。
- ② 《百咏南禅师塔铭》,收入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编:《上方山访碑录》,学苑出版社,2023年,第1页。
- ③ 李捷民、冯秉其编著:《上方山和石经山》,文物出版社,1959年。齐心:《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考》,《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2期。杨亦武:《上方山兜率寺》,华文出版社,2004年。松木民熊:《北京·上方山兜率寺の仏塔群》,《北海道东海大学纪要》(人文社会科学系)2005年第18期。刘文江:《上方山》,北京出版社,2018年。刘卫东:《房山区上方山(佛说四十二章经)刻石》,《北京文博文丛》2021年第4期。侯海洋:《从上方山永慈寺碑刻看万历初年冯保宦官群体在京的佛事活动》,《博物院》2022年第2期。陈金焱:《清代〈上方山志〉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年。
- ④ 《重砌上方兜率寺天梯路碑》,《上方山访碑录》,第138—139页。
- ⑤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536页。
- ⑥ 《冯保施财创建永亨庵碑》,《上方山访碑录》,第179页。
- ⑦ 《钦赐永慈寺护持碑记》,《上方山访碑录》,第204页。
- ⑧ 《兜率寺香火院地契碑》(拓片),国家图书馆藏,书号:北京9394。
- ⑨ [明]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00页。
- ⑩ 《孤山和尚碑》,《上方山访碑录》,第237页。
- ⑪ [清]龙其善:《湛白大士塔铭》,《上方山访碑录》,第273页。
- ⑫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左步青点校:《国朝宫史》卷首《圣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页。
- ⑬ 《重修兜率禅寺碑》,《上方山访碑录》,第169页。
- ⑭ 《重修上方兜率寺塔碑》,《上方山访碑录》,第151页。
- ⑮ 《冯保施财修接引殿碑》,《上方山访碑录》,第176页。《冯保施财创建永亨庵碑》,《上方山访碑录》,第179页。
- ⑯ 《甲辰新凿井泉碑》,《上方山访碑录》,第156页。
- ⑰ 《上方山三圣庵置田供众碑》,《上方山访碑录》,第251页。
- ⑱ 《上方山寺义田碑》,《上方山访碑录》,第336页。
- ⑲ 《涿州房山县禁约碑》,《上方山访碑录》,第281页。
- ⑳ 《上方山寺义田碑》,《上方山访碑录》,第336页。
- ㉑ 《顺天府宛平县邵世贵捐地碑》,《上方山访碑录》,第302页。
- ㉒ 《会末李氏捐地碑》,《上方山访碑录》,第308页。
- ㉓ 《上方山施舍供众地亩碑记》,《上方山访碑录》,第349页。
- ㉔ 《王九成等捐资红桥庵碑》,《上方山访碑录》,第376页。
- ㉕ 《重修斋堂碑》,《上方山访碑录》,第384页。《重修上方山兜率寺舍利殿碑》,《上方山访碑录》,第380页。
- ㉖ 《老米会施田碑》,《上方山访碑录》,第339页。
- ㉗ 《水月禅师行实碑》,《上方山访碑录》,第317页。
- ㉘ 《老米会施田碑》,《上方山访碑录》,第339页。
- ㉙ 《上方山置地碑记》,《上方山访碑录》,第334页。
- ㉚ 《老米会施田碑》,《上方山访碑录》,第339页。
- ㉛ 《华严米会碑》,《上方山访碑录》,第348页。
- ㉜ 《天香修道禅师塔铭》,《上方山访碑录》,第197页。
- ㉝ 《水月禅师行实碑》,《上方山访碑录》,第316页。
- ㉞ 《道目禅师自序铭》,《上方山访碑录》,第288页。
- ㉟ 《修殿造像置地永远供众碑》,《上方山访碑录》,第320页。
- ㊱ 《建立供众斋僧碑》,《上方山访碑录》,第325页。
- ㊲ 《明贤胜修尊宿供众碑》,《上方山访碑录》,第328页。
- ㊳ 《心安禅师置地碑》,《上方山访碑录》,第333页。

京西模式口承恩寺庙产变迁探析

苗天娥

承恩寺是明清之际京西比较著名的寺庙，以历史悠久、庙貌巍峨、佛像庄严而独领风骚，是文人墨客、达官贵人驻足停留的胜地，留下的优美诗文和传奇故事也不少。不仅如此，承恩寺在明朝正德年间初建时寺庙土地众多，开山住持担任僧官，后世还出了不少名僧，历经 500 余个春秋，一直屹立于京西模式口古道边。模式口周边村民传言：当年，模式口大街的一半都是承恩寺的庙产，附近不少村的地也是承恩寺的。模式口有民谣“模式口，三里长，家家住着和尚房”，据村老讲，这“和尚房”大部分是承恩寺的庙产。本文就明清以降承恩寺的庙产（主要指庙址、下院、香火地等不动产，涉及少量动产）变化及相关问题梳理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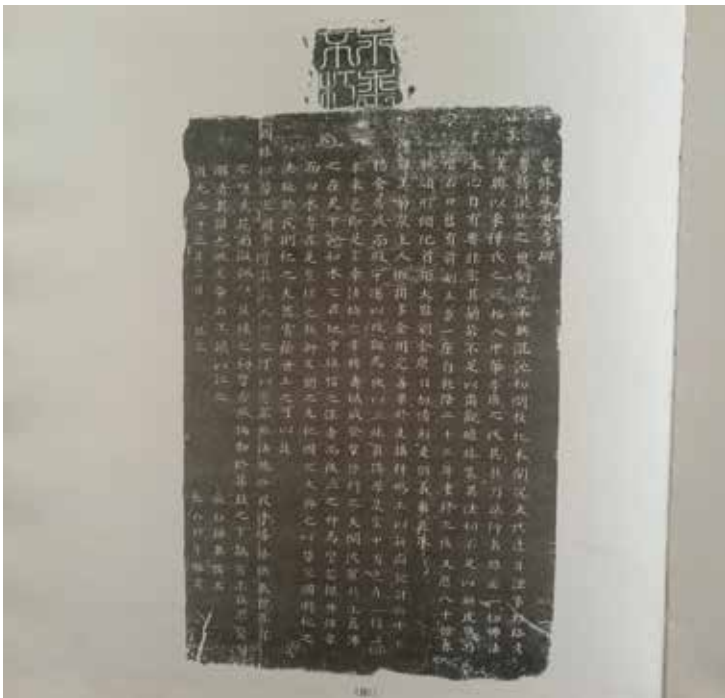
一、承恩寺明朝创建时的庙地

在古代，寺庙庙产里最大宗的、最有价值的当数土地，寺庙拥有的土地越多，其经济地位越高，相应的政治地位也越高，寺院实质上成为地主。承恩寺创建之初的地产分两部分，一部分由建寺功德主温祥购买，另一部分由首任住持永公购得。

承恩寺初建之时庙产颇丰，原立于大雄宝殿前的《承恩寺敕谕碑》碑文中有明确记载。这通珍贵的明碑现已不存，幸而北京图书馆有拓片（图一）。《承恩寺敕谕碑》个别文字缺失，可喜的是关键字句都在，庙产地亩数目清晰无误。碑文中说：“司礼监太监温祥……入禁庭，小心畏慎，绩学内馆，器业进修，朕在春宫，□□□□□□史，勤诵惟□□□□□□□□□□□□务守法，奉公廉静，且将远避□□□□□□□□□□谦人使宗藩□□□□竭诚佐理□朕□□祥尝以□耳禄□□□于顺天府宛平县香山等乡买民人王鼎等地四顷有余，于内盖寺一区，旁置祠堂、莹域，以为□□之计。又于田村买锦衣卫右所百户赵弘远等地三顷有余，以供香火之需……”^①

这段碑文透露出，承恩寺为温祥买地私建，占地面积七顷有余。温祥担心有权有势的人觊觎侵吞庙产和香火地，请求正德皇帝为他下了上面那道圣旨，除声明庙产亩数外，强调这些庙产地除了照章纳税外，优免一应杂泛差徭，又升僧人宗永为僧录司左觉义金书管事兼本寺住持，领众焚修，还担心日后势豪之人侵扰盗卖，特降敕为之禁约，晓谕内外官员、附近军民僧俗人等，胆敢不遵守敕旨者，严惩不贷。

温祥是正德皇帝特别宠信的内臣之一，早在正德帝当太子居住在春宫之际，温祥充当他朝夕相伴的内官。正德帝龙登九五之后，把以前在春宫侍奉



图一 《承恩寺敕谕碑》拓片

他的太监一股脑儿升为最有权势的司礼监太监，刘瑾、温祥等名列其中，因人数太多、升迁太快引起朝臣的不满。这事在正德元年（1506）遭到都给事中张文等人上疏弹劾，在《请裁内臣冗员》的奏折中提及：“温祥、范亨、徐智、王岳骤至司礼。”^②言下之意升迁太快，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武宗根本不在乎朝臣的议论，依旧宠信这些中官。到武宗发布这一敕谕的时候，温祥已当了8年的司礼监太监，在他的护持下，承恩寺香火地、免差徭、升住持、赐寺额曰承恩等请求，都得到了武宗的允准，还明令官员人等不得侵犯。温祥觉得这是最权威的护身符、保护伞，便命人刻碑立石，竖在承恩寺大雄宝殿前。

之后，承恩寺开山住持宗永（永公大和尚），在任期间买了二十多顷庙产建设塔院，扩大了寺院规模和影响。他当承恩寺住持的同时，兼任僧录司左觉义金押管事，为从八品官。僧录司在明代是朝廷设立的掌管佛教事务的机构。

宗永为山东兖州人，生于天顺八年（1464），11岁时拜京西大功德寺住持宣公为师，这与法海寺前几任住持出自功德寺相类似。弘治七年（1494），他担任金山宝藏寺住持，持续20年。宗永住持宝藏寺初期，前国戚太监陆公□（名字处碑文模糊）捐资重建金山宝藏寺，这是一次重建，始于弘治七年（1494）^③（图二）。宝藏寺现存海淀区青龙桥老府村，历代多次重修。

从宗永的塔院碑文看，担任承恩寺住持之前，他做了一个神奇的梦，等他应司礼监太监温祥之邀来到承恩寺做开山鼻祖时，发现承恩寺正是梦境之地。他接任不久便将承恩寺庙务委托给他的徒弟方因，自己带着百余人开疆拓土，先是建造下院两区，后又在模式口西边高井村创建开山塔院（俗称承恩寺老塔院），置地二十余顷，架屋二百楹，雇人耕作，以备日常用度，院落布置得规规矩矩、井井有条。可见，他的精力和时间大部分用在了扩大承恩寺产业和规模上。永公圆寂于嘉靖十八年（1539），安葬于开山塔院中。

开山住持永公和其徒弟方因之后，承恩寺历任住持和寺田的记载寥若晨星，见于史料记载的住持有万历年间的万庵，但只有名字，事迹微乎其微。承恩寺在明代未见重修记录。

二、清代时承恩寺经历多次维修

在清代，承恩寺碑刻记载至少有四次重修，分别是乾隆八年（1743）、道光二十三年（1843）、道光三十年（1850）、光绪年间（图三）。乾隆八年承恩寺修缮未见碑刻，事迹见于道光二十三年碑文中。道光年间相隔七年的这两次修缮，类似接力维修，前一次修了前殿、山门及后殿，剩下的殿堂如后殿、后殿之北填屋数楹供奉温公塑像等，在后一次修缮中得以完成。这两次维修都提到了礼亲王府邸首领太监刘金庆倡议并慷慨出资，得到礼亲王鼎力相助。前一次礼亲王菊泉领銜施钱1200吊，其余大多是附近村落里的各种商号、店铺、煤窑、北山园寝、南山园寝等，多达上百家，捐资助修，住持僧本玺，监修僧清□。后一次维修特意提到在后殿的北面专门建了几间房子，供奉温祥塑像。承恩寺还有一块捐款碑未具年月，碑阳和碑阴全部为捐款人名单，领衔者为兵部右侍郎崇礼施舍银五十两，还有仓厂侍郎、盛京户部侍郎、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刑部侍郎、工部侍郎、奉天府尹等一些地方官僚和五里坨、石门营、河间、外火器营、镶红旗满洲、健锐营、礼府内外官员，西黄村、内务府、礼府南山园寝、礼府北山园寝、南庄等村



图二 《永公塔院碑》拓片



图三 道光二十三年承恩寺敕谕碑

落和官署捐资，住持僧德瑞，监修僧法安、圣安、定慧、云慧、庆林等同立。从崇礼等官员的名号看也是一块清碑，年代应在光绪年间。三块存世的碑里都提到了礼亲王府，所以当地老百姓传言承恩寺在清代是礼亲王府的家庙，据说每次礼亲王府后人来福寿岭和金顶山的两处祖坟上坟的时候，都要来承恩寺小住一番，和住持僧人闲聊话旧。

从现在承恩寺大雄宝殿的屋顶形制低于天王殿形制这一现状来推测，可能进入清晚期承恩寺一度实力衰减，所以殿宇重修后形制格局不及从前，具体什么原因不得而知。其住持散见于碑刻和文人诗文中，有元空（雍正年间）、本玺（道光年间）、德瑞（光绪年间）、法安（光绪至民国）、圣安（光绪至民国）、云慧（民国）等。如此家大业大的承恩寺，经历了明的覆灭、清的改朝换代，在400多年间传承不息，这中间的线索断断续续、忽明忽灭，大都湮没在历史的风云中。至于庙产多寡，未见明确记载，但从数百号功德人名单可看出庙产在减少，维修经费主要来源于礼亲王府太监、官员个人和一些商铺捐资。

三、民国时普林等僧人多次盗卖承恩寺的庙产

到了民国二十年（1931），北平市社会局对寺庙进行调查时发现，承恩寺有土地“十四亩有余，毗连余地三十三亩，附属土地平地山地二顷零七亩，又云慧老和尚自置民红契地二顷二十八亩（妙慧押，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由承恩寺下院青塔院住持妙慧代表秀林补登）”^④。这样看来，原本明代始建时承恩寺有庙地将近三十顷（本庙加两处下院和老塔院），到了民国时已经损失十分之九还多，只剩二顷半，好在云慧老和尚（当时住持）又购买了民间红契土地二顷二十八亩，稍稍填补了累年的亏空，庙地约为初创时的七分之一。

民国中后期，承恩寺的庙产出现了大规模的流失，一是受当时社会混乱、军阀混战等大环境的影响，二是源于劣僧普林师徒的盗卖和滥租。

承恩寺从建立之初就属于师徒相承的子孙院，住持和僧侣有师承关系。更早的承恩寺住持和一般僧侣的师承关系，只在

1920年的重修承恩寺高井永公和尚老塔院的碑中提到：“法安、圣安率徒心慧，师侄云慧、妙慧，徒纯慧暨孙茂林、秀林、月林，序重孙体山、玉山、崇山同立。”^⑤这一组名字中涉及师徒四代人，实际上法安、圣安的徒子徒孙远不止这些，罗列的只是当时正在承恩寺里修行的师承僧人，这时名声败坏的普林不在承恩寺内。

法安和圣安是承恩寺德瑞师父培养出一代高僧大德，“复查普林名寂春，伊师祖伯法安名本明，师祖圣安名本谦，承恩寺正支正系，精明干练，素无嗜好之僧，尚有相当人材”^⑥。他们在佛教界影响很大，所处的年代正值清末民初，那时的承恩寺一度兴盛。法安俗姓王，是距承恩寺不远的琅山村人，自幼在承恩寺出家，法名本明，字法安，和圣安同为德瑞和尚的高徒。在晟一法师的推荐下到贤良寺（在今东城区）担任住持，同时兼任承恩寺住持，

实际庙务多由他的徒弟云慧料理。其后法安升为贤首宗三十六世法师，时人尊称他为“明公”。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成为佛教界的领袖，担任“僧录司正堂”，与名公巨卿来往不断，主持操办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驾崩后的诵经道场，名重一时。民国二十三年（1934），法安圆寂，承恩寺的住持一职由他的弟子云慧接替^⑦。

圣安俗姓杨，法名本谦，字圣安，是毗邻琅山村的雍王府村人，法安的师弟。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炮轰灵光寺后，圣安受八大处灵光寺住持海山邀请主持重修灵光寺，得到八大处各寺住持及僧人的拥护。他率人从招仙塔塔基中清理出弥足珍贵的佛牙舍利，使得灵光寺声名远播，各路僧侣纷至沓来。圣安一边精心妥善保护佛牙舍利，一边担任重兴灵光寺住持，组织重修灵光寺。工程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始，至民国十二年（1923）竣工，历时22年，建殿宇廊舍70余间，灵光寺焕然一新，更加著名。民国二十四年（1935），圣安圆寂，长门重孙墨林接任八大处二处重兴灵光寺的住持^⑧。

随着法安、圣安的相继离世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他们的徒子徒孙们，以普林为首沆瀣一气，联手盗卖庙产、盗伐树木，把原本还算殷实的承恩寺弄得处境维艰、案件频发，不再延续往昔的风光。

普林名寂春，与茂林、葆林、月林、墨林同为师兄弟，隆山、俊山是他的徒弟，体山、崇山是他的师侄。但他一向不务正业，偷鸡摸狗，在八大处重兴灵光寺、承恩寺、法海寺等处流窜作案，在僧人中声名狼藉。“查普林为重兴寺住持圣安之徒孙，系代其已故之徒显慧所收之徒，在十六岁时，因窃伊师祖圣安之物件及重兴灵光寺贵重物品被侦知后畏罪潜逃。民国十二年，在豫省军队入伍。十六年拐枪来京，不敢回庙，即将枪卖去，在北京各寺鬼混为僧。”^⑨档案还载：普林“骄奢淫逸、异常刁顽，其平素行为非仅有悖僧规，即俗家亦不屑，为地方人多嗤之以鼻，以无赖和尚、花和尚等绰号名之，其有害善良风俗，莫此为甚”^⑩。他经常在各个大庙之间流窜，且行踪不定，穿上家人服装，改名萧某，自称萧四爷，落脚处有西郊石景山下北辛安村、西郊八角村、西四牌楼北大街路西存古斋、前门外羊肉胡同十一号、西长安街忠信堂饭庄等地。承恩寺是他师伯祖法安住持的京西大庙，重兴灵光寺是他师祖圣安经营的京城名刹，仗着这些关系，普林经常混迹其间，骗吃骗喝，为非作歹。圣安之后，担任重兴灵光寺住持的是墨林，普林身为师兄，时不时在灵光寺闲逛生事，随意触犯佛门清规，惹得众僧对他极为不满，被僧团驱逐出灵光寺。但是，他在承恩寺和法海寺所做的不法行为一直没有得到遏制，特别是承恩寺的许多庙产（主要是地产和树木）惨遭他和他的徒弟毒手。

1931年8月，北平社会局接到坐落在西郊外五分署磨石口十四号的承恩寺的住持秀林的呈报：云慧病故秀林接座呈报备案，承恩寺庙照为民国十七年九月四日北平佛教会京字第九十号。住持秀林未到社会局接受询问，派贤良寺知客振海代为前往，声言庙在郊外，不能出租，田产收入淡薄，竭尽绵薄捐助（惠工学校）大洋六元。秀林那一年58岁，师父云慧于民国十八年（1929）病故，临危指派他于该年十月二十九日接座（即接充住持），特补办手续，担保人为东单牌楼北帅府胡同李文海^⑪。那一年承恩寺除了有庙地十四亩有余、毗连余地三十三亩、附属土地平地山地二顷零七亩以及云慧老和尚自置民红契地二顷二十八亩之外，还有房屋一百二十五间，附属房屋一百一十五间。神像有毗卢佛、释迦佛等七十余尊；铜钟、《法华经》等法器；房地约壹万伍仟伍佰肆拾元。附属土地房出租，所得租金用于收拾殿房及衣食。附属房屋每年租得洋元二十元。每月收入在三十元上下。每月助资佛教会洋一元^⑫。

秀林刚执掌承恩寺的前两年，“本庙执事五人，现住本庙僧人七人，有秀林、心慧、月林（管地）、成林（管殿）、体山、崇山、玉山。”普林发现秀林软弱可欺，趁机来到承恩寺，恃强凌弱，逐渐霸占了承恩寺，开始胡作非为。“自民国二十一年普林恃强入庙以来，无恶不作，如锯伐古柏、盗卖法物及处分庙产、吸食鸦片、赌博嫖娼等种种劣行，业经呈报钧局查明有案。”^⑬

从1932年到1947年的15年中，普林把持承恩寺庙务，发生盗卖承恩寺土地、树木、法物等案件多起，详列如下。

（1）盗伐树木。1936年，秀林圆寂后，普林曾拟将该寺房院及山坡全部出租给某人为牧场，因村民反对未能得逞。之后，普林又擅自锯伐古柏一百三十株，被举报后警察局传案在押未结。北京佛教会派调查部主任慧三等前往彻查，经调查普林所盗伐树木系承恩寺后山黄柏一百三十株，由中岛商会运走十九棵计二十七节，未曾运走一百一十一棵

计九十四节，均为承恩寺所有。

(2) 把持庙务。1937年4月至11月，普林为了全面控制承恩寺，向北平佛教会申请自己当承恩寺住持。被认为不妥当后，普林又心生一计，拉拢方丈庙意珠、真武庙心泉、天空寺月尘，极力推荐他的冒充徒弟本春接任承恩寺住持。北平佛教会经过调查，发现心泉并非真武庙住持，天空寺不在寺庙登记之册，认为不适合推举。普林不甘心，再请西城白塔寺东夹道方丈庙住持意珠、德胜门内孝友胡同心华寺住持通宝、西城护国寺街棉花胡同毗卢寺住持露祥等作保，推荐本春接充承恩寺住持管理庙务。如此三番，北平市社会局只好同意。但此事遭到本村乡绅薛厚田、梁德秀、仲天明、薛泽民、李子崇、李天祥等人的联名反对，他们上书揭发普林盗伐树木自肥等卑劣行径，建议将承恩寺改成十方常住寺庙。北平佛教会几经周折查明普林和本春串通，发通知撤销本春的住持职务，由佛教会暂行管理承恩寺财产，公推宝兴接任承恩寺住持。普林的如意算盘终于落空^⑭。

(3) 典卖庙地。1939年1月10日，新任承恩寺住持宝兴呈报北平市社会局，称普林在其接任前盗卖寺产，呈请社会局批准传唤普林到案追查地契。据宝兴呈报，该寺养僧田地不下五六百亩，有道南即宛平县界田地三顷六十亩，地契名义上是法安，已经被普林以秀林的名义分别典与模式口村人耕种；道北西郊界田地一顷多，地契名义上是云慧，也被普林以秀林名义典与模式口村人耕种；承恩寺圈内园田及塔院山坡地，被普林分别卖给他人作为安葬地。宝兴在该寺内检出1938年6月由普林、秀林共同签名的典契，将寺后一段有四至五亩数的地卖给马四，价银一百五十元。实际上，秀林已于1936年圆寂，根本不可能在1938年的卖地契约上签字。此外，普林还在本春代理承恩寺住持的短暂期间，公然盗卖庙地，并于最近在京召集承典人欲作价卖死或变卖给日本人和韩国人。普林隐匿承恩寺各项契据两大包袱，押在韩国人崔三甲家（住北辛安）。普林伙同日本人近藤将种地人马昆山打了一顿，强迫其把地交出。宝兴要求登报声明勿再使承典人受普林蒙骗，请社会局传唤普林到案严查地契并查办卖地经过。北京特别市把这一情况转告警察局追查。警察局鉴于普林素日行为不端，有前科，责成西郊警察署传唤普林到案。西郊警察署多次传唤普林，始终未获，上报市警察局备案^⑮。

(4) 构陷士绅。1941年1月18日，模式口村长马华亭等人呈报北平特别市公署社会局，呈请严惩凶僧普林及韩国人崔三甲陷害士绅事件。马华亭陈述了普林捏造事实，使地方公正士绅受陷的前后经过：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普林勾结韩国人崔三甲（系毒贩）捏造事实，报告石景山车站警务员大浦铁己误信谎言，将模式口村长马华亭、村副仲旭东传去捆绑责打拘押一昼夜，限期交出与普林有恩怨的前任村长薛厚田，呈请严惩凶僧普林及崔三甲等^⑯。

(5) 普林被抓。1941年10月，在宝兴等人的揭发检举下，警察局在北辛安高家抓获了普林，此时的普林化名刘念生。普林被解送到局后，供认吸食鸦片，地契抵押给日本人假本，得大洋一万元，又托白小山介绍转求蒋宾侯。宝兴等恳请警察局羁押普林，严查地契盗卖案^⑰。

(6) 卖地纠纷。1944年6月间，承恩寺僧人普林将坐落于西郊高井村的十二亩耕地（也是承恩寺的香火地）卖与张秀山，并订立了契约。此外，普林还将有关该地的一套红契凭证交予张秀山。但是，原来一直租种该地的白如文却声称该地早已由承恩寺住持云鹤年于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卖与自己，故而迟迟不肯将土地交予张秀山。伪造契约与真实契约并存，孰真孰伪，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产生了纠纷，因此告到了河北省高等法院^⑱。

除了普林盗卖承恩寺庙地外，其他不法僧人也趁机私拨承恩寺庙地：一是秀林于1936年擅与模式口村公所订立合同拨给庙地六十余亩，经模式口村长薛厚田、薛泽民等呈控属实，因此秀林被北京佛教会斥革（撤职），同时取消秀林与模式口拨地之原立合同，责令继任住持收回。直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这桩公案还没了^⑲。二是承恩寺祖师塔院孝义田五十亩，经墨林手违法永典与古城村廉树棠名下，到1944年还在交涉中^⑳。

四、关于承恩寺下院

据老人们讲，模式口小小一个村落，有寺庙28座，算得上名寺的，大寺有承恩寺、法海寺和慈祥庵三座寺庙，

其中承恩寺庙产最多，庙产数量大大超过了法、慈二寺之和。承恩寺家大业大、下院众多，居住的、做小本经营的入大多租用承恩寺的土地和房屋。那么，承恩寺到底有多少庙产、几处下院？长期以来，这个问题比较含糊，总是一带而过，笔者近年做了调查和梳理，初步认定以下8处是承恩寺的下院，或者称庙产。

（一）翠云庵

在开山住持永公塔院碑中，提到永公带人修建下院两区，一区字迹完好，为“一在高井村，曰翠云庵”，另一区字迹被凿毁，无法得知具体名称和所在位置^②。翠云庵在模式口大街西北的高井村，山门门额上镌刻有“翠云庵”三个字，端正秀丽，在修复前石额一直被遗弃在山门外的古槐树下。仅余二进院的正殿和西厢房，山门前的石狮曾摆在高井村口汽车修理厂门前。高井村原本还有僧坟、古塔，这些都与翠云庵有关。院里有两株古柏，至今长势依然很好。2006年3月29日，翠云庵被列为石景山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宸垣识略》卷十五转录清代诗人查慎行《西行翠云庵》诗：“乱石山有崎岖路，时听征车撼石声。行过翠云尘乍少，马头麦浪绿初成。”又记：“翠云庵在西山，由磨石口而进。”诗人途经磨石口隘口来到翠云庵，亲眼看见京西古道的坎坷不平与惊险难行，有感而发。

清《日下旧闻考》卷一〇四引《五城寺院册》“高井村北有翠云庵、净德寺”，又记乾隆时期有“磬一，明万历十三年造”。1928年，当时北平特别市社会局做过调查，翠云庵的山门左右原本各开有一个角门，有两进院，一进院有东西厢房各三间，耳房一间，二进院的二道门前面有一堵影壁，东西厢房各有三间，耳房各有二间，正殿是三间，左右还有客房各三间，大殿中供奉的是泥质三世佛，挂着一个铁磬，磬上铸万历十三年（1585）造，还有泥五供，以及《金刚经》一部，可惜抗战时一进院被毁坏了，现仅存寺额和大殿（图四、图五）。

值得注意的是，在翠云庵旧有的铁供器上铸有“嘉靖二年日月造翠岫庵供奉”字样^③。那么，这个翠岫庵在哪里？为什么它的铁供器会出现在翠云庵里？它是不是永公建的下院两区中的另一处呢？翠云庵、翠岫庵，从名称上看，似乎有某种联系。经过查阅古籍，只找到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这样描述：“翠微山，八大刹所在也。……循山北出杏子口，趋香山，则碧云寺、五华寺、玉皇顶、卧佛寺、宝藏寺，皆山之名刹，而不在八刹以内。此外皇姑寺、嘉禧寺、翠岫庵今皆废矣。庚子，‘灵光’，证果，毁于兵。”^④震钧寥寥数语，细腻精准地勾画出西山八大处及周边各处寺庙的位置和特色，他不仅提到了前文所说的开山住持宗永住持过的“宝藏寺”为名刹，还提到了“翠岫庵”，能和西山八大刹、香山碧云寺、皇姑寺相提并论的，绝不是普通寺庙，虽然和皇姑寺、嘉禧寺都成了废刹，



图四 翠云庵石额



图五 翠云庵大殿

但也能说明这座庙就在西山八大处附近，曾经名气不小。

（二）开山塔院

开山塔院俗称老塔院，也称祖师塔院。位于高井村翠云庵后，亦在永公塔院碑中提到。塔院是寺庙格局，有石狮子、山门、墓碑、墓塔、围墙等建筑。除了埋葬开山住持永公之外，还埋葬有后世高僧。1958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该庙较为完整，除永公塔和碑外，另有和尚墓碑13块，推断宗永之后的若干代住持与僧人安葬在承恩寺开山塔院中，可惜后来被毁^②。尽管目前尚不知这些僧人的名字和事迹，但有一点不可否认，承恩寺的法脉不仅传承有序，而且后继有人。当然，这些僧塔不是承恩寺住持的全部，有的住持埋葬在其他地方，知道的比如法安葬在八大处南边的贤良寺塔院里，圣安葬在八大处的塔院里。

（三）关帝庙

在承恩寺东侧有一座关帝庙，二进院落，门额上镌刻“敕封三界伏魔大帝庙”，且位于承恩寺高大的院墙之内，毫无疑问是承恩寺的下院之一。只是这座寺庙建造年代晚于翠云庵等下院，从它命名的年代看，关羽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所以这座下院与承恩寺建造时间不在同时，是承恩寺的附属建筑。

（四）西塔院

承恩寺之西侧原有一处塔院，俗称“西塔院”，德瑞住持圆寂后，埋在这个塔院里，此外还有哪些僧人尚不太清晰。承恩寺西曾有太监墓，原有一座牌坊，上面镌刻着“乐善好施”四个大字，墓主为明代乾清宫牌子尚衣监太监张升，1956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此发掘出土张升墓志铭。张升是隆庆、万历、天启三朝的元老太监，他最大的功劳是给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修建“发祥工程”，即“修溇邑永乐店慈圣皇太后发祥工程”，工程竣工后，受到万历帝的嘉奖，此后仕途平步青云，直至乾清宫牌子太监，卒于天启元年（1621），“兹卜葬于阜成关外磨石口地方承恩寺之侧”^③。这么一个皇帝眼前的当红太监，死后埋葬在承恩寺旁边，按照惯例那他生前应该出资修过承恩寺，最起码捐过一定数量的香火钱，否则不会死后葬在这里。这从侧面反映出承恩寺在明代末年至少得到过宦官的维修和保护。

（五）翠峰庵

在清初著名文人顾贞观撰、今人张秉戍笺注的《弹指词笺注》一书中，录有顾贞观所作词《昭君怨》一首，全词如下：

昭君怨

夜宿翠峰庵，为西山承恩寺下院。

真个而今亲试。月白霜浓萧寺。佛阁梦双凭，第三层。

何处银饼素纆。暗入远钟疏磬。一滴下杨枝，乍醒时。^④

顾贞观为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四世孙，清代文学家，工诗文，词名尤著，与陈维嵩、朱彝尊并称清初“词家三绝”，同时又与纳兰性德、曹贞吉共享“京华三绝”之誉，著有《弹指词》《积书岩集》等。《弹指词笺注》是资深清词研究学者张秉戍对清代知名词人顾贞观代表作《弹指词》进行的笺注。

先说说顾词《昭君怨》前注，明确写着“夜宿翠峰庵，为西山承恩寺下院”，就与模式口承恩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诗人不仅在承恩寺下院翠峰庵住宿，还借景抒怀赋词一首。承恩寺及其下院历来是明清文人墨客京西游览探胜的必经之处，也是下榻的最佳地方。从今天能找到的明清之际诗作看，西山一些大的寺庙经常是文人官僚游览或公务住宿的胜地，因为古时候交通不方便，到西山游览往往不能当天返回京城，于是不少人选择住宿在承恩寺及下院翠峰庵，如顾贞观、醇亲王奕譞、宝璽等，偶尔也有人住在邻近的法海寺，如颜光猷、钱维城等。明代大学士李东阳在《承恩寺记》^⑤中写到，他年轻时游历西山不下数十次，对翠微山之胜非常熟悉，所以愿为承恩寺做记。

再探究翠峰庵具体位置在哪里。经过详细查阅国图明清碑刻拓片，觅得一张翠峰庵碑的拓片，碑在西城区翠峰

胡同。据碑文记载，这座寺庙由司礼监太监张诚为感恩圣上建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城内在西直门内往南一里许建精舍一区，出现了地名翠峰胡同，可见其当时影响力挺大。这座翠峰庵一庙两址，城外的庙址在田村，张诚另和田村购置房舍一处、土地二顷建寺，延僧薰修，寺庙名称也叫翠峰庵，“故今都内外仁祠相望”²⁸。田村所在的位置离西山不远，往西北瞭望便是重峦叠嶂、翠绿一片的西山，正西对着翠微山。明代洪熙皇帝特命名大圆通寺（今八大处六处香界寺）所在的山为翠微山，之后翠微山的范围逐渐扩大，周边的山峰出现了不少跟“翠”字有关的，翠峰山是其中的一座。《大明一统志》云：“翠峰山在府西五十里，又名遮风岭……”“桃花峪在府西四十里，介乎翠峰、遮风间。”²⁹有专家推断桃花峪大体位置在模式口福寿岭和蟠龙山中间的馒头山上。这里每年阳春三月，漫山遍野桃花盛开，灿烂如霞；夏季葱茏翠绿，满目清新。馒头山、桃花峪、蟠龙山、福寿岭、翠峰山等均属于广义的翠微山范围。当时大太监张诚或许是考虑到寺庙邻近翠微山，又受翠峰山启发，便为寺庙取名翠峰庵。张诚田村翠峰庵庙址正好毗邻承恩寺初建时买的锦衣卫右所百户赵弘远等田村三顷余地，那是承恩寺建寺之初买的香火地，明确写在《承恩寺敕谕碑》碑文中。张诚晚年势败后，他的寺庙极可能被皇帝赐给他人或者本人变卖，被邻近的承恩寺获得也在情理之中。不管上述推论能否成立，有一点不容置疑，翠峰庵是模式口承恩寺的下院，其庙址应离承恩寺不远，诗人顾贞观饱览北京西山美景后，住宿在翠峰庵，想必承恩寺也是他游走过的景点之一。

（六）青塔院

前文提到，1931年北平市社会局寺庙调查档案中明确指出青塔院为承恩寺下院，住持为妙慧。此处塔院是云慧老和尚当任期间购买民间土地辟作塔院，可能到了民国时西塔院和开山塔院已经没有空闲地方埋葬僧人了，只好另买吉地。经查证，青塔院在现海淀区沙窝西口往南，原有青塔村，2021年成立青塔街道办事处，包括青塔东里社区、青塔西里社区等14个社区，2个行政村。

（七）观音庵

前文提到，承恩寺住持宝兴呈请收回模式口及观音庵庙地七百余亩，他已收回六百余亩（皆为普林典押盗卖），唯模式口乡公所占用庙地六十余亩，村西头观音庵一处及附属山地一段（二十亩）流入外人之手，尚未收回，请社会局予以支持³⁰。这条记载充分证明模式口村西头的观音庵也是承恩寺的附属寺庙之一，也在下院之列。

（八）南菜园

前文提到，1939年1月10日，新任承恩寺住持宝兴呈报北平市社会局，该寺养僧田地有五六百亩之多，包含道南即宛平县界田地三顷六十亩³¹。模式口村在民国时期，以古道为界，道南属于宛平县，道北属于顺天府。而道南的菜园，即今天北京九中校园所在处，历史上一直是承恩寺的庙产，专门种植蔬菜瓜果，雇人耕种、管理，一街之隔却不在一个行政区内，也被人们视为下院之一，现仍存百年以上老柿子树、核桃树、黑枣树、国槐、侧柏等20余棵。

小结

综上所述，明代承恩寺在4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庙产（主要指该寺庙各种类型土地）呈现锐减趋势。明朝正德年间有将近30顷田地，前后至少8处下院，均为太监温祥和开山住持宗永及后世僧人出资购买，既有至高无上的皇帝下旨保护庙产的敕谕，又有高僧大德住持坐镇，还有当朝大太监撑腰。有明一代，承恩寺的政治地位比较高，经济基础雄厚。进入清代，逐渐走下坡路，尚能维持寺庙生计，表现为寺庙建筑规制等级降低（大雄宝殿规制低于天王殿），出资修缮仅靠礼王府太监、礼亲王等贵族、官员、附近商铺、煤窑、村落捐款维护修缮，被传为礼王府的家庙。到民国年间，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承恩寺土地庙产锐减到四五顷，还被劣僧普林等人以各种不正当手段盗卖、烂租，陷入了住持更迭频繁和庙产纠纷不断的泥潭中。这种乱象前后持续了十几年，导致承恩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江河日下，举步维艰，京西大庙的名号已经不复存在。

- ①《承恩寺敕谕碑》，《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4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页。
- ②[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十四，中华书局，1985年，第1790页。
- ③②①《明故僧录司左觉义兼承恩堂上开山第一代住持寿堂永公大和尚塔院碑记》，《石景山文史》第二十七辑《石景山历代金石碑刻选》，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第592—593页。
- ④⑥⑨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⑳㉑《西郊区承恩寺僧人秀林登记庙产、更换住持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批示、通知》，北京市档案馆，档号：J-002-008-00326。
- ⑤《重修承恩寺开山第一代住持永公大和尚塔院碑记》，《石景山文史》第二十七辑《石景山历代金石碑刻选》，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第594—595页。
- ⑦⑧于书江：《承恩寺内出名僧》，政协石景山区委员会编《石景山文史》第十三辑《模式口专辑》，2006年，第468—475页。
- ⑩《北平市警察局郊五警察分局关于查获法海寺僧人体山等盗卖树墩及木料案请讯办的呈文》，北京市档案馆，档号：J181-27-05062。
- ⑰河北省档案馆藏，民国河北高等法院档案，档号：634-12-1544。
- ⑲《石景山文史》第二十七辑《石景山历代金石碑刻选》，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前言第3页。
- ⑳震钧：《八大刹》，载何薇编著《北京漫游记》，河海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81页。
- ㉑北京市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编：《石景山文物（第五辑）普查编研资料专辑》，第733页，有承恩寺老塔院平面示意图，2012年，第730—734页。
- ㉒《皇明乾清宫牌子尚衣监太监慧庵张公墓志铭》，《石景山文史》第二十七辑《石景山历代金石碑刻选》，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第574—575页。
- ㉓[清]顾贞观撰，张秉成笺注：《弹指词笺注》卷中，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文津出版社，2017年，第146页。
- ㉔[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〇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722页。
- ㉕《翠峰庵碑》，收入《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8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 ㉖[明]李贤等奉敕修：《大明一统志》卷一，天顺五年内府刊本，第9、14页。
- ㉗《承恩寺僧人送寺庙登记表及社会局的批示》，北京市档案馆，档号：J-002-008-01366。

延庆旗人、旗庄与八旗驻防探源

杨程斌

清兵入关后，在京师周围的直隶地区圈占了大量“旗庄地”。今延庆地区在清代大部分为“旗庄”“皇庄”，分别归属满洲王爷和汉军八旗等，产生了很多“投充旗下”之人，延庆现有14个满族村，大多为“投充人”后代。为拱卫京师，清廷在京师周围的直隶地区驻防了大量八旗军队。今北京密云、昌平、延庆等地清代曾属直隶，扼守交通要道，地理位置重要，驻有较多八旗军队，今延庆千家店曾设满洲八旗驻防。有清一代，延庆旗民人命诉讼之事属专管旗人事务的独石口厅管理，今延庆千家店、珍珠泉等地区为独石口厅属地，不属延庆州。今延庆地区在历史上曾与“八旗”产生过错综复杂的联系。研究延庆地区的旗人、旗庄、八旗驻防，不仅可以还原八旗在延庆的生活、驻防历史，也可为延庆的满族村追根溯源。

一、延庆与旗人的渊源

延庆扼控居庸关，是从北面进入北京的必经之地。早在皇太极时期就多次经延庆南下进攻明朝。明崇祯七年（清天聪八年，1634）七月“清兵四略永宁”“永宁边兵遇之，败绩”^①，《明季北略》记当年七月十四日清兵“驰入永宁”^②，此永宁即明代永宁县、永宁卫，在今延庆永宁镇。这是旗人第一次进入延庆。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清兵第三次入关，七月，皇太极弟阿济格等“会师出延庆州，俘人畜一万五千有奇”^③。这是旗人第二次进入延庆。清兵入关定鼎中原之前旗人已经涉足延庆了。

《满汉名臣传》记雍正六年（1728）直隶总督宜兆熊疏言：“宣化府属之保安、延庆二州旗民杂处，向无武弁防御。”^④证明最晚在雍正年间，延庆已经生活了很多旗人。

与延庆相邻的张家口厅、独石口厅、多伦诺尔厅“口北三厅”有大量旗人，延庆旗民人命诉讼事属独石口厅（治所在今河北省赤城县独石口镇）管理。成书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的《口北三厅志》载：“独石口理事同知。雍正十二年设，管理独石口外东翼（笔者注：也称察哈尔左翼）正白、镶白、镶黄、正蓝四旗逃、匪、命、盗等案，并口内延庆、怀来、龙门、赤城四州县旗民互讼人命之事。”^⑤旗民诉讼事归独石口厅管理，佐证清代延庆应有很多旗人。

延庆的旗人情况也可从清代初期延庆知州的籍贯中一窥究竟。乾隆《延庆州志》载知州：“廖文元，辽东人……王振祖，正白旗人……唐翰弼，正黄旗人。熊启印，辽东杏山人……李兆龙，厢白旗人。武登科，奉天人。于翔汉，奉天人……甘国埏，汉军正蓝旗人。宋永清，汉军正黄旗人。高国楹，奉天正黄旗人。”^⑥据此可知，清初延庆州前15个知州中有6个旗人和4个清朝比较信任的辽东、奉天（今辽宁）人，这在清朝其他以汉人居多的州、县是较少见的。按清代惯例，旗民居多的地方多由旗人州官管理，也可反证清代前中期延庆应有很多旗人。

于成龙、王秉韬是清代延庆最著名的旗人。两人经历极为相似，祖籍都是辽东人，均属汉军镶红旗，都当过“河道总督”，而且都是治水能臣。于成龙是奉天盖平人（今辽宁盖州），曾任镶红旗汉军都统，官至直隶巡抚、河道总督，深受康熙皇帝信任。《于成龙年谱》记其“十三岁，移居延庆州，治举子业。……十五岁，李恭人来归”^⑦，也就是于成龙在13岁移居延庆，开始上学，15岁娶了李夫人。于成龙在延庆至少生活了两年。和于成龙不同，王秉韬的墓在延庆。1984年，在延庆大丰营村（其墓原属大营村，后墓地划给了大丰营村）征集到了王秉韬墓

志(图一)^⑧。今大营村是延庆著名的满族村,以王姓居多。王秉韬虽然祖籍辽东,但有可能出生或落籍延庆州大营。清兵入关后,很多辽东汉军旗人到内地为官,举家南迁,王秉韬家族应属此类。于成龙、王秉韬是清代两位著名的汉军旗人官员,他们祖上即为汉军旗人官员,他们家族选择在延庆生活,证明作为京畿的延庆应有很多旗庄和旗人。

二、旗庄、皇庄地与旗人的由来

清朝定都北京后,不仅在直隶地区驻防八旗,且在环京师五百里州县俱有旗庄地,今延庆盆地在清代大部分是“旗庄地”。清代早期,延庆就曾拨给顺义、怀柔、平谷等京师周围州县土地,以补偿他们被旗人圈地后的损失。

(一) 西部盆地旗庄地的分布

康熙朝以后,旗人在延庆州大量圈地。光绪《延庆州志》引乾隆《延庆州志》对其有所记载:“镶红旗庄亲王地,在东关、小营等处。平郡王地,在南新堡。惠郡王地,在刘家堡。公地,在东关、军营等处。镶红旗满洲地,在米家堡、双营、大泥河等处。镶红旗蒙古地,在东新庄等处。镶红旗汉军地,在东关、老人庄、大泥河等处。正白旗蒙古地,在西河屯等处。镶白旗蒙古地,在西关等处。镶黄旗蒙古地,在白龙庙、五里营、小桥等处。镶红旗汉军地,在大营、丰家营、白龙庙等处。雀户地,在吕家场。果地,在永宁等处。乾隆志云,旗地历年久远,亩无从稽查,不能悉考,不能悉载,谨录大略如右。”^⑨以上村庄名称与今名基本可以对应,满洲、蒙古、汉军旗庄地皆有,还提到了三位王爷的地。庄亲王是清代铁帽子王之一,始祖为皇太极第五子硕塞,后代世袭。平郡王属多罗克勤郡王,是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始祖是代善长子岳托。硕塞嫡次子博翁果诺被封为多罗惠郡王,后代世袭。《延庆州志》还提到了镶红旗汉军地,在大营、丰家营、白龙庙。此大营在今大营村北,丰家营演变为现在的大丰营和小丰营村,白龙庙即原西白庙村。前面提到王秉韬是镶红旗人,这与大营旗庄地的旗籍也是相符的,也可佐证王秉韬是大营人。

明确记载的十处旗庄地中,有五处是镶红旗地,其中有两处汉军镶红旗地,与于成龙、王秉韬旗籍相符。

(二) 西部盆地旗人的由来

西部盆地旗庄地分属满洲王爷和汉军、蒙古旗人。汉军和蒙古旗人落籍、定居在延庆,但占延庆总人口比例不多。延庆州的土地原来大部分归属汉族地主所有,旗人“圈地”后,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带地投充”,成为“投充旗下”之人,还有很多“个人投充”。这些人虽然是旗人的奴仆,但也纳入旗档,成为旗人。所以,在旗庄地分布较多的延庆西部盆地地区,出现了很多在旗汉人庄头及雇农,即汉族投充人。

延庆14个满族村中,小营村、南辛堡村、大营村3个村庄与《延庆州志》所记“旗庄地”方位完全吻合。东官坊村紧邻“旗地”大营村,老百姓将“皇庄、旗庄”俗称为“官庄、官地、王庄”等,东官坊村名来历应与此有关。今东官坊村满族人的祖上很可能是汉军八旗人。清代对土地管理者和农户,分别出现了“庄



图一 《王秉韬墓志》拓片局部(照片由延庆区文物管理所所长于海宽提供)

头”“庄户”等多种叫法，今小庄科村曾名“庄户”，即为给“官庄种地的民户”，即“个人投充者”。慈母川村清代属昌平州（今北京昌平）管辖^⑩，旗人在昌平州也圈占了大量“旗庄地”^⑪。另有王仲营、冯家庙、南老君堂、新华营、吴坊营、东灰岭、南张庄7个村庄与上述“旗庄地”方位略有不符。这些村庄都位于清代延庆州城（今延庆城）20千米范围内，与旗庄地距离较近，很可能是当年没有“带地入旗”的农民，即“个人投充者”后代。

综上，汉军、蒙古旗人和“投充”的汉族庄头和雇农构成了清代延庆西部盆地旗人的主体，“投充人”占旗人的大多数。大营、东官坊村居住的是祖上来自辽东的汉军八旗人，是地主，也是延庆地位最高的旗人。“投充”的地主和农民虽然加入了旗籍，但是严格来说，他们仍是“纯正”的汉族，和辽东迁居的汉军旗人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因为辽东汉人长期生活在关外，与女真、蒙古等民族杂居，交流频繁，且很早就加入了旗籍，所以，从生活习俗上讲，和关内汉族已经完全不同了，和满洲人倒是有些相似。不仅如此，汉军旗人作为最早支持满洲人的“盟友”，地位比关内汉族人高很多。今延庆西部盆地地区除大营、东官坊村是汉军八旗后代外，其余基本为汉族庄头、农民后代，严格来说，是汉族旗人后代，不是满族。据《延庆州乡土志要略》所记，延庆州（不包括千家店、珍珠泉）在清末有旗户男2556人，女1163人^⑫，旗人占比并不算太大。

（三）东部山区旗庄地的分布

今延庆千家店和珍珠泉在清代曾长期隶属独石口厅。根据光绪《延庆州志》疆域图（图二），今千家店、珍珠泉都不属于延庆州。光绪《畿辅通志》载独石口厅辖丁庄湾、黑河川、东卯镇、千家店四处地方^⑬，证明千家店在清代隶属直隶省口北道独石口厅。《口北三厅志》记独石口厅山川包括花盆岭、菜树岭、仓米道岭^⑭，以及白河、黑河^⑮、珍珠泉、滴水壶、龙潭^⑯等，皆在今千家店、珍珠泉界内，又记独石口厅“南三百七十里至珍珠泉与延庆州交界”^⑰。千家店在珍珠泉以北，证实清代千家店、珍珠泉隶属独石口厅，不隶属延庆州。

《口北三厅志》记载了分管千家店、延庆州巡检管辖的47个村窑^⑱。在今延庆界内的有“小川、下马路沟、大石窑、熊洞沟、八道河、六道河、白河口、



图二 光绪《延庆州志》延庆州东部疆域图

九岭梁、石槽、石槽梁、黄石寨、上花楼、下花楼、珍珠泉、庙儿梁、杏叶沟、山神庙、前仓米道、后仓米道、东南天门、红石湾、西千家店、东千家店、白塔儿、多罗湾、奶子山、菜木沟、滴水壶、四潭沟、平台子、首领沟、转山子、花盆镇、牯牛沟、忽拉岭、哈拉魁、黄土梁”。这些村庄与今名基本对应，大部分属于千家店，少部分属于珍珠泉、刘斌堡、四海。《口北三厅志》又记以上村庄“系左翼（笔者注：指察哈尔左翼）镶黄旗”^⑲，证明这些村庄土地属于察哈尔左翼镶黄旗。

据《钦定八旗通志》所记，千家店有2400亩旗庄地^⑳。乾隆六年（1741）管理独石口等处副都统宝善六月十五日（7月27日）奏：“……千家店兵丁每名赏给官房二间，地六十亩；……”^㉑千家店共驻防八旗官兵43名，共有2580亩土地，这些土地属于千家店驻防八旗。暂未能查到察哈尔左翼镶黄旗在千家店、珍珠泉土地的具体亩数。

（四）东部山区旗人的由来

《钦定八旗通志》载千家店“俱镶黄旗各佐领家人庄头地”^㉒，佐领是清代八旗组织基本单位名称，隶属“防守尉”，正四品。那么，清代千家店是察哈尔左翼镶黄旗各佐领家人“庄头”的地，也就是今千家店、珍珠泉及少部分刘斌

堡、四海的土地属于察哈尔左翼镶黄旗各佐领家人，佐领家人让庄头帮他们管理土地。明末清初，千家店、珍珠泉基本处于荒无人烟的状态，可能只有少量汉族地主。推测旗人在千家店、珍珠泉圈地的时候，这些汉族地主“带地入旗”，成为帮助佐领家人管理土地的庄头。

《口北三厅志》记载当时千家店、珍珠泉等地有32旗户，644民户，共有1283人^②。按一户5人算，共有160名镶黄旗庄头旗人，其余为1100余名民人。明末清初时期，千家店和珍珠泉地区荒无人烟，所以只能从其他地区招募农夫，这些农夫不是“本地人”，无法投充获得旗籍，这也是现在千家店和珍珠泉没有满族村的原因。

（五）珍珠泉皇庄地

珍珠泉不只有旗庄地，还有皇庄地。乾隆《延庆州志》记：“皇庄地，在永宁东珍珠泉。”^④皇庄地是指皇室内廷管理的土地，与八旗所有的旗庄地不同，地位更高。但皇庄地也不是皇帝直接管理，而是指归内务府、皇族、八旗武官管理的田庄。清代的皇庄主要分布于京畿、盛京地区，设庄头管理壮丁进行生产，所获交广储等库，是皇室开支的主要来源。如果是汉人佃户种地还要交租金，皇帝有时将部分租金用于国事，如救灾、军费等。

乾隆十年（1745）的《恩准四海口外民人出入碑》记有“珍珠泉镶黄旗……于明宝；珍珠泉镶黄旗……于大焕”。前述千家店、珍珠泉为察哈尔左翼镶黄旗地，碑文所记镶黄旗即为察哈尔左翼镶黄旗。于明宝、于大焕是汉人名字，他们的名字能写在碑刻中，证明在珍珠泉的身份地位是比较高的。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于明宝、于大焕祖上是珍珠泉的地主，地被旗人圈占后，“带地入旗”成为庄头，这才有了旗人的身份。庄头可以继承，所以，在乾隆初期，珍珠泉于姓地主后人于明宝、于大焕继续担任庄头，为旗人看管土地。千家店、珍珠泉大部分土地属于察哈尔左翼镶黄旗，所以，于明宝、于大焕入的是镶黄旗。现在珍珠泉仍有很多于姓人，应该就是于明宝、于大焕的后人。

《口北三厅志》载：“珍珠泉。四海冶口东十里，源出平地，方广可半亩许，深六尺余，澄澈见底，清冷异常。其泉口沸，盘旋自下而上，如珍珠万琲喷散，水面源源不绝，池侧有小渠分流四注，左右田数百亩皆借以灌溉焉。”^⑤很可能是因为有好的泉水灌溉，所以，清廷才在这里设立皇庄地。珍珠泉的皇庄地就在现在的珍珠泉泉水周围。

三、千家店八旗驻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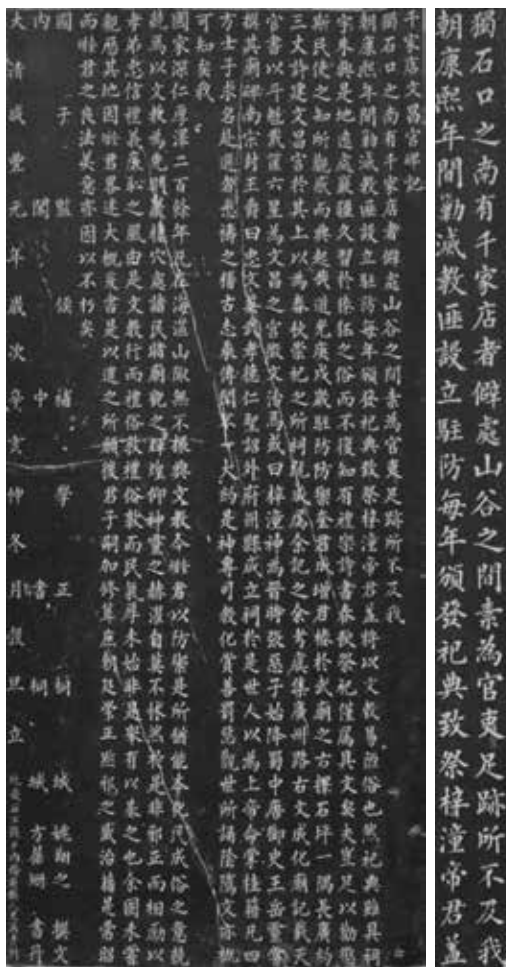
（一）设立八旗驻防

千家店八旗驻防的设立与剿灭“教匪”有关。刻于咸丰元年（1851）的《千家店文昌宫碑记》载：“康熙年间剿灭教匪，设立驻防。”（图三、图四）这个“教匪”有可能就是当时较为猖獗的白莲教徒。

史料对千家店八旗驻防有明确记载（图五）。成书于乾隆四年（1739）



图三 存放于延庆原千家店中学内的文昌宫碑（照片由延庆区文物局研究员范学新提供）



图四 《千家店文昌宫碑记》正面拓片及局部（照片由延庆区文物局研究员范学新提供）



图五 乾隆《延庆州志》千家店地图

的《八旗通志》载：“千家店驻防：康熙五十年，奉旨设立。以营盘口外千家店、花盆、龙潭等处现有房地，拨独石口章京一员、拨什库四名、甲兵三十六名，驻防千家店等处。计给章京衙署一所，八间。甲兵营房，各二间。雍正七年，添设章京一员，十年，延庆州盖给章京衙署一所，十六间。”^{②6}成书于嘉庆年间的《钦定八旗通志》记载更为详细：“千家店驻防。康熙三十二年，赤城县拨给正白、镶红两旗下披甲地共四顷。在样田堡、镇安堡。（本县来册）。康熙五十年六月，延庆州拨给章京一员，地三顷。兵丁四十名，共地二十四顷。俱镶黄旗各佐领家人庄头地。雍正七年闰四月，自独石口续添给千家店章京一员。十一年，拨给延庆州地三顷。（本驻防来册）。”^{②7}综合以上两条史料，千家店八旗驻防正式设于康熙五十年（1711）^{②8}，至嘉庆年间，共有章京二员，官兵40人，章京衙署两所。

《八旗通志》记雍正十年（1732）“延庆州”曾为千家店盖章京衙署一所，为什么是延庆州盖衙署而不是独石口厅？这涉及清代千家店的归属问题。乾隆《延庆州志》记康熙五十九年（1720）“边外千家店地方并归州管理”^{②9}。据此可知，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以后千家店、珍珠泉属延庆州。《清史稿》载雍正十二年（1734）“置独石口厅”^{③0}，自雍正十二年（1734）开始，千家店、珍珠泉归属独石口厅，直至清亡。所以，在雍正十年（1732），仍由延庆州为千家店盖章京衙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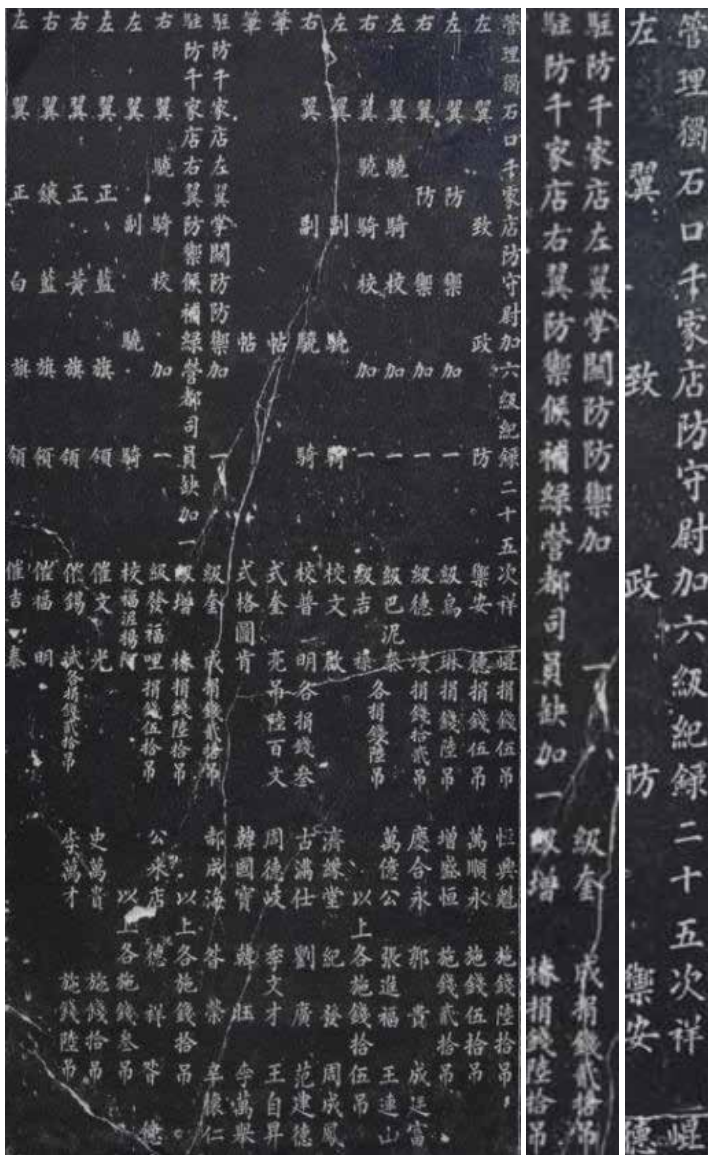
（二）千家店八旗隶属

立于咸丰元年（1851）的《千家店文昌宫碑》碑阴记有“管理独石口千家店防守尉……祥昆……驻防千家店左翼掌关防防御……奎成，驻防千家店右翼防御……增椿”（图六）。“管理独石口千家店防守尉”，证明独石口和千家店只有一个防守尉。

《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载：“管理独石口千家店防守尉萨泰……光绪三十年……”^{③1}文中只云独石口事而未记千家店，佐证了独石口防守尉兼管千家店。道光二十九年（1849）察哈尔都统双德等奏：

“据署独石口防守尉……呈称，独石口……千家店官兵住房，……”^{③2}再证千家店八旗驻防归独石口防守尉管辖。

《钦定大清会典》记：“独石口防守尉所属八旗……兼辖之千家店防御……”^{③3}证明独石口防守尉“兼辖”千家店“防御”。防御是八旗官员，受防守尉管辖。防守尉是清朝驻防八旗中的专城将领，设于直隶及盛京地区的一些城镇、关口，正四品。总掌本城镇旗籍和防守事务。下设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官。分别由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等兼辖。光绪《畿辅通志》记：“镇守察哈尔地方都统一员（驻万全县张家口）。副都统一员。……独石口防守尉



图六 《千家店文昌宫碑记》背面拓片及局部（照片由延庆区文物局研究员范学新提供）

一员。……千家店防御二员。……”又记谨案：“察哈尔都统、副都统，总理察哈尔游牧事，统辖张家口、独石口、千家店三处驻防。”^⑤证明千家店八旗最高官“防御”归属于察哈尔都统、副都统下的独石口防守尉。

（三）八旗武官

雍正《畿辅通志》载千家店：“防御一员，康熙五十年设。”^⑥证明康熙五十年（1711）千家店始设“防御”。《口北三厅志》载：“千家店防御。康熙五十年自独石口派拨防御一员移驻西千家店，雍正七年添拨一员移驻东千家店，乾隆元年添设骁骑一员，驻防花盆镇。”^⑦“骁骑”即骁骑校。证明雍正七年（1729）千家店开始同时设置两名防御，乾隆元年（1736）首设骁骑校。立于宣统三年（1911）的《千家店朝阳寺碑》记有“防御隆丰、永兴”（图七），证明终清一朝千家店八旗驻防官员只设有两名防御。

“防御”即前文所云章京，是“清朝驻防八旗之基层军官，位在佐领之下，骁骑校之上。正五品。凡驻防之处丁少而不足治以佐领者，皆置防御治之，或专设，或与佐领兼设，视驻地营丁多寡而异。掌所辖驻防户籍，以时颁其教戒”^⑧。与延庆知州官职（正五品）平级，由此可见清代千家店政治地位之高。骁骑校是八旗组织中基层编制单位的副长官，位在佐领之下，也是骁骑营的下级武官，协助佐领管理所属户口、田宅、兵籍，以及骁骑营操练、守卫等事务。正六品官。

《口北三厅志》记载了5名满洲八旗防御和一名骁骑校^⑨，《千家店文昌宫碑记》记有防御奎成和增椿，《重修千家店朝阳寺碑记》记有防御隆丰和永兴。乾隆十年（1745）的《恩准四海口外民人出入碑》记有“驻防千家店镶蓝旗防御章京一员……索住……驻防千家店镶黄旗防御章京一员……富昌”，又记“驻防千家店正黄旗骁骑校一员……关成保”。目前共能查到的千家店驻防八旗有9名防御和两名骁骑校，如表一。

表一 千家店八旗官员信息表

姓名	官职	旗籍
阿代	防御	满洲镶蓝旗
杨柏	防御	满洲镶蓝旗
索柱（索住）	防御	满洲镶蓝旗
勒世太	防御	满洲镶红旗
富长（富昌）	防御	满洲镶黄旗
奎成	防御	满洲
增椿	防御	满洲
隆丰	防御	满洲
永兴	防御	满洲
乌兰泰	骁骑校	满洲镶蓝旗
关成保	骁骑校	满洲正黄旗



图七 《重修千家店朝阳寺碑记》正面拓片及局部（照片由延庆区文物管理所所长于海宽提供）

《口北三厅志》载：“千家店驻防满洲官兵。防御二员，岁支俸饷银每员八十两。骁骑校一员（驻防花盆镇），岁支俸饷银六十两。”^⑳俸禄比较高。

（四）八旗甲兵

《钦定大清会典》记载了千家店甲兵情况：“千家店八旗防御所属，八旗满洲，领催四人，骁骑三十六人。”^㉑文中“八旗满洲”，证明驻防千家店的八旗均为满洲八旗。领催是八旗军低于骁骑校的下级军官，满洲八旗每佐领下设6人，由马甲选充。前述千家店只驻有一名骁骑校，此“骁骑”应该就是低级甲兵。《八旗通志》记千家店有“拔什库四名，披甲兵丁三十六名，……”^㉒。拔什库是满语，即汉语领催。《钦定大清会典》所记骁骑就是甲兵。

《口北三厅志》记载了千家店八旗甲兵的分布情况：“千家店驻防满洲官兵……马甲兵四十名（内西千家店马甲十名，东千家店马甲十五名，花盆镇马甲十名，白塔儿马甲五名）。以上岁支官俸、兵饷、马乾等银一千二百四十两，米八百八十石（俸饷银于直隶藩库支领，月米于延庆州就近支领）。”^㉓证明领催也可算为甲兵，共计40名甲兵。这些甲兵的“月米”由延庆州支出，佐证千家店在清代虽然隶属独石口，但因地近延庆，与延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光绪《延庆州志》记载了千家店八旗兵的兵器：“盔甲四十三顶副，腰刀四十三口，弓四十七张，箭八百六十支。”^㉔道光十九年（1839），千家店八旗增加了“六力官弓”。道光帝谕：“所有张家口驻防满洲、蒙古十旗，及独石口、千家店二处，每旗、每处准其添制六力官弓各二张。”^㉕

综上，清代千家店八旗驻防皆为满洲八旗兵，无蒙古和汉军八旗，军事地位较高。有清一代，千家店常驻43名满洲八旗官兵，算上家属，按每户5人算，共有215人。加上前述160名千家店、珍珠泉汉军镶黄旗庄头和家人，清代千家店、珍珠泉共有约375名旗人，远低于清末延庆州的3719名旗人，这肯定和千家店、珍珠泉“个人投充者”较少有关。

（五）设立千家店驻防的意义

察哈尔是蒙古的一个部落，蒙古最后一位大汗林丹汗即出自此部落，曾与皇太极反复交战。“布尔尼之变”后，康熙皇帝将察哈尔单独编为八旗，从东北迁居于宣化（今河北张家口）、大同边外，千家店地属察哈尔左翼镶黄旗，位于察哈尔部的南缘。千家店北通朔漠，南可经四海直奔京师，地理位置较为重要，在此驻防八旗既可盯防察哈尔部，及时将察哈尔部的活动情报传递京城，也可以剿灭隐匿在山中的教匪。满洲八旗是清廷最信任的军队，只有驻防满洲八旗才能更好完成盯防察哈尔的任务，这是在弹丸之地千家店驻防满洲八旗的根本原因。

四、结论

综上所述，清代延庆州不包括今延庆千家店、珍珠泉。清初在延庆州大量圈地。今延庆东关、小营村是镶红旗庄亲王地。南新堡村是平郡王地。刘家堡村是惠郡王地。米家堡、双营、大泥河村是镶红旗满洲地。东关、老银庄、大泥河村是镶红旗汉军地。大营、大丰营、小丰营、原西白庙村（老白庙）是镶红旗汉军地。小河屯村是正白旗蒙古地。西关村是镶白旗蒙古地。原西白庙（老白庙）、东五里营村是镶黄旗蒙古地。另外还有一处东新庄，不能确定现在的方位，是镶红旗蒙古地。这些旗庄地分属满洲王爷和汉军、蒙古八旗所有，所以，清代有很多汉军旗人落籍、迁居延庆。以上10处旗庄地中，有5处为镶红旗地，证明清代延庆州居住了大量汉军、蒙古等镶红旗人。曾在延庆居住，生活的清代河道总督于成龙、王秉韬都是汉军镶红旗人。汉军、蒙古旗人仍是延庆州旗人的少数，剩下的多数为“投充”旗人。这些旗人广泛分布于今延庆西部盆地的“旗庄地”，构成了延庆旗人的主体。清末延庆州共有3719名旗人。今延庆14个满族村除大营、东官坊村是汉军八旗后裔外，其余村庄基本为“投充人”后代，严格来讲，都不是满族。

清代千家店、珍珠泉属独石口厅管理，有很多察哈尔左翼镶黄旗的旗庄地，地属镶黄旗庄头管理，有2580亩土地属千家店驻防八旗所有。珍珠泉是今延庆行政区划内在清代唯一设有皇庄地的地方，由当地于姓汉人庄头管理，地在今珍珠泉泉水附近。清代千家店、珍珠泉共有约160名镶黄旗庄头和家人。清代在千家店驻防有43名满洲八旗官兵，以及约172名家人。有清一代，千家店、珍珠泉共有约375名旗人。

千家店是今延庆地区唯一有八旗驻防的地方，设立之始为剿灭“教匪”，后来主要作用是盯防蒙古察哈尔部。千家店驻防八旗由察哈尔都统独石口防守尉兼辖，均为满洲八旗，地位较高。设有两名防御和一名骁骑校，40名甲兵，官兵共计43人。千家店八旗防御为正五品，是千家店古代级别最高的官员。千家店八旗还兼管南部的珍珠泉。

今北京北部的密云、怀柔、延庆是除北京城区以外，满族分布最集中的地方，密云、怀柔因满族人口多，受到学者关注比较多。其实，根据本文的研究，延庆也是旗人活动的重要区域。怀柔未设八旗驻防，密云副都统设于乾隆年间，而延庆千家店驻防设于康熙年间，是这三个地区中最早设立八旗驻防的地方。同时，也是今北京地区除城区外5个清代八旗驻防点（昌平、顺义、古北口、千家店、密云）之一，值得深入研究。

- ①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谢适汀、董金环主编:《中华大典 军事典 军事战例分典 5》,辽宁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979页。
- ②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胡建林主编:《太原历史文献辑要·第四册·明代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9页。
- ③ 《清史稿》卷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页。《清史稿》此处记载应参考《东华录》,其记:“武英郡王等会师出延庆州,俘人畜一万五千有奇。”[清]蒋良骐撰,鲍思陶、西原点校:《东华录》卷三,齐鲁书社,2005年,第35页。
- ④ [清]清国史馆辑:《满汉名臣传》卷三十三《宜兆熊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64页。
- ⑤ [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四,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72页。
- ⑥ [清]李钟俸修,穆元肇、方世熙纂:乾隆《延庆州志》卷四,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旧志集成·延庆志辑四》,据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七年(1742)刻本原大影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
- ⑦ [清]宋荦、李树德:《于襄勤公(成龙)年谱》卷上,沈云龙主编、金鼎雯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辑《清朝翰詹源流编年》,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2页。
- ⑧ 程金龙:《妫川碑石录》,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4年,第396页。
- ⑨ [清]何道增修,张惇德纂:光绪《延庆州志》卷三,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08页。
- ⑩ [清]缪荃荪等编:光绪《昌平州志》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64—165页。
- ⑪ [清]缪荃荪等编:光绪《昌平州志》卷十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46页。
- ⑫ [清]佚名:《延庆州乡土志要略·户口》,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旧志集成·延庆志辑四》,据国家图书馆藏清末稿本原大影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
- ⑬ [清]黄彭年等撰:光绪《畿辅通志(第9册)》卷六十九,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6页。
- ⑭ [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二,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34页。
- ⑮ [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二,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36页。
- ⑯ [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二,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37—38页。
- ⑰ [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一,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4页。
- ⑱ [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五,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91页。
- ⑲ [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五,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91页。
- ⑳ [清]铁保等续纂,李洵、赵德贵、周毓方等校点:《钦定八旗通志(第2册)》卷七十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286页。
- ㉑ 葛全胜主编,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奏折汇编 农业·环境》,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6页。
- ㉒ [清]铁保等续纂,李洵、赵德贵、周毓方等校点:《钦定八旗通志(第2册)》卷七十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286页。
- ㉓ [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五,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91页。
- ㉔ [清]李钟俸修,穆元肇、方世熙纂:乾隆《延庆州志》卷三,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旧志集成·延庆志辑四》,据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七年(1742)刻本原大影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
- ㉕ [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二,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37页。
- ㉖ [清]鄂尔泰等修,李洵、赵德贵点校:《八旗通志》卷二十四,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48—449页。
- ㉗ [清]铁保等续纂,李洵、赵德贵、周毓方等校点:《钦定八旗通志(第2册)》卷七十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286页。
- ㉘ 《八旗通志》记康熙五十年(1711)“独石口拨给千家店章京一员”,但《钦定八旗通志》却记是“延庆州拨给千家店章京一员”,笔者暂未在史料中查到清代延庆州八旗驻防的记载,而且现存史料多记是独石口拨给千家店一名防御,暂从此说。
- ㉙ [清]李钟俸修,穆元肇、方世熙纂:乾隆《延庆州志》卷一,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旧志集成·延庆志辑四》,据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七年(1742)刻本原大影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
- ㉚ 《清史稿》卷五十四,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72页。
- ㉛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 绥远、察哈尔部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59页。
- ㉜ 转引自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79页。
- ㉝ 《钦定大清会典》,《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提要著录丛书 史部 127》,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726页。
- ㉞ [清]黄彭年等撰:光绪《畿辅通志(第4册)》卷三十一,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33页。
- ㉟ [清]唐执玉、李卫修,陈仪纂:雍正《畿辅通志》卷三十八,影印本。
- ㊱ [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二,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74页。
- ㊲ 张政娘主编:《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15页。
- ㊳ 《口北三厅志》记千家店防御:“阿代,满洲镶蓝旗人。杨柏,满洲镶蓝旗人。索柱,满洲镶蓝旗人。勒世太,满洲镶红旗人。富长,满洲镶黄旗人。乌兰泰,满洲镶蓝旗人,骁骑校。”[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四,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74页。
- ㊴ [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五,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84页。
- ㊵ 《钦定大清会典》,《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提要著录丛书 史部 127》,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726页。
- ㊶ [清]鄂尔泰等修,李洵、赵德贵点校:《八旗通志》卷二十七,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13页。
- ㊷ [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五,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84页。
- ㊸ [清]何道增修,张惇德纂:光绪《延庆州志》卷五,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44页。
- ㊹ 转引自邢亦尘:《清季蒙古实录》,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1981年,第283页。

颐和园宝云阁沿革考

孙 萌

宝云阁，俗称铜亭。宝云阁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清漪园时期，位于北京市颐和园万寿山西部，是五方阁院落中的一座铜铸建筑。清朝皇室曾定期在此举办佛事活动。宝云阁历经两次兵燹，建筑因是铜铸而幸存，阁内陈设遭盗抢毁坏。清末至民国，社会局势动荡，宝云阁遗失部分铜格扇窗，成为历史上未破的悬案。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利用档案、图像等史料进行系统分析，考证宝云阁历史轨迹，揭示其多元价值。

一、建造原因及过程

在皇家园林中修建大型铜铸建筑——宝云阁，其核心功能是服务于藏传佛教的宗教仪式，是清统治者宗教文化融合的政治表达。铜质结构也是清代熔模铸造技艺的巅峰展示，象征着皇权的永固恒久。宝云阁的建造满足了园林空间的审美需求，它位于万寿山建筑轴线西侧，与转轮藏对称布局，依山势而起，构成了山地园林的立体层次。“以金代木”的建造理念也是文物保护意识的超前实践，客观上延长了宝云阁的寿命，让它屹立百年成为可能。

宝云阁，名称取自佛教经典《宝云经》。宝云阁在建造前曾发生过偷盗铜斤事件。据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753年1月28日），慎刑司奏折《将偷盗万寿山铜斤李如侗等治罪事》中称：民人李如侗听说万寿山起造铜殿，胆敢起意伙同民人韩忠等，在万寿山附近租房开设酒铺，勾引匠役偷盗铜斤，接买贩卖，犯罪情节严重，按满数律枷号一个月，责二十板^①。1755年宝云阁开工后，内务府造办处受偷盗事件影响加强对宗教建筑的管控，在铜殿内壁镌刻官员及全部工匠职名。东南槛窗榻板内壁刻有督理大臣官员职名：太子少保、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事务总管内务府大臣海望，工部左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和，总管内务府大臣、副都统苏赫纳等13人。榻板内壁还刻有乾隆二十年（1755）岁次乙亥夏六月的铭文。西南坎墙壁上刻有工匠姓名及工种，有铸匠郭文炳等5名、拔蜡匠杨国柱等3名、凿匠纪会等9名、碓匠周光禄等3名、锉匠张国良等11名、木匠赵承生等3名^②。《中国铸造技术史》认为木匠的任务是用木头造构件模型，供铸匠用以翻制泥范或陶范^③，所以木匠工种会出现在铜殿建造铭文中。

二、建筑及陈设

宝云阁通体用铜和锌铸造而成，构筑及花纹图案均采用中国传统的拔蜡法工艺。拔蜡法又称为“捏蜡法”，是失蜡法的一种，先手工捏制蜡模，再塑造纹理细节。铜殿由上万个部件按设计组合而成，每个铜部件都需要经过造芯、制模、焙烧、浇铸、出蜡、打磨等工艺流程^④。铸成后的宝云阁安放在汉白玉须弥座上，阁通高7.5米，



图一 斗匾



图二 横匾

重207吨，平面呈正方形，四面各显3间，进深4.5米，面积186.68平方米。重檐歇山式顶上有喇嘛塔宝顶，北侧上层悬挂铜质斗匾，上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宝云阁”（图一），下层挂大光明藏铜质横匾（图二）。四

作者单位：中国园林博物馆

面装修菱花窗、门，四角各有1个铜铃。宝云阁的梁、柱、枋、椽、斗拱、顶瓦、宝顶、门窗以及匾额、楹联皆为铜铸，但其式样、尺寸和工艺精细程度与木结构完全相同^⑤。

宝云阁建好后，分批添置陈设。清漪园陈设来源多为内务府造办处专门定制，或直接从紫禁城调拨。有关宝云阁内部陈设的记录最早见于乾隆三十年（1765），自京内往万寿山铜殿送安铜供桌，用苏拉二十名^⑥。现有档案最早可一览宝云阁内外檐陈设全貌的，是嘉庆十二年（1807）内务府大报恩延寿寺等处佛像供器清册记载：

宝云阁殿内面南木胎铜包厢神台一座 / 铜包厢面板一块 / 上供铜度（镀）金随背光宝塔龕一座 / 外檐明柱上蟠眼龙二条 / 龕内供铜胎释迦牟尼佛一尊 / ……前面安铜供桌一张 / 年节挂黄地织五彩无量寿佛壁（壁）衣一分 / 蓝布里计十一块 / 外檐上层挂铜胎斗匾一面 / 下层挂铜胎横匾一面 / 明间柱上挂铜胎七言对一副。^⑦

据陈设清册记载，进行分类如表一。

表一 宝云阁文物分类表

类别	子类别	名称 / 位置	数量	材质 / 工艺	用途	保存状态
建筑构件	匾额	铜胎斗匾 / 外檐上层、铜胎横匾 / 外檐下层	2 件	铜胎	标识建筑名称、外檐装饰	完整
	对联	铜胎七言对 / 明间柱悬挂	1 副	铜胎	装饰	完整
佛龕及供具	主龕	木胎铜包厢神龕 / 殿内主位	1 座	木胎铜包	供奉佛像	完整
	龕内供器	铜镀金背光宝塔龕、铜胎释迦牟尼佛（身披金丝缎佛衣）、乾隆款洋磁葫芦瓶（插孔雀尾 / 吉祥草） / 龕内陈列	3 件	铜镀金 / 铜胎 / 洋磁	供奉	完整
	供桌及陈设	铜供桌（乾隆款铜掐丝珐琅五供、铜镀金香靠）、二层供托（五色玻璃果供）、三层七珍、四层八吉祥 / 供桌陈列	4 层	铜 / 珐琅 / 玻璃 / 嵌石	分层供奉	完整（部分珐琅有渍）
佛像及造像	主尊佛像	铜胎释迦牟尼佛（紫檀座）、铜胎文殊菩萨（2 尊）、铜胎弥勒菩萨、铜胎手持金刚 / 龕内及殿内陈列	5 尊	铜胎 / 紫檀座	供奉	1 尊文殊菩萨腿环
	玉佛	青玉佛（紫檀座 / 铜镀金背光座） / 龕内两侧塔内陈列	14 尊	青玉 / 紫檀 / 铜镀金	供奉	完整
法器及装饰	佛锅及配饰	金胎嵌松石佛锅（内供画像佛 / 御笔心经）、银胎金佛锅（连银座玻璃门）、银里金五佛冠（嵌珊瑚 / 珍珠） / 悬挂 / 佩戴	3 件	金 / 银 / 松石 / 珊瑚 / 珍珠	供奉	完整（部分穗不全）
	塔及灯饰	红雕漆八方七层塔（龕两边）、金漆宝盖绣红纱方灯（黄穗 / 朱穗不全）、紫檀画玻璃方胜戳灯 / 龕两侧及供桌两侧	4 件	红雕漆 / 金漆 / 绣纱 / 玻璃	装饰	部分穗不全
	幡及挂饰	穿朱欢门幡、边幡、黄地织五彩无量寿佛壁衣、蓝布里壁衣 / 墙面及殿内悬挂	7 首 11 块	织锦 / 布	（年节挂）装饰	完整（部分虫蛀）
织物及坐具	拜垫及褥	白拜毡、花拜毡、黄云缎拜褥 / 地面铺设	3 块	织锦 / 毡	跪拜	部分虫蛀
	壁衣	黄妆缎壁衣、黄绸壁衣 / 常年悬挂	2 分 22 块	妆缎 / 绸	墙面装饰	完整
其他文物	耳环及配饰	银里金耳环（连珠石，重 30 两 9 钱）	1 对	银 / 金 / 珠石	佩戴 / 供奉	完整
	经匣及典籍	红雕漆经匣（内盛御书《智严经》） / 供桌陈列	1 件	红雕漆 / 锦	存放经书	锦套有渍

拱卫宝云阁的院落平面呈曼荼罗型，象征藏传佛教中的坛城。宝云阁前有山门，后有罩楼——五方阁，楼上挂铸胎五方佛五尊（各随宝盖座） / 地上铺红白拜毡二块（虫蛀） / 外面石堂随节挂绢堆释迦牟尼佛一尊^⑧。五方阁东

西各有配殿，院落四角各有一座重檐四方角亭，各建筑之间用围廊相连。整体院落布局、内外檐陈设、装饰都具有鲜明的宗教特色，清帝后在此举办佛事活动、寻求身心庇护（图三）。



图三 五方阁及院落

道光中后期，社会性质发生巨变，国力日趋衰弱。清漪园中各殿陈设，内务府虽定期派员核查，循例呈报，但仅限于清点记录，无力修旧补新。根据道光二十六年（1846）至三十年（1850）大报恩延寿寺陈设清册档案记载，比较嘉庆十二年（1807）宝云阁陈设，除御书《智严经》一册、银佛锅一座、铜胎释迦牟尼佛一尊、

青玉佛十四尊外其余均不在册；破坏不全紫檀画玻璃方胜戳灯二件、虫蛀霉烂红白拜毡三块都集中存放在慈福楼外，宝云阁内陈设种类、数量、位置及用途大体无调整改变。道光末年，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清漪园万寿山满洲喇嘛诵经礼佛活动渐停渐息，统治者更无暇游幸山水，昔日皇家离宫走向没落。

三、两次劫后余生

（一）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至承德避暑山庄。侵略者们把三山五园作为掠夺目标，对圆明三园、清漪园（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大肆劫掠焚烧，这场暴行以《北京条约》的签署而终止。浩劫过后，清漪园内满目疮痍，御苑之景灰飞烟灭。



图四 遭受劫难后的宝云阁



图五 被保护的宝云阁

万寿山前山除众香界、智慧海（砖石建筑）、

宝云阁（铜建筑）、佛香阁下的石台、石狮、石经幢，木建筑转轮藏和养云轩等处保存尚为完整，其他建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焚毁破坏^⑨。园内各殿陈设也从四万余件锐减到四千余件。19世纪60至80年代，清漪园内秃山涸水，断壁残垣。宝云阁因铜质不易损而幸存，但建筑周围杂草丛生，汉白玉台柱、石板残损开裂破败不堪（图四）。19世纪70年代，为防止铜构件脱落遗失，管理者修了三面围墙对其进行简单保护（图五）。宝云阁本体在浩劫后勉强幸存，内部陈设器物却难逃盗抢厄运。咸丰九年（1859），宝云阁内部沿袭道光三十年陈设状态，佛龕、佛像、佛锅、佛塔、铜供桌、五供、七珍八宝等共计五十余件。至咸丰十年（1860）清漪园山前山后南湖河道功德寺等处陈设清册记载：

宝云阁铜龕一座 / 内供铜胎释迦牟尼佛一尊 / 铜供桌一张 / 缙丝挂像佛十一轴。^⑩

除去体积大不易携带的器物外，其他陈设已被英法联军掠夺一空。

（二）庚子之乱

光绪十四年（1888）清帝国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以归政为名，开始重修清漪园用作颐养冲和的夏宫，并改名颐



图六 民国时期宝云阁



图七 宝云阁现状

和园。为了确保养老地是万年福寿的佳境，统治者找人观看了园内各处风水。在看到颐和园万寿山风水情形档案中提到宝云阁为辅弼二星拱照^①。其所处位置、政治影响、宗教属性决定了修复价值和意义。光绪十九年（1893），除琉璃料件外，修复宝云阁应用料件均已到位，工程历经两年。先后完成宝云阁宫门、五方阁、东西配殿、四方亭柱顶石、柱木的重装竖立，以及各殿座屋顶绿色琉璃瓦的铺设。重新修砌宝云阁须弥座青白石栏板柱，补铺了屋顶铜瓦。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完成五方阁和宫门四方亭外檐装修后，整修工程整体竣工。据呈颐和园粘修殿宇等项工程需用钱粮数目清单记载，宝云阁各工需银八千五百三十九两九钱^②。由于复建经费紧张，工程只包括各殿座亭廊建筑本体，没有对内部陈设进行置办添补，宝云阁内仅存陈设不齐的铜供桌一张。1900年庚子之乱爆发，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自颐和园逃至西安。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各国部队开进颐和园，盘踞时间长达一年。园中珍宝古物被大肆劫掠，园内殿堂庙宇、亭台楼阁再遭重创。1901年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八国联军才陆续从颐和园撤走。民国小说《西太后轶事》中对宝云阁在庚子之乱后有所记载，称宝云阁被联军用利刃破坏，太监勘察时发现，因惧怕触及慈禧太后之讳，对铜亭四壁被砍划只字未提。慈禧发现后，责罚当事太监并施以笞刑^③。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开始重修颐和园，宝云阁包括在内。光绪二十九年（1903）德兴木厂商人马文连领到宝云阁各座工料银四千零五十两整。源通木厂商人周启霖领到宝云阁实银四千零五十两^④。证实宝云阁在联军占领期间也遭到了破坏。

四、民国时期的宝云阁

1912年封建帝制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后，颐和园仍归清室内务府管理。1914年，为弥补经费不足，步军统领衙门与清室内务府决定颐和园向公众开放，出售门票^⑤。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管理颐和园事物所接管颐和园，昔日皇室私产转变为国家公园。民国时局动荡不安，经费捉襟见肘，制度混乱多变，管理者更换频繁，颐和园处于严重的失修失养状态，园内物品被盗事件频发。民国档案记载1940年1月13日管理颐和园事物所呈报北平特别市公署称：“本月10日，勤务文顺发现宝云阁东边铜格扇心缺一份，计内外2页，复查无异，情况属实。经派各勤务四处寻找访查无果。又查得宝云阁原有铜格扇均系浮按，身量甚轻，易于移动。现值排云门不另外售票，游人异常复杂，铜格扇心体量较轻，易于搬动之，若仍照旧按放，实属难于保管。拟将宝云阁所有现存格扇（心）39页全行拆下存放库内，以便保管。”^⑥宝云阁原共有铜格扇门12个，铜格扇窗20个，帘架3个，都有内外两层菱花格扇心，共计格扇心70页。据呈文所知，宝云阁已丢失31页铜格扇（心），除上述2页有详述事件始末外，另29页铜格扇（心）无记载（图六）。1945年8月，宝云阁内铜供桌及园内铜缸、铜香炉、铜门钉等被日本侵略者运往

天津，准备熔化后制造枪炮。日本投降后，铜供桌等文物又完整地运回了颐和园。

余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宝云阁进行了多次修缮。20世纪90年代至今，流失在外的宝云阁铜格扇窗（共22页），先后通过捐赠等方式回归颐和园，但其余铜窗及阁内陈设文物仍不知所终。宝云阁见证了270年的风雨历程，亲历了清王朝的繁盛与衰亡，目睹了民国时期的动荡与混乱，躲过了外敌内寇的侵扰与破坏，迎来了新生，铸就了不朽的生命奇迹（图七）。对宝云阁进行系统研究，有利于园林文物古迹的保护，加快文物回归的进程。宝云阁承载的民族智慧，凝聚的民族精神是后人世代传承的宝藏，也是文化自信的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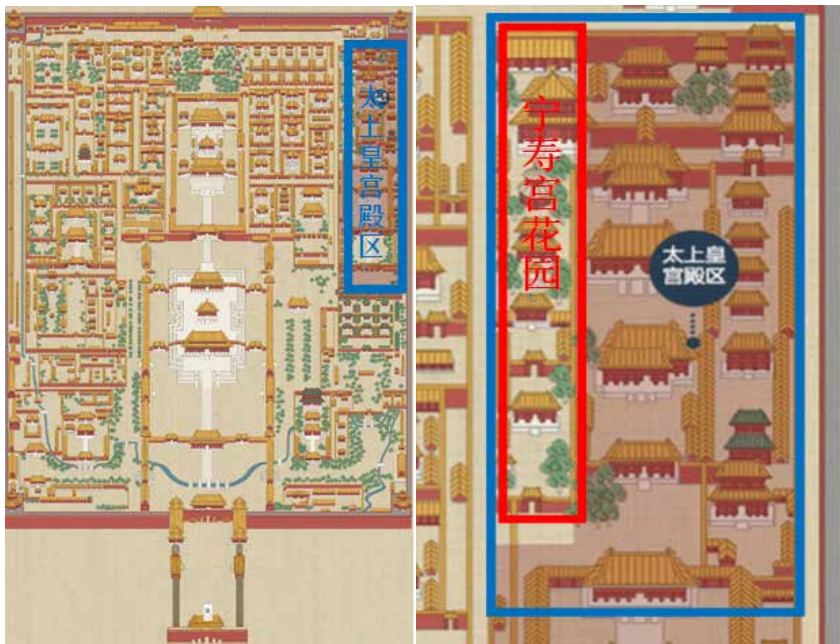
-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编：《清宫颐和园档案·园囿管理卷》，中华书局，2015年，第648—651页。
 - ② 颐和园管理处编：《颐和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年，第221页。
 - ③ 张剑葳：《中国古代铜殿研究》，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75页。
 - ④ 徐凤桐：《百年奇案：悄然水落“铜”出》，《开发区导刊》1994年第3期，第41页。
 - ⑤ 颐和园管理处编：《颐和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年，第220—221页。
 - ⑥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颐和园大事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14年，第30页。
 -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编：《清宫颐和园档案·陈设收藏卷》，中华书局，2017年，第956—961页。
 -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编：《清宫颐和园档案·陈设收藏卷》，中华书局，2017年，第961页。
 - ⑨ 颐和园管理处编：《颐和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年，第185页。
 -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编：《清宫颐和园档案·陈设收藏卷》，中华书局，2017年，第8161页。
 - ⑪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编：《清宫颐和园档案·园囿管理卷》，中华书局，2015年，第2134—2135页。
 - ⑫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编：《清宫颐和园档案·营造制作卷》，中华书局，2015年，第3752页。
 - ⑬ 杨公道：《西太后轶事》，大中华书局，1921年，第81—84页。
 - ⑭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编：《清宫颐和园档案·营造制作卷》，中华书局，2015年，第2505、2515页。
 - ⑮ 颐和园管理处编：《颐和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 ⑯ 颐和园管理处编：《颐和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年，第348—349页。

北京故宫宁寿宫花园的园林意趣

安菲 金超 孙艳群

中国古典园林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的喜爱，园林及园林中的建筑不同于其他建筑，在功能上兼具娱乐与居住的作用，通过自然花木与建筑的完美结合，人们置身其中感受大自然，身心得到双重享受。

北京故宫宁寿宫花园是乾隆皇帝自己属意的敕建花园，又称乾隆花园，位于故宫内廷区的太上皇宫殿区，是外东路宁寿宫区的西北侧花园（图一），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历时6年建成，原为乾隆皇帝计划退位后的养老场所。但直至去世，他没有一天住过宁寿宫花园，后期也未对这座花园做大幅度的改动，依旧保留着它的历史信息与建筑特色。



图一 北京故宫太上皇宫殿区及宁寿宫花园位置示意图^①

一、宁寿宫花园的建造历史

宁寿宫花园是在康熙时代初创的宁寿宫旧址上改建而成，所谓“康熙创其端，乾隆竟其绪”。从乾隆《京城全图》上可以看到诸如宁寿门、宁寿宫、景福宫等后来宁寿宫花园一直沿用的宫殿名称，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国朝宫史》延续了与《京城全图》完全一样的名称、布局。宁寿宫花园正式兴工，极大改变了康熙时代宁寿宫的原有布局。按《国朝宫史续编》记载，康熙时代宁寿宫旧址新建重檐皇极殿，以备归政以后的“太上皇临御之所”。从《京城全图》上看，康熙时代的这座“宫西花园”平面近乎方形，布局左右对称，是典型的早期清宫庭院样式，与乾隆时代的这座宁寿宫花园的平衡布局明显不同^②。

查阅文献资料可知，宁寿宫花园的维修历史中，未见有关重建及改建的明确记载，只局部有多次大型及小型的维修记录。局部建筑部位在以往的维修过程中因当时的条件所限改变了原做法，花园大部分建筑基本保持了乾隆时期的样式与形制，整体建筑格局保存较好。无论是建筑本身的木构、装修，还是建筑上的油饰彩画，其材料构成及工艺手法经考证都是多个历史时期的遗物，历经岁月的洗礼，见证了古建筑保护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科学价值，是清代古建筑的实例，是珍贵的历史遗存。

二、宁寿宫花园的建筑概况

宁寿宫花园总体是一座南北长、东西短的长方形花园，南北长160米，东西宽37米，占地面积5920平方米。花园由一条南北向的轴线将四个小院落串联成整体的一组大院落。花园最南边为大门的出入口，由南向北进入，依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文物工程质量监督站

次为第一进院古华轩区、第二进院遂初堂区、第三进院萃赏楼区、第四进院符望阁区(图二、图三)。

古华轩区占地面积 1589 平方米,以坐落在中轴线上的古华轩为主要建筑命名,其余几座单体建筑与游廊连接成整体院落,并有假山、室外陈设、花草树木间或掩映其中(图四)。

遂初堂区占地面积 1156 平方米,以坐落在中轴线上的遂初堂为主要建筑命名,与其他单体建筑形成一个规整的三合院,建筑之间以游廊串联,院落中对称设置了陈设与高大树木(图五)。

萃赏楼区占地面积 1324 平方米,该院落中轴线稍向东移,但仍以坐落在中轴线上的萃赏楼为主要建筑命名,其余几座单体建筑与游廊连接成整体院落,并有假山、室外陈设、花草树木间或掩映其中(图六)。

符望阁区占地面积 1851 平方米,该院落中轴线与萃赏楼轴线对齐,以坐落在中轴线上的符望阁为主要建筑命名,其余几座单体建筑与游廊连接成整体院落,并有假山、石桥、室外陈设、花草树木间或掩映其中(图七)。



图二 宁寿宫花园俯瞰图



图三 宁寿宫花园院落组成示意图



图四 古华轩院落



图五 遂初堂院落



图六 萃赏楼院落



图七 符望阁院落

三、宁寿宫花园的构成要素

在中国园林建造史中,山、水、植物、建筑是四个主要的构成要素。在宁寿宫花园中,这四个造园要素也是和谐共生:精选太湖石堆叠成山,造型各异,因势利导,与建筑相依相偎充满整座花园(图八);禊赏亭中的流杯渠映射了文人士大夫归隐山野,隐居的雅趣充斥其中(图九);植物与山、与水、与建筑互相成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人置身其中如入桃花源一般(图一〇);建筑样式丰富多样,却都完美地与山、水、花木密切结合,建筑没有抢夺园林的风采,园林也没有抛弃建筑,两者相互协调,实现了建筑与园林的和谐统一。



图八 假山一隅



图九 禊赏亭内流杯渠



图一〇 假山与植物、建筑共处

四、宁寿宫花园的布局特征

(一) 写仿自然

园林的产生与建造随着人们的生产活动越发频繁，也随之愈加兴起。在园林中，人们欣赏自然、融于自然，人与自然相映成趣，特有的园林建筑样式为园林景观增色不少，人们置身其中既可游览又可休息，自是一处真正解放身心的自然之所。

乾隆皇帝将南方精妙绝伦的私家园林悉数搬入规矩的皇城内苑中，学习借鉴、吸收融合，这座园林成为乾隆皇帝心中所向往的那样，得当运用自然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将江南园林的精与散巧妙地嵌入紫禁城中，让它得以安于一隅，散发自身的园林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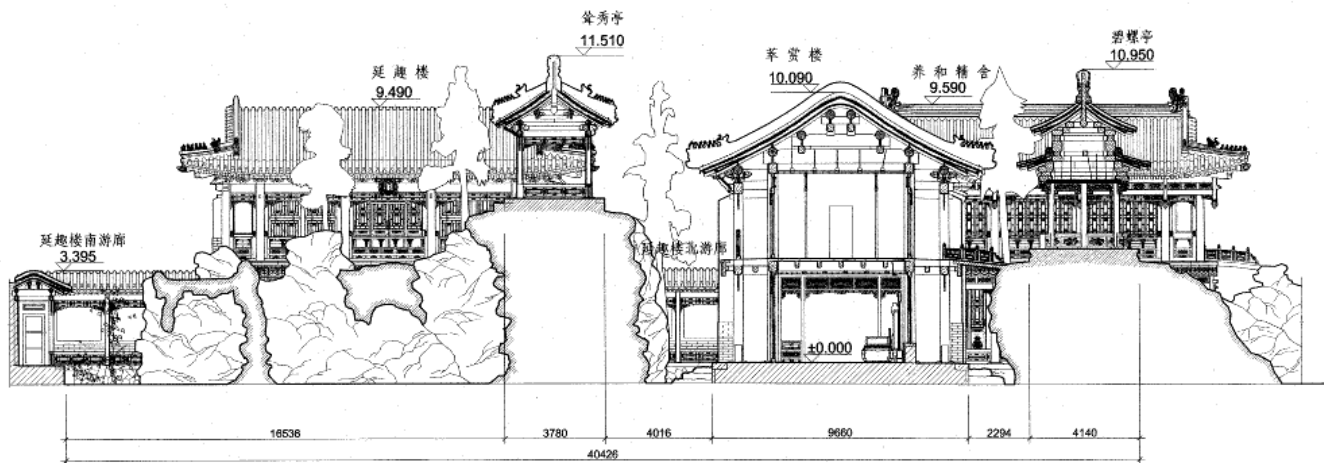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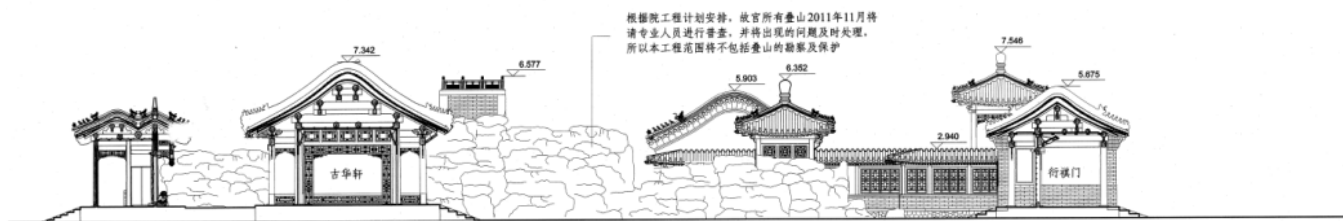
置身宁寿宫花园中，最大的感受就是亲近大自然、回归大自然，将自然的美留在心中，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这种审美情趣的映射正是乾隆皇帝想要的，他在高位已久，被桎梏的心情在这里得到了放松，他渴望在宁寿宫花园里像一位大隐隐于市的文人隐士般过着潇洒、隐逸、自由、悠闲的生活，享受着荣华富贵，修养着情操心性，做一名志存高远的富贵闲人。

(二) 因地制宜

在紫禁城中，宁寿宫花园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在一众高大巍峨的官式建筑群中，留给它的位置是一块狭长紧凑的区域，北侧与西侧依靠高约 8 米的宫墙，南侧与东侧围合的是高约 4 米的院墙，花园整体被西北疏朗高大、东南紧密矮小的狭长型墙体合围起来，西高、东低、北高、南低。

进入花园，由于西侧宫墙的高大，建筑物必然不能渺小，否则宫墙会大于花园建筑，显得本来不够开阔的环境在墙体的压迫下愈加紧凑。于是，花园西侧布置的都是大体量建筑。由南向北，先是在最南侧依宫墙堆叠了较大面积的假山，体现园林景色；再往北是建有重檐的禊赏亭，攒尖的宝顶突出宫墙高度，从高度上与宫墙相持；再往北就到了第一进院落的末端，在此也设置了一座小假山，假山之上是一座单体建筑旭辉庭，高度与禊赏亭相似。至第二进院落，此为一套规整的三合院，房屋高度与整体院落环境协调，故院内西配殿的高度不及周边建筑。从第三进院开始至第四进院结束，在东侧宫墙均建有二层楼式建筑，三进院为一字形延趣楼，四进院为直角型云光楼，高度基本相同。在宁寿宫花园的东路一侧，为不被高大的宫墙淹没，依次建造了大体量的建筑。这些建筑并没有一味地追求高度，而是设置高低起伏避免单调，尽可能地表现出宁寿宫花园丰富的建筑样式，又与高大的宫墙相互协调，富于建筑趣味（图一一）。

花园西侧院墙设置的建筑体量相较于东侧要小得多。由南向北，南侧最开始建造的是位于小体量假山上的撷芳亭，整体体量小，与院墙相持；往北是一座小体量的硬山建筑抑斋，在它的北侧堆叠了较大面积的假山，郁郁葱葱地围绕在院墙的周围，高度平缓；再往北是第二进院落的东配殿；第三进院落建造的也是小体量的三友轩；三友轩

图一一 西宫墙处部分大体量建筑（第三进院）^③图一二 东院墙处部分小体量建筑（第一进院）^④

北侧假山与萃赏楼的值房连接，通过第四进院落的假山末端收紧。在宁寿宫花园的西路一侧，依次建造了小体量却造型各异的单体建筑，用假山与绿植增加园林的观赏性，与院墙周边其他的建筑融为一体，和谐过渡，自然又突出了园林的建筑趣味（图一二）。

宁寿宫花园是一座人工山水园，受选址所限体量偏小，有建筑30余座，建筑之间由假山、石桥与游廊相连，南北贯通，围合成一个狭长的四进院落。虽然花园总体体量较小，但布局有巧思、不局促，于细微之处可窥见造园的高超技术与艺术。

（三）由表及里

中国人的审美历来是含蓄且内敛，低调而不过分铺张，这种审美情趣体现在建筑中就是一种有节制且不张扬地渲染建筑元素与色彩的表现力。封建社会，在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的影响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往往会在国家利好期入世为官，效仿孔儒为政以德、天下为公。然而，当国家处于动乱时期或是政治斗争处于混乱状态，这些文人士大夫的抱负得不到施展，反而被压迫、流放时，他们会毅然决然选择出世，避开纷争寄情于山水之中，像真正的隐士般保持高洁的精神追求，韬光养晦地过着隐逸的生活。待社会环境稳定后他们再次入世，施展自己的抱负，为国家的稳定贡献自己的才华。

乾隆皇帝自诩为文人士大夫中的一员，同样心中有远大的志向与高洁的追求，作为天下共主，他有着紫宸之志；当他认为自己执政功德圆满时，功成身退的他向往的是像一个真正的文人那样生活。在修建自己的养老场所时，他不仅在意其私家园林的美学表达与赏览趣味，更在意的是归政与归隐后隐逸生活的体现。将自己的审美情趣映射到园林建设中，这是乾隆皇帝自己心中的梦想所在，是将自身比拟为大隐隐于市的隐士、一生追求高洁的文人风骨与出众的艺术品位。建造一座自己最为得意的园林就是这种文人雅趣最好的体现方式。

（四）构图丰富

宁寿宫花园内既合理又精妙地运用山、水、植物与建筑将院内建设成一个大景区。而其中又分散着许多小景区，自成一景。为地理位置所限，宁寿宫花园的布局相对局促，要想在小的地方呈现大山、大水、大植物，是不现实的。

因此需要在花园中利用建筑呈现移步换景的效果，依靠花园的环境特色分别置景，化整为零、步步皆景，突出了建筑特色，增强了审美趣味。

在进入第一进院古华轩时，并不能赏见宁寿宫花园的全景。入口处，近处太湖石堆叠的假山掩盖了花园的内景，周围遍植的花草树木增添了园内的自然之感，丛林掩映，远处的建筑隐约中露出了一角，令人想一探究竟。沿着假山小路曲径通幽，园内景色如画卷般徐徐展开，园林美景尽收眼底，整体建筑环境令人豁然开朗、心旷神怡。

通过垂花门进入第二进院遂初堂。此为第一进游园景高潮的尾端。第二进院是个规矩的三合院，是花园内最朴实无华的地方，在前后两院围合之下，前水后山、绿荫环绕，犹如山野中世外桃源般的处所，亦如乾隆皇帝所渴望的那样，作为一名隐士在此过着自由与悠闲的生活。第二进院整体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通过遂初堂北侧格扇进入第三进院萃赏楼。院中堆叠了大体量的假山，假山四周随环境布置各式建筑，建筑布局较为严密紧凑，不能将院内所有景色一览而尽。与第一进院的大敞大开形成鲜明对比。假山之下，设置不同方向的石踏步及洞内隧道供人穿行，四通八达。假山之上是一片开阔地带，极目远眺，赏心悦目。第三进院的山包院设置，下紧上松、四处连接、张弛有度、倍添趣味，此为花园园景的第二个高潮。

第四进院符望阁是收尾，更是整座花园园景的最高潮部分。此院中心建筑符望阁是花园至高点，迷幻的布局设计与奢华装饰凸显建筑的美轮美奂与华贵无比。第四进院的建筑样式非常丰富，碧螺亭五瓣梅花亭的设计既有设计的巧思，又有建造的巧艺；竹香馆里外贯通，建筑与环境相洽，茂林修竹的意境深远。

至此，宁寿宫花园的游览已结束，园内美景构图丰富、高潮迭起，是一场园林建筑盛宴。

五、结语

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历史源远流长，清朝是园林建造的技术成熟期与艺术高光期，北方皇家园林与南方私家园林共同蓬勃发展，互相影响、互相成就，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与宝贵的建筑遗产。

北京紫禁城中的宁寿宫花园，是乾隆皇帝的私家花园，是一座集皇家园林官式制度与江南园林造景技艺于一体的园林建筑群。这座花园借鉴、运用与糅合了江南园林的各色造园手法，在皇家礼法的桎梏下，有序而又巧妙地布置与体现了一个园林建筑群落应有的轻盈、灵动与精美的建筑意境与特色。宁寿宫花园既是一组独立的园林，又由各自独立的小园林组成。组成宁寿宫花园的四个院落纵横连接，高低错落，疏密有致，曲折蜿蜒，处处体现着园内建筑型式与自然风貌的统一，人工与天然之美互相融合、各有千秋，堪称我国官式苑囿与私人园林的集大成者。

时移世易，宁寿宫花园历经岁月的洗礼与历史的积淀，越发显得底蕴厚重。宁寿宫花园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园林精品，具有极高的建筑价值，是一处重要且珍贵的文化遗产。

① 故宫博物院：导览页，<https://www.dpm.org.cn/Visit.html>。（作者对图片进行了修改）

② 程子衿：《乾隆花园》，故宫出版社，2016年。

③④ 本图绘制过程中参考引用了故宫博物院古建部以下图纸资料：张学芹：《（土木部分）故宫宁寿宫花园古华轩区古建筑保护维修工程设计（图纸）》；吕小红：《（土木部分）故宫宁寿宫花园遂初堂区古建筑保护维修工程设计（图纸）》；黄占均：《（土木部分）故宫宁寿宫花园古华轩区古建筑保护维修工程设计（图纸）》；杨红：《（油饰彩画部分）故宫宁寿宫花园古华轩区古建筑保护维修工程设计（图纸）》。

北京海淀“永山宅院”名称考述

马明杉 王承浩 杨逸帆

“永山宅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街道老营房路，蓝靛厂外火器营南门内东侧，正蓝旗营南侧路北。据传为清末外火器营翼长永山的私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永山宅院”改为蓝靛厂小学。“永山宅院”历经多次改造，原有院落格局已经不复存在，现仅存东西两院十一座建筑，共有正厅五间、正房三间、配房三间、耳房一座及倒座排房七座。2012年，原蓝靛厂小学腾退后，海淀区文化委员会组织对“永山宅院”



图一“永山宅院”现状（摄于2024年2月）

进行修缮。2014年，“永山宅院”被列入海淀区第四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图一）。

一、宅院名称存疑

据《北京名胜古迹词典》记述，该院落是清末蓝靛厂外火器营首领永山的宅园。永山，号子茂，其胞妹嫁给世袭礼亲王世铎为福晋。光绪年间在修长河大堤工程中，他贪污银两，贿赂礼亲王，得以擢升江宁将军^①。《北京西郊宅园记》一书关于“永山宅院”章节的记述亦与此相同^②。《北京市海淀区火器营满族社会调查报告》则记载：

“如光绪年间外放江宁将军的永隆一字子茂——在任火器营翼长期间，曾大规模修理火器营营房，并在营房周围疏浚河道。火器营当年为了报答他，为他修造了一所官邸（现蓝靛厂小学校址）至今保存完好。”^③《海淀老街巷胡同寻踪》“曙光街道”章节亦采用永隆宅院的名称和记述^④。由此可见，以上提及该宅院的有关论著，对于该宅院的命名各执一词，不尽相同。永山、永隆，到底谁才是这座宅院的主人呢？为寻求答案，需查阅清宫档案等原始文献资料，围绕永山、永隆两人生平事略，结合其他佐证资料，分析该宅院真正归属于谁。

二、永山与永隆的生平事略

经查询，《清史稿》记载如下：

永山，袁氏，汉军正白旗人，黑龙江驻防吉林将军富明阿子，黑龙江将军寿山弟。以荫授侍卫，归东三省练军。中日战起，从将军依克唐阿军，率黑龙江骑旅驻摩天岭。永山临敌辄深入，为士卒先。与日军战数有功，连歼其将。既克龙湾，乘胜渡草河，规凤凰，依克唐阿策袭其城，檄永山为军锋，偕寿山分率马步队深入攻之。抵一面山，距城八里，张左右翼，各据一坡以待。永山为右翼，尤得地势。故作散队，伍伍什什冒死前，复以大队横冲我左翼。左翼溃，右翼亦不支，乃相继退。永山独为殿，遇伏，连受枪伤，洞胸踣，复强起督战，大呼杀贼而逝。事闻，谥壮愍，予建祠奉天。^⑤

据以上记述，结合其列传正文可知，永山生于同治七年（1868），光绪九年（1883）授三等侍卫，光绪十三年（1887）赏加四品衔，常年驻守东三省，中日甲午战争中奋勇杀敌，光绪二十年（1894）以身殉国，年仅26岁；其生平事迹与《北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

《北京名胜古迹词典》等资料记述完全不同，未记述其曾在京中外火器营任职，因此永山在时间与空间上根本没有于京城内置办宅邸的可能性。

另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人名权威资料查询”系统显示：永隆，佟佳氏，字子懋，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其职务履历详见表一。

表一 永隆职务履历表

职衔	任期	出处
鸟枪护军	同治？年—同治三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5册，494
额外蓝翎长、外火器营蓝翎长	同治三年—同治八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5册，494
鸟枪护军校	同治八年—光绪五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1号
空衔花翎	光绪五年—光绪六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1号
委鸟枪护军参领	光绪六年—光绪十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1号
副鸟枪护军参领	光绪十年—光绪十二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1号
正鸟枪护军参领、鸟枪护军参领	光绪十二年—光绪十三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1号
掌攻防营总	光绪十三年—光绪十四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1号
委翼长	光绪十四年—光绪十七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1号
副都统衔	光绪十七年—光绪二十一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1号
外火器营翼长	光绪十七年—光绪二十二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5册，494
水碓局管代官	光绪十七年—光绪？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5册，494
颐和园工程处总理弹压事务	光绪十七年—光绪？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5册，495
不详（水操营总）	光绪二十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代宫中档奏折即军机处档折件，130683号
镶黄旗汉军副都统	光绪二十一年—光绪二十二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1号
镶蓝旗满洲副都统	光绪二十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光绪？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1号
正黄旗汉军副都统	光绪二十二年—光绪二十四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1号
正红旗护军统领	光绪二十四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1号
不详（管八旗骁骑营）	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1号
都统衔	光绪二十五年—光绪？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1号
镶白旗汉军副都统（署）	光绪二十六年—光绪？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1号
查斋大臣	光绪二十六年—光绪？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4号
不详（管理内外火器营事务）	光绪二十七年—光绪？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4号
正白旗蒙古副都统	光绪二十八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1号
右翼监督	光绪二十九年—光绪三十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4号
江宁将军	光绪二十九年—光绪三十二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702002656-1号

据表一所列，结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永隆传包”（图二）记述，可以明确，永隆曾任外火器营翼长、颐和园工程处总理弹压事务、江宁将军等职务，其出身履历与《北京名胜古迹词典》等资料记述所谓“永山”生平事迹完全吻合。

比较分析上述永山、永隆生平事迹，可初步确定《北京名胜古迹词典》等资料记述“永山”实为永隆，故“永

山宅院”应为永隆宅院。

三、其他佐证及存疑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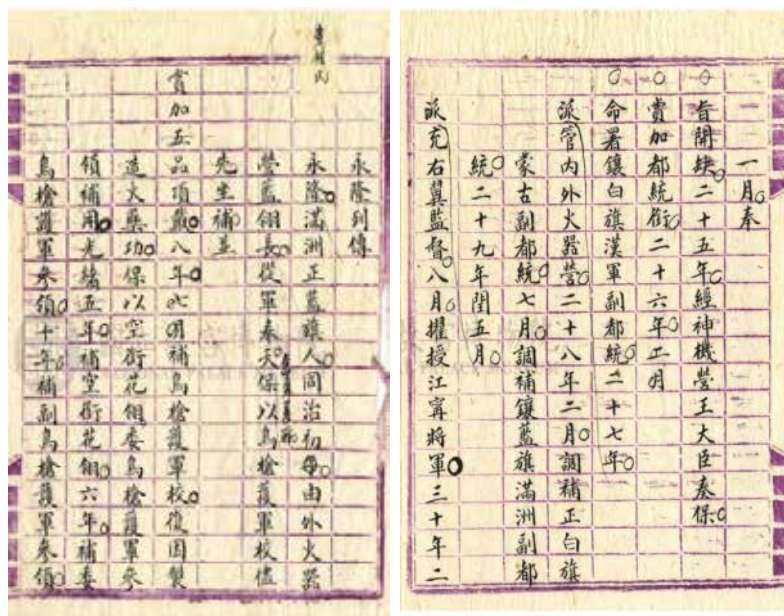
据北京市档案馆藏《教育部关于清查京兆区域之官产的飭文及学务局调查前各学区内官荒地址表和接收永宅房屋事项给外火器营的咨》^⑥记载：“……查外火器营南门内迤东有前江宁将军永君子茂住房一所，约计房屋七十余间……”（图三）该档案记述时间为民国四年（1915），其时清王朝虽已覆灭，但外火器营机构尚存，其官方表述“永宅”为前江宁将军永子茂住宅，当为可信。结合前文所引永隆出身履历记载，永君子茂即永隆，且永隆曾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三十二年（1906）任江宁将军，故可以基本确定“永宅”即为永隆宅院。

另据《北京市散杂居少数民族教育问题调查报告》记述“如光绪年间外放江宁将军的永隆（字子茂），在任火器营翼长期间，曾大规模修理火器营营房，并在营房周围疏浚河道。火器营当年为了报答他，为他修造了一所官邸（现蓝靛厂小学校址）至今保存完好。提起永大人永子茂，火器营老人都知道”^⑦。该段记述明确指出蓝靛厂小学校址（今“永山宅院”）是江宁将军永隆的官邸。该项调查于1982年8月至1983年4月间进行，调查人员由北京市民委、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学者和学生组成。

此外，对于“永山宅院”应为永隆宅院，有学者认为尚有存疑需解决。其主要依据，即《大清播绅全书》记载永隆为满洲正红旗人^⑧，而“永山宅院”位于营区东南角临河，此处属正蓝旗驻地，正红旗旗人居于正蓝旗驻地有悖常理。但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朝上谕档记载，永隆为“正蓝旗满洲人”^⑨。且上谕档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是民间商人编撰的《大清播绅全书》所不能比拟的，上述疑问不攻自破。

四、结论

综上，可基本断定前文提到的诸多论著中“永山”相关记述实则为永隆事略，而“永山宅院”则应命名为永隆宅院。



图二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永隆传包”



图三 《教育部关于清查京兆区域之官产的飭文及学务局调查前各学区内官荒地址表和接收永宅房屋事项给外火器营的咨》，档号：J004-001-00121-P57/P58

《北京市散杂居少数民族教育问题调查报告》记述蓝靛厂小学校址原为永隆宅院，根据其调查时间，可以推断至少1984年以前永隆宅院的名称是准确的。1989年《北京名胜古迹词典》出版，其宅院名称开始误传为“永山宅院”，由此可推断造成永山、永隆混淆的时间段应为1984年至1989年，其时正在开展第二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登记工作，误传大概率就发生于普查登记时。

经笔者咨询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专家，得知永山、永隆两个名字从满文字形和字音来看，均差别明显，不易混淆。故永隆宅院被误传为“永山宅院”的真正原因，仍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2023年7月，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永山宅院的活化利用方案；8月，经过专家评审，中关村科学城城市大脑股份有限公司的《让古朴文物绽放“科技之光”》方案脱颖而出；适时厘清“永山宅院”真正的主人，还原历史真相，有利于该宅院后续活化利用工作的顺利开展。

①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北京名胜古迹词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第276页。

② 焦雄：《北京西郊宅园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114—115页。“……原是外火器营中八旗总翼长永山的宅园。永山号子茂，胞妹出嫁世袭礼亲王世铎为正福晋，因结成亲戚关系，在修长河大堤工程时，他贪污库银，发了不义之财，大肆扩建宅院。”

③ 北京市社会学会、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调查组：《北京市海淀区火器营满族社会调查报告》，《满族研究》1988年第1期。

④ 徐征、冯黛虹：《海淀老街巷胡同寻踪》，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168页。“……原蓝靛厂小学校是清末外火器营翼长永隆的宅院。”

⑤ 《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10页。

⑥ 《教育部关于清查京北区域之官产的飭文及学务局调查前各学区内官荒地地址表和接收永宅房屋事项给外火器营的咨》，档号：J004-001-00121，第57—58页，北京市档案馆。

⑦ 北京市社会学会、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调查组：《北京市散杂居少数民族教育问题调查报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⑧ 《大清摺绅全书·京师户部·元》，光绪二十九年荣宝斋镌版，第29页。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二十七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4页。

日伪统治时期北海公园的“献铜”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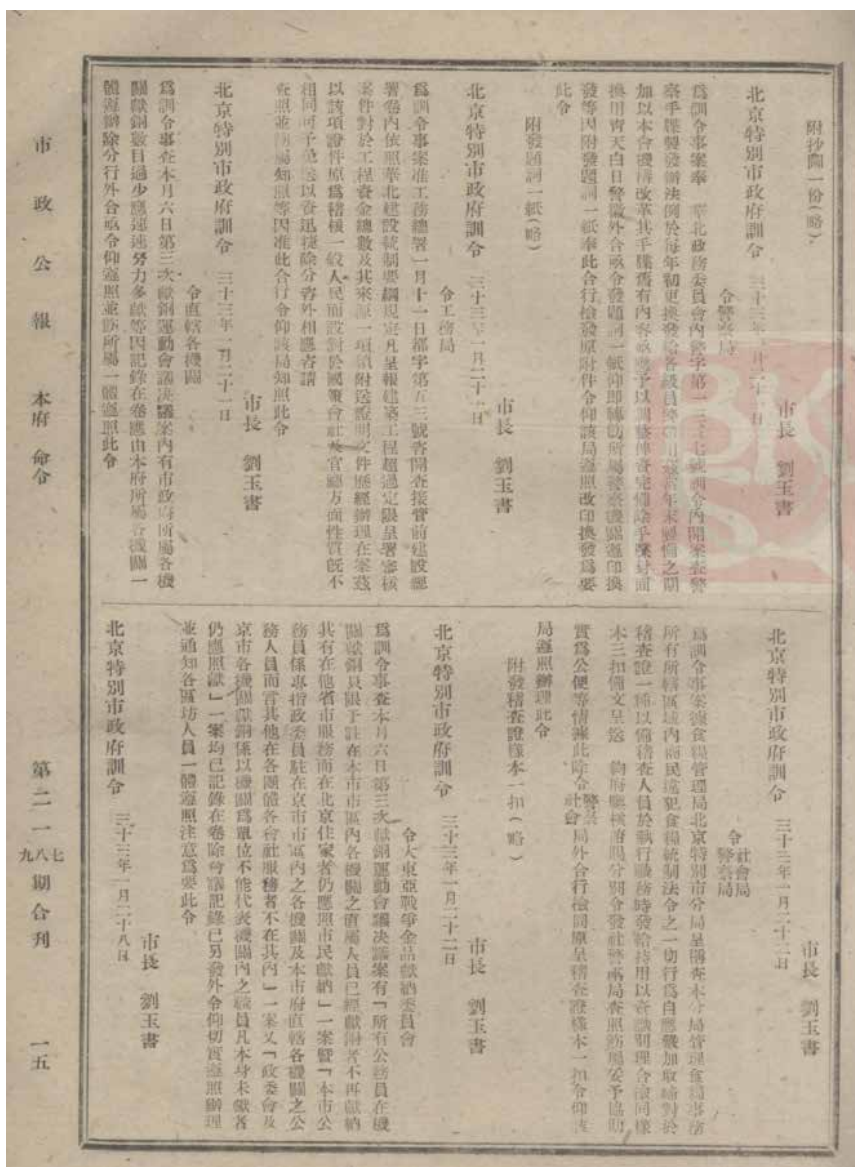
郭妍 陈春萌

“献铜”运动是日本在侵华时期开展的“献纳”（供出）运动的一种，其主要目的是在北京等沦陷区搜刮铜这一军用物资，以补充抗日战争后期越来越紧缺的军用资源。这一运动在北京自1942年至1945年共开展三次，北海公园由于属伪北京特别市政府管辖，园内铜制品文物众多，因而也不可避免被列为“献铜”目标。本文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档案，对北海公园“献铜”运动进行深入研究，希望进一步厘清这一事件的脉络。

一、北京市“献铜”运动的历史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7月29日北平沦陷，直到1945年8月21日日本签署投降协议，国民革命军孙连仲部进驻北京，北京遭受日本侵略者长达八年的掠夺历史才终告结束。日本是个资源小国，侵华战争延至后期，由于大量战争消耗，资源短缺的情况越发明显，因而加紧了在中国的掠夺。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更趋恶化。为支持侵略战争，日伪政权疯狂搜刮战略物资，日本铜矿资源尤其稀少，而铜又是制作武器的重要战略物资，因此日伪政府对于铜的掠夺可谓不遗余力，从市民的生产生活用铜到公共铜质资源都搜刮殆尽。

1942年伪北京市政府成立“大东亚战争金品献纳委员会”，专门负责搜刮北京的铜制物品。第一次“献铜”运动在1942年10月开始，第二次“献铜”运动^①（图一）在1943年8月开展，第三次“献铜”运动在1945年3月开始，此时已是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日本对于铜制品的需求和贪婪也达到顶峰。3月29日日本北京陆军联络部致函伪北京特别市市长，要求开展第三次“献铜”



图一 《市政公报》1944年4月22日第二次“献铜”运动期间伪北京特别市政府发布训令要求伪市政府所属各机关增加“献铜”量

作者单位：北海公园管理处

运动，并且函送《北京特别市铜类献纳运动实施要领案》（以下简称《要领》）。该《要领》直接指明“献铜”运动的产生是为“大东亚战争之最后胜利”服务，通过“献铜”运动“直接增强战力”。该《要领》对“献铜”的方法以及各区承担量进行了明确规定，对于铜制品的要求、“献铜”奖励、“献铜”运动宣传都做了详细说明。其中特别提到“北京特别市政府根据本方针，将其所保管之无用公共物件铜材 400 吨，与本施策并行献纳（供出）之”^②。这一规定为之前两次所未有，此处之“无用公共物件”从伪北京特别市政府的训令中可以得知，大部分属于北海公园、颐和园、中央公园等机关保存的文物。根据档案及报刊记载，日本人对于故宫博物院铜、铁质文物的劫掠在 1944 年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第二次“献铜”运动期间。《大公报》^③以“汉奸媚敌，殃及古物”（图二）为题



图二《大公报》1944年10月19日对“献铜”的报道

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顷设‘献铜献木委员会’，企博敌欢心，并将故宫明代铜缸六十六只，铜炮三尊，准备献敌。”可知此时日本人已经对我国文物进行了劫掠和破坏，只是在 1945 年又发布相关规定，企图将这种掠夺“合法化”。

《北京特别市政府为如期办竣第三次铜品献纳运动的训令》中要求北海公园等机关“将管内废置之公共铜制品尽量搜集随时缴交工务局”^④，本该 4 月底截止的“献铜”运动由于收集铜制品数量与目标差距过大，因此不仅延后结束，而且在 5 月 18 日由“金品献纳委员会”组织成立第二收集组，北京市公有铜品都由该组负责收集。第三次“献铜”运动最终在 8 月结束，大部分公有铜品都被运往天津，此时距离日本最终投降不过还有几天。

北京各机关为保护文物的安全与日本人可谓极尽周旋。根据档案可以得知，管理坛庙事务所于 5 月呈函伪市长，希望保护园内斋宫铜钟，因其“属京市主要祭坛古物，颇有保存之价值”^⑤。8 月又致函伪市长，希望保护帝王庙珍贵铜缸，因其“宏大奇古在京市各祠庙中为稀有古铜品”^⑥。8 月颐和园事务所呈函市长希望暂缓颐和园铜门钉拆卸。甚至连伪北平市市长许修直在其 1945 年 10 月 8 日的“施政报告”中也提及此点：“本次（‘献铜’运动）往复折冲，延展期日，结果较之彼方原所希望之数量所差甚多。”^⑦

二、北海公园“献铜”运动经过

“献铜”运动中明确记载北海公园的损失文物有两件，一件是静心斋铜炉及铜缸，据档案记载：民国三十四年（1945）6 月 10 日，“公园委员会举行第 195 次会议，关于献纳铜品一事，已将静心斋前铜炉 3 个和铜缸 4 个运去献纳”^⑧。

另外一件是大西天大慈真如宝殿内的铜塔（图三^⑨、图四^⑩），铜塔为两座三层七重檐八方铜塔，乾隆二十年（1755）七月十三日内务府奏案记载：“……遵旨大西天建造三层七重檐八方铜塔一座，通高二丈另六寸（6.59 米）。”^⑪又乾隆二十一年（1756）七月二十三日奏案记载：“大西天八方铜塔一座，约需铜六万九千余斤。”^⑫民国十七年（1928）12 月《调查北海天王殿前丹陛报告》中记载：“原大西天经厂内大慈真如宝殿内塑有四大金刚，殿后之塔全刻佛像琉璃砖砌成，天王殿全用楠木建成，内陈贴金佛三尊，佛前设精制铜塔二，塔之洞内原遍置小铜佛，后被军人盗去变卖。”^⑬



图三 北海公园大慈真如宝殿（天王殿）内铜塔照片（法国摄影师拉里贝摄于1900—1910年）



图四《天津商报》1934年刊登北海天王殿内铜塔照片



图五《北平日报》报道北平市法院审理工务局长谢子夷一案

关于北海铜塔拆卸的过程虽然没有档案记载，但1946年的一篇报道或许能佐证此事，1946年11月《北平日报》（图五）报道北平市法院审理工务局长谢子夷一案。谢子夷是“金品献纳委员会委员”，正是他在1945年6月呈函伪北平市市长，要求将颐和园内的铜制品“献纳”，呈函记载：“颐和园内各项铜品均属公有且久已废置，既与历史文化无重要关系，亦与风景美观毫无裨益，拟请准予作为公有铜品献纳。”^⑭可知他正是造成颐和园众多铜制品损失的罪魁祸首，在法庭上他却将此项罪行推给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谢子夷在庭审中辩解：“日人强拆北海铜塔，并想要颐和园铜亭，都是我们阻止的。”^⑮可知北海铜塔也并非北海公园园方主动“献纳”，而是被强制拆毁。另据《北海景山公园志》记载：铜塔“1945年7月被日军拆走，运至塘沽”^⑯。

三、北海公园铜塔回归的过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25日颐和园事务所向伪北平市长呈函申请将尚未熔毁的铜制品运回。此时或由于战争刚刚结束，伪政府尚无暇顾及此事。11月8日《明报》报道在天津卜内门仓库发现尚未熔毁的故宫铜缸，并且陈列在市政府门前。11月30日故宫博物院派员赴津调查发现铜缸并非故宫之物。铜缸六口都是“光绪年制”字样以及“天地长春”篆印，缸上有浮花金团寿字，故宫已经判明这六口铜缸不是故宫之物，而颐和园曾“献纳”铜缸六口，字样、花纹都与卜内门仓库现在保存的铜缸可以对应。仓库内除了保存着故宫的铜炉、铜桌外，还有北海公园、中山公园等机关的铜制品，因此才有了后面各机关联合赴津运铜一事。但是北海公园“献纳”的静心斋铜缸却并未发现。

直到1946年1月27日，北平市政府才派人会同北海公园、中南海、中山公园、故宫、历史博物馆等单位一行七人赴天津与天津市政府洽办运铜一事。《世界日报》报道：“敌伪前在本市强迫民众捐输之铜铁，现有一批储存在天津码头仓库待运，抗战胜利后，业经我方接收，今日将由关系机关派员赴津点收运平。”^⑰

2月11日北海公园赴天津负责处理此事的职员俞绍勋呈函北海公园委员会，申请赴天津押运铜塔的运费。呈函中写道：“业将所运去之天王殿铜塔陆续寻出，一切手续次序办妥，即可装运押返。惟该铜塔重量计达数万斤，

全部市府搬运碎铜及各处铜品约需运费共法币肆拾万元之谱。本园应分摊法币柒万元。”¹⁸直到11日运铜一事尚且顺利。

然而2月15日由于天津市警察局局长的通知，运铜一事突生变故。“私有碎铜系各地分献者，究何种碎铜系伪北平市政府所输赠者无从辨明，碍难准予运返”¹⁹。天津市政府不同意北京各机关将碎铜运走。此事在故宫档案中也有记载：“经科员曹兴华陪往大王庄卜内门仓库视察，存有上年本院被征铜炮及破碎铜灯亭一堆，因损坏无法计数，另有北海大铜塔、南海之十二铜属相、铜炮三尊，此外尚有大量碎铜堆积甚多。经天津警察局长毛文左视察已过磅之碎铜，声称此项碎铜无从证明，其为北平市民被征之物，伊负有保管责任，碍难允运。此项碎铜其各机关之铜灯亭、铜炮、铜塔、铜属相等等即可起运。”²⁰俞绍勋写给北海公园的《关于赴津押运铜塔事报告》中记载道：“关于公有铜品（即各机关输赠者）可予运返，至于私有铜品（即征自人民者），因无法辨明何物系北平所有，不准起运。”²¹原因系第三次“献铜”运动北平市民及各机关的“献纳”铜品数目分别计算，但是由于各机关的铜制文物不便转运，因此多被损坏成为碎铜。而各机关此时无法证明这部分碎铜为文物，天津市政府因而不同意运走。后北平市市长熊斌致函天津市政府，但依然未得到解决。而随着时间拖延，运铜回北京的运输、人工成本也越来越大，故宫及北海都不得不选择先将完整的铜制品搬运离开天津。各机关剩余碎铜共七万三千一百零八千克，最终这部分铜塔的碎铜也没能返还给北海公园。

1946年1月27日俞绍勋到达天津，1月29日及2月6日分别在仓库内寻得部分铜塔。2月25日俞绍勋同北平市政府职员与天津铁路局协商，办理装运事宜。25—27日全部铜件装运完毕。此次运铜前后共计32天，花费运输费、搬运费等共计十五万九千九百六十元。2月28日铜塔运抵北京，铜塔包括塔座、塔身等十八件，小塔门九件，全部放置于北海公园九龙壁广场处。1946年3月2日《世界日报》对铜塔等古物运抵北平一事进行了报道，但其中关于铜塔数量记载有误：“计有北海天王殿之铜塔三座，由津专车运抵北平。”²²实际北海公园只有两座铜塔遭到损毁。

在多年的抗战过程中，日本侵略者给中国的文物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对战时文物损失情况进行统计，日本侵略者累计劫掠或损毁中国公私文物、字画、艺术品、书籍、标本等超过360万件，北海的两座铜塔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一粟。

1953年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曾经会同北京市文物组致函北海公园管理处，希望修复两座铜塔。据档案记载：“天王殿内原有铜塔二座，曾于日伪时期被拆毁运走，投降后追回，存于北花洞内，迄未处理，顷有人民建议予以修复，或做其他适当处理，查该塔系属文物之一，除由我会派员外，拟请你组（文物组）就现有材料于殿内拼凑恢复成一塔，下余铜料选择适当处所保存，以重文物。”²³两座铜塔最终因残损过多，无法复原，残件最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按废铜处置。北海公园的两座铜塔也因此消失于历史中。

四、小结

本文以北海公园经历的第三次“献铜”运动为对象，初步厘清了这一事件的经过。“献铜”运动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为获得铜这一重要战略资源，利用日伪政府开展的经济掠夺行动，在行政手段上以强制摊派为手段，大肆征收民用铜制品，破坏人民生产生活，后期由于资源紧缺，对寺庙、园林等公共场所的“公共铜制品”甚至采取直接掠夺的手段。与此同时利用报纸等媒体，鼓吹“文物无用”，营造战争即将胜利的虚假舆论氛围。“献铜”运动从1943年持续到1945年，对我国经济、文化都造成了重大损失。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认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文化带来的破坏，从而更好地守护我们的文化遗产。

-
- ①《北平特别市政府训令》，《市政公报》1944年4月22日。
- ②④⑤⑥⑭《日伪统治后期北京市办理铜品献纳运动史料》，档号：J1-2-263、264、265，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史料》2015年第2辑，新华出版社，第242—258页。
- ③《汉奸媚敌殃及古物》，《大公报》1944年10月19日第3版。
- ⑦《日伪北平市末任市长许修直施政报告史料一组》，档号：J1-7-149，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史料》2015年第2辑，新华出版社，第265页。
- ⑧⑬王洪新：《京华通览：北海》，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131、142—144页。
- ⑨[法]菲尔曼·拉里贝摄，吕俊君译：《清王朝的最后十年：拉里贝的实景记录》，九州出版社，2017年，第167页。
- ⑩《北平北海天王殿内铜塔木塔》，《天津商报》1934年4月28日第14版。
- 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第101卷032件。
- 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第107卷041件。
- ⑮《公园铜像献了铜》，《北平日报》1946年11月14日第4版。
- ⑯北海景山公园管理处编：《北海景山公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 ⑰《平市前献铜品》，《世界日报》1946年1月27日第2版。
- ⑱⑲⑳《1946年北海公园赴津运回日本掠走铜塔史料》，档号：J77-1-169，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史料》2015年第2辑，新华出版社，第279—283页。
- ㉑马思猛：《马衡年谱长编》，故宫出版社，2020年，第900—901页。
- ㉒《已被运走之平市古物 昨由津运抵平》，《世界日报》1946年3月2日第2版。
- ㉓《市文物组会同市文物整理委员会勘查天王殿铜塔的来往函》，北京市档案馆，档号：J011-001-00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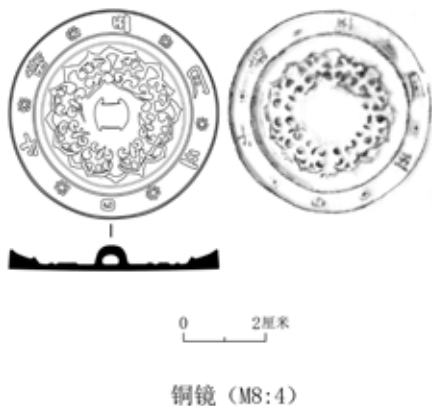
丰台区唐墓出土的“重五”镜——兼论“江心镜”

孙 勳 张智勇

2022年7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丰台区张家坟唐代墓葬（编号M8）的考古发掘中，清理出一面铜镜（编号M8：4）。镜背装饰可分内、外区，内区为八朵连枝花卉纹；外区铸阳文“五月五日午时”，楷体六字，顺时针旋读，每字之间隔以花点图案。直径5.1厘米（图一、图二）^①。“五月五日”，即重五，因而本文以之命名此镜。这种带有



图一 铜镜（M8：4）



图二 铜镜线图及拓片

“五月五日午时”或与之相似的纪时铭文的唐代铜镜，存世可知的不多，考古出土的更为有限，在北京地区的考古中为首次发现。并且，这种纪时镜还

一、“五月五日”铸镜缘起

镜铭“五月五日午时”是指该铜镜的铸造时间。镜铭之中出现“五月”，始见于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延续，有“五月”或“五月+干支纪日”“五月+数字纪日”等不同的形式。如：东汉中平四年（187）神人神兽画像镜“中平四年五月午日”^②、永平七年（64）尚方兽带镜“永平七年五月造真”、元兴元年（105）环状乳神人神兽镜“元兴元年五月丙午日”、元兴元年兽首镜“元兴元年五月丙午日”、东汉永嘉元年（145）夔凤镜“永嘉元年五月丙午”^③、黄龙元年（229）神兽镜“黄龙元年太岁在丁巳……五月丙午”、永安四年（261）神兽镜“永安四年五月五日丙午日造竟（镜）”、永安六年（263）神兽镜“永安六年五月廿五日”^④等。五月之中，尤以“丙午”和“五日”最为常见。清代学者桂馥最早注意到镜铭中的这一现象，认为“是则五月丙午，冶家之吉日良时也”，并且指出“‘五月丙午’与‘五月五日午时’同意……若不遇丙午，亦取其利市耳”^⑤。五月火正，丙、午为火，午为日中之时，也是火^⑥。按五行相胜之说，“精胜坚，故火胜金”^⑦，因而定此月日进行冶炼铸镜。不仅是铜镜，阳燧、刀剑、带钩等铜、铁器的冶铸，也有这一层面的考量。《论衡》记载：“阳遂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⑧《抱朴子》中记：“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捣五石，下其铜。五石者，雄黄、丹砂、慈石、馨石、曾青也。皆粉之，以金华池浴之，内六一神炉中鼓下之，以桂木烧之，铜成以刚炭炼之，令童男童女进火，取牡铜以为雄剑，取牝铜以为雌剑。”^⑨特别是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器物铭文所见的五月中的干支纪日，与实际历谱不符^⑩，更凸显了时人在冶铸器物活动中对“吉日”有意识的选择。此外，随着东汉以后序数纪日的流行^⑪，“古以干支纪日，后世则易之以数”^⑫，“后世专用五日”^⑬取代了午日或丙日^⑭，也就是“五月五日”。

作者单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二、唐代“重五”铸镜与江心镜

汉晋以来于五月“择吉日”铸镜是阴阳五行思想下的产物，到了唐代不仅继承了这一传统，且进一步神奇化，并与皇家贡物联系起来，将“五月五日”铸镜理念推向了顶峰。唐代铜镜之中，与“五月五日午时”直接相关的就是“江心镜”。“江心镜”也有“水心镜”“百炼镜”“天子镜”之称，其制造与得名的缘起，颇具传奇、神秘色彩。对此记载最为详细、生动的莫属《镜龙记》^⑤。“开元三年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纵横九寸，青莹耀日。背有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生动。玄宗览而异之。进镜官扬州参军李守泰约：铸镜时，有一老人，自称姓名护。须发皓白，眉如丝，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相随，年十岁，衣黑衣。龙护呼为玄冥。以五月朔忽来铸所，神采有异，人莫之识。谓镜匠吕晖曰：老人家住近，闻少年铸镜，暂来寓目。老人解造真镜龙，欲为少年制之，颇将愆于帝意。遂令玄冥入炉所，扃闭户牖，不令人到。经三日三夜，门左洞开。吕晖等二十人于院内搜览，失龙护及玄冥所在。镜炉前获素书一纸，文字小隶，云：镜龙长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气、禀五行也；纵横九寸，类九州分野；镜鼻如明月珠焉。开元皇帝圣通神灵，吾遂降祉。斯镜可以辟邪，鉴万物。秦始皇之镜无以加焉。歌曰：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野有象，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上清仙子，来献圣聪。吕晖等遂移镜炉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时，乃于扬子江心铸之。未铸前，天地清谧。兴造之际，左右江水忽高三十余尺，如雪山浮江；又闻龙吟，如笙簧之声，达于数十里。稽诸古老，自铸镜以来，未有如斯之异也。帝诏有司，别掌此镜。”^⑥此后，扬州进贡江心镜成为常例。“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⑦直至唐德宗大历十四年（779）六月“己未，扬州每年贡端午日江心所铸镜、幽州贡麝香，皆罢乞”^⑧。

上述文献资料对于目前判断、界定“江心镜”至关重要^⑨，包括其铸造的起始和终止时间、基本形制、纹样与功能等。“江心镜”最早铸造于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停贡于唐德宗大历十四年六月。也就是说，江心镜作为贡物生产的时间前后也就65年。这是“江心镜”在铸造时间上的限定。“江心镜”铸造于扬州，这是在产地上的限定。江心镜是贡奉给唐朝皇帝——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的物品之一。这是在具体用途、性质方面的限定，也是对其等级性、流通范围的限定。江心镜的尺寸是“纵横九寸”，按唐代常用尺尺度值30.6厘米^⑩计算，其纵横约为27.54厘米。这是对其规制方面的限定。对于“纵横九寸”的理解至少可以有两种，一是圆形，一是方形，其他如葵花形、菱花形和亚字形等也可笼统纳入前两种之中。“镜鼻如明月珠”，是对其钮部样式的限定。江心镜的主体图案是一条盘龙，并且“镜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尽管其长度无法纳入“纵横九寸”的镜内，但这是对镜背纹饰的限定。“百炼”则是对其铸造工艺的限制。“百炼”一词用于铜镜或者铜器上，目前所知最早见于东汉时期，主要是指在铜及其合金的熔炼过程中，反复煎炼的次数之多^⑪。据此，大体可以给出江心镜的定义，即开元三年至大历十四年期间，于每年五月五日在扬州铸造的专门贡献给皇帝的盘龙纹铜镜。即便在江心镜停贡后，白居易对其也还有颇为清晰的记忆，“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人间臣妾不合照，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⑫。至于进一步限定在午时于扬子江江心铸造而成，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要求，实际上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可忽略不计。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龙护留下的文字中有“秦始皇之镜无以加焉”，即将“江心镜”的神异功能与“秦始皇之镜”相比较。《镜龙记》的作者张说在《咏镜》中同样提出“宝镜如明月，出自秦宫样”^⑬。由此可见江心镜的产生与“秦始皇之镜”有着密切的关联。关于“秦始皇之镜”的记载，最早见于《西京杂记》：“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⑭其可照人心胆的神异传说，流传到隋唐时期，因而产生了“秦王镜”^⑮。故宫博物院收藏一面隋代的龙纹方镜，外区有铭文一周，每边五字，共二十个字：“赏得秦王镜，判不惜千金；非关欲照胆，持是自明心。”^⑯这应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秦王镜”，其盘龙图案可视为“江心镜”纹饰的直接来源^⑰。

1998年在印尼苏门答腊岛东南方勿里洞岛发掘的“黑石号”沉船中，清理出一件八卦四神纹铜镜，上有铭文“扬子江心百炼造成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有学者将其定为“江心镜”^②，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③。若按上文所述江心镜，其中至为关键的两点：“五月五日午时”和镜背为一条盘龙，也就是铸造时间和主体图案，均与这件八卦四神纹铜镜不相吻合。因此，这件沉船中的铜镜无法被定为江心镜。尽管目前还不能确定江心镜的实物，但是在唐代由于江心镜的传奇色彩并作为皇家贡物的双重影响下，铸镜择日定于“五月五日午时”已形成一种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同。丰台区张家坟唐墓出土的这件铜镜只以“五月五日午时”六字为铭文，这明显不同于汉晋乃至隋代的镜铭内容，应是在江心镜影响下的产物之一，也是唐代铜镜装饰中的一种新样式。

三、唐代端午与铸镜

“五月五日”不仅是铸镜的吉日良时，还早在唐代以前就已经作为节日和节日的通行名称存在了。“五月五日，赐五色续命丝，俗说以益人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缿，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温。”^④“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踏百草。今人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⑤而没有资料可以表明，唐代以前“五月五日”铸镜与“五月五日”节日有直接联系。到了唐代，“五月五日”节受到朝野重视，习俗活动更为丰富多样。并且在盛唐以后，“五月五日”作为节日名称逐渐被“端午”取代^⑥。因而，《旧唐书》中记“扬州每年贡端午日江心所铸镜”。这一记载还首次明确将铸镜与端午直接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铸镜发展为唐代“五月五日”或端午节民俗活动中的一部分。以至宋、明时期，仍视端午铸镜为唐代风俗之一。“唐世五月五日扬州于江心铸镜以进，故国朝翰苑撰端午帖子词，多用其事”^⑦；“唐人端午于江心铸镜”^⑧。由此可见，唐代镜铭“五月五日午时”，除延续了择“吉日良时”铸镜的观念外，还是因江心镜的出现和“五月五日”节俗的发展，从而衍生出的新样式。可以说，唐代“重五”镜是吉日与节日“双重观念”下的产物。

丰台区张家坟唐墓出土的“五月五日午时”铜镜，综合考虑其所属墓葬的形制^⑨、共出铜钱的样式^⑩和镜背的装饰图案^⑪等，可将其年代定在晚唐时期。这件铜镜是北京地区首次考古发现的唐代“重五”镜，与罗振玉《古镜图录》中收录的“五月五日”铜镜^⑫和新乡博物馆收藏的“五月五日”铜镜^⑬等有相似之处，但更符合江心镜铸造所强调的“五月五日午时”，因而对于构建北京地区出土唐代铜镜的类型序列、认识唐代铜镜的制器思想等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 ① 张智勇:《丰台区张家坟唐、元、清墓发掘报告》,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编著:《北京考古(第5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24年,第33—34页。
- ② 陈佩芬编:《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33页。
- ③ 刘永明编著:《汉唐纪年镜图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11页。
- ④ 湖北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编:《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1、23页。
- ⑤ [清]桂馥撰:《札朴·古镜文》卷八,中华书局,1992年,第311页。
- ⑥ 庞朴:《“五月丙午”与“正月丁亥”》,《文物》1979年第6期。
- ⑦ [清]陈立撰:《白虎通疏证·五行》卷四,中华书局,1994年,第189页。
- ⑧ 黄晖撰:《论衡校释·率性篇》卷二,中华书局,1990年,第88页。
- ⑨ [晋]葛洪著,金毅校注:《抱朴子内外篇校注·登涉》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659页。
- ⑩ 罗振玉:《镜话》,《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0页。连先用:《汉末三国镜铭纪日干支错乱问题新探》,《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8期。
- ⑪ 陈侃理:《序数纪日的产生与通行》,《文史星历:秦汉史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153页。
- ⑫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86页。
- ⑬ [清]赵翼撰:《陔余丛考·上巳端午除夜》卷二十一,中华书局,2006年,第402页。
- ⑭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重数节日的形成》,池田温:《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68页。
- ⑮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华书局,2021年,第78—79页。
- ⑯ [唐]陈翰编,李小龙校证:《异闻集校证》,中华书局,2019年,第14—15页。此事还可参考[唐]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贝编》,中华书局,2015年,第413页。
- ⑰ [唐]李肇撰,王福元校注:《唐国史补校注·扬州江心镜》,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49页。
- ⑱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德宗本纪上》卷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322页。
- ⑲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2009年,第226页。
- ⑳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一九五六年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唐墓葬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丘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30页。
- ㉑ 何莹坤:《关于我国古代铜镜铸造技术的几个问题》,《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
- ㉒ [唐]白居易:《百炼镜·辨皇王鉴也》,《白居易集笺校》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04—205页。
- ㉓ [唐]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杂诗》卷九,中华书局,2013年,第458页。
- ㉔ [晋]葛洪撰:《西京杂记》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第18—19页。
- ㉕ 范淑英:《隋唐墓出土的“古镜”——兼论隋唐铜镜图纹的复古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6期。陈晓伟:《秦王瑞兽镜铭文新证》,《美术研究》2021年第2期。
- ㉖ 郭玉海:《故宫藏镜》,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第74页。铭文可参考罗振玉:《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 ㉗ 唐代“秦王镜”的铭文与隋代相同,但纹饰流行四兽或四马,这种转变,很可能与“江心镜”“千秋镜”作为贡镜、赐镜的等级有关。可参考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1页。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陕西省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100页。赵彩秀、杨新文:《四龙纹金镯与秦王镜》,《文博》1998年第1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木纳尔墓地的发掘》,《考古》2006年第12期。张雪岩:《吉林集安出土的古镜》,《文物》1986年第6期。杨清秀、胡秉钧:《介绍几面馆藏铜镜》,《中原文物》1988年第3期。姚香勤、饶胜:《镜映千古——新乡市博物馆藏古代铭文铜镜》,《文物春秋》2018年第1期。秦欣欣:《新乡市博物馆藏历代铜镜选介》,《文物天地》2021年第4期。聊城地区文化局文物研究室:《聊城地区出土部分古代铜镜》,《文物》1993年第4期。王月华:《滦平县博物馆藏铜镜》,《文物春秋》1997年第1期。崔利民:《长治市博物馆收藏的历代铜镜》,《文物季刊》1996年第4期。
- ㉘ 齐东方:《“黑石号”沉船出土器物杂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3期。陈灿平:《“黑石号”沉船出水铜镜初探》,《芳林新叶——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3页。陈克伦:《印尼“黑石号”沉船及其文物综合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9年第4期。
- ㉙ 贺逸云、沈睿文:《“黑石号”江心镜为唐伪作镜考》,《考古学研究(十三)》,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499页。
- ㉚ [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中华书局,1981年,第605页。
- ㉛ [梁]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页。
- ㉜ 张勃:《唐代节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5页。
- ㉝ [宋]洪迈撰:《容斋随笔·容斋五笔卷九·端午帖子词》,中华书局,2015年,第743—744页。
- ㉞ [明]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古钱》卷八,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年,第204页。
- ㉟ 刘耀辉:《试论北京地区唐墓》,《北京文博》1998年第4期;王乐:《试论京津唐地区隋唐墓葬》,《中原文物》2005年第6期;胡传耸:《北京地区隋唐墓葬分期与年代研究》,《北京文博文丛》2011年第1辑。
- ㊱ 徐殿魁:《试论唐开元通宝的分期》,《考古》1991年第6期。
- ㊲ 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 ㊳ 罗振玉撰集:《古镜图录》卷下,朝华出版社,2018年,第153页。
- ㊴ 姚香勤、饶胜:《镜映千古——新乡市博物馆藏古代铭文铜镜》,《文物春秋》2018年第1期。

辽代墓志十二生肖纹饰探析

王晓颖

十二生肖是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之一，秦简中就有相关描述，只是彼时对十二生肖的组配说法不一。汉代，十二生肖已经发展成熟，如东汉王充的《论衡》中对十二地支与十二属相组合搭配的描述，已与现在别无二致：“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兔？亥，豕也，……巳，蛇也，申，猴也。”^①“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东南。”^②

现如今针对中古时期十二生肖具体图像的考察资料主要来源于考古材料即墓葬出土的文物，如墓志、壁画、生肖俑等，其中生肖墓志数量最多，是认知十二生肖形象的主要载体。学界对此有诸多研究成果，并大多集中于隋唐时期生肖纹饰墓志的分期、分类以及十二生肖在墓志中的排列规律上。事实上，该习俗在辽代墓葬中多有出现。故本文以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馆藏两方辽代十二生肖纹饰墓志为出发点，基于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对辽代墓志中十二生肖纹饰的流变提出更进一步的观点，对墓志上的十二生肖形态和辽代生肖纹饰主流类型进行初探，试图更深层次挖掘其背后的内涵。

一、馆藏辽代十二生肖墓志概况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收藏有两方刻有十二生肖纹饰的辽代墓志，一方为耶律迪烈墓志^③，由志石和志盖组成，灰砂岩质。志盖顶部篆书“南瞻部洲大辽国迪烈王墓志文”，四刹阴刻文官形象，手持笏板，面向左侧站立，冠饰十二生肖形象，志盖四角阴刻云纹，志盖底部四边立面线刻牡丹花纹（图一）。志石书写契丹小字32行。针对志文，已有学者对其进行考释，明确了墓主身份，即是《辽史》有传的“耶律迪烈，字撒懒，采访使吼五世孙”^④。



图一 耶律迪烈墓志盖



图二 大辽故张府君墓志盖

另一方仅有志盖无志石，志盖为盃顶式，顶部篆书“大辽故张府君墓志铭”九字。志盖四刹线刻十二辰像，为官员站姿形象，着宽袍大袖交领服饰，手持笏板，侧身站立（图二）。志盖四角饰以牡丹花纹饰，线条流畅形象生动。由于无志文和其他相关信息，暂无从考证墓志的出土时间、地点以及墓主的身份。

两方墓志十二生肖纹饰类型并不相同，耶律迪烈墓志为动物并冠顶生肖，张君墓志则是完全的人物形象，并无动物生肖出现。由此可知，辽代墓志的十二生肖纹饰不止一种类型，纹饰类型的选择有可能与墓主身份或地域文化相关，为此对辽代墓志十二生肖纹饰有必要做进一步探讨，或许能发现关于“张君墓志”的更多信息。

二、辽代墓志十二生肖纹饰探析

十二生肖纹饰墓志起源于北朝时期的西安地区，在唐代京畿地区最为流行，带有中原文化底色。辽是契丹族在

作者单位：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

北方建立的多民族政权，探析十二生肖纹饰墓志在辽代的发展情况，亦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融情况。

（一）墓志分布情况

辽代十二生肖纹饰墓志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北京、辽宁等地，河北、山西亦有少数分布，与辽王朝政治版图相对应。在唐代，以上大部分地区都已有十二生肖纹饰墓志的使用，比如北京房山的刘如泉墓志（783）^⑤、山西永济的樊策墓志（692）^⑥、河北馆陶的左用墓志（877）^⑦、内蒙古乌审旗的徐买墓志（696）^⑧等等。在辽代入主燕云十六州后，墓志上的生肖纹饰并未因政权的更迭而停止使用，而是在吸收并继承中原文化后，在其政治版图内焕发生机。目前已发现最早的辽代十二生肖纹饰墓志是应历九年（959）内蒙古驸马沙姑墓志，最晚的一例是天庆四年（1114）北京王师儒妻丰国夫人韩氏墓志，生肖纹饰墓志存续的时间正是集中于辽代入主燕云十六州后，辽政权得以南移，自此与中原文化的交往更进一步。

（二）辽代生肖纹饰类型

辽代墓志上的十二生肖纹饰除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藏的两类型外，已知还有三种类型，分别是写实动物型（图三）、兽首人身型（图四）、人物并怀抱生肖型（图五）。在纹饰类型上，除了人物并怀抱生肖类型外，其余类型在唐代长安地区已出现并流行，譬如写实动物型的郭均墓志（595）^⑨、人物并冠顶生肖型的郭文喜墓志（750）^⑩、兽首人身型的宜都公主墓志（803）^⑪、完全人物类型的杜氏墓志（829）^⑫。可以说，辽代墓志十二生肖纹饰类型基本延续了唐长安地区的风格特点。

鉴于人物并怀抱生肖纹饰墓志在唐长安地区至今未有发现，因此不能断定该类型来源于京畿地区。整理资料发现唐幽州地区出现大量该型纹饰墓志，并且此类型纹饰在辽代也正是集中在这一地区，所以辽代人物并怀抱生肖类型纹饰应是受唐幽州地区的影响，是该地区丧葬习俗的延续。

辽代墓志十二生肖纹饰类型在地域分布上有几处较鲜明的特征，如内蒙古地区以人物并冠顶生肖型居多，有韩匡嗣墓志（985）^⑬等；人物并怀抱生肖类型集中于辽南京地区，有董匡信夫人王氏墓志（1051）^⑭等；完全人物化类型大多出自河北宣化张氏家族墓，有张匡正墓志（1058）^⑮等。

前文提及馆藏张府君墓志，在纹饰类型上与河北宣化地区发现的墓志一致，纹饰风格刻画类

似，人物俱是着交领、宽袍大袖服饰的官员形象，表情淡然，面向左站立，双手持笏，头戴幘头，靴头露在外（图六）。十二生肖之间均无隔断纹饰，志盖四角饰以简约的花纹。鉴于辽代墓志十二生肖纹饰在类型上具有地域集中化的特点，且馆藏张府君墓志与辽代河北宣化张氏家族为同一姓氏，因此，本文推测该墓志出土于河北地区，墓主



图三 耶律习涅墓志盖十二生肖纹饰（局部）



图四 韩佚夫人王氏墓志盖十二生肖纹饰（局部）



图五 韩资道墓志盖十二生肖纹饰（局部）



图六 张匡正墓志盖十二生肖纹饰（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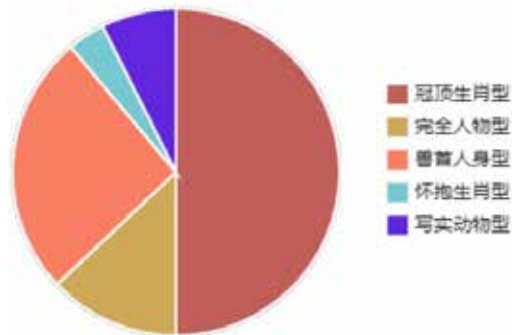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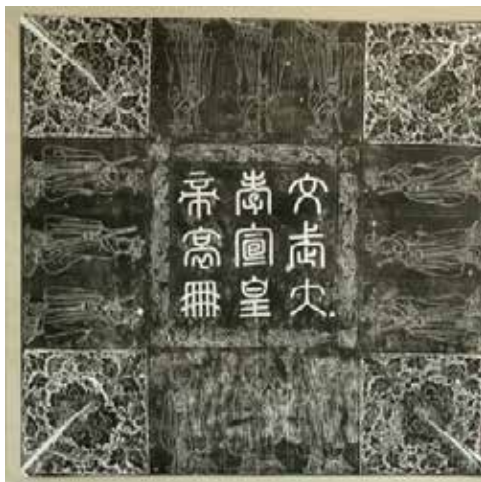
身份可能是宣化张氏家族成员之一。

（三）辽代十二生肖纹饰主流类型——人物并冠顶生肖

墓志上人物并冠顶生肖纹饰较早出现在唐代中原地区，其中人物以坐姿为主，但彼时生肖纹饰中的主流仍为写实动物与兽首人身类型。如前所述，辽代在生肖纹饰类型上主要承继了中原地区的风格，但主流纹饰并没有与之相统一。在已出土的辽代生肖纹饰墓志中，人物并冠顶生肖纹饰占比近一半（图七），另从墓主身份看，辽统治阶层尤其是契丹贵族更偏重该类纹饰，如辽圣宗哀册、仁德皇后哀册、陈国公主墓志等都是采用人物并冠顶生肖类型（图八）。

由此可见，不论从墓志数量还是墓主身份看，人物并冠顶生肖是辽代十二生肖纹饰中的主流类型，这有别于唐代中原地区。关于人物并冠顶生肖纹饰在辽代成为官方规制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辽代兴起的时期，适逢该纹饰在唐末中原地区出现，于是适时接受了这种形式^⑮。除此之外，本文认为还与辽代崇佛有关。自辽太宗时，对佛教的信仰已经渗透到统治阶层。天显十二年（937），太宗将幽州大悲阁的观音像迁往木叶山，建庙“尊为家神”^⑯。圣宗以后，辽朝佛教进入全盛期^⑰。在此自上而下的崇佛背景下，佛教信仰中的十二神将作为昼夜十二时护法神，他们在佛经中的具体形象被描述为以头戴生肖为冠^⑱，作为身份的标志，并且十二神将的轮次顺序与十二生肖相契合。所以，辽代墓志十二生肖纹饰流行冠顶生肖类型与佛教信仰是有关联的。

馆藏的耶律迪烈墓志，也印证了辽代十二生肖纹饰类型的选择与契丹贵族对佛教的崇拜有关。该墓志盖上刻有“南瞻部洲”字样，南瞻部洲为梵语音译，是佛教传说中四大部洲之一，位于须弥山之南方咸海中，由四大天王之一的增长天王守卫。将佛教中虚拟的地理概念用在墓志上表现了墓主对



图七 辽代墓志十二生肖纹饰类型比例图



图八 辽圣宗哀册盖（左）及辽仁德皇后哀册盖（右）

佛教的崇拜，该墓志盖上线刻的十二生肖纹饰正是与佛教信仰相关的冠顶生肖类型。

（四）辽代生肖纹饰形态

十二生肖纹饰在墓志上的表现形态主要分为两种：坐姿与站姿。对于生肖形态的探讨主要是针对人物化生肖类型中人物的形态，包括兽首人身、人物并手抱生肖、人物并冠顶生肖及完全人物型，故写实动物类型不在此讨论范围。

虽然在纹饰类型上辽代多受唐长安地区影响，但在人物化生肖纹饰形态上的表现与之亦有不同。根据学者们以往的统计研究，唐京畿地区墓志上的十二生肖纹饰形态流行坐姿^⑲。经过图文结合考证，辽代墓志中的拟人化十二生肖形态绝大多数是站姿，极少是以坐姿呈现人物形态^⑳。基于辽承唐制的观点，将考察范围扩大至唐京畿地区外，即十二生肖纹饰墓志较为流行的其他地区，发现墓志上的站姿十二生肖纹饰最早出现于唐幽州地区的郭府君墓志（733）^㉑，而后该地区墓志上的十二生肖纹饰形态都是站姿形态，成为唐幽州地区墓志十二生肖纹饰的区域特色。结合目前可知的辽代墓志十二生肖纹饰都出现在辽代人主燕云十六州以后，故辽代墓志十二生肖纹饰的站姿形态是

受唐幽州地区影响。

三、余论

辽建立之初，契丹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接纳中原文化的重要性，在政治上效仿中原，因俗而制，“契丹国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经略使，始有唐官爵矣。其后习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太祖因之”^{②③}。在取得燕云十六州后，“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诚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②④}。在这种背景下，接受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丧葬习俗亦是辽融入中原文化的部分写照，在墓志十二生肖纹饰上体现出对唐中原地区生肖纹饰类型的继承，同时在生肖纹饰形态上又接受了唐北方幽州地区的站姿特征。

辽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显著特征是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在墓志纹饰细微之处便能窥见一二。辽代墓志上十二生肖纹饰的特点体现了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融合，并且在主流纹饰的选择上有别于中原地区，具有本朝特色，将崇佛意识体现其中。

墓志作为墓葬中主要的文字载体，一直以来深受学者重视，对志文的考释，可以佐证史书记载、补充正史缺失。但纹饰作为墓志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应受到关注，某一类墓志纹饰从产生到流行、传播，除了能展现古人的审美情趣和丧葬习俗外，还蕴含着政治、文化等内涵，仍需要更进一步地去挖掘。

① [东汉]王充著，陈蒲清点校：《论衡》卷三《物势篇》，岳麓出版社，2006年，第63页。

② [东汉]王充著，陈蒲清点校：《论衡》卷二十三《言毒篇》，岳麓出版社，2006年，第294页。

③ 该墓志是北京市文物公司于1997年捐赠给辽金城垣博物馆（现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当时出土时间与地点不详。据包联群《〈南瞻部洲大辽国故迪烈王墓志文〉的补充考释》[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指出该墓志1995年出土于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嘎亥图镇。

④ 卢迎红、周峰：《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0年第1期。

⑤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⑥ 运城市文物局：《运城市馆藏文物精粹》，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

⑦ 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壹）》，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38页。

⑧ 故宫博物院、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叁）》，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8页。

⑨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页。

⑩ 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线装书局，2007年，第473页。

⑪ 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贰）》，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

⑫ 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514页。

⑬ 盖之庸：《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⑭ 苏天均：《北京郊区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2期。

⑮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66页。

⑯ 杨玥：《辽代墓志生肖图案的考古学观察》，《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

⑰ 《辽史》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第446页。

⑱ 尤李：《多元文化的交融——辽代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89页。

⑲ 谢志斌：《十二药叉信仰的组成及其中国化形态》，《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4期。

⑳ 唐静：《考古材料中十二生肖形象的类型及演变》，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㉑ 目前只有辽代早期的驸马赠卫国王沙姑墓志中的生肖纹饰是坐姿形态，纹饰类型是人物并冠顶生肖。其他已知人物化生肖纹饰墓志中人物形态均是站姿。

㉒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4页。

㉓ 《辽史》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第771页。

㉔ 《辽史》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第772页。

金代韩景□神道碑补考





孙建权

2003年5月，北京市五环路丰台段施工过程中，在卢沟桥与宛平县城间出土了一方韩□□墓神道碑。碑出土时已残毁，仅存下半部，现存丰台区文管所。碑文正书，40行，残石每行字数不等，最多46字，残存碑文共约1840字。该碑原位于石景山区八宝山，明代因卢沟桥发洪水，遂被当作石料移至卢沟桥，直至2003年被发现。残碑出土后，陈康先生及时撰文简要介绍了它的情况，并考察了墓主的家世，指出墓主名为“韩景□”，最后附有录文^①。嗣后，《北京辽金史迹图志》《金代石刻辑校》《全金石刻文辑校》等书并据陈先生录文转录该碑文^②。在陈先生录文的基础上，学界也开始利用该碑解读一些历史问题，如孙勳先生《墓志中所记北京地区辽代韩氏家族考略》一文借以考察了辽代韩延徽家族的世系传承^③，李浩楠先生《金朝与西夏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分析了碑文中关于金夏关系的记录^④，拙文《金代韩景□神道碑考释》（以下简称《考释》）则首次对该碑文做出较为全面的考释，指出了碑文的主要史料价值以及前人对立碑时间的误判^⑤。
















综上，学界对此碑的认知与利用，几乎都完全建立在陈康先生的录文之上，而未能查探原石照片或拓片的下落，故各种论著对陈先生录文中存在的疏失未能纠正，从而影响了对碑文价值的正确阐释，甚至产生了一些误解^⑥。2023年10月出版的《中都遗珍——北京辽金遗迹》一书，依旧在根据陈先生录文著录该碑^⑦。实际上，此残碑的拓片早在2003年便已刊布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历代碑志选》一书中，唯编者将其命名为“韩公神道碑”并误识为辽碑^⑧，故鲜为人知。有鉴于此，本文将利用此碑的原始拓片，对碑文进行重新誊录，并在既有考释结论上，尽量充分、准确地发掘此碑的史料价值。

一、拓本与录文

《韩景□神道碑》拓本载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历代碑志选》，如图一，并据以重新录文。“□”表示碑文无法辨识，框内汉字为笔者据字形或文意补出，“■”表示无法确定缺字字数，“/”表示换行。

■户、食实封一伯户韩公神道碑 /

奉直大夫、翰林待制、同知制诰、上骑都尉、河南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撰 /

■门下平章事。平章生倬，中书令、赠侍中。侍中生绍文，太子太师、鲁国公。鲁国公生造，太子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 / ■任。公即诩之次子也。公既贵，赠诩宣武将军。曾祖妣张氏，追封歧国太夫人。祖妣王氏，妣张氏、王氏，皆赠南阳郡太夫人。 / ■纷扰于天庆间，祇候閤门，特授左承制。及 / ■宋二主归命，朝廷选閤门祇候能干者十余人护视西北，公首预焉。二主尝出珠玉纨绮遗之，公不受，公益礼之 / ■任使。皇统初，考叙前绩，自六宅超授明威将军。累迁振威，授利涉军节度副使。至镇，具疑狱滞讼即请于守，愿悉心剖决 / ■郡用宁。公日涉簿书，度民力所堪以均赋役，而人不困。断治明察，吏不得民一钱。岁且满，累迁宣威将军，授兴平军节 / ■竟夕，一境沾足，民德之。初，守待玉牒近属，方熙宗时，宗臣作牧，挟贵专恣，嗜驰猎不以时。方春，州县承帖拘马数百 / ■喻遣之，守惧，为之止。公尝察州县吏修废。时海山令贪纵不法，令方以事诣州，公曰：“汝职废久矣。”悉条其宿恶：“汝宜以□ / ■县吏之奸者，杖而去之。”县民僉曰：“公神明也。”复按滦州同知取财。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方鞠之时，僚属交议，以为暴刻。公曰：“日浸月积，而民/■守顾毁誉，不能有所损。”惟公痛裁节之。畏公廉毅，而亦莫之毁也。平人赖以纾。后遂以为例。及罢将去，郡老幼相扶携，嗟/■以赏雄里中，居母丧，饮酒荒纵，遇二宿奸逼取银三百两，莫有知者。公察系逼银者，付狱鞠之，二人款伏，银遽追获。公戒/■激溢河流，下接堤岸不支，民居将荡没。公乘舟相河之势，率民当完者完之，冲泛风涛，出九死而不顾，忘食息，水以平。时/■泻。阳起石贡余，例为府僚分有之。公曰：“为吏以俸廩足食于家，可纵其贪耶？”悉入官以助经费。时廉访使周行天下，距/■第一。民皆曰：“复得公，民其安矣！”皆奔走歌呼，惟恐其别有除命也。公益扫除变更，兴起法度，使百姓安便之/■大将军既代，府民遮恋，尤甚于去平时也。未几，授同知延安尹兼鄜延路兵马都总管府事，未之任。天德三年，太师南/■首膺是选。日视出纳，百用繁浩，至于亿计。公心术明敏，服劳不倦，事无巨细，皆躬亲而办，仍僻州佐县令谨廉者十余/■召上殿。海陵面谕曰：“朕曩者皇统间常过济州，一识卿面，尔后稔闻卿政誉，朕甚嘉之。”鄜延总尹纯质旧人，不炼事，以/■遇。既之任，事皆决于公。初，夏人以数万众入寇，过塞门寨，侵扰边户。戍兵屡出不能却，固颇为患。公移檄夏人，一日/■皆敛色屏气。公从容谕之曰：“汝幽遐小邦，受上国封建，岁有贡赐，当慎固疆场，遵守臣职。今乃恣为不逞，以尺寸之/■一介问罪汝国，其将何辞以对？”渠帅耸然服罪，诉以追访失马至此，咸恐惧请命，固却兵三十里。公悉驻列城堡，诸/■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府事。使谕海陵旨曰：“延安政成，皆赞固之力，今移汝近地，以待殊擢。”公附谢曰：“臣待罪巨藩/■□□十日。”逾旬，许人告捕给赏，仍削官杖之停罢，留者处固。固赞皇令子婿到县□告固过期者，公骇然谓其人曰：/■子婿面质其罪。公曰：“汝祖父生之前，然所出非嫡，命立不明。其人常侍汝祖父，既而有出，宁得为婢耶？义当优礼嫁/■□不预签署。”公曰：“少尹无一铢之罚，公坐何不预焉？”始有悖语，公甜然不为较也，府帅为改悔。会宋国贺生辰使/■□□宴，以严饰见公，大夫、士皆以为宜。方京师阙饷，以公驰传发运河北东西路廩粟，始议取民物力，均以陆运，/■□不阙，民用不扰。未几，海陵议公材干，不可以秩次升用，大臣亦荐公不可弃之于外，将以户部尚书授公。命已/■□岁六月甲申，葬大兴府宛平县房仙乡鲁郭里，从先域也。迨/■□□者，辄谕以义，使归思之，狱以故少。闻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处事，无细大，皆尽其心，故民乐其不扰。凡/■□之甲族，勤孝柔仁，动无违德，故内外宗姻莫不嘉其行。累封南阳郡夫人。有子六人，曰湛、曰淳，皆举进士业。/■□副使。曰激，祇候内承奉班、监苏门河平县早生镇酒税，卒于官。曰温，敦武校尉、监涿州税，病卒。女二人，长适/■□伯益，祇候承奉班、知潞王府印。深二子也。曾孙一人，合喜。女孙五人，长早卒，次为尼，次适辅国上将军、镇西/■辅国上将军，勋至护军，爵至开国侯，食邑至一千户，实封至一伯户。宜有墓隧之碑，乃得次而铭之。铭曰：/

- 弱冠筮仕，因固廉清。入治惟勤，出长惟明。副节济平，化行两郡。教导刑威，固邪为正。/
- 授赴关右，□□回辕。天都肇建，百用寔繁。日受万计，日固固□。公才何优，毫厘固固。/
- 何不淑，一病莫兴。皇天丧我，万人之英。克孝于家，固固于国。固身以廉，化民以德。/
- 鲁郭之里，房仙之乡。山长水远，永固公藏。
- 乡贡进士丁□□篆额。杨固刊。/
- 节度判官、轻车都尉、济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丁□□之书丹。/
- 举常平仓事、护军、南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伯户深立石。/

二、碑文考释补正

《考释》一文对韩景□神道碑已有比较全面的考释，但受限于当时未见拓片，个别结论并不正确，今在其基础上就韩景□先祖与子孙、韩景□履历再加补释。

（一）韩景□先祖与子孙

韩景□是辽初名臣韩延徽后裔，韩绍文玄孙，韩造曾孙，韩资□之孙，韩诩之子。碑文开篇便交代了韩景□的族系源流：“固固固门下平章事。平章生倬，中书令、赠侍中。侍中生绍文，太子太师、鲁国公。鲁国公生造，

太子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 \square 神道碑。公即诩之次子也。公既贵，赠诩宣武将军。”此间涉及韩倬之父、韩倬、韩绍文、韩造、韩诩五人，以下结合多方辽代墓志与之对勘。

韩倬之父名，残碑阙载，考辽统和十五年（997）《韩佚墓志铭》知，韩倬为韩佚二弟，他们的父亲为韩德邻。《韩佚墓志铭》称韩德邻“少亡”而不提其仕宦，且志文内叙述韩佚入仕乃是凭借伯父韩德枢恩荫，足见韩德邻卒前未入仕或虽做官但品级甚低^⑨。据碑文，韩德邻最后的赠官中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名，可补史缺。

关于韩倬的赠官，咸雍五年（1069）《韩资道墓志铭》载为“皇辽兴军节度使，累赠至中书令”，与碑文有异，或韩倬赠官在咸雍五年后复有追加所致。《韩资道墓志铭》载韩绍文的官爵与此碑文相同：“祖绍文，守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鲁国公致仕。”^⑩

韩造官衔因残石缺失而不见全貌，考天庆四年（1114）《王师儒墓志铭》载师儒岳父韩造结衔为“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使事兼赠中书令”^⑪，天庆十年《杜恂墓志铭》也载韩造结衔为“故守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使事、赠中书令”^⑫。两相对照，知残碑“判”下所缺文字当为“三司使事赠中书令”云云，唯《杜恂墓志铭》中的“太子太师”与碑文“太子太保”小异。

碑文下文复提及韩景 \square “祖妣王氏，妣张氏、王氏，皆赠南阳郡太夫人”，可凭此再对韩景 \square 祖父作一推测。韩景 \square 祖父为韩资 \square ，祖母为王氏，而《韩资道墓志铭》载资道“娶琅琊王氏”，与之合。另考资道“有子五人，长曰迎恩奴，次三子早亡，次尚幼”，从姓名来看，“迎恩奴”并非汉名，当时资道幼子尚无姓名，所以不能排除韩资道正是韩景 \square 祖父的可能性。

韩诩，从残存“致仕。公即诩之次子也。公既贵，赠诩宣武将军”碑文可以看出，其生前仕宦不显或并无功名。将此点与韩资道早亡（享年三十一）相结合，也能进一步怀疑韩资道为韩诩之父：韩诩当无机会因父荫入仕。不过，因为“致仕”之前的缺失文字也不排除是在陈述其长子的履历，所以要坐实上述推论，仍需更直接的证据。

神道碑的立石人是韩景 \square 之子韩深。韩深之名不见于已知的其他金代文献中。关于韩深的介绍必在原石的上半段，今已无从得悉，据碑文叙述墓主子嗣的顺序推断，韩深是韩景 \square 的第三子或第四子。另从碑末韩深的残存题署“举常平仓事、护军、南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伯户”来看，韩深在立碑时的官品并不低，至少散官应与其父平级，能够延续家族势力不坠。又考碑文在叙述第五子韩激之前，有残存“副使”二字，或即韩深职事官，故笔者认为韩深大概率是韩景 \square 的第四子。

韩景 \square 曾孙名“合喜”，乃女真名，汉意为“犬子”^⑬，从中可窥见金代汉人出现的一些女真化倾向。

（二）韩景 \square 仕途履历订正

残碑明确记载韩景 \square 入金后历任阁门祗候、六宅使、利涉军节度副使，而下一任职，陈康先生录文为“授兴平



图一 《韩景 \square 神道碑》拓本

军 罔 度 使”，《考释》据以认为韩景□在利涉军节度副使秩满后擢为兴平军节度使，此论有误。今覆核拓片，残石文字在“节”后已换行，“度使”二字乃是陈先生据文意补，不足据。碑文下有“守待玉牒近属，方熙宗时，宗臣作牧，挟贵专恣，嗜驰猎不以时。方春，州县承帖拘马数百■喻遣之，守惧，为之止”云云，说明平州主官（即碑文中“守”）另有其人，是一宗室，故韩景□所任官乃是“兴平军节度副使”。相较前任的利涉军节度副使，此番属于平调。

随后，《考释》认为韩景□结束平州任期后，当任济南尹，也不准确。金代府尹为正三品，而韩景□在任职济南府之前既是从五品的节度副使，在济南府任后是从四品的同知延安尹兼鄜延路兵马都总管府事，则其在济南府所任官职正常应介于从五品与从四品之间。考金代散府（济南府为散府）官员品级：尹为正三品，同知为正四品，少尹为正五品，府判为从六品，其中未有“从五品”与“从四品”^⑭，故笔者认为韩景□担任的是正五品的济南府少尹。又从碑文“时廉访使周行天下，距■第一。民皆曰：‘复得公，民其安矣！’皆奔走歌呼，惟恐其别有除命也。公益扫除变更，兴起法度，使百姓安便之■大将军既代，府民遮恋，尤甚于去平时也”可以看出，韩景□在济南府少尹一职上获得了连任。

最后，《考释》认为韩景□结束延安府任期后担任“知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府事”，同样不正确。韩景□最后担任的官职应为同知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府事，理由是，碑文续有“府帅为改悔”一句，说明韩景□并非真定府长官。

综上，韩景□入金后的仕途履历应修正为：閤门祗候→六宅使→利涉军节度副使→兴平军节度副使→济南府少尹→同知延安尹→同知真定尹。

三、其他问题

碑文对于我们了解金朝前期的政治、官制也有一定价值。同时，通过分析碑文提供的种种细节，我们能够进一步获悉此碑的立碑时间。

（一）金初平州的重要地位

碑文称平州“守待玉牒近属”，即熙宗朝的兴平军节度使多为皇亲国戚，这与辽代平州辽兴军节度使“非王公不得补是职焉”^⑮如出一辙，足见平州在辽金时期的重要地位。韩景□任兴平军节度副使是在皇统后期，《金史》所载此间的兴平军节度使共有二人，一为完颜宗永（世祖孙），一为完颜隈可（康宗子），均为宗室^⑯，均与碑文所载守臣的身份特征相符。

（二）正隆时未停封百官妻命妇号

《金史·樞密温敦思忠传》载正隆时（1156—1161）海陵废停了品官封赠外命妇的制度：

海陵欲定封爵制度，风思忠建白之。封王者皆降封，异姓或封公或一品、二品阶。惟封思忠广平郡王，赐以玉带。思忠言百官不当封妻，海陵从之。惟封思忠次室为郡夫人。^⑰

但此碑明言卒于正隆末的韩景□之妻“封南阳郡夫人”，与上述《金史》记载相左。笔者曾援引此碑作为论据，并结合《金史·樞密温敦思忠传》（以下简称《传》）的上下文逻辑，推断《传》中的“百官不当封妻”似为“百官不当封妾”之误^⑱。今再补一证，以说明《韩景□神道碑》所载可信。正隆末大定初，金朝奉国上将军、武胜军节度使萧中一投宋，宋人记载萧中一“妻耶律氏见带番伪兰陵郡夫人，次妻耶律氏并妾路氏……各未有封号”^⑲，亦明言妻有命妇号而妾无。由此可见，正隆时期金朝仍有“百官封妻”的现象，故知海陵废除的实是皇统以来封品官次室命妇号的制度。

（三）立碑时间再考

学界长期判断此碑立于大定年间，然并无证据。《考释》考订此碑当立于明昌三年（1192）以后^⑳，今据碑文再做进一步推断。

韩深次子韩伯益，“祇候承奉班、知潞王府印”。“承奉”本作“供奉”，章宗即位后因避讳其父显宗名而改。潞王，史载章宗朝以降金代有此封爵者共两人：一为完颜永济，大定二十九年（1189）闰五月进封^②，明昌二年改封韩王^③；另一人为完颜永德，承安二年（1197）进封^④，大安三年（1211）时已为韩王^⑤。由于此碑立于明昌三年之后，故此处的“潞王”实指完颜永德。缘此我们能够进一步推定，此碑当立于承安二年以后。

至于立碑下限，也可约略考得。碑文中仍见“总尹”“少尹”等官名，未见避讳“尹”字，据之可判断此碑应立于泰和四年（1204）金朝全面贯彻避讳官制中的“尹”字之前^⑥。

综上所述，此碑立石时间是在承安二年至泰和四年之间（1197—1204）。

《韩景□神道碑》虽然仅存下半部，但它对于我们了解辽金时期的燕京韩延徽家族和金朝前期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仍有着不可忽略的史料价值。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发现此碑的上半部分，合为完璧，令世人重见金代燕京汉人世家大族的演变史，丰富我们对辽金王朝的认识。

① 陈康：《丰台出土辽韩氏家族墓神道碑》，《北京文博》2003年第3期。

② 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290—292页；王新英编：《金代石刻辑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70页；王新英辑校：《全金石刻辑校》，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319—321页。

③ 孙勣：《墓志中所记北京地区辽代韩氏家族考略》，载北京联合大学编：《北京学研究文集 2007》，同心出版社，2009年，第329—341页。

④ 李浩楠：《金朝与西夏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夏研究》2010年第1期。

⑤⑥ 孙建权：《金代韩景□神道碑考释》，《北京文博文丛》2011年第2辑。

⑦ 如孙勣先生误将此碑文撰者的结衔与下行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连为一体，释作韩延徽之子韩德邻的官衔。参孙勣：《墓志中所记北京地区辽代韩氏家族考略》，载《北京学研究文集 2007》，第331页。

⑧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编：《中都遗珍——北京辽金史迹》，北京燕山出版社，2023年，第725—726页。

⑨ 中共石景山区委宣传部等编：《北京市石景山区历代碑志选》，同心出版社，2003年，第7页。

⑩ 《韩休墓志铭》拓片，见《北京市石景山区历代碑志选》，第38页。

⑪ 《韩资道墓志铭》拓片，见鲁琪：《北京出土辽韩资道墓志》，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77页。

⑫ 《王师儒墓志铭》拓片，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四十五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2页。

⑬ 《杜念墓志铭》拓片，见陈康：《辽杜念墓志考》，载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第5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211—212页。

⑭ 《金史·国语解》，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20年，第3054页。

⑮ 以上诸官品级，参阅《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第1396—1398页。

⑯ 《杜念墓志》拓片，见陈康：《辽杜念墓志考》，载《北京文物与考古》第5辑，第211—212页。

⑰ 《金史》卷六五《斡襄子宗永传》，第1647页；卷六六《隈可传》，第1661页。

⑱ 《金史》卷八四《孛鲁温敦思忠传》，第2002页。

⑲ 孙建权：《金代外命妇制度的演变》，《文史》2022年第4辑。

⑳ [宋]周必大撰、王瑞来校证：《周必大集校证》卷九七《封赠归正人萧中一及妻妾舅附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411页。

㉑ 《金史》卷九《章宗纪一》，第230页。

㉒ 《金史》卷一三《卫绍王纪》，第315页。

㉓ 《金史》卷八五《永德传》，第2026页。

㉔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八《韩王清琼公疏》末署“皇弟、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师、韩王”，载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第6082页，上栏a。碑文虽未直书此人姓名，然卫绍王时称“皇弟”，且为太子太师，则此人正是永德，《金史》卷八五《永德传》记永德在“卫绍王时，累迁太子太师”，第2026页。

㉕ 孙建权：《试析金代“治中”出现之原因——兼论金朝对“尹”字的避讳》，《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3期。

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藏明本《西厢记》版本浅述

张胜磊

一、《西厢记》藏书概况

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以下简称“综合事务中心”）成立于2021年，由原市文物局服务中心、信息中心和图书资料中心等五家单位合并而成。综合事务中心收藏了一大批珍贵的古籍、拓本、民国版图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市历次文物普查档案，是北京地区文物、考古、博物馆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典藏资料较丰富、权威的档案图书资料单位，这批古籍和资料主要来源于原图书资料中心。

《西厢记》又称《第六才子书》，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将此书与《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集》和《水浒传》并称为“六才子书”，在戏剧史和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成就。《西厢记》作为综合事务中心的特藏之一，涵盖了刻本、抄本、石印本、铅印本等多种版本，共计32种之多，归集部曲类。据周锡山编著的《西厢记注释汇评》一书可知，《西厢记》在明清两代有214种版本之多。本文选取综合事务中心珍藏的明代版本进行探讨和分析，力求抛砖引玉，为学术研究服务。

二、明本《西厢记》版本分析

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共收藏明本《西厢记》11种，笔者曾在2017年《收藏家》杂志上发表的《西厢记版本赏析》一文中对明代凌濛初朱墨套印本《西厢记》、明末刻本《会真六幻十九卷》、明末刻本《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五卷合评会真记一卷》、明末抄本《新刊合并董解元西厢记二卷图一卷》、明万历刻本《重校北西厢记二卷》5种珍贵的明代版本做了详细介绍，在此不做赘述。下面将对余下6种版本做一下梳理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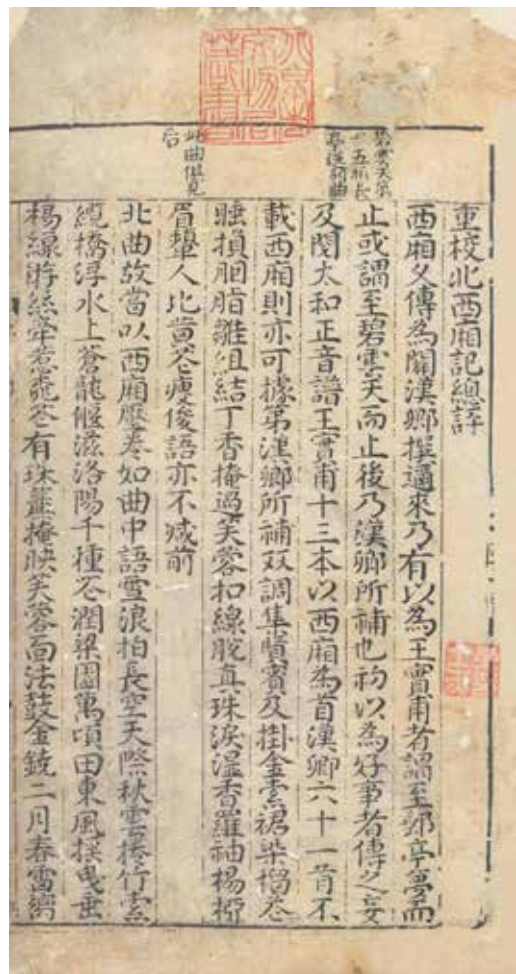
（一）重校元本大板释义全像音释北西厢记二卷钱塘梦一卷园林午梦一卷会真记一卷蒲东诗词考证一卷（图一）

元王实甫、关汉卿撰。明万历刻本。一函四册。半页十行，行二十五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页分上下栏，上栏镌评，下栏刻文。前有北西厢总评、目录二十出、凡例九条、钱塘梦一卷、园林午梦一卷和崔莺莺遗照。后附会真记一卷、蒲东诗词考证一卷。全本共二十出，每出后附版画二幅。

此书归集部曲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均未著录此版本。总评页钤“某士赤印”白文方印、“北京市文物局藏书”朱文方印；卷首钤“某士赤印”白文方印。

（二）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二卷会真记一卷释义一卷（图二）

元王实甫、关汉卿撰，明王世贞、李贽评。明万历刻本。一函四册。



图一 重校元本大板释义全像音释北西厢记二卷 卷首

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单边。前有新校北西厢记考、凡例十则及汪耕于仿唐六如作莺莺遗照版画一幅。内文附图。

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明苏州府太仓州人。历任大理寺左寺丞、刑部员外郎和郎中、山东按察副使青州兵备使、浙江左参政、山西按察使、湖广按察使等职，好为古诗文。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山堂别集》《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等^①。

凡例中提及王世贞评云：“先生扬挖风雅，声金振玉，《艺苑卮言》中点缀《西厢》百一，未张全锦。兹得之王氏家草。”提及李卓吾评云：“先生评骘古今，一字足焉一史，具载《焚书》《藏书》等编。《西厢》遗笔，乃其游戏三昧，近得之雪堂在笥。”

此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1651号、《中国古籍善本总目》1876页均有著录，国家图书馆、戏曲研究院和上海图书馆亦有收藏。

新校北西厢记考前钤“北京市文物局藏书”朱文方印。

（三）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六卷图一卷（图三）

元王实甫编，明徐渭附解，明沈璟评，明王骥德校注，明李润、朱朝鼎同校。一函七册。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氏香雪居刻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单边，白单鱼尾。版心下刻“香雪居”三字。护页有后人题记，前有万历四十二年方伯良序，凡例三十六则，《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标目五折，《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考目录，崔莺莺画像及插图三十八幅。

第六卷为考，由明王骥德汇考，李润、朱朝鼎同校；卷二为抄配，卷六护页有赵万里抄录《蒲州府志》普救寺内容，后有题记。

王骥德，字伯良，又字伯骥，自号方诸生、秦楼外史。明浙江会稽人，曾从徐渭游。工词曲。曾校订《西厢记》《琵琶记》。有传奇《题红记》，又有杂剧《男王后》等。另有《曲律》^②。

此书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1678号、《中国古籍善本总目》1877页均有著录，《中国善本书提要》688页有此版本的著录描述。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绍兴鲁迅图书馆亦入藏。

（四）西厢定本二卷会真记一卷图一卷（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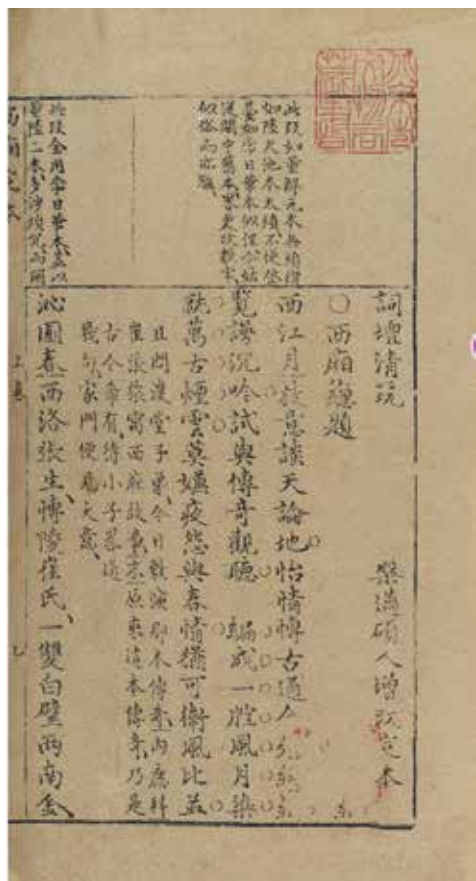
元王实甫撰，明槃邁硕人增改定本，明天启元年（1621）刻本。一函三册。上下两栏，上栏十字镌评，下栏半页八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卷首端题“词坛清玩”。正文前附玩西厢记评、刻西厢定本凡例十七则、会真记一卷、历代题咏《西厢记》的诗词、词坛清玩西厢记目录、莺莺遗照和版画十四幅。



图二 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二卷 卷首



图三 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六卷 卷首



图四 西厢定本二卷 卷首

此书乃槃邁硕人增改定本（西厢定本）。书分上下二卷，合三十折，首一折，附一折。书中画像和插图分别出自唐伯虎、魏文璜、刘素明、钱贡、吴彬、袁玄、魏之克、董其昌、陶冶、喻希连、陶若水、毛鸿、董昭等人之手，增加了《西厢定本》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具有一定的版本意义。

槃邁硕人是晚明理学家徐奋鹏的别号。徐奋鹏，字自溟，号笔峒先生。明江西临川人。徐氏一生坎坷，家境贫困，早年曾有意科举，终因仕途之路艰难，退而设馆授徒为生。徐氏在研读经史子集之余，将《西厢记》《琵琶记》删润增改，作为娱乐消遣，他将此称作“词坛清玩”。

此本归集部曲类，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1671号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1877页均有著录。国家图书馆亦收藏此本。

（五）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二卷会真记一卷（图五）

元王实甫撰，明李贽批点，明崇祯刻本，一函二册。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上单鱼尾。护页二有“西厢记”三字。

此书系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贗本，后有题记云：“四篇首序言，称醉香主人所作，但以后坊间又将卓吾换作圣叹，崇祯庚辰换作康熙己酉（或作戊子），醉香主人改作汪沅勋，作为金批西厢之序，据我所见，即有四种金本使用此序。根据以上材料可以断定此书为坊间托名的假李卓吾本。”题记之人对此本评价甚高，又云“此本虽然是李卓吾贗本，但却是西厢记善本，虽然所依据的还不完全是原本、底本，但却是现有版本中最好的本子”，并认为此本有曲词全、篡改少、语言好、底本老、不标王作关续这五项优点。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均未著录此版本。《中国善本书提要》688页有相似版本的著录描述，但此版本与《中国善本书提要》所提之版本不一致处较多，“第一册附刻汤显祖《西厢摘句散谱》《钱塘梦》《园林午梦》，元王生《围棋闯局》、元微之《会真记》及图像二十一页”，但此版本只在第二册后附《会真记》，并无其他内容。

（六）董解元西厢记二卷图一卷（图六）

元王实甫著，明杨慎点定，明黄嘉惠校阅。一函二册，明黄嘉惠刻本。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单边，白单鱼尾。卷端首题“董解元西厢记卷上”，卷下则题“新刻董解元西厢记卷下”。前有西湖寓客黄嘉惠题《董解元西厢》引，其后附明唐寅崔莺莺画像及插图二十一幅。后有题跋、题签。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明四川新都人。历任翰林修撰、翰林学士，后遭戍永昌卫，卒于戍地。所著诗、词、散曲甚多，有《升庵全集》^③。

黄嘉惠，按《明代安徽出版记事》记载：“字长吉，休宁县人。崇祯间徽州府著名书商，以校刻文史戏曲名闻当时，所刻多名善本。”尤以所刻《史记》《苏黄风流小品》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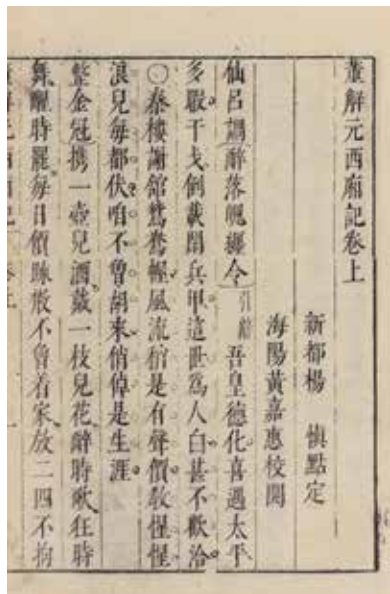
此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1621号、《中国古籍善本总目》1871页均有著录，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亦入藏。

三、明本《西厢记》版本价值

综合事务中心藏《西厢记》版本三十余种，笔者选取其价值较高的11种稀见版本进行分析。这11种版本包括



图五 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二卷 卷首



图六 董解元西厢记二卷 卷首

刻本和抄本。版本年代以明本为主，各版本版画精美。在这 11 种版本之中，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尤以凌氏刻本和王骥德的校注本为最佳，李卓吾版本因争议较多，现不能辨别其真伪。其他版本也各具特点，其价值体现在如下几点。

（一）版本好，版本价值高

明清两代《西厢记》刊刻比较混乱，各种版本常常根据传奇的体式，按照刊刻者的意愿，随意删减文字，可谓版本众多。综合事务中心现存 11 种明代版本中，有合刻本、丛书本、单刻本；其中《重校元本大板释义全像音释北西厢记二卷钱塘梦一卷园林午梦一卷会真记一卷蒲东诗词考证一卷》和《新刊合并董解元西厢记二卷图一卷》均未见著录，属于新发现版本，这两种版本的发现对《西厢记》的版本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蒋星煜先生对《西厢记》版本有过全面的研究。在他的《明刊本西厢记研究》中，蒋先生对明本《西厢记》做了详细的介绍，从版本、序跋、注释、插图等方面做了考证和评论，分析了诸多版本存在的可能性，对某些版本的真伪问题做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④。凌濛初刻本曾得到了蒋星煜先生的高度评价。他认为凌氏刻本有“相当精细的校勘”“规范的曲文和谨严的评注”，“凌濛初刻本对《西厢记》的传播与普及，起到了非凡重大而广泛的作用，影响是深远的。”^⑤

据黄季鸿先生分析：“凌濛初刻本《西厢记》乃现今唯一未受传奇体制影响，体例保存完好、改动较小，与元杂剧最相契合的相当妥善的刊本，凌濛初本《西厢记》体例的独到处，为明清其他版本所不及。”^⑥

（二）文献学价值高，体例丰富

王骥德校注本通过十几种版本《西厢记》的版本比较，为我们做古籍版本文献的整理提供了参考。《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云：“……余刻纷纷殆数十种……既觅得碧筠斋若朱石津氏两古本。序碧筠斋者，称淮干逸史。首署疏注仅数千言，颇多破的。朱石津，不知何许人。视碧筠斋，大较相同。关中杜逢霖《序》言：‘朱没而其友吴厚公氏手书以刻者。并属前元旧文，世不多见。’”由此可见，王骥德校注本有着自己不同的体例，为我们整理研究西厢记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蒋星煜先生在《〈六幻西厢〉及其元杂剧〈西厢记〉》一文中，认为：“《六幻西厢》在中国书志学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是具有开创性的。同样在戏曲文献学角度看，也是如此。”^⑦高度评价了《六幻西厢》的文献学价值。

四、小结

综合事务中心所藏的明本《西厢记》，其版本涉及刻本和抄本等类型。根据本次及此前的梳理和分析，笔者对每种版本的版式和文字都做了基本的版本分析，但是对于版本之间详细的比较和不同版本之间的传承关系没有做进一步的解读。此文通过详细介绍余下 6 种明本《西厢记》，也算是抛砖引玉，使更多《西厢记》的研究人员关注明代版本，借此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

① 张勃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174 页。

② 张勃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28 页。

③ 张勃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856 页。

④ 蒋星煜：《明刊本西厢记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年。

⑤ 蒋星煜：《〈西厢记〉研究与欣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年，第 72 页。

⑥ 黄季鸿：《明清〈西厢记〉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 年。

⑦ 蒋星煜：《〈西厢记〉研究与欣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年，第 73 页。

《敕建护国万佛延寿寺永远传代香火碑》考释

谢欣

一、石碑概况

《敕建护国万佛延寿寺永远传代香火碑》(图一—图四),立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岁次庚辰孟夏(四月)吉旦。碑为青石质,碑螭首方座,碑身阳、阴两面边框均浮雕云龙纹,碑座上雕二龙戏珠纹。碑高321厘米,宽102厘米,厚38厘米;座高84厘米,宽138厘米,厚72厘米。首题“敕建护国万佛延寿寺永远传代香火碑记”。周镛撰文,周道洽书丹,张翱、张翔镌刻。碑阳额文漫漶,篆书;碑文20行,满行54字,实存726字,正书。碑阴额文3行,行2字,篆书;碑身线刻须菩提长老画像,唐代王翰画,周道洽重摹,住持如琳识;画像右侧镌刻题记3行,满行32字,现存90字,行书。

碑原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大井村延寿寺,现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真觉寺原址)。

二、护国万佛延寿寺历史沿革考释

护国万佛延寿寺原名义井庵,始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大井村,在广安门外一带十分有名,被当地人称为“高庙”。

明《长安客话》中记载:“义井庵天宁寺西十里,复十里至卢沟桥。义井或曰密井,相传文皇帝驻蹕甘其泉,故云。此庵为中涓所修。初创宝阁,高入云汉,中范丈六身称之。”^①

根据以上古籍内容可知,明代时大井村叫作“义井”,也称“密井”,相传明成祖永乐皇帝迁都时曾在此驻蹕,认为此地井水十分甘甜,故又称为“蜜井”,并因此而得名。此地村里有一古刹名为“义井庵”,为宦官所修。

与护国万佛延寿寺相关的《敕建护国万佛延寿寺碑》,刻立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原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岳各庄大井村高庙,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体育中心北侧护栏内。青白石材质,碑首高117厘米,宽112厘米,



图一 《敕建护国万佛延寿寺永远传代香火碑》碑阳



图二 《敕建护国万佛延寿寺永远传代香火碑》碑阴



图三 《敕建护国万佛延寿寺永远传代香火碑》碑阳拓片



图四 《敕建护国万佛延寿寺永远传代香火碑》碑阴拓片

作者单位: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厚 48 厘米；碑身高 191 厘米，宽 104 厘米，厚 41 厘米。首题“敕建护国万佛延寿寺碑记”。周镛撰文，周道洽书丹，徐锡登篆额，张翱、张翔镌刻。墓碑底部有部分埋于土中。结合《敕建护国万佛延寿寺碑》的碑文记载可知，义井庵的住持法界大师依托门前水井的便利条件，时常向过路的行人施舍茶水，义井庵名称中的“义”即由此而来。后来有僧人募集资金铸造了高达三丈六尺的观音铜像。当时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十分好佛，广修寺院，为讨其欢心，万历皇帝遂下令将铜像送到义井庵进行供奉，并且拨款重修寺院，赐名“护国万佛延寿寺”。此即护国万佛延寿寺与铜铸观世音菩萨立像的由来。因而先有义井庵，再有观世音菩萨铜像，最后有“护国万佛延寿寺”之名。

清光绪《顺天府志》记载：“万佛延寿寺，在天宁寺西十里大井屯。明初立义井庵，井在门外，或曰密井。相传文皇帝驻蹕，甘其泉，故名。庵为中涓所修。万历中赐今额。外寺后有大悲阁，内奉大士，金身高三丈六尺，阁前立明神宗敕谕碑，其正殿前有崇祯十三年碑，河南右布政使周镛撰。”^②



图五《重修万佛延寿寺铜观音像碑》

由此可知，护国万佛延寿寺后殿为大悲阁，寺内供奉铜铸观世音菩萨立像一尊，高三丈六尺。阁前为《明神宗敕谕碑》，刻立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六月，原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大井村。青石材质，螭首方座，周刻云龙纹。碑高 315 厘米，宽 103 厘米，厚 40 厘米，额题“圣旨”，碑座埋于地下。该碑记录了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明神宗朱翊钧差遣汉经厂掌坛御马监太监卢永寿送造佛大藏经于寺中安放供奉，并敕谕兹寺“尔住持及僧众人等，务要虔洁供安，朝夕礼诵，保安眇躬康泰，宫壺肃清。忤已往愆尤，祈无疆寿福，民安国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归仁慈善教”。此碑碑文清晰地记录了护国万佛延寿寺在当时的地理位置。

正殿前则为崇祯十三年（1640）所立《敕建护国万佛延寿寺永远传代香火碑》，此碑为河南右布政使周镛撰文，其子周道洽书丹，张翱、张翔镌刻。碑文记载了崇祯十三年间皇帝下令拨款对护国万佛延寿寺进行修缮的具体过程。

依据碑文中所记“大悲阁群楼共十九间，大殿三间，天王殿三间，方丈二层共十间，伽蓝殿三间，祖师殿三间，南北官房六间，南北禅堂十间，雨廊群房共计三十二间，钟鼓楼二座，大铜钟一口，十方堂三间，山门无梁殿三间，茶房三间，场房二十间，塔院一区树株全，菜园二个，街北菜园十亩，地共二十一段，总计九顷四十九亩。周围石墙，大殿铜钟一口，铜磬一口，供器全，大悲间铜钟一口，铜海灯一座，供器全，铜云板一个，大铜锅二口”。我们可知明崇祯十三年间重修护国万佛延寿寺时，寺庙内的建筑包括山门、大殿、天王殿、方丈、伽蓝殿、祖师殿等，寺庙规模甚是庞大宏伟，且香火鼎盛。

寺内大悲阁中所供奉的明制铜铸观世音菩萨立像，净高 8 米，头戴宝冠，冠下大士面庞饱满丰润，表情含蓄、庄重而不失柔和，充满女性的温柔、善良和虔诚，合掌面向东方，身材挺秀，比例匀称。观世音菩萨立像身着短衣长裙，通身璎珞，伴以轻盈且流动的飘带，赤足，下踏莲花座。左右 24 只手臂姿态各不相同，形态生动自然，但到民国时期大部分手臂已经残缺。这尊铜像分三段铸造而成，刀法简洁有力，流畅自然且富有韵律感，工艺精湛，在铸造和雕刻技法上都呈现出高度的艺术造诣，是北京现存最大、造型最优美的铜铸菩萨雕像，展现了我国明代雕刻艺术的高超技艺。

根据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于 2006 年 8 月所立《重修万佛延寿寺铜观音像碑》（图五）碑文可知，护国万佛延寿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遭受严重破坏，寺院围墙不复存在，仅有后殿大悲阁留存下来。大悲阁内有铜铸观世音菩萨立像一尊，殿基址上有铜铸释迦牟尼佛坐像一尊。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寺庙因受到破坏而被拆除，仅剩坐、立两尊佛像，后立佛被砸成五截，佛首和手臂部分被毁坏，残躯则被放置于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进行保护。

1984年万佛延寿寺铜铸观世音菩萨立像被列为区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丰台区政府将原大悲阁铜铸观世音菩萨立像从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运回，并按照原样修复了头冠和其中四臂，立于丰台体育中心西南角的寺院原址。2006年恢复铜铸观世音菩萨立像另外二十臂，并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增加护栏等设施以保护铜像。

三、碑阴须菩提长老画像

《敕建国万佛延寿寺永远传代香火碑》的碑阴线刻了一幅须菩提长老像，根据碑文可知这幅须菩提长老像是由唐人王翰画于江州庐山西林乾明寺经藏壁间。宋代庄绰所著唐宋史料笔记《鸡肋编》一书中记载：“江州庐山西林乾明寺经藏壁间，有唐戊辰岁樵人王翰画须菩提像，世以王为与杜子美卜邻者。按《文苑传》：‘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人。少豪健恃才，及进士第，然喜蒲酒。开元十一年，张说辅政，召为秘书正字，擢通事舍人，驾部员外郎。家蓄声伎，目使颐令，自视王侯，人莫不恶之。十四年，说罢宰相，翰出为汝州长史，徙仙州别驾，日与才士豪侠饮乐游畋，伐鼓穷欢，坐贬道州司马，卒。’则西林所画，盖自仙州贬营道时过九江也。笔墨简古，非画工所能。自开元十六年戊辰，逮绍兴九年己未，四百一十二年矣。今独石刻存焉。”^③

据《新唐书·文苑传》记载，王翰为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字子羽。杜甫诗曾有“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之句，则王翰应年长于杜甫，为唐代开元初年人。此幅须菩提长老像是王翰在被贬为仙州别驾时所作。根据《敕建国万佛延寿寺永远传代香火碑》碑阴文字可知，宋代元丰二年，知州事李时亮（又名李春华，字端夫，北宋才子、政治家，人称“南流李白”，累官至检校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有庚和诗《李陶集》。四子皆为北宋朝廷护国将帅，民族英雄，抗击交趾侵略军，可谓一门忠义）认为这幅画像非常奇特，因而将此画像镌刻于石上，并传入北京。淳熙己酉年，住在湘山寺（湘山寺故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的僧人守诜重新将此画像镌刻于湘山。崇祯年间，皇帝下令重修护国万佛延寿寺时，河南右布政使周镛便令其子周道洽重摹勒于《敕建国万佛延寿寺永远传代香火碑》之上。

画像中的须菩提，又可译为苏补底、须扶提、须浮提等，意为善现、妙生、善吉、空生，即《金刚经》第二品标题“善现启请分”的“善现”。须菩提出身于婆罗门教家庭，是古印度拘萨罗国舍卫城人，为古印度拘萨罗国舍卫城长者鸠留之子，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以“恒乐安定、善解空义、志在空寂”著称，系佛陀弟子中最善解空理者，号称“解空第一”。须菩提智慧过人，于佛陀之说法会中，常任佛陀之当机众，屡见于般若经典中。因而《敕建国万佛延寿寺永远传代香火碑》碑阴所线刻的这幅须菩提长老像也可体现出明代佛教的兴盛。

结语

护国万佛延寿寺虽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然铜铸观世音菩萨立像仍屹立于原址，诉说着岁月的流转，也印证着护国万佛延寿寺的真实存在。现立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内西侧寺观碑刻区的《敕建国万佛延寿寺永远传代香火碑》以及相关的《明神宗敕谕碑》《敕建国万佛延寿寺碑》，以石为载体，用碑文记录了护国万佛延寿寺的前世今生，展现了明万历、崇祯年间北京地区佛教盛行、广修寺庙的特点，让我们在数百年之后的当下，透过碑文依然能够了解护国万佛延寿寺在当时的恢宏气势，更得以窥见佛教寺庙及佛教文化在明代的发展。

附录：

《敕建护国万佛延寿寺永远传代香火碑》录文

碑阳：

敕建護國萬佛延壽寺永遠傳代香火碑記

昔佛在日，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未有宮室之設也。後世聖人立為像教，使人散亂心，一入於塔廟，一聲南無佛，皆共成佛道，為之宮殿以奉之，並為之方丈以居之，為之瞻田以養之，並為之香廚以味之。飲食、衣服、醫藥、器具，作福者惟恐有一之未備，使大修行人利己利它，順風順水，一息而千裏，故建立名利，莫妙於十方院，而莫不妙於袈裟院。何者？十方院以有德者居之，無專屬也。住持三寶，猶如養毒龍而馴饑虎，飲烏頭附子以療疾，良非易事。雖然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方見修行之手，三教聖人鹹以修立教。昔裴丞相言鬼神，沈幽愁之苦，鳥獸懷猶狘之悲，修羅生瞋，諸天正樂，其趨覺路發菩提，唯人道為能耳。人而不修，吾莫如之何也已矣。夫六道之中，唯人道為好修。然談修於善世，其功效頗遲，談修於五濁惡世，其功效甚敏。何也？五濁惡世之人，其造業最深，而其趨善也，亦最捷。顧不修則已，修則事半功倍，日劫相懸。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以名利熏心之人，而與之譚苦空，不吐則走。雖然慈悲普度，法雨普潤，名利熏心之人，即成佛作祖之人，只爭迷悟一關耳。夫都城，宦海也；義井，濟渡關津也。延壽寺則慈航，而住持則舵師也。為舵師者，欲其利涉，必先修其桅檣，緝其棚纜，無日不討衣衲而戒備之。乃克有濟，否則是無降龍伏虎之手，而誤飲烏頭附子之毒也，必無幸矣。謹將寺中傳留房地器具一一勒石，以垂永久，並以告後之佛子勿相易云：大悲閣群樓共十九間，大殿三間，天王殿三間，方丈二層共十間，伽藍殿三間，祖師殿三間，南北官房六間，南北禪堂十間，雨廊群房共計三十二間，鐘鼓樓二座，大銅鐘一口，十方堂三間，山門無梁殿三間，茶房三間，場房二十間，塔院一區樹株全，菜園二個，街北菜園十畝，地共二十一畝，總計九頃四十九畝。周圍石牆，大殿銅鐘一口，銅磬一口，供器全，大悲間銅鐘一口，銅海燈一座，供器全，銅雲板一個，大銅鍋二口。

菩薩戒弟子周鏞撰。

戒弟子周道洽書。

信心弟子車天祥、姚誠同立。

住持如琳。關中張翱、張翔鑄。

崇禎十三年歲次庚辰孟夏吉旦。

碑阴：

敕建護國萬佛延壽寺永遠傳代香火碑

須菩提像，唐人王翰作於廬山西林藏殿壁間。宋元豐二年，知州事李公端夫奇之，鑿石，托垂不朽。淳熙己酉，僧守詵重鑄於湘山，歲久，石泐都人方伯周公鏞，命子道洽重摹勒於義井延壽寺，時大明崇禎十三年庚辰孟秋也。住持如琳識。

① [明] 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6页。

② [清] 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卷二《京师志十七》寺观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34页。

③ [宋] 庄绰、张端义撰，李保民校点：《鸡肋编 贵耳集》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1页。

对《新获清吏部尚书马希纳墓志考》的补充考释

陈 康

近见中国文物研究中心冯双元先生在2024年第2期《历史档案》刊载的《新获清吏部尚书马希纳墓志考》一文，冯先生文章考证翔实、逻辑缜密，读之受益匪浅。

马希纳的墓在石景山区五里坨的秀府村，秀府村是因明秀怀王朱见澍的墓地位于村西而得名，马希纳墓园紧邻秀怀王墓园，属石景山区文物部门管辖。

之前因为鲜见有关马希纳及其家族的资料，难以对马希纳的生平进行进一步考证。冯先生文章刊有《马希纳墓志》的录文，几十年来幸得一见，故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但因冯先生文中未见刊出《马希纳墓志》的拓片，故无法就墓志本身做进一步的考释，通过与冯先生的沟通，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李永强先生协助下，今幸获冯双元先生惠赠《马希纳墓志》的拓本一睹为快，才解开了这一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难题，《马希纳墓志》填补了史料中许多空白，诸多问题迎刃而解。本文就冯双元先生文章因篇幅所限未涉及而笔者所了解的内容做补充考释，还请冯先生和广大读者指教。

一、20世纪80年代时的马家坟

石景山区五里坨秀府村北原有一片很大的墓园，当地人称“马家坟”，墓园早年曾因遭遇过不同程度的盗挖、出售、平毁，在遗址神道上仅剩两座螭首龟趺汉白玉满汉文双碑，西为汉文碑、东为满文碑。满文碑碑阳文字已经完全漫漶殆尽，汉文碑文字也漫漶严重，仅留存“皇清 闕 闕 闕 闕 大夫议政大臣吏部尚书”12字，但这却也为考证马家坟墓主身份留下了宝贵的线索。

研究清史的冯其利先生在20世纪的早期曾踏访过此地，他采访了马家后人马昆岐，考证马希纳神道碑文字及查找史料，已经确定马家坟系清初吏部尚书马希纳家族墓园。冯其利之后所作文章“秀府村的马家坟”在《京郊清墓探寻》《北京市地名志·石景山区地名志》《石景山文物小志》^①中均有介绍登载，但由于《清史稿》中马希纳无传，且始终未见有《马希纳墓志》出土，故无法考释马希纳的生平。冯其利只好从资料中引用马希纳家族中在《清史稿》里有记载的雅虎、马达尔汉、马福塔事迹来补充，之后各种书籍都在沿用、照抄冯其利的文章，流传甚广，四十多年来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文史研究者。

20世纪80—90年代笔者在文物部门工作时，曾因在工作时对马家坟日常巡查中多次作过检查和考证，那时马家坟地面上残留下来的建筑参照历史文献和冯其利先生早年考察时留下的记录对照。墓园坐北朝南，自南而北依次是一对华表、月河神桥，神桥下的月河已经不见，仅在桥下留存有浅淡的河道痕迹，而神桥虽部分已被泥土埋没，但仍保存完好。神桥北侧为神道，神道两侧的石像生獬豸、石羊、石马、石驼、石狮已经不见踪影，据说这些石像生均是曾在民国十六年（1927）被张学良购买给张作霖修建抚顺元帅林时挪走的。在神道之北的两座满汉文神道碑保存



图一 马希纳家族墓园神道碑

作者单位：北京市石景山区文旅局

完好（图一），为螭首龟趺汉白玉双碑，碑额刻“万古流芳”，其北有三座三合土的宝顶，按冯其利说法：“还有其他土坟共 31 座。”

有幸保存下来的这两座神道碑，其中满文碑已经漫漶，文字完全看不见了，大概是满文文字纤细和字口浅所致，而汉文碑也漫漶严重，但仍留下了“皇清 固固固固 大夫议政大臣吏部尚书” 12 个宝贵的大字。

马家坟占地百余亩，在秀府村中有马家的阳宅，进深两进，有房 17 间。看坟户姓徐。

二、《马希纳墓志》志文

《马希纳墓志》是 2019 年出土的，墓志保存完好，志盖长 67.6 厘米、宽 67.6 厘米、厚 10.7 厘米，盖篆“皇清诰封光禄大夫吏部尚书议政大臣加一级拜他喇布勒哈番佐领甫山马公墓志铭”，6 行 35 字，满行 6 字（图二）。志底长 67.1 厘米、宽 67.1 厘米、厚 10.9 厘米，志文正书阴刻 47 行，满行 49 字，计有 1593 字（图三）。志盖、志底四周均线刻云纹与飞鹤相间的 8 组边饰，撰志者杜立德、书丹者郝惟纳、篆额者叶方藹。兹移录志文如下：

皇清诰封光禄大夫，吏部尚书，议政大臣加一级，拜他喇布勒哈番，佐领甫山马公墓志铭。

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兼礼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加一级，前太子太保，前内国史院大学士，吏、户、刑三部尚书，吏兵工三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吏户两科都给事中，浙江典试，甲辰、丁未、癸丑三科文武会试总裁，戊戌、辛丑、甲辰、庚戌廷试充读卷官，纂修《实录》、监修《玉牒》总裁渠梁进士眷弟杜立德顿首拜撰。

赐进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加一级，前户、礼、刑、工四部尚书加一级，都察院左都御史，吏、户二部左右侍郎加二级，大理寺卿，通政使司左右通政参议，太僕寺少卿，福建督粮道参议，刑部山西、广西司郎中、员外、主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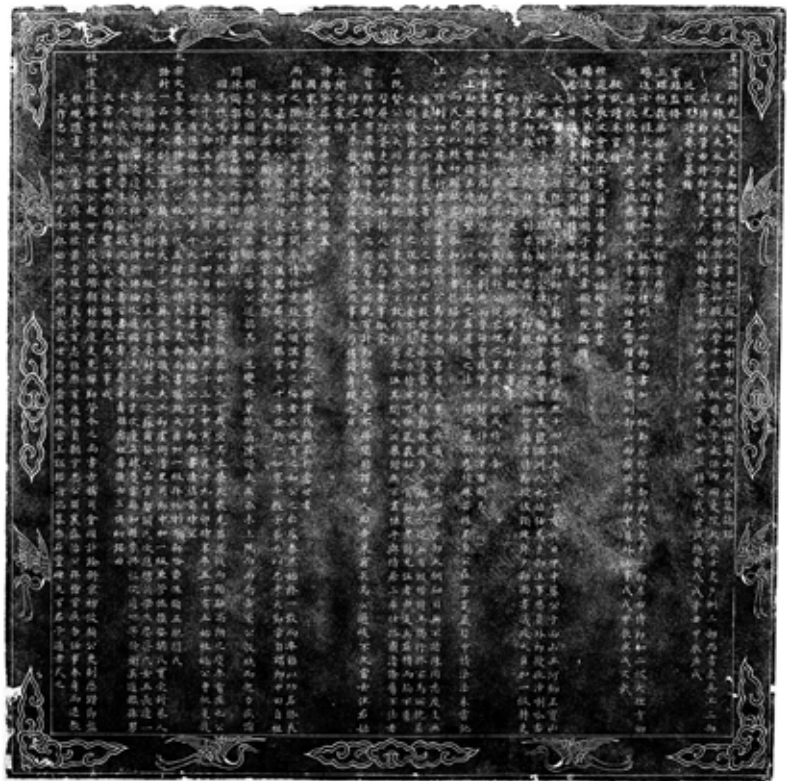
图二 《马希纳墓志》志盖

戊戌、甲辰、庚戌文武殿试读卷官，侍经筵，甲辰文会试主考益津眷弟郝惟纳顿首拜书。

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侍讲，前国子监司业，翰林院编修，起居注日讲官东吴叶方藹顿首拜篆。

大冢宰甫山马公既歿，其子工部郎中蘇立泰等將以康熙十四年五月二十有六日甲申葬公於西山玉河鄉正寶山之原，而請予為其墓之銘。

謹按：公諱馬希納，字嘉謨，甫山其號，滿洲人也。始任為戶部主事，曆員外郎，授托沙喇哈番，升吏部啟心郎、授拜他喇布勒哈番，改戶部啟心郎，晉兵部督捕左侍郎，授佐領，旋拜戶部尚書，議政大臣加一級，轉吏部尚書。三年，以病乞歸。又三年而歿。公始為戶部主事，奉命巡覽畿甸土田，八旗屯丁與居民相訐，公從容理之，軍民悅服，鹹恃以安。世祖章皇帝器之，由員外郎擢啟



图三 《马希纳墓志》拓本

心郎。公揚曆兩曹，諳習故事，人材國計，皆重有賴焉。

今上御極，簡任督捕，案牘雖繁，一以公平處之。蓋逋逃之法，不得不嚴，而民情殊苦株累，自公在事，寬嚴皆中情法，法未嘗弛，而民得以蘇。初，財賦之在各部寺者總歸戶部。上以經制初更，慮奉行者或未盡善，旋以公為戶部尚書，有大事必與議焉。公凡四任戶部，大綱細目，無不諳練，周悉度支，無妄出入，至今司農之署守公之法而不敢變者居多。當時在朝執政多公姻戚，公從無有假借，特立獨行，終不為所撓屈。又因議節省遂有為撤兵之說者，公以安不忘危，力持不可，但嚴核私人冒餉及老弱充伍者，由是兵益精而餉不匱。上既賢公可大用，命掌銓衡。公確秉成憲，不敢以私意參伍其間，凡所舉錯無不盡愜乎輿情。居三年，仕路肅清，僚屬不法者皆屏跡，胥吏無所為奸，得人盛焉。每奏事輒蒙俞旨。維時有要秩，強力者欲幹之，因屬其所親百計動公，久之，竟不得聞。因謂其人曰：“吾策窮矣！馬公過峻，不久當去位，君姑待之耳。”未幾，果以勞瘁成疾。屢乞罷政事，久乃得請。身歿之日，上聞之震悼，特賜祭葬如禮，中外無不痛惜。蓋國家受天之祐，創業垂統者三十年，一時豐沛從龍之士，樹偉伐顯，名於當世者，兩朝之際，誠不可更僕數。然其間率情任意致滅頂濡首之悔者，眾或有之，如公之出處泰然，始終一致，而卒能以功名終，良可嘉尚也。公居家篤行長者，有漢萬石君之風。

服官三十年，儉約一如寒士，教子弟必以忠孝大節。嘗自謂郎中曰：“自祖父及餘，並曆顯仕，今小子又備官矣。其念國恩，勉圖報稱。”公方病，聞議並撤三藩。公逆揣其必生變，將草疏痛陳得失，疾亟未上，既而西南告變。公投袂而起，力疾詣闕，陳備禦方略。屬續之際，猶以不能報國為恨。嗚呼！疾病不忘君國，死不及私，公之忠誠詎出古人下哉。宜其生榮死哀，克昌厥後而顯融，高朗之慶未有涯也。

公生於天命五年庚申四月二十四日酉時，歿於康熙十三年甲寅二月十九日卯時，享年五十有五。始祖姚公魯，曾祖夏護公，世有隱德。祖雅護公，官十大臣，勤勞素著。父馬福塔公，官戶部尚書，清慎負時望，太宗文皇帝寵眷特隆。

以公故三代並贈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議政大臣加一級，拜他喇布勒哈番，佐領。正配關氏，誥封一品夫人。副室羅氏、錢氏、吳氏。子四：長蘇立泰，通議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加一級兼管佐領，娶關氏，實受封恭人。次伯赫，中憲大夫，三等侍衛加一級，娶王氏，實受封宜人。次蘇爾發，八品官，娶關氏。次應琇，國學生，娶蔣氏。女五：長適一等侍衛洪海，次適原任二等侍衛佛倫，次適國學生王永吉，次適直隸慶雲縣知縣李興祖，次適一等侍衛吳通鑒。孫男十人：長蘇彬，國學生；次蘇敏、文壽、永壽、百壽、莊壽、元壽、喜壽、明壽、祖壽。孫女三，俱幼。

銘曰：

大業初起，名世聿興。南陽豐沛，代有休稱。顯允馬公，事我祖宗。遙遙華胄，奕葉從龍。公起世臣，茂德躋朝。材宗度支，克殫勤勞。今之尚書，古稱司會。國計銓衡，宗枋攸賴。公更揚曆，錯節盤根。規隨畫一，成憲攸存。股肱蕭曹，腹心良平。百志惟熙，百慶惟貞。朝寧思公，留裊盛治。公拜稽首，疾勿任事。奉身而退，教子作忠。公惟全始，以克全忠。始之忠之，明良盛世。存曆崇階，歿當上諡。銘詩志墓，樂石豐碑。凡百君子，過者式之。

三、《马希纳墓志》撰志、书丹、篆额者

由于冯双元先生在文中主要是考证马希纳的生平及马氏家族，而未涉及《马希纳墓志》的撰文、书丹、篆额者，而墓志提供了这些信息：杜立德撰文、郝惟讷书丹、叶方霭篆额。

杜立德（1611—1691），明崇祯十六年（1643）三甲第一百四十二名进士。直隶宝坻（今天津市宝坻区）人，字纯一，号敬修。顺治元年（1644）顺天巡抚宋权荐授中书科中书。累迁太子少保，刑部尚书，拜国史院大学士，寻授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太子太傅，卒谥“文端”^②。

郝惟讷（1623—1683），清顺治四年（1647）二甲一百八名进士，直隶霸州（今河北省霸州市）人。字敏公，

一字端甫。授刑部主事，累官吏部尚书，仕宦四十载，九列历其八、六卿历其五。在工部四载，为冢宰九年。于国计铨致，尤慎而祥。领吏户两部最久，法制多经裁定，卒谥“恭定”，有《郝恭定集》^③。

叶方蔼（1629—1682），清顺治十六年（1659）一甲第三名进士，高中探花。江南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人，字子吉，号切庵，一作认庵。授翰林院编修。康熙十二年（1673），充日讲官起居注，敷陈忠朴。累官至刑部左侍郎。卒谥“文敏”。有《读书斋偶存稿》《独赏集》，撰《尚书讲义》^④。

此三人均在六部供过职，其中以杜立德资历最久，地位最高。他明朝时中进士，是清初汉人中少数身居高位者，入清后累迁“太子少保，刑部尚书，拜国史院大学士，寻授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太子太傅”。三人中尤以郝惟讷曾领“吏户两部最久”，资历颇深，马希纳在户吏两部任尚书时，郝惟讷同在这两部，他们的关系甚厚。顺治入关后，曹溶、龚鼎孳建议开科取士以收“民心”。顺治二年（1645）清政府已开科取士了，郝惟讷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顺治四年（1647）考中了二甲第一百零八名进士。

四、马希纳家族世系

由于冯双元先生在《新获清吏部尚书马希纳墓志考》一文中对马氏哈达那喇家族的成员：雅护、满达尔汗、马福塔等的考证资料较为翔实，故不再另行考证。

有关马希纳妻妾、子女，冯双元先生已做了详尽的考证，故不再提及，笔者仅就先生文中未提到的一些方面作一补充。

1.《马希纳墓志》中关于马希纳祖籍的记载仅有“满洲人也”四字。据《钦定八旗通志·马福塔传》记载，马希纳之父马福塔“家族世居即满洲哈达那喇氏”，哈达大约位于今辽宁开原南哈达河。志文不载其旗籍，按《钦定八旗通志·旗分法》：“自雅虎起至马希纳四子英修，皆隶正黄旗。”^⑤

2. 马希纳的姓氏是否为满洲八大姓之一呢？《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满洲‘着姓’为八个。”《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云：“满洲八大姓，为纽祜禄氏，绎姓郎。瓜尔佳氏，关。舒穆鲁氏，舒。那拉氏，分叶赫、辉发二那拉，富察氏，付。完颜氏，王或有姓金者。费莫氏，费。马佳氏，马。章佳氏。是为九姓。然，费莫、马佳二姓乃一族也。”^⑥哈达那喇氏原系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一，源自那拉氏，哈达那喇氏与乌喇纳拉氏同为一祖，即纳齐布禄。世居今辽宁开原，当时居有哈达城（今辽宁省西丰县）等，系满洲八大姓之那拉氏。马希纳正配关氏即满洲八大姓之一的瓜尔佳氏。

3.《马希纳墓志》云：“始祖姚公鲁、曾祖夏护公，世有隐德。”似可认为姚公鲁与夏护公均未出仕，墓志中还提到“自祖父及余，并历显仕”，更可印证这一点。还有一点不解，《马希纳墓志》云“始祖姚公鲁、曾祖夏护公……祖雅护公，官十大臣，勤劳素著。父马福塔公，官户部尚书”，曾祖夏护、祖雅护、父马福塔皆尊称“公”，而唯独始祖名为姚公鲁，有些不通，称姚鲁公才符合对其先祖的尊称，或许是杜立德撰文时的笔误。

志云“祖雅护公，官十大臣”。十大臣之名在满语中称为“扎尔因齐”，是在后金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初设的。十大臣作为后金朝廷机构初建，当时只设有负责军事的八旗总管大臣、负责主管政务的是议政五大臣（雍正后转为军机处）和理事十大臣。雅护位居十大臣之列。

在冯双元先生和冯其利的文中对雅护和夏护是否为同一个人的叙述有所不同。冯其利在《北京文物胜迹大全》“马家坟”一节中称：“马希纳的祖父夏瑚（亦写为“雅虎”）……夏瑚第八子马福塔在清太宗时为户部参政、承政，屡次出使朝鲜。”^⑦而按《马希纳墓志》载“曾祖夏护公……祖雅护公”即上述文中称夏瑚（夏护）或雅虎（雅护）二人实际是父子关系。冯双元先生根据《马希纳墓志》已经厘清了马希纳的曾祖是夏护、祖为雅护。证明了冯其利在《马希纳墓志》出土前的考证是错误的，冯其利在此显然是把夏瑚与雅虎当作一人。

冯其利的“马家坟”一文中称“马福塔长子马希纳，次马尔都（杜）”。而冯双元先生根据墓志认为马福塔之子“除马希纳外，马福塔另有二子可考。其一为马尔杜、另一位鄂退”。冯其利文中没有“鄂退”。按《钦定八旗

通志》载马福塔实际生有三子，即马希纳、马尔杜、鄂退。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记载夏护为夏瑚：“（夏瑚）以抚养公主勤劳，授为三等轻车都尉。遇恩诏，加至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寻以头等侍卫。”^⑧与《马希纳墓志》所载“曾祖夏护公，世有阴德”不同。马希纳之父马福塔为雅护第三子，《清史稿·满达尔汉弟马福塔传》载其生平称：“初授牛录额真……天聪五年授户部参政。”^⑨《钦定八旗通志·马福塔传》也有记载。《马希纳墓志》则云：“父马福塔公，官户部尚书，清慎负时望。”

马希纳家族六代世系列表

始祖	姚公鲁
曾祖	夏护（《八旗通志通谱》载“夏瑚”，即墓志中称“曾祖夏护公”）
祖父	雅护（虎）
父辈	满达尔汉、福尔丹、马福塔
妻妾	正配关氏，诰封一品夫人；副室罗氏、钱氏、吴氏
子四	苏立泰 伯赫 苏尔发 应琇
女五	皆无名
孙男十	苏彬 苏敏 文寿 永寿 百寿 庄寿 元寿 喜寿 明寿 祖寿
孙女三	俱幼，皆无名

《马希纳墓志》仅述及六代世系，未记载他的曾孙辈，但在冯其利的文中提到在马家坟西碑碑阴上刻“雍正三年八月吉旦礼科掌印给事中，□□寺赞礼，□录二级曾孙德寿敬制”^⑩。但未知德寿是马希纳孙男十人中何人之子。

碑文中“□□”寺的脱字，应为太常寺。清太常寺以吏部满尚书兼管太常寺务，入衔。下设少卿、寺丞、博士、赞礼郎，有满二十二人、汉十四人。正九品。汉制太常所属为赞飨、治礼。皆于祭祀时指导皇帝行礼者，因接近皇帝，故多用满人为之。

五、马希纳生平与事迹

《马希纳墓志》曰：“公讳马希纳，字嘉谟，甫山其号。公生于天命五年庚申四月二十日酉时，歿于康熙十三年甲寅二月十九日卯时，享年五十有五。”马希纳出生时为后金太祖努尔哈赤天命五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1620）。康熙十三年（1674）系清圣祖玄烨年号。

《马希纳墓志》盖篆“皇清诰封光禄大夫，吏部尚书，议政大臣加一级，拜他喇布勒哈番，佐领甫山马公墓志铭”。在《马希纳墓志》未出土前，冯其利曾对神道碑上已漫漶的汉文做过考证，他认为“皇清 囿 囿 囿 囿 大夫议政大臣吏部尚书佐领马公之墓”，对照《马希纳墓志》来看，实为“诰封”二字。

杜立德在撰写《马希纳墓志》时，首句是“大冢宰甫山马公既歿”。冢宰是指先秦的古官名，亦称太宰，《周礼》称“天官”，相当于后代的吏部尚书。杜立德撰文冠以“大冢宰”，一个含义是说马希纳在朝中所居地位之高，马希纳在任户部尚书时还领议政大臣加一级之衔，已进入清初统治的核心阶层。另一个含义是马希纳的结衔为吏部尚书，自魏晋至明清，朝廷在六部设吏部尚书，确立吏部位居六部之首，此职在明代极为受重视，是因吏部操控用人之权，常能把持朝政。到了清代，皇帝以军机处剥夺了吏部的大权，吏部尚书也不过是与其他各部尚书平等，但因其位居六部之首，类比先秦的天官，故杜立德可称其为“大冢宰”。

由于郝惟纳撰写的《马希纳墓志》中没有明确提到他初任户部主事具体的时间，因此笔者以马希纳一生中的三个重要节点任官、辞官、歿去为锚点，尝试推算出马希纳初任官的时间。

1. 马希纳是在何时任官的呢？首先，《马希纳墓志》和《清史稿》中关于任官时间的记载有所不同。《马希纳墓志》云：“官三十年，俭约一如寒士。”“……转吏部尚书，三年，以病乞归，又三年而歿。”按墓志所云应是从任吏

部尚书三年，在病归三年后卒时凡六年。而《清史稿》载马希纳是在康熙八年（1669）乙酉六月转吏部尚书，康熙九年（1670）十月壬午病免，与《清实录·仁皇帝实录》中“康熙九年十一月病辞”的时间吻合。综合马希纳转任吏部的时间及对喀纳在同年十二月乙酉继任吏部尚书的记载，可以明确推论出马希纳在吏部尚书任上仅一年三月有余。这与墓志任吏部尚书三年的记载不符。墓志记载马希纳从任吏部尚书三年后到病故有六年，即是在康熙十一年（1672）辞官，在三年后的康熙十四年（1675）去世。从康熙十一年辞官，上推三十年，他初任户部主事应该在后金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清史稿》记载马希纳从任吏部尚书到病故为四年，在康熙九年辞官，按他为官三十年计，他任官的时间应在后金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其次，他是以何种方式入仕的呢？据冯双元先生推测：志文云马希纳官三十年，则其初任官的时间大概为崇德七年，考虑到其父马福塔曾任户部承政（即后来称为尚书），推测马希纳以‘任子’方式入仕的可能性较大”^①。

2. 辞官，墓志云：“未几，果以劳瘁成疾，屡乞罢政事，久乃得请。”马希纳辞官的时间与《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九年（1670）十一月因疾辞”的记载相符^②。

3. 去世，马希纳在康熙九年“以病乞归，又三年而歿”。因此马希纳是在康熙十三年（1674）去世的。

马希纳为官三十年，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授托沙喇哈番（汉名“骁骑尉”），吏部启心郎，授拜他喇布勒哈番（汉名“骑都尉”），户部启心郎、兵部督捕左侍郎，授佐领，拜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加一级，转吏部尚书。

马希纳先后任过吏部、户部启心郎，又转任户部、吏部尚书二职，以其在户部任职的时间最长，故墓志云“公凡四任户部”，是指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户部启心郎、户部尚书。

马希纳任官历练30年，墓志记有4个特点：（1）从未外放过；（2）在户吏两部任官占有大部分时间，这两部职能最能具备上下其手的机会，所有官员都会与其来往；（3）在户吏两部都出任过启心郎和尚书；4. 马希纳为官，是从户部低层的主事开始做起，经过了多年的历练，一步步走入政治的中心。

《马希纳墓志》中并未记载马希纳历官累迁的时间点，今试图以《清史稿》的记载为根据，来排出马希纳的累官进程，有些是能查到的，有些目前尚无实证，可作进一步的考证。

1. 清崇德五年（1640）任户部主事，受托沙喇哈番（汉名骁骑尉）。按《马希纳墓志》记载：“官三十年。”“三年，以病乞归，又三年而歿。”“享年五十有五。”从马希纳任官到辞官退隐又三年计，上推三十三年，他也是应在崇德五年入仕，初任户部主事。

2. 顺治元年至三年任吏部启心郎。受拜他喇布勒哈番（汉名骑都尉）。清代吏、户两部下设左右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堂主事、司务、笔帖式、内仓监督等。

3. 顺治十一年，调吏部启心郎。马希纳后改任户部启心郎，属于从吏部启心郎平调至户部启心郎，他应是以满人身份任启心郎的，而非因精通汉文而出任的。启心郎始创于天聪五年（1631），后金时在天聪五年议定官制，建六部，各以贝勒一人领之，置启心郎一人，崇德三年（1638）六部定启心郎三人，满一人、汉二人，康熙十二年（1673）裁撤。

4. 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晋兵部督捕左侍郎，授佐领。《马希纳墓志》曰：“晋兵部督捕左侍郎。”马希纳在以吏部启心郎改任户部启心郎，属于平调。为何又晋升为兵部督捕左侍郎呢？这是与清初推行的“逃人法”有关。《国史·吴达礼传》：“（顺治）十一年正月，上以八旗逃人众，增设兵部督捕侍郎、郎中、员外、主事等官。”《清史稿·职官志·兵部》：“十一年，增置督捕，满左侍郎、汉右侍郎各一人。”^③清政府在兵部增设督捕是为了应对“逃人”。清军在入关前是附庸于明朝的建州卫，此时“往往掠汉人为奴，视为大利”。汉人多逃亡朝鲜，朝鲜辄解送中国，建州恨之。时为寇朝鲜，以为报复，此积世纠缠之事，具见《朝鲜实录》。“太宗既以兵力压伏朝鲜，乃严约不许解送。而汉人尚有逃入朝鲜以求庇者，朝鲜涕泣拒之，或有不忍坐视中国人为奴，私自纵还中国者，清必予重罚。是为满洲督捕逃人旧法。”^④《清史稿·李裪传》对此有详尽的记载：“八旗以俘获为奴仆，主遇之虐辄亡去。汉民有愿隶八旗为奴者，谓之‘投充’，主遇之虐亦亡去，逃人法自此起。（顺治）十一年，王大臣议‘匿逃人者，

秀府村北有一卧牛台，是属于西山东北—西南走向褶皱山地，它的范围是东起潭峪、西达隆恩寺、北临天台山。

但在很多清末民初中外绘制的地图上既没有标“天台山”也没有标“天太山”，更没有天泰山，反倒多是标有一个“天宝南山”。20世纪30年代由最新地学社出版的《北平四郊名胜详图》中标有狮子窝、板凳沟、陈家沟3个村落和“天宝南山”（图四），这个位置正是天泰山所在地方。既然标着天宝南山，那么必定还有“天宝山”。地图上天宝山位于海淀区的香山西侧，在香山鬼见愁的北侧玉皇顶的西面。天宝山与鬼见愁隔山谷相望，是昔日妙峰山——天泰山古香道北道上一处重要的景点。旧时天宝山以产煤为主，当地村民都是以煤为生，他们视其为“天赐之宝”，故名曰“天宝山”。这天宝南山位于石景山区的天泰山以南的位置，在马家坟的西北面。马希纳墓志中也提到了一座正宝山：“其子工部郎中苏立泰等，将以康熙十四年五月二十有六日甲申，葬公于西山玉河乡正宝山之原。”冯其利所说的“宝山”，《北平四郊名胜详图》所标出的“天宝南山”与《马希纳墓志》中的“正宝山”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天宝山与天宝南山是两个明确的山名，一个位于海淀、一个在石景山，都是正式的名称，如果说“正宝山”是笔误的话，似乎天宝南山又距离马家坟稍远了些。这也许还需要有更多的资料来佐证。

①⑩ 石景山区文物保护协会编：《石景山文物小志》第二辑，1991年，第45页。

② 《清史稿》卷二百五十《杜立德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6393页。

③ 《清史稿》卷二百六十《郝惟讷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6553页。

④ 《清史稿》卷二百六十六《叶方霭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6573页。

⑤ [清]纪昀等纂修，李洵、赵德贵校点：《钦定八旗通志》卷五《旗分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6页。

⑥ [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7页。

⑦ 陈广斌、李新乐、冯其利编著：《北京文物胜迹大全·石景山区卷》，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99页。

⑧ [清]弘昼等编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二十三，辽沈书社，1989年，第304页。

⑨ 《清史稿》卷二二七《满达尔汉弟马福塔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6093页。

⑪ 冯双元：《新获清吏部尚书马希纳墓志考》，《历史档案》2024年第2期。

⑫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95年，第467页。

⑬ 《清史稿》卷一一四《职官志·兵部》，1976年，第2356页。

⑭ 孟森：《孟森讲清史》，团结出版社，2019年，第120页。

⑮ 《清史稿》卷二四四《李裪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6343页。

⑯ 《清史稿》卷二四四《魏绾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6342页。

⑰ 《清史稿》卷一八〇《部院大臣年表二上》，中华书局，1976年，第4388页。

⑱ 《清史稿》卷一八〇《部院大臣年表二上》，中华书局，1976年，第4390页。

⑲ 《北京市地名志·石景山区地名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349页。

从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所藏几组清代房契看清代北京城区房产交易

张晶晶

契约是官府或民间在房产交易过程中直接产生的文字资料，具有原始性、凭证性的特点。笔者整理了几组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所藏清代北京城区旗人、民人进行房产交易的契约文书，以此为依据对房产交易的内容和政策做初步探讨。

现今出版的有关清代北京城区契约文书汇编的主要有《中国历代契约粹编》^①《首都博物馆藏清代契约文书》^②《首都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研究》^③，但对北京城区契约的研究的论著并不多，主要有刘小萌的《清代北京旗人社会》^④，张小林的《清代北京城区房契研究》^⑤，邓奕兵的《清代前期北京房地产市场研究》^⑥等。

中心藏清代北京城区房契共 116 种（内城、外城）。从契别上看以卖契和典契的数量最多，其中卖契 66 种，典契 29 种；契类较为丰富，有白契、官稿白契、红契、官稿红、契尾红、执照、满汉合璧契约等；立契的时间范围较广，在康熙二十年（1681）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之间。中心藏契约文书地域特色明显，能够真实、细致地反映清代北京城区房产交易的历史特点，对此进行整理与研究，将对北京地方史、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产生重要的推进作用。

一、旗民分居政策对旗民居住区域的影响

顺治初年，清廷圈占北京内城的民房以安置“从龙入关”的八旗官兵，原有居民除投充旗下者外，被强令迁往外城^⑦。清政府在京城推行旗民分居政策。《清会典事例》中所载的八旗具体方位：“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⑧原来在内城居住的汉人一律迁居外城。

中心所藏三组外城民人房契如实地反映了清代民人的居住区域主要集中于外城的史实，一组位于北城灵中坊小安南营，雍正十二年（1734）至同治八年（1869）；一组位于北城日南坊琉璃厂桥，康熙十年（1671）至咸丰三年（1853）；一组位于南城东南坊香串胡同，同治元年（1862）至光绪三年（1877）（表一）。《京师坊巷志稿》中记载：“灵中坊 隶北城。凡内城自德胜门街以东，地安桥、兵马司胡同、交道口、东直门街以北，皆属焉。外厢则安定门、德胜门外，其分地也。”又记：“日南坊 隶北城。所属皆外城。自煤市桥观音寺前石头胡同、板章胡同以西，宣武门外大街、半截胡同以东，皆属焉。”，又记：“东南坊 隶南城。所属皆外厢，南则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门外，东则广渠门外，西则广宁门外，其分地也。”^⑨由此可见，从清初到清末民人生活区域一直以外城为主（图一），这是清初实行的“旗民分治”的政策所造成的，即使已历经二百多年的世代更迭，旗民居住的区域依然保有清初统治者政策的痕迹。

刘小萌的《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述：“旗人与民人分城而居，是清朝旗民分治二元体制在空间关系上的突出表现。旗人的主体是满人，民人的主体是汉人，又说明旗民分治的实质是满汉隔离。”^⑩“旗民分治”政策使清代北京城区的房屋分为旗房和民房，旗房产权国有，旗人只有使用权；民房则产权私有。这两种不同属性的房屋在

历史进程中，随着清代的经济不断发展，在房地产交易方面势必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旗人房产

（一）旗房交易从禁而不止到交易合法化

清初禁止旗产交易，清政府并不允许出卖旗房，但是实际上出于生活所需，旗房的交易从来都是禁而不止，为了躲避官府的纠察，旗房的买卖常以“典”的形式在私下里进行，签订契约方面多以白契为主。直到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颁布八旗田宅税契令，标志着旗房交易的合法化^①。随着清政府封建统治的稳固，旗人的思想观念逐渐受到汉文化影响，房产私有化的观念加强，旗房的交易愈加频繁，本旗、跨旗、旗民之间的交易陆续出现。

中心所藏一组旗房交易的契约（表二），该处房产位于东单牌楼总布胡同，乾隆二十四年（1759）满洲正蓝旗德明将此房12间卖与满洲镶白旗阿肃，此后至光绪三年，此处房产依次经正蓝旗伊进泰、镶白旗富隆额、正白旗巴汉泰、正蓝旗参领五十六、正蓝旗骁骑校保昌、民人石昆山、镶白旗策勋、镶白旗阿穆昌阿、正黄旗文英、正蓝旗奎鉴、正蓝旗常清、正白旗德姓辗转典卖，在118年间，此处房产转手13次，平均9年典卖一次，以典房为主，交易较为频繁。契约类型主要包括卖房红契、典房白契、老典白契、改典为买执照、转典白契等，反映了房产交易中形成的多种契约关系，也反映出在此一系列交易过程中旗房性质的逐步变化。

具体以乾隆二十四年大兴县德明卖房红契为例（图二），做进一步考察：

正蓝旗满洲觉罗伊精阿佐领下闲散觉罗德明，有瓦房拾贰间，坐落总铺（布）胡同东头路北地方，今卖与厢白旗满洲赫伸佐领下庶吉士阿肃名下，价银贰佰肆拾两。此房倘系未行扣完官银之公产并重复典卖，亲族人等争执等情，俱系佐领伊精阿、骁骑校福尔杭阿、领催胡松阿，卖主德明，全保此照。

纳税银柒两贰钱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日立卖契人德明（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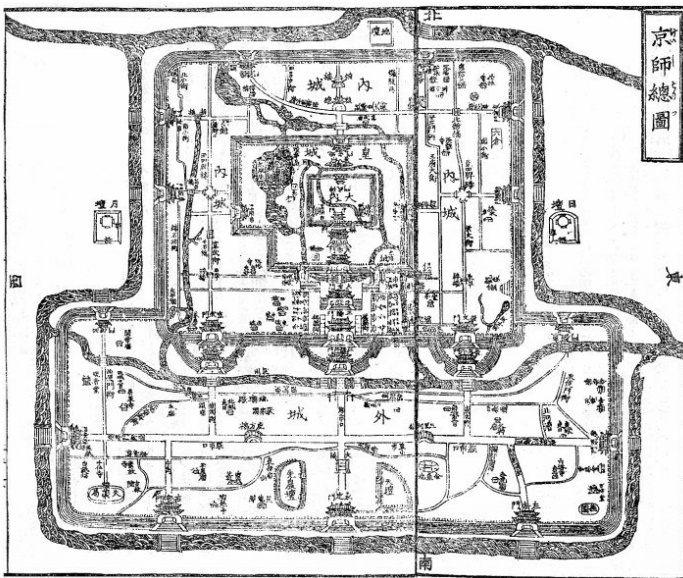
骁骑校福尔杭阿领催胡松阿（押）

佐领伊精阿（押）

（左附满文红契）

有章（左翼管税关防、京师地方审判庭登记处编号的朱文印章、督办京都市政公所验讫、北京市财政局第三科登记股注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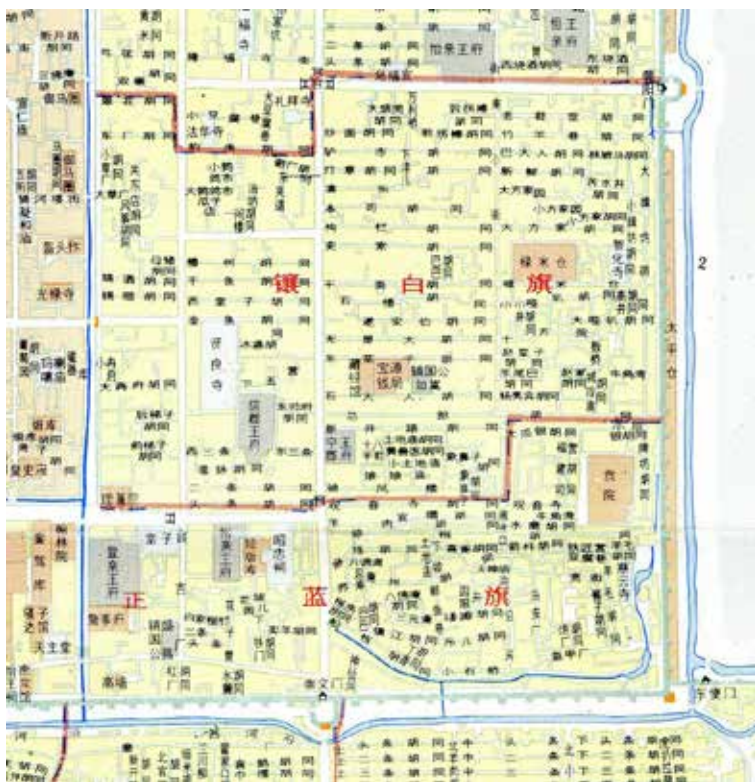
此张契约为满洲正蓝旗伊精阿佐领下的德明将位于总铺（布）胡同的12间房卖与满洲镶白旗赫伸佐领下阿肃，价银240两，纳税银7两2钱（每两银收取三分），满汉合璧红契，盖“左翼管税关防”官印，可以佐证旗人买卖房产，需受佐领和八旗左右翼管税官防管理，按民间例纳税，还需卖主所在佐领在场画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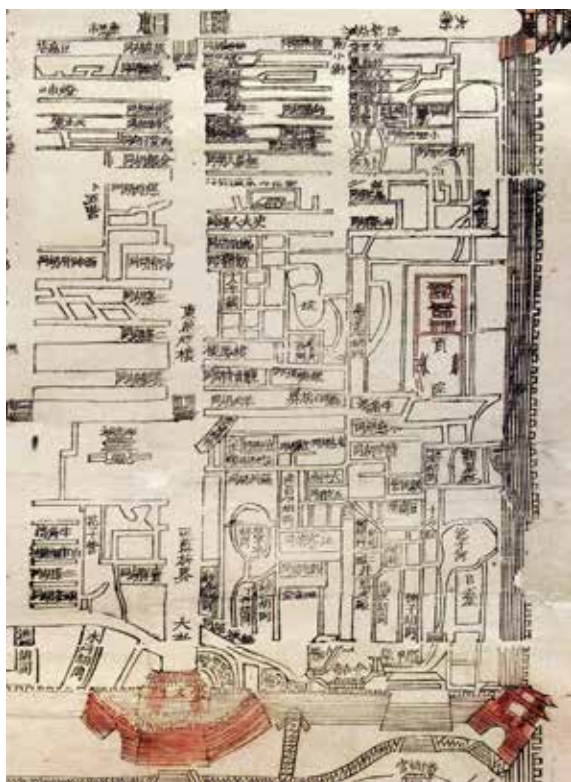
图一《京師總圖》（选自《唐士名胜图会》）



图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兴县德明卖房红契（局部）



图三《首善全图》局部



图四 清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全图局部

该处房产在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1764）共完成了3次房产交易，皆在正蓝旗与镶白旗两旗间进行。可见清乾隆时期跨旗交易十分普遍，已受到官方认可。而总布胡同坐落于正蓝旗与镶白旗交界地带（图三、图四），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为跨旗交易提供了便利。自嘉庆五年（1800）后，跨旗跨区域的交易愈加频繁，先后流转于镶白旗、正白旗与正蓝旗之间。道光三年（1823）2月，正蓝旗保昌将该房产典给大兴县民人石昆山，又于同月转典于镶白旗策勋名下。刘小萌《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与格局变迁》所附“康雍乾嘉年间北京内城房屋交易略表”^②也列举了旗人之间跨旗交易的契约实例。以上情况反映出清代中叶旗人居址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清初规定的各旗居住的界址已经被完全打破，旗人与民人交易房产也从被禁止到被允许。

（二）旗房交易形式

旗房交易的主要形式有卖、典、抵押等形式，其中典房是一种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不充分的房屋买卖形式，在旗房交易中使用频率较高。在房屋出典期间，典主拥有使用权、处分权或转典他人的权利，房主则保留出典限满后的赎回的权利。房屋买卖需要缴纳契税，多为红契；而典房不用纳税，多为白契。

东单牌楼总布胡同这处房产，从乾隆二十四年至光绪三年，其中只有乾隆二十四年、乾隆二十九年、光绪三年为卖房红契，钤盖朱印，满汉合璧，其余10张均为典房白契，汉文。旗人典主为了达到“以典为卖”的目的，典房的赎回期限有时长达五十年，还会写明“听凭业主永远为产”，以达到“明典实卖”，逃避税款的目的，而且典房不需要有本旗佐领在场，只需要中保人即可，更加简化了交易方式。

在典房过了赎回期限后，原业主若无力赎回，新业主需到左右翼管税官防办理税契手续，补缴税契，从而完成由典到卖的合法交易程序。这处房产在嘉庆五年（1800）至同治七年（1868）的9次典房过程中，虽已过了赎回期限，但均以转典的形式继续交易，并未办理契税手续，有偷漏税之嫌。

（三）旗房的交易政策的调整

随着旗房房产交易的增多，旗房私有化进程的加剧，以典为卖、逃避税款的情况日益增加。回赎期限长造成的房屋所有权的不确定性，与旗人房屋买卖关系发展形成的矛盾日益尖锐，从典契中房产的赎回时间可以看出清朝对



图五 乾隆二十九年（1764）大兴县伊进泰卖房红契

旗房政策的调整。乾隆三十五年（1770）颁布的命令：“旗人民人，典当田房，契载年份，统以十年为率，盖不税契。”同时宣布“其从前典契内，载有二三十年至四五十年者，限于三年内报名各佐领，改典为卖，一体上税”^⑬。十年以上的典契必须改典为卖，即按照原典价银的3%纳税。《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收录“旗人房契简表”^⑭中记，乾隆三十四年（1769）满洲镶黄旗将自家汤家胡同房产典与满洲镶黄旗包衣玉柱，一典100年，典主玉柱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办理了执照，按例纳税。东单牌楼总布胡同房产，乾隆二十八年（1763）至二十九年（1764）的典契回赎期限均是50年，而在嘉庆五年至道光三年典契的回赎期限是8年，咸丰六年（1856）至同治七年（1868）典契的回赎期限是10年。乾隆二十九年大兴县正蓝旗伊进泰将房典与镶白旗敷元，一典50年，典主敷元于乾隆三十八年办理了执照，纳税银18两，执照印明“照依户部议覆典契为买契之例相符”，可以作为制度与交易行为相互作用的实证（图五）。

三、民人房产

（一）民房交易中铺面房占一定比例

外城民人的房屋系自建或自置，属于个人私有，由于清初便有了买卖田宅税契制度的规定，房产交易也较为规范，即使后来出现旗民交产，清政府调整了相关政策，其交易形式典卖多样化，签订契约红白契兼有，差异在是否纳税上。

居住在内城的民人迁往城外，导致外城人口大量增加，外地来京的官吏、商贾、举人因其身份只能居住在外城。各地商贩聚集于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之外的外城地区，使得外城地区的商业得到了极大发展，导致铺面房越来越多。

笔者所见清代北京房契中涉及铺面房的契约有17件，约占13%，是民人房产交易的一大特色，其中一组关于外城民人铺面房房契（表一 7—13），可作为铺面房记载的实证。该处房产位于北城日南坊琉璃厂桥东边路南，康熙十年张林将自盖铺面房顶与侯姓人交易，此后至咸丰三年，此处房产依次经侯寿、张姓、刘姓、王姓、唐姓、章姓辗转交易。契纸背面的墨书“琉璃厂/信远斋”，可以推断此间铺面房在某一时期系“信远斋”的商铺。据传，

在清乾隆年间，有小商贩来京城投靠其在京做官的叔叔，这位官员从宫廷御膳房中传出了一个宫廷饮料配方，让亲戚在前门外大栅栏摆摊，小商贩照其配方制成桂花酸梅汤出售，很受欢迎，被称为“清宫异宝”“御制乌梅汤”。清咸丰年间，小商贩在东琉璃厂有了两间门脸的铺面房，正式开始前店后厂、自产自销的经营，店铺取名为信远斋。此间铺面房的最后一次交易正是咸丰三年，由唐乐圃典与章姓并补契税。清乾隆中后期，外城具有经营特色、固定字号的店铺越来越多，此组契约可作为见证之一。

（二）从民房交易看外城民人的隶属制度情况

在实施旗民分居政策之后，内外城居民的隶属制度也有所差别，内城为八旗驻地，旗人由各旗都统衙门管理；而外城民人居住区则主要实行保甲制，通过外城房契的内容可反映京城落实保甲制的实际状况。以乾隆三十八年（1773）大兴县张天禄顶卖房官契为例（图六），做进一步考察：

顺天府大兴县今据刘名用价契买遵例纳税事

立顶卖房契人张天禄，今因乏用，将祖遗门面房壹间，前接檐板棚半间，门窗户壁俱全，坐落北城日南坊贰铺琉璃厂桥东边路南总甲杨永成地方。今凭中保人说合，情愿顶卖与刘名下永远为业。叁面言定顶卖房价银肆拾两整。其银当日收足，外无欠少。自顶卖之后，倘有满汉亲族人等指房执契借欠官银私债争竞，有顶卖房主同保房人苏世沛暨中保一面承管。恐后无凭，立此顶卖房契永远存照。

此房有张姓本身红契壹张，付买主收存再照。

乾隆叁拾捌年伍月

立卖契人 张天禄

同至亲知情保房人 苏世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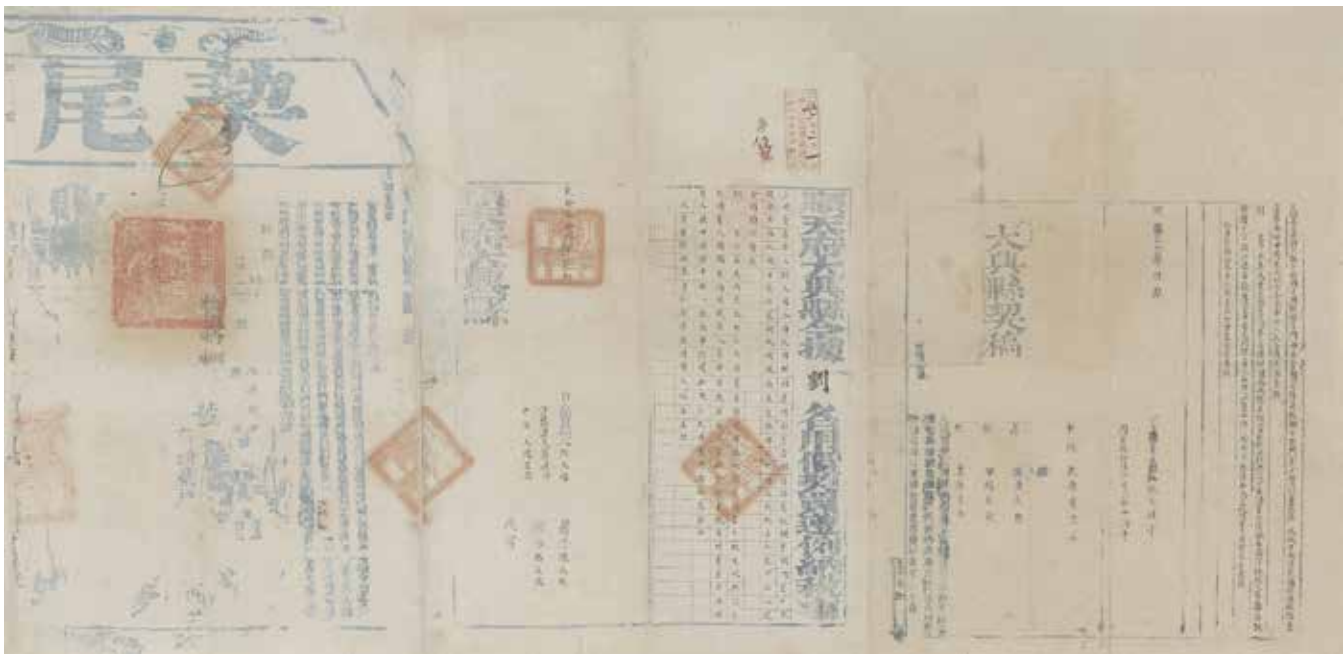
中保人 陈秉忠

房牙 陈永懋

总甲 杨永成

后附清乾隆三十八年大兴县契稿一张、契尾一张（价银肆拾两整，应纳税额一两贰钱）

有章（大兴县印、北京市财政局第三科登记股注销章、北京市财政局第三科登记股办理土地登记验契戳记、直隶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之印）



图六 乾隆三十八年（1773）大兴县张天禄顶卖房官契

此张契约为张天禄将位于北城日南坊琉璃厂桥东边路南的1间半铺面房顶卖与刘姓名下为业，价银40两，纳税银1两2钱（每两银收取三分），官稿红契，有契稿和契尾，盖“大兴县印”“直隶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之印”。可以佐证外城民人进行房产交易，需照例到大兴、宛平县纳税，领取红契。房契坐落项一般写明“某城某坊某牌某铺，搃甲某地方”，除立契人、中保人外，还有“至亲知情保房人”“房牙”“总甲”签字。

该处房产只在康熙十年为白契（未缴纳税款），之后的182年间，此处房产转手6次，平均30年交易一次，均按规定缴纳税款；交易类型以顶房为主，顶房是一种房屋交易方式，类似于转让或取得经营权或房屋租赁权；契约类型主要包括官稿白契、官稿红契、契尾、典房白契、补税契等。通过契纸和契印发现，此处房产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乾隆三十八年、乾隆五十年（1785）使用大兴县契纸，盖大兴县印，嘉庆元年（1796）、道光二十二年（1842）、咸丰三年（1853）则使用宛平县契纸，盖宛平县印，可以推断清代外城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管理单位也有所不同，这类现象在当时较为普遍。

（三）民房的交易政策的调整

在清代200多年时间内，保甲制经历了由强化到衰落的过程。笔者整理的其中一组北城灵中坊小安南营的契约（表二 1—6），从清雍正至同治年间历经六次交易，坐落项和总甲、房牙的画押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契约中的房屋坐落看，包括雍正十二年（1734）之前的两次房产交易（表二 1、2），该房屋归大兴县管辖，并标注搃甲姓名。自乾隆三十四年至同治八年（1869）间，据契纸和官印推论，则归宛平县管辖，缺少搃甲、房牙的画押，而改为由深知情底保人作保；另一组北城日南坊琉璃厂地区的契约（表二 7—13），自康熙十年至咸丰三年（1853）间，在搃甲的画押的情况上比较完整，但房牙、左邻、右里的画押情况逐渐减少，且也出现了该房屋的管辖变迁；最后一组南城东南坊香串胡同的契约（表一 14—17），自同治元年（1862）至光绪三年（1877）间，已没有搃甲的参与。房屋交易，除了同治元年（1862）第一份契约为官稿，有房牙画押盖章外，之后的三份契约均为白契。契约坐落项和画押的情况体现了民房交易政策的调整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清代外城保甲制度由肃整到废弛的变化过程。

四、结语

中心藏清代北京城区房契反映了清朝入关定居北京后200余年的房地产交易方面的变化，清初“旗民分治”政策所造成的旗人与民人、旗房和民房两种不同属性的群体和物产，在清代经济发展中始终是两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因身份不同而在房产交易中有着许多不同的表现，旗人逐渐受到民人的影响，联系日益密切，由分治走向融合；对旗、民的管理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而愈加规范，又随着社会动荡而愈加废弛，两种不同身份的群体、不同属性的物产在最初带有强烈民族属性的政体的瓦解下最终走向一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表一 清代外城民房交易契约三组

序号	立契时间		立契人	受契人	坐落	价格	契别	契类	备注1 (质地、间数)	备注
	年	月								
1	清		邵琳同 男邵文 成	闫姓	北城灵 中坊小 安南营	银100两	卖契	官稿红	房6间	中保人房 牙搃甲代 书
2	清雍正 十二年 (1734)	10	闫士钦 同叔闫 弘禧	康奇瑞		大兴县北城灵 中坊并铺搃甲 张士奇地方	银80两	卖契	便民契 稿白 契纸红	瓦房6间

续表

3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	1	康维同男康奇瑞同孙康玉龙	林姓	北城灵中坊小安南营	宛平县北城灵中坊小安南营路西地方	纹银100两	卖契	契稿红契尾红	瓦房6间	中保人
4	清道光八年(1828)	6	林锦成同至亲蒋松岩	方姓		宛平县北城灵中坊小安南营路西并铺地方	银50两	卖契	契稿白官稿红契尾红	灰棚4间	深知情底保人 中保人
5	清道光八年(1828)	11	方大钱	杜姓		宛平县北城灵中坊小安南营路西	京平纹银500两	卖契	官稿白官稿红契尾红	灰棚4间, 添盖9间	知情底保人 中保人 房牙 代书人
6	清同治八年(1869)	2	杜门楚氏	徐姓		宛平县北城灵中坊小安南营路西并铺地方	银50两	卖契	契稿红契尾红	房13间	知情底保人 中保人 代笔人
7	清康熙十年(1671)	4	张林	侯姓	北城日南坊贰铺琉璃厂桥东	宛平县琉璃厂内北城日南坊二铺地方	银30两	顶房契	白契	房1间	搃甲 中人 左邻 右邻
8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	1	侯寿	张姓		大兴县北城日南坊二铺代后地方	银23两	顶房契	官稿红	房1.5间	中保人 左邻 右邻 房牙 搃甲
9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	5	张天禄	刘姓		大兴县北城日南坊贰铺琉璃厂桥东边路南搃甲杨永成地方	银40两	顶房契	官稿白官稿红契尾红	房1.5间	中保人 房牙 搃甲 代书人
10	清乾隆五十年(1785)	12	刘永安	王姓		大兴县北城日南坊贰铺琉璃厂桥东边路南搃甲董祥地方	银200两	顶房契	官稿白官稿红契尾红	房2间	中保人 房牙 搃甲 代书
11	清嘉庆元年(1796)	1	王门韩氏同男昌年	唐姓		宛平县北城日南坊二铺琉璃厂东边路南搃甲宗升地方	银200两	顶房契	官稿白官稿红契尾红	房2间	知情底保人 中保人 房牙 搃甲 代书人
12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	3	唐乐圃	章姓		宛平县北城日南坊二铺琉璃厂桥东边路南地方	银100两	典契	白契	房4间	知情底保人 中保人 搃甲
13	清咸丰三年(1853)	2	章姓			宛平县北城日南坊二铺琉璃厂桥东边路南地方	银100两	补税契	契稿红契尾红	房2间	知底中保人 搃甲
14	清同治元年(1862)	8	徐坛	王姓	南城东南坊香串胡同	大兴县南城东南坊香串胡同中间路西	银80两	卖契	官稿白	房15间	知底保人 中保人 说合人 房牙
15	清同治五年(1866)	4	王沛珍	索姓		大兴县南城东南坊香串胡同中间路西	银85两	卖契	白契	房15间	知底保人
16	清同治六年(1867)	10	索国禄	鲁姓		大兴县南城东南坊香串胡同中间路西	银80两	卖契	白契	房15间	知底保人 中保人
17	清光绪三年(1877)	8	鲁清泉	樊姓		大兴县南城坊香串胡同中间路西	银650两	卖契	白契	房15间	知底保人 中保人

表二 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光绪三年(1877)

东单牌楼总布胡同旗房交易契约一组

序号	立契时间		立契人	受契人	价格	契别	契类	备注1 (质地、间数)
	年	月						
1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	8	正蓝旗德明	镶白旗阿肃	银 240 两	卖契	红契(满汉合璧)	房 12 间
2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	2	镶白旗阿肃	正蓝旗伊进泰	银 600 两	典契	白契	房 12 间
3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	3	正蓝旗伊进泰	镶白旗敷元	银 600 两	典契	契稿白 执照红 (满汉合璧)	房 12 间
4	清嘉庆五年(1800)	7	镶白旗富隆额	正白旗巴汉泰	银 800 两	典契	白契	房 13 间
5	清嘉庆十五年(1810)	7	正白旗巴汉泰	正蓝旗参领	银 800 两	典契	白契	房 13 间
6	清道光二年(1822)	3	正蓝旗副护军参领 五十六	正蓝旗骁骑校 保昌	银 800 两	典契	白契	房 13 间
7	清道光三年(1823)	2	正蓝旗骁骑校保昌	石昆山	银 800 两	典契	白契	房 13 间
8	清道光三年(1823)	2	石昆山	镶白旗策勋	银 800 两	典契	白契	房 13 间
9	清道光十五年(1835)	3	镶白旗策勋	镶白旗松姓	钱 1800 吊(1384— 1500 两)	典契	白契	房 21 间半
10	清咸丰六年(1856)	1	镶白旗阿穆昌阿	正黄旗诺姓	钱 1800 吊(约 900 两)	典契	白契	房 12 间半
11	清同治七年(1868)	4	正黄旗文英	正蓝旗奎鉴	钱 1800 吊(1125— 1200 两)	典契	白契	房 14 间半
12	清同治七年(1868)	4	正蓝旗奎鉴	正蓝旗舒姓	钱 1800 吊(1125— 1200 两)	典契	白契	房 14 间半
13	清光绪三年(1877)	10	正蓝旗常清	正白旗德姓	2 两平松杠银 200 两	卖契	契稿红 执照红 (满汉合璧)	房 14 间半

-
- ① 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粹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② 首都博物馆：《首都博物馆藏清代契约文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
 - ③ 杜翔：《首都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
 - ④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 ⑤ 张小林：《清代北京城区房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 ⑥ 邓奕兵：《清代前期北京房地产市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
 - ⑦ 刘小萌：《从房契文书看清代北京城中的旗民交产》，《历史档案》1996年第3期。
 - ⑧ [清]托津等纂修：（光绪）《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十二，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58页。
 - ⑨ [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6页。
 - ⑩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 ⑪ [清]鄂尔泰等纂修：《八旗通志初集》第70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347—1348页：“查定例内，不许旗下人等与民间互相典卖房地者，盖谓旗人恃房地为生，民间恃地亩纳粮，所以不许互相典卖，斯诚一定不易之良法也。应将条奏所称旗民互相典卖之处无庸议外，至旗下人等典卖房地，从前俱系白契，所以争讼不休。嗣后应如所请，凡旗人典卖房地，令其左右两翼收税监督处，领取印契，该旗行文户部注册。凡实买卖者，照民间例纳税，典者免之。至年满取赎时，将原印契送两翼监督验看销案，准其取赎。倘仍有白契私相授受者，照例治罪，房地入官。”
 - ⑫ 刘小萌：《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与格局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 ⑬ [清]托津等纂修：（光绪）《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十八，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15页。
 - ⑭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37—138页，表3-16、17。

《燕京烬余录》价值初探

韩建识

从汉代到元代的北京地方文献，大多已散佚。到了明代，有关顺天府的专书日益增多，光绪《顺天府志》统计有120余种^①，如《宛署杂记》《长安客话》《万历顺天府志》《燕都游览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帝京景物略》等。到了清代，研究北京史地的风气日盛，有孙承泽《春明梦余录》、顾炎武《昌平山水记》、朱彝尊《日下旧闻》、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吴长元《宸垣识略》、震钧《天咫偶闻》等雕版行世。民国时期记载北京的专书又有《燕都丛考》《旧都文物略》《北京市志稿》等。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藏有张润普著《燕京烬余录》稿本及后人抄本，该书是尚未对外公布的研究北京近代城市变迁的重要资料，本文试对其价值做初步探讨。

一、《燕京烬余录》作者及成书

《燕京烬余录》作者张润普（1882—1967），字霁青，别署虹南。满族，北京人，曾任清末户部员外郎、户部主事、江西监理官等职。辛亥革命后，任财务部公债司司长、代理次长等职。1954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在文史馆的推荐、安排下，多次受聘于修建各名胜古迹的调查工作，并提供历史变迁资料，如参加钓鱼台国宾馆的建设等。著有《三国史略》《蒙古史纪事诗》《东三省沿革表》《曼殊谈往》《燕京见闻录》《三贝子花园及乐善园的变迁》《漫谈北京的桥》《虹南词集》等^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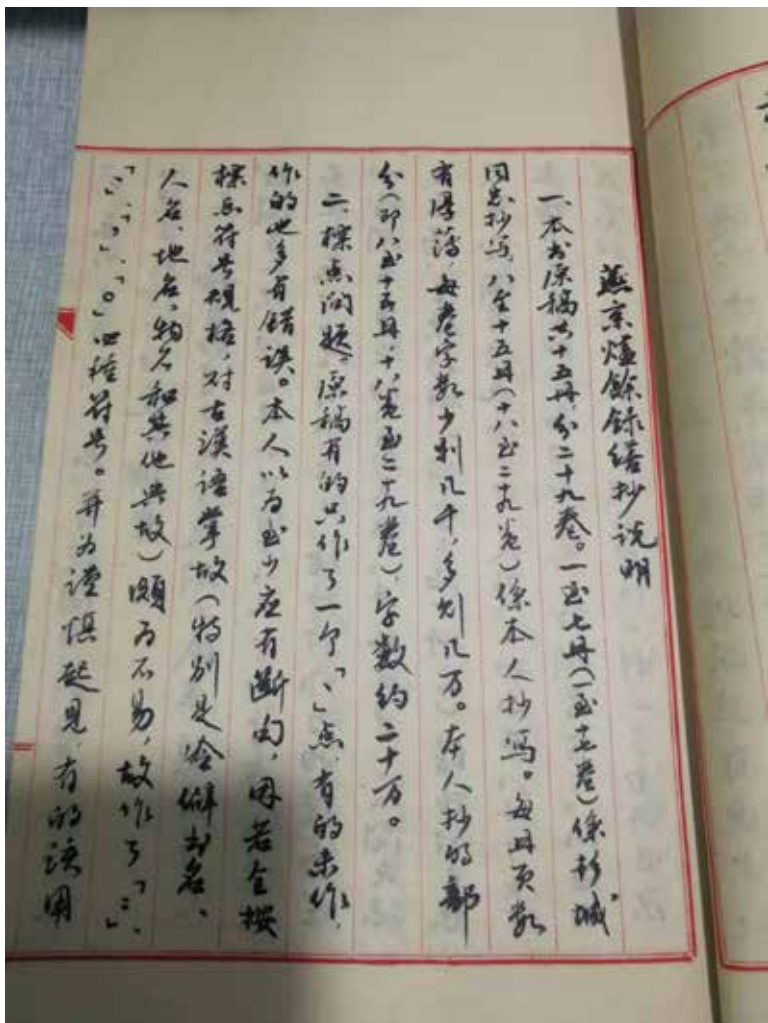
《燕京烬余录》稿本第15册末有作者所作自序，载其成书缘由及过程：“乾嘉以降，物力渐凋，旧有规模，减色弗少。及庚申一役，御园灰烬，撤府第，建使馆，而京师一变。庚子一役，翠华西幸，赤帟嚣张，壮丽几乎沉沦，繁华尽于俄顷，而京师又一变。壬子以后，政局转易，魁柄方新，将以改制，为发扬上国之光，更始庶政之具，而



图一《燕京烬余录·序》

作者单位：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

京师又变。有此数变，而京师旧物所存于今日者，亦仅仅矣。余生也晚，于当日承平景象已不及见，第于所遗旧迹尚获睹十之四五，今幸前贤著录未至散佚，旧日勋戚尚易咨访，倘不钩考纂辑，执笔以记之，则此十之四五者，一至再至，又为墟矣。且自庚申以来不过六十余年，京师变幻，至于此极，脱复废城垣，敷路轨，日月逾迈，而庐山真面将无人能识，虽有流连光景，伤禾黍于故宫，谋托筒编，续春明之旧梦者，将何所取证乎。兹不揣简陋，掇拾京师建置，并躬自履勘，或一日而往数处，或一处而采访两三次，上自官府，下迄官衙，及坊巷梵刹之属，或尚完好，或已圯废，或经改置，或创新名者，凡若干所在，而后披阅载籍及各家笔记诗文集，一一证实，而后志以签条，由近而远，由内外城而四郊，然后成帙，都为二十九卷，颜曰燕京烬余录，藏诸篋笥，以备遗忘。……甲子中秋，张润普自叙于银锭桥畔虹南精舍。”（图一）由此可知，北京自元明清至民国，禁苑官衙、城坊寺观，迭经嬗递。乾嘉以降，国力渐衰。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京城部分府第被撤除，建立了使馆。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烧杀抢掠，北京城再次遭到严重破坏。



图二《燕京烬余录缮抄说明》

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原清廷建筑功能发生了改变。有感于近代北京剧变，为避免燕京掌故湮没，便于日后稽考，该书作者张润普披阅载籍、各家笔记、诗文集等前贤著录，咨访旧日勋戚，并亲往实地勘察，对旧京官府、官衙、坊巷、梵刹的完残、圯废、改置、创新情况列条目详加陈述，著成《燕京烬余录》。该书自序撰于“甲子中秋”，“甲子”应为1924年，可见，该书于1924年已成书。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还藏有《燕京烬余录》抄本，为20世纪80年代由彭城、周积涵依稿本缮抄（图二）。

二、《燕京烬余录》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一）该书是反映近代北京城市变迁的重要专著

《燕京烬余录》稿本扉页题：“《燕京随见录》^③最初稿，计十五册，凡二十九卷。张虹南。”《燕京烬余录》共15册29卷，全书列有条目2000余则，叙述顺序为先内城，再宫城、外城、东郊、南郊、北郊、西郊，条目涉及官府、官衙、坊巷、梵刹等内容，撰写体例似《日下旧闻考》，先列出条目名称，再引用相关文献加以叙述，最后以按语的形式阐述作者本人观点（图三）。书中最后一章为“总录”，在全书最后一册。“总录”下小节为沿革、建置、街制、坊巷、水道、城垣、群书订误。书末有张润普为该书所作自序，全书近30万字。《燕京烬余录》引用文献达500余种，每一条目下所列文献，保留了大量重要史料，可为后人研究提供参考。《燕京烬余录》成书于1924年，与同一时期其他记载北京史地的专书相较，该书内容极为丰富。

与《燕京烬余录》同一时期的陈宗蕃编著的《燕都丛考》是较为全面系统记述古代至民国前期北京城区变迁的著作。该书记述了北京城区宫殿苑囿、坛庙衙署的建置沿革，重点是记述近四千条街巷胡同的变迁，包括它们的名称、位置，其中中的重要衙署、王府、名人故居、祠庙、会馆、古迹，以及有关的逸闻掌故、诗文、碑刻等。该书对研究古都北京的历史、名胜和城市发展，都有重要参考价值^④。然而遗憾的是，《燕都丛考》对北京郊甸的内容并未涉及。据笔者统计，《燕京烬余录》一书有600余条关于旧京四郊寺庙、宫观、衙署、古迹的条目，对近代京郊名胜古迹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就



图三《燕京烬余录》“太仆寺”条目

北京内外城部分而言，《燕京烬余录》也有大量条目中的内容在《燕都丛考》一书中没有相关记载。《北京市志稿》是20世纪30年代末编写的一部比较完整的北京史地方志，对研究这一时期北京的城市建设、工农商业、文化教育、礼仪民俗、名胜古迹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⑤。与《北京市志稿》不同，《燕京烬余录》着重陈述旧京宫府、官衙、坊巷、梵刹的完残、圯废、改置、创新情况，特色更加突出，相关内容也更为丰富。汤用彬著，1935年出版的《旧都文物略》包括城垣略、宫殿略、坛庙略、园囿略、坊巷略、陵墓略、名迹略、河渠关隘略、金石略、技艺略及杂事略，详细地记载了早先京兆20多个城镇和市内坊巷等^⑥。《燕京烬余录》共有条目2000余则，在反映旧京宫府、官衙、坊巷、梵刹历史变迁方面，其相关内容比《旧都文物略》丰富得多。

（二）书中按语保留了大量反映近代北京城市变迁的珍贵资料

《燕京烬余录》作者是满族人，且长期生活在北京，撰写该书时，他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又亲自咨访故旧、实地勘察，故书中按语保留了大量珍贵史料。

一是按语有助于后人了解旧京宫府、官衙在近代的变迁情况。如宫城内“延禧宫”条按语：“延禧宫于道光三十年及咸丰初年两次火灾，迄未修复，相称其址为水晶宫，宣统间拟再重建，亦未克举工，今尚荒芜。”内城“宗人府”条按语：“明宗人府，初为大宗正院，后改为宗人府。又宗人府今移于东安门外光禄寺署，原府划归京师警察厅。”“吏部”条按语：“吏部今改为京师警察总监公署，堂额及御制训词尚存。”“户部”条按语：“户部大库即银库，光绪庚子划归公使馆，辛丑春间，别于大堂建立新库。”又按：“户部于咸丰末年失慎一次，大堂尽毁。光绪六年，河南司复不戒于火，庚子年又罹兵燹。壬寅春间甫经修竣，未逾月，又火，故户部各司向无旧案，其九式经邦匾额，凡经同治、光绪两次重书矣。又大库内有镇库元宝，皆前朝旧物，庚子年失。又户部门左有土阜一，高过屋顶，相传去则与堂司不利，壬子后亦削为平地矣。今户部为烟酒事务公署。”“礼部”条按语：“礼部今已废为空地，宣统二年所建之习礼亭移于社稷坛，明诸司题名碑俱无考。”“兵部”条按语：“兵部公署，光绪庚子后划归各国

使馆，今俄国校场即其地也。”“工部”条按语：“工部亦划入使馆界。”“鸿胪寺”条按语：“鸿胪寺初为仪制司，洪武九年改为殿庭仪礼司，三十年始改为鸿胪寺，今寺署划入使馆界。”“钦天监”条按语：“钦天监初为太史监，明洪武元年改司天监，又置回回监，三年始改为钦天监。光绪庚子后，监署移于观象台，署址划归使馆。”“太医院”条按语：“太医院，光绪庚子年后移于地安门外、东皇城根南，西向，原署划归各国使馆，今俄国校场即其地也。”“教习庶常馆”条按语：“庶常馆亦划入各国使馆界内。”“会同四译馆”条按语：“会同四译馆庚子年废，归使馆。”“淳亲王府”条按语：“咸丰庚申，府废，为英国使馆。”“銮驾库”条按语：“銮驾库庚子年划归各国使馆，今为英国校场。”“翰林院”条按语：“翰林院于光绪庚子年为外兵占据，向存《四库全书》稿本及零种《永乐大典》尽成罍具，遗弃满地，院址旋归各国使馆，今为英国校场。”“詹事府”条按语：“詹事府，今为日本使馆。”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在东交民巷建立使馆。1901年《辛丑条约》更是将东交民巷一带划为外国人享有特权的“使馆区”^⑦。由《燕京烬余录》一书按语可知，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府衙古建筑在近代被占用、改建或拆除，其功能也相应发生改变。

二是书中按语保留了北京寺观、坊巷胡同的沿革资料。如“成化寺”条按语：“寺前有井一，俗称高井，庚子年，与双关帝庙同废。”“双关帝庙”条按语：“在崇文门大街路西高井庙南，奉关帝像二，建置年月无考，庚子年废。”“慈云寺”条按语：“慈云寺規制甚宏，后楼藏有明内府所颁金字藏经。光绪庚子，以驻拳匪，全寺毁为平地。”“隆福寺”条按语：“隆福寺今存，庙市如旧，惟各殿及东西廊庑，日就倾圮。光绪辛丑春间，正殿复毁于火，石栏仅存少许，门前牌坊亦拆尽。”“二郎庙”条按语：“二郎庙，相传于魏珙盛时曾为忠贤生祠，忠贤败复祀二郎，今庙及碑俱存。”“智化寺”条按语：“智化寺，殿宇尚存，廊庑尽为市贩赁居，污秽特甚。”“大慈延福宫”条按语：“大慈延福宫，俗呼三官庙，今存。又庙西有粮肆，相传为明时开设，延福宫碑阴所刻明时绅商捐款题名记即有店号，是亦数百年旧肆也。”“大能仁寺”条按语：“大能仁寺今只存一殿，匾额亦脱落，殿前成一窄巷，两旁尽为居民，殿后为一煤肆，亦不甚广，惟其地犹称能仁寺耳。”“火神庙”条按语：“火神庙今尚完好，殿后水亭已不可考。又庙南有白衣庵，正对澄清闸，亦旧刹也。”“兴善寺”条按语：“今广化寺左有废庙一，门额已佚，当系兴善寺旧址，寺南即小龙华寺。”“崇国寺”条按语：“护国寺年久失修，渐就倾圮，前殿、中殿、檐殿均已坍塌，惟历代诸碑尚存，庙市仍旧耳。”“白塔寺”条按语：“妙应寺殿宇颇壮，今渐残旧，惟白塔不时修理，皎然如银，迄未减色也。”“净业寺”条按语：“净业寺今尚完好，寺轩有匾题曰西涯一角，昔人多有题咏。”“普胜寺”条按语：“普胜寺，俗称十鞑子庙，近改为欧美同学会，《旧闻考》所称寺前城墙旧址已不可考。”“普度寺”条按语：“今缎匹库及普度寺，本明时小南城故址，其后建为睿忠亲王府，及王薨爵除，乃析其一段建缎匹库暨普度寺，今库已废而寺尚完好。”“历代帝王庙”条按语：“历代帝王庙今尚完整，门前照壁、石桥及东西景德坊均存。”“弥勒庵”条按语：“庚子年前庵尚完整，今止存山门未毁。”“太平庵”条按语：“太平庵在净业寺西，今已半圮，崇祯七年杨方盛重修碑亦仆于地。”“观音庵”条按语：“当街庙在石老娘胡同东口外，创建年月无可考，曩昔以乘舆所经，时加修饰，壬子年后，以妨石老娘胡同行入出入，拆为平地。”“崇元观”条按语：“崇元观俗称曹老公观，而《五城坊巷胡同集》作曹老虎观，庚子前已倾毁殆尽，今其遗址为陆军大学。”“大高元殿”条按语：“大高元殿在景山西门，南向，正面乾元资始牌坊已撤，门前二亭，光绪甲午曾加修饰，庚子后又修葺一新，故颇完整。又东西牌坊外，各有下马石碑一，镌刻极精。”“大报国慈仁寺”条按语：“报国寺为京师巨刹，其双松及窑变观音像并殿后毗卢阁，尤为著名。且每月庙市有旧书摊，故游者甚众。凡诸名士，莫不各有题咏。光绪庚子，以驻拳匪，尽付一炬，古迹荡然。今只唐经幢一，并井栏石刻乾隆诗碑及成化二年御制大慈仁寺碑尚存。”“昭忠祠”条按语：“今昭忠祠即报国寺旧址，庭中所树雍正年间御碑二座，旧在城内，庚子年已沦入使馆地界，定兴鹿公重建昭忠祠时，乃商诸澳馆，移置新祠，并定由忠裔在京者，每年轮流一人，帮管祠宇。”“顾亭林祠”条按语：“顾亭林祠在今昭忠祠大门外西偏，每岁春秋及亭林生日，例有各名流在此举行祀事。《顾亭林先生祠记》为朱琦撰、王锡振书。”“长椿寺”条按语：“长椿寺在下斜街，今尚完整。渗金佛塔及米书水斋禅师碑俱无恙。《燕

舟客话》所称画像，今寺中存者止有衣红锦袈裟者一轴，尚系同治时寺僧摹绘，其原像暨《居易录》所称之田妃像悉无考矣。又长椿寺为京师著名巨刹，诸家题咏及记载颇夥，名篇络绎，概不复载。”“法源寺”条按语：“法源寺今颇完整，旧碑悉无恙。《顺天府志》：寺前门在白帽胡同。又今法源寺街南有大慈院，再南有关帝庙。”郊垧“天宁寺”条按语：“天宁寺今存，浮图及各殿宇均无恙。”“白云观”条按语：“白云观今存，尚完整。每年正月朔庙会甚胜。观后花园台阁树石亦极清洁。”“万寿寺”条按语：“万寿寺在广源闸桥西，庚子时曾经兵燹，旋即修复。假山北有光绪甲午御制慈禧太后六旬万寿祝釐碑文，为大学士毓庆宫行走翁同龢书。”“觉生寺”条按语：“觉生寺及大钟，今俱完整，曾家庄地名已无人能知，仅呼其地为大钟寺矣。每年元旦至灯节，尚有庙会。寺后左为老虎庙，右为白塔庵，寺东邻土城近处，有西山某寺下院，名神州庙。”“姚斌庙”条按语：“泊子街，《日下旧闻考》作泡子街，今称报子街。”“佟府”条按语：“野园在佟府内，介受兹即佟国纲曾孙，今宅已易主，巷则改名同福。”“范文肃公祠”条按语：“今北新桥头条胡同内有范家胡同，当即文肃故居。”“荟英书屋”条按语：“纬纓巷，今称未英胡同。”“马市街”条按语：“马市街，今称太平桥，街南有鸡鸣市，今称集雅士胡同。”“浣衣局”条按语：“浆家房俗讹蒋家房，今呼蒋养房胡同。”综上，此类按语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近代旧北京寺观的沿革情况，也为今人探寻京城坊巷胡同名称变迁提供重要线索。

三是书中按语反映了旧北京古物变迁情况。如“观象台”条按语：“观象台及紫微殿，今俱无恙，惟前代旧器，仅存筒仪在紫微殿前。又浮漏室诸器，止有铜壶二，余俱不存，当为庚子年散佚。又康熙时所制天体仪，径六尺，座高四尺七寸，庚子年为德国运至外洋，乃另制一具，直径座高，悉减原器尺寸之半，及辛丑年德国复将原器返还，于是观象台上乃有大小二天体仪矣。”“科尔沁亲王府”条按语：“今铁狮子胡同，双狮尚存，惟已残毁。又铁狮旁有碑碣一段，下镌麒麟一，刻工甚精，俗呼麒麟碑，好事者更作铁栏护之，不知亦为田家物否。”“石虎”条按语：“在横二条胡同中间石虎胡同东口，西向，为蹲伏状，头角为行人抚摩，已无狰狞气象矣。”“铁影壁”条按语：“铁影背即铁影壁之讹，此壁高不逾丈，长可七八尺，上宽下狭，其色黝赭，前面所雕麒麟及各色花纹尚可辨识，壁后为一小庙，额曰□□庵。”“狮子府”条按语：“狮子府，据《日下旧闻考》案称，朝天宫后，向存旧殿三重，土人称为狮子府，盖元天师府也。而土人相传，则谓此石狮与大市街南小院胡同单狮子府之石狮，皆系某王府之物，嗣以后人析产，而二狮遂分置两地，一称单狮子府，一称狮子府焉。”“天安门”条按语：“天安门外有石狮二，其一腹下有枪痕，深指许，相传为崇祯甲申李自成入京时以枪割成者。又曩时人有冤枉时，率于天安门外拍打石狮，以代叩阍，故刑律内有拍打长安门内石狮鸣冤治罪专条。今石狮尚存。”

3. 该书订正了北京古书某些错误观点

《燕京烬余录》“总录”一章中有“群书订误”一节，对北京古书中部分内容指出其讹误、提出自己观点，书中列有：朱氏《日下旧闻》“铜车门地址之误”，光绪《顺天府志》“恒亲王府之误”，某书“五城察院北城之误”，余荣昌《故都变迁记略》“泡子河与南北河泊之误”，吴士鉴《清宫词》与某氏《清史纪事本末》“水晶宫之误”，《天咫偶闻》“东富西贵之误”，陈铎氏《仰迺居游记》“金台夕照地址之误”，近人《花之寺谈集》“地址之误”，张次溪记“乾水桥为银锭桥之误”，《古物陈列所记略》“浴德堂之误”，《北京城垣变迁记》“元皇子宫地址之误”。

昔日北京有“东富西贵”之说，清末学者震钧著《天咫偶闻》载：“京师有谚云‘东富西贵’，盖贵人多住西城，而仓库皆在东城。”^⑧《燕京烬余录》在“《天咫偶闻》‘东富西贵之误’”一节对此观点加以驳斥：“京师崇文门东西为商货萃集之所，如珠玉绸缎麻布糖果估衣南路烧酒皆于此设栈堆积以待肆商购取，宣武门东西皆官宅会馆，皆仕宦所居，故有东富西贵之说，而《天咫偶闻》则以内城当之，谓贵人多住西城，仓库皆在东城，实则西城以十（什）刹海及西苑三海所据，住户更少于东城，大僚住宅之不如东城为多，震钧氏之说不免附会也。”这里，《燕京烬余录》作者以崇文门东西为商货萃集之所、宣武门东西皆仕宦所居，故有东富西贵之说。此说虽未必是定论，但可聊备一说。

在“陈铎氏《仰迓居游记》‘金台夕照地址之误’”一节中，作者论述说：“金台夕照碣在朝阳门外大道南苗家地东四旗教场东侧，有乾隆御题金台夕照石碣，已仆于地，碑亭久毁，而陈氏游记则谓金台在永定门外东南约三里，且云昔岁曾一往游，凭槛远眺云云，亭且不存，槛于何有？况其地不在永定门外耶。”《燕京烬余录》作者张润普说，金台夕照碣在朝阳门外大道南苗家地东四旗教场东侧，石碣已仆地，碑亭久毁。显然他对乾隆御题金台夕照石碣进行了实地考察，其观点应真实可信。

《古物陈列所记略》以为清乾隆时将故宫武英殿西之浴德堂改为香妃沐浴之所，《燕京烬余录》在“《古物陈列所记略》‘浴德堂之误’”一节中提出异议：“乾隆帝容嫔和卓氏，乾隆二十七年晋封为妃，和卓氏当为新疆和卓木姓，是时西域初平，所称香妃，当指容妃而言。又《清史·后妃传》容妃于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卒，除封嫔时不计外，实在妃位二十七年，乾隆三十八年创设聚珍版，三十九年编撰《古今图书集成》，于武英殿缮校，岂有一武英殿一面臣工修书、一面妃嫔居住之理。且武英殿外朝也，与后宫系属两地，皇帝之妃不居后宫而居外朝，且杂于臣工值次，更为无理之甚。又同治八年己巳六月二十日，武英殿灾，延烧房屋三十余间，岂浴德堂独未延及耶？总之，浴德堂为治格故弄狡猾，以愚无识之人而已，稍知掌故者，绝不之信。”此处张润普对浴德堂为香妃沐浴之所这一观点的驳斥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作者对北京古书的订误，提出了自己观点，进一步推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为今人学术研究拓宽了思路。

三、结语

《燕京烬余录》列条目 2000 余则，引用古籍 500 余种，为后人研究北京宫府、官衙、坊巷、梵刹、名人故居等留存了大量文献资料。该书作者张润普为北京人，目睹了晚清、民国旧京文物古迹变迁情况，再加上作者博览群书，对相关古迹进行了实地勘察，该书鸿篇巨制，论述翔实，对今人研究近代北京城市建置变迁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① [清]周家楣、缪荃孙编纂：《光緒《順天府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325—6360页。

② 北京市文史研究館編：《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2002年4月，京准字2002-067，第74—75頁。

③ 《〈北京市志稿〉初探》一文談到，張潤普先生著有《燕京隨見錄》十六卷，稿本。張先生去世後，其子將這部稿本（約四十冊）售給中國歷史博物館，現藏該館圖書館。參見王燦熾著《王燦熾史志論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259頁。

④ 陳宗蕃：《燕都叢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正文前“內容提要”。

⑤ 吳廷燮等：《北京市志稿》，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後記”。

⑥ 湯用彬：《舊都文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⑦ 紀良：《近代北京城市的變遷》，《北京社會科學》1990年第2期。

⑧ [清]震鈞：《天咫偶聞》，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五四在北大》内容揭示和版本比较研究

董思彬

一、前言

我国近代史上，五四运动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折点。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编委会在1949年所编《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里开篇《毛泽东同志论五四运动》，记载了毛泽东同志对五四的论断，“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与五四以后，划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与社会革命论。”^①从毛泽东同志的论断里不难看出，五四对于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巨大影响和历史意义。

五四相关书籍和刊物对研究当时社会背景、揭示先进意识形成的内在和外驱动力、分析星星之火发展壮大因素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对这些书籍和刊物的研究，就目前发表的成果来看是十分丰富的，例如《〈五四〉一书的成书过程及其史料价值》，研究对象《五四》是第一本关于五四运动的史料集^②，《李大钊与五四时期公共舆论空间的构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为中心的考察》^③《以思想之新求中国之新——五四新潮中的〈新中国〉杂志》^④对于五四时期杂志刊物的研究等。查看各类研究成果，并未见有关于《五四在北大》的研究成果被报道出来。

《五四在北大》出版时间为1947年，时值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北京大学校园庆典，这一庆典活动被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抗暴运动”为中心的“新五四运动”的一部分，向全国人民传递着“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爱国民主运动并未消沉下去，‘新五四运动’呼声再次响起”^⑤的信号。该书扉页刊登了北京大学五四纪念活动的照片和校景照片，还在书中摘录了关于五四的北大壁报，撰写了名人名家人物志，并翔实记录了纪念活动中的各晚会实况和教员讲词，是研究北大校史尤其是五四纪念史的重要文献。本文研究重点一方面针对该书编辑发行者——北大壁报联合会和风雨社的背景资料进行汇总探究，另一方面针对《五四在北大》的内容以及版本开展深入研究，从而以本书为媒介，窥见当时进步社团的宣传理念以及北大教授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态度和观点。

二、北大壁报联合会和风雨社

《五四在北大》封面印有“北大壁报联合会委托风雨社编辑兼发行”（图一）。壁报是写在或贴在墙上向民众宣传的媒介形式，抗日战争时期，民众教育宣传和大学校园中普遍采取壁报的形式，“向民众宣传敌人的暴行，动员民众参加各项抗战工作，供应抗战的需求”^⑥。北大壁报有着光荣的历史，不但在校内鼓吹引导了民主运动，而且可以向校外的读者传递各类先进思想和意识形态，在北大各大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北大壁报联合会则是在1944年由北大校内几大壁报联合成立的，此亦是北大壁报从沉闷转为活跃，进而迈向黄金时期的重要事件之一。



图一《五四在北大》封面

（一）北大壁报联合会

查询《北京大学史料》，“北大壁报联合会”是于1944年9月由“壁报协会”改组而成的^⑦，而“壁报协会”则是1944年5月10日在学生壁报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时成立的，当时推选《生活》《耕耘》《文艺》三壁报为协会常委^⑧。此次联席会议可以说是壁报联合会的第一次大的争论，主要是关于孔祥熙“赠送”同学三十万元的处置问题，其间各壁报都主张“集中”使用，并且出了第一个联合版来反映彼此不完全相同的意见，参加的有七个壁报，由此成立了“报联”，这是联大民主运动发展历史中的一件大事^⑨。以1944年5月为时间节点，纪念五四的各项活动从出版壁报、举办时事晚会和文艺晚会等开始丰富，这也标志着自皖南事变后政治空气沉寂的西南联大校园重趋活跃。关于《生活》《耕耘》《文艺》三壁报的相关信息见表一。

这里需要进一步提及的是，《生活》壁报的创刊时间未有权威记录，目前查看各类研究成果，述及《生活》壁报的有四项：1.《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左翼校园文化的形成（1945—1949）》记述“《生活》壁报活动时间为1947年9月至1948年夏”^⑩；2.《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研究》记述“1944年5月10日，壁报协会成立。秋季，外文系1946级级会成立，并出版壁报《生活》”^⑪；3.《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共同体研究》中仅述及社团（外文系二年级级会）、负责人（李明）、导师（吴宓），未述及《生活》壁报的创刊时间^⑫；4.《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1937—1946）》中记述“1943年考入外国语文系的同学，到二年级时，在李明同学的倡导下，程法伋等同学讨论并决定出版《生活》壁报”^⑬。

综合分析《生活》壁报创办社团应为外文系年级会，而有关《生活》壁报创刊时间的记述存在出入的原因或是受创办年级会不同的影响。以《北京大学史料》官方记录为基础，显然1和2两篇文献中所记述的《生活》壁报并非1944年5月作为“壁报协会”常委的《生活》壁报。另从导师线索查询《吴宓日记》1941—1945年的全部日记信息，亦无对创刊时间的记述。故表中《生活》壁报的创刊时间综合1943年考入外国语文系的二年级时间和壁报协会成立时间，记为1944年1月至1944年5月更为严谨。此外，关于负责人，文献3仅将李明列为负责人，而根据文献4，笔者认为最后讨论和决定出版者程法伋对于《生活》壁报的出版亦具有重要作用，故将李明和程法伋均作为主要负责人列于表中。

表一 《生活》《耕耘》《文艺》壁报信息表

名称	社团	创刊时间	主要负责人	导师
《生活》	外文系二年级级会	1944年1月至1944年5月	李明、程法伋	吴宓 ^⑭
《耕耘》	耕耘社	1943年秋	邹承鲁、袁可嘉	
《文艺》 ^⑮	文艺社	1943年10月1日	张源潜、程法伋	李广田 ^⑯

（二）风雨社

学生社团作为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学生的重要纽带，在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对学生的政治教育和实行政治领导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考验进步分子，培养和发展党员的最好组织形式^⑰。

风雨社为1946年11月北大复员时所成立，取义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有史可查活动时间为1946年秋至1948年夏，自成立之初便作为进步社团发挥作用，例如1946年12月27日，在史学会的召集下，与其他学生社团参与组织了北大抗议美军暴行筹委会的成立活动，并积极开展罢课、游行示威活动^⑱。

以下是查看《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中所记关于“风雨社”^⑲的内容：

三十五年的十一月，北大刚刚复员；那时候，我们是生活在寒冷，混乱，阴沉，窘迫……里面。大家也许还记得当时流行的“古怪歌”吧——“……只许他们汪汪叫啊，不许人啊出嘴来讲话。……”。这歌声实泄出我们的郁闷和愤慨。然而，这些时是短暂的。我们——正如众多的同学们一样——不甘忍受这无□的沉重的寂寞。于是，我

们成立了风雨社。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这是我们社名的取义，也是我们底社的用意。我们要在风雨如晦的今日，以我们的喉咙加入这不己的鸡鸣中——让报晓的声音更响亮更有力，让沉睡的人醒过来，让休息过的重新振作：继续努力！

因此，我们从来不吝惜我们底笔：我们出壁报。我们对丑恶绝不恁情的口朱笔伐！

但不仅仅是用我们底笔的。只要需要，我们便贡献全部心力和体力，我们提浆糊桶，我们跑腿，我们张贴……

在每一次工作中，我们固然得到进步，但愈过每一次工作的考验，我们愈感到空虚，于是，我们喊出“加紧学习”。

我们要读书，除了读课本，我们还读别的，那怕被官方认为是“邪说”的。

这暑假，我们的社友增多了。我们底新伙伴带着满身精力走进来。比以前，我们玩得更热烈，我们笑得更嘹亮。但我们工作和学习得更认真。我们的读书会，有哲学和经济两组。我们经常座谈、经常讨论。要是有空，我们便彼此“串门”，倾谈心曲，我们发现：每个人都坦白热情，每个人都有过和有着苦痛的磨炼。而因此，我们的手握得更紧了！我们原是“风雨同舟”的。向前划吧，向前划吧！

我们曾出过一本“五四在北大”。简单地记下三十六年北大同学举办的光辉的“五四周”。这里，我们祝福有五四传统的不懈不急的北大人。愿我们再创造，再发扬新的五四吧！

风雨社成立背景是抗战胜利后，1946年北京大学刚复员迁回北平原校址，当时国民党政府对统治区实行白色恐怖，中国社会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言论可谓极度不自由。通过对这一史料的解读，风雨社成立的目的是要宣泄对于政府压迫的愤慨，目标是在这“风雨”的社会背景下，以“鸡鸣”的嘹亮，直抒自由理念，从而唤醒沉睡的大众。实现途径是“读书学习”“交流讨论”，风雨社的读书会分为哲学组和经济组，并不单纯固定某一学习方向，而是兼收并蓄频繁交流学习，字里行间将当时北大学子的学习热情和开放学风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与蔡元培先生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是密不可分的。这些话语，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社会动荡、百姓受到极端压迫的时代背景下，学生团体对于社会责任的勇于担当，以及对于“社会丑恶”斗争反抗的坚定理想信念。

三、《五四在北大》内容介绍

《五四在北大》一书由北大壁报联合会委托风雨社编辑并发行，整书内容分为“扉页”“目录页”“蔡子民先生赞”“我们的呼号”“五四在北大”“壁报文摘”“凯旋”“检讨‘五四周’”“编后”，共计九个部分。其中“五四在北大”部分，包括“科学晚会”“附录：袁翰青先生讲辞”“文艺晚会”“历史晚会”“附录：许德珩先生讲辞 樊弘先生讲辞”“经济晚会”“史料展览和返校节”“为五四而歌”“血泪的控诉”“营火记”。“壁报文摘”部分，包括“从‘五四’谈到学生运动的方向”“杂谈科学”“写给师长们的一封信”“去年的五四圣地”“人物志：李大钊 傅斯年 朱家骅 段锡朋”。

（一）扉页

扉页印有“鲁迅先生墨迹”以及五张照片分别是“壁报联合会的巨型壁报”“史料展览门前”“参观史料展览者”“五四前夕之历史晚会”“北星体育会主办体育表演”。“鲁迅先生墨迹”为1921年1月3日鲁迅因周作人生病代笔回复胡适进行表态，所涉及问题始于对《新青年》第八卷“色彩过于鲜明”的不同看法，北京同人欲再议编辑问题^②。信件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妥当。至于发表新

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树 一月三日

（二）目录页

目录页上端印有《蔡子民先生赞》，表达了北大壁报联合会和风雨社对于蔡元培先生这位“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赞美和怀念，全文如下：

他是自由主义的保姆。

当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成了“珍宝”，成了独裁政权的点缀品；当今天的“自由主义”几乎成了学术史上的名词，成了无从兑现的支票；我们怀念他，我们永远永远忘不了他——他这中国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他就是自由的化身，民主的象征，我们永远朝向他前进。他就是我们的希望，他就是我们的信心。他的名字，在黑暗的现在，光耀璀璨。就是在光明的未来，也永恒地发亮。

（三）我们的呼号

“我们的呼号”是由各壁报社发起的号召，内容有对五四运动28年后国家的政治、民主、民生等状况是否改善的拷问，有对青年们继承五四精神为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战斗的号召，落款为：“北大、清华、燕京、中法、师院五十余壁报社。”

（四）五四在北大

“五四在北大”的晚会实录以及各知名教员、校友的现场讲词，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科学晚会”中所记郑华炽、杨钟健等演讲者5名，以及袁翰青先生讲词的全文记录；“文艺晚会”中所记朱自清、冯至等演讲者4名；“历史晚会”中所记胡适、许德珩、周炳琳等5名演讲者，以及许德珩先生和樊弘先生讲词的全文记录；“经济晚会”所记赵乃搏、秦瓚、陈振汉等5名演讲者。朱自清先生和周炳琳先生的演讲内容概述如下。

朱自清先生演讲的题目是《五四时代的文艺》，共讲了三点内容，分别为“新文体到白话文”“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礼教与孩子”。在“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中，提到陈独秀先生，“陈主张的三大主义总起来就是‘人民语言’的文学，没有他的激进，文学改革不会很快就流行”。在“礼教与孩子”中，评价鲁迅先生：“然而他的创作为新文学可以存在提出了‘证据’。鲁迅发现了礼教是吃人的工具，是强凌弱时的护符……鲁迅喊出了‘救孩子’……救孩子的办法，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

周炳琳先生的演讲提到“从五四到现在整个是‘中年人利用青年人’……以为历史总是循环的，总是‘以暴易暴’的，革命也无非‘一将成名万骨枯’”。批评闻一多先生“近乎煽动仇恨”。

通过朱自清和周炳琳两位先生的演讲，可以侧面了解当时北大教员中对于五四运动、自由民主思想的两种鲜明态度，一种如朱自清、陈独秀、鲁迅等认为改革是必须的，唯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另一种如周炳琳认为五四运动不过是别有用心者利用青年人来成就自身，并且批评闻一多先生故意煽动仇恨。这些思想碰撞的讲词于今日读起来，依旧能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对于我们研究北大校史，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

“五四在北大”这部分不仅有对教员的外貌特点、性格、谈吐等特征的写实，还有风雨社对各类教员讲词的评价，例如对朱自清、陈振汉先生言论的赞扬，对于周炳琳先生言论的抨击，字里行间的态度和立场是极为鲜明的。

关于朱自清先生的评价：

朱先生的语调永远是平平淡淡，然而字字结实，经过了深思，值得人去领会。

关于陈振汉先生的评价：

陈先生的话，像似一阵柔和的春风，吹来了满院的春意，也最力地吹去了院中残余的败叶残渣。

关于周炳琳先生的评价：

对于周先生的不健康的悲观思想，若是原因在他身体的不健康，我们希望他好好修养；若是并不是如此，我们希望他多与年轻人接近，多多读书——关于现实的书和文艺书籍，从这里得到一个“人类必会进步”的信念，这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不可或缺的信念。他对闻一多先生的批评，出发点就错误了，那句话也真是青年人受不了的。

这一部分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分别记录了“五四史料试展”展览、五四朗诵歌唱会，以及两个晚会（分别为戏剧晚会和营火晚会）。戏剧晚会的记录以《血泪的控诉》为题，介绍了晚会当天四个独幕剧《开锣前后》《饥饿线上》《一个女人和一条狗》《凯旋》的内容。另外还介绍了《一个女人和一条狗》和《凯旋》两幕剧遭到禁演后，北大全校面对禁演所做抗议和《凯旋》隐蔽复演的经过。营火晚会则是以《营火记》为题目，实况记录营火晚会节目，包括点火、拔河等晚会场景。

（五）壁报文摘

“壁报文摘”，这部分收录了《从五四谈到学生运动的方向》《杂谈科学》《写给师长们的一封信》《去年的五四圣地》四篇文章，以及李大钊、傅斯年、朱家骅、段锡朋四位先生的人物志。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按照目录，《杂谈科学》一文应位于《从五四谈到学生运动的方向》和《写给师长们的一封信》之间，但是后面实际的文章排序是将《杂谈科学》置于人物志之后，且文章全名为《纪念五四杂谈科学》。

（六）凯旋

“凯旋”，按照目录顺序应在“壁报文摘”部分之后，但实际查看整书结构，发现“凯旋”这一部分安排在了“编后”之后，作为全书最后一部分，更像附录的形式。而在“编后”之前安排了《关于“凯旋”》一文介绍了《凯旋》这幕剧排演社会背景和阻力。这样排版或是因为《凯旋》剧本文字篇幅较大，达到18页，将其挑出置于全书最后可使全书内容衔接更为紧凑，结构上更为合理，增加可读性，亦可使《凯旋》这一遭到反动派停演的剧本更为突出。

（七）检讨“五四周”

“检讨‘五四周’”由风雨社撰写，是对“五四纪念周”的总体评价。其中提到纪念周值得肯定的是：1. “没有个人的英雄，只有群众的英雄”。2. 《未婚夫妻》和《凯旋》两幕剧虽遇“恐吓”而停演，但剧艺社立即赶排《未婚夫妻》，筹备会重演《凯旋》，表明“只要团结，任何恐吓和暴力都压我们不倒！”；有待改进的是“营火会中的节目似乎可以弄得更富教育性和现实性”；批判的是陈雪屏“不打自招”的表述。

（八）编后

“编后”提到《凯旋》这一反内战剧本，在北大演出遭阻挠，在南开演出时中途被破坏，可谓命途多舛。这一描述仅只言片语便描绘出当时蒋介石政府对于反内战言论的舆论封锁，也充分向读者展现了北大壁报联合会和风雨社不畏强权，弘扬五四精神，开展“反内战”宣传的勇气和胆量。

四、《五四在北大》版本比较

（一）存藏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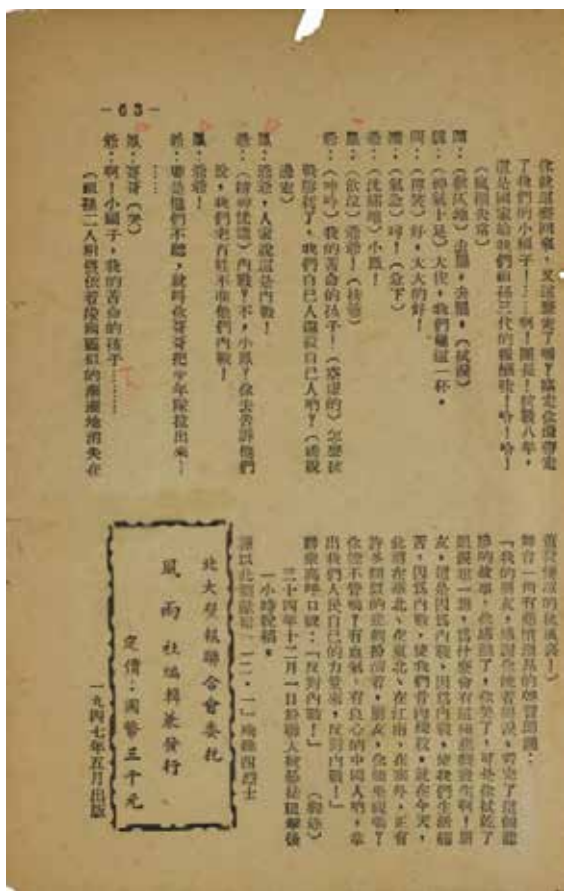
对各存藏机构访查，存有《五四在北大》一书的机构有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对比各机构存藏情况，从藏书量来说，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量最多；从版本来说，发现此书存在两个版本，以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所藏版本最为全面，故按照中心藏版本划定为209版和393版，具体藏量和版本情况见表二。

表二 机构藏量和版本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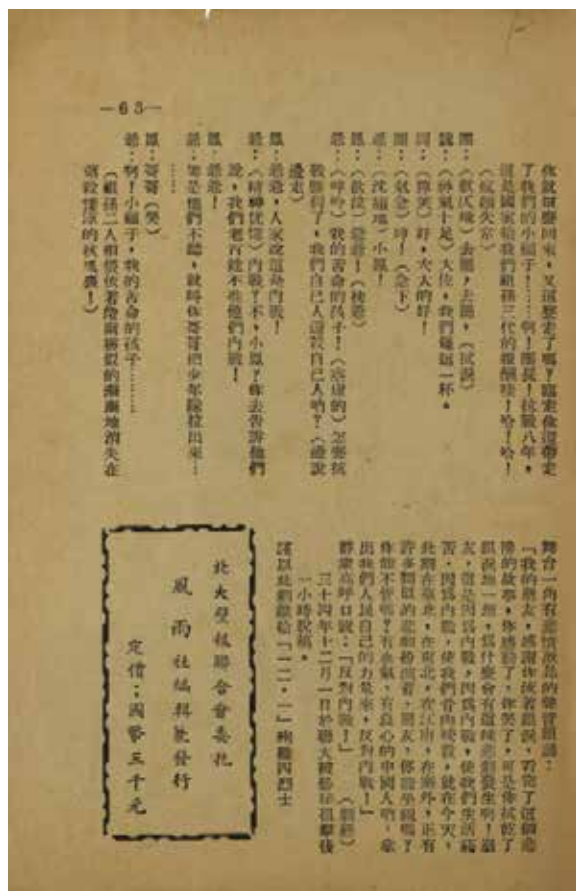
序号	机构名称	索书号	存藏情况	版本
1	国家图书馆	MGTS/204108	存有 1 册（纸版无法提供，仅可看缩微版本）	209 版
2	上海图书馆	221829	存有 1 册	393 版
3	北京大学图书馆	336.67/1441	存有 9 册（大钊阅览室 4 册；名家阅览室 2 册；历史分馆阅览室 2 册；库本阅览室 1 册）	393 版
4	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	三级民 209、三级民 393、特 1273	存有 3 册	209 版、393 版

(二) 版本比较

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藏《五四在北大》有三册，索书号分别为三级民 209、三级民 393 和特 1273。查看三册的出版信息页（第 63 页），三级民 209 印有“一九四七年五月出版”（图二），另一版为三级民 393 和特 1273 未印此信息（图三），后文为方便论述称之为 209 版和 393 版。



图二 三级民 209 出版信息页



图三 三级民 393 和特 1273 出版信息页

除出版信息不同外，两个版本在内容和排版上亦存在诸多不同，现将差异之处以示例的形式列于表三、表四和表五。

表三 排版印刷差异处

序号	页码	位置	差异	正误情况	
				209 版	393 版
1	15	下半页第二十四行	“欺侮天下无人。”中的“下”字，209 版印刷歪斜	错误	正确
2	16	上半页第二十四行	“(鼓掌)”，209 版括号为全角，393 版为半角	正确	错误
3	20	上半页第十五行至第十六行	209 版“经济关键”中“键”字顺时针旋转 90 度印刷	错误	正确
4	21	下半页第十六行	“来，从这些东西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那时工作”，209 版字未与其他行对齐	错误	正确
5	28	下半页第十六行	209 版和 393 版排版不同	—	—

(注：此处指仅因排版和印刷原因引起的不同，由于内容不同而引起的排版不同不算在内)

表四 内容差异处

序号	页码	位置	差异	正误情况	
				209 版	393 版
1	15	下半页第十九行	393 版“中国的官僚最聪明，”，209 版“中 的官僚最聪明”，209 版缺少“国”字	错误	正确
2	15	下半页第二十二行	209 版“那里知道，这一批人初步来偷偷摸摸，都躲藏起来。”，393 版“那里知道，这一批人初进来偷偷摸摸，都躲藏起来。”	错误	正确
3	20	下半页第十七行	209 版“经济及财政措施亦如此，”，393 版“经济及财政措施亦如此，”	错误	正确
4	21	下半页第十三行至第十四行	209 版“刘半农，李大钊，刘清扬，邓颖超，周恩来，胡适等等，”，393 版“刘半农、李大钊、刘清扬、邓颖超、周恩来、胡适等等，”	错误	正确
5	21	下半页第十七行	209 版“北边一挂全挂的当时展开运动的各种告社”，393 版“北边一排全挂的当时展开运动的各种告社”	错误	正确

表五 其他差异

页码	位置	差异	正误情况	
			209 版	393 版
2	《我们的呼号》文末	393 版存在三个“%”字符，而 209 版不存在	正确	错误

综合分析 209 版和 393 版的差异之处，209 版错误 26 处；393 版错误 23 处；仅排版印刷有区别但不区分正误处 5 处。根据审校、排版、印刷顺序，错误较多的版本通常为前期版本，故可以猜测 209 版先于 393 版发布。另外，209 版本印有“一九四七年五月出版”，393 版未印，或许是由于 209 版印刷出版时间确定，而 393 版是为进一步宣传而增印版，印刷时间靠后，故未刊印出版印刷时间。此外在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藏 209 版中，存在藏书签名“B.n.c. 1947.6.2”，证明 209 版的确应在 1947 年 5 月出版发行。综合北京大学五四纪念活动时间以及审校排版和印刷时间，可以推断 209 版早于 393 版。

五、社会意义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五四青年节向全国广大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当前，我国社会已步入新时代，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我们在回望历史、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应深刻

认识到“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需加强对五四运动的深入研究，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五四在北大》一书成书于1947年5月，时值北京大学庆祝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校园庆典，彼时为北京大学复员后的校园活动第一次盛大庆典，书中翔实记录的科学晚会、文艺晚会、历史晚会、经济晚会中知名教员讲词，各类“五四”纪念学生活动，北大壁报精选文章，《凯旋》剧本等内容。通过对教员讲词的解读，读者能够对当时教职人员的思想以及对于学运的态度和观点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通过对刊载各类文章的研究，读者能够切实感受到那个时代青年学子对于民主的渴望，对于当时政府、军阀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痛斥，对于团结反抗反动势力最终夺取胜利的勇气和信心。因此，《五四在北大》这一文献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学生运动背景和进步思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五四在北大》字里行间透露着那一辈北大教员和青年们在国家积贫积弱、外有强敌内有纷争的祖国危亡之际，对于个人命运、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上下求索与思考觉醒。这些晚会和教员精彩讲词的实录以及风雨社态度鲜明的评价，使历史背景和人物形象不再是课本上一件件事件的叙述，而是更为生动鲜活地跃然于纸面之上。《五四在北大》史料的深入解读，使我们对“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有更为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重温五四相关史料，传承五四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

-
- ① 五四周年纪念专辑编委会：《五四周年纪念专辑》，新华书店，1949年，第4—5页。
 - ② 邓绍根、杨雅芸：《〈五四〉一书的成书过程及其史料价值》，《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第6期。
 - ③ 张静：《李大钊与五四时期公共舆论空间的构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为中心的考察》，《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 ④ 杨宏雨、贺晓航：《以思想之新求中国之新——五四新潮中的〈新中国〉杂志》，《理论学刊》2024年第2期。
 - ⑤ 欧阳军喜：《“五四”的变奏：1946—1947年的“新五四运动”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3期。
 - ⑥ 明飞龙：《西南联大“公共空间”的开创——西南联大壁报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2期。
 - ⑦⑧⑨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1937—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51、549、498页。
 - ⑩ 李兆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左翼校园文化的形成（1945—1949）》，《南开史学》2020年第1期。
 - ⑪⑬ 李浩泉：《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46、48页。
 - ⑫ 储德天：《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共同体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22页。
 - ⑭⑮ 闻黎明：《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1937—1946）》（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797、796页。
 - ⑯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3页。
 - ⑰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9页。
 - ⑱ 白雪：《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国统区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41页。
 - ⑲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39页。
 - ⑳ 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

北京市海淀区祁家村辽金时期遗存考古发掘简报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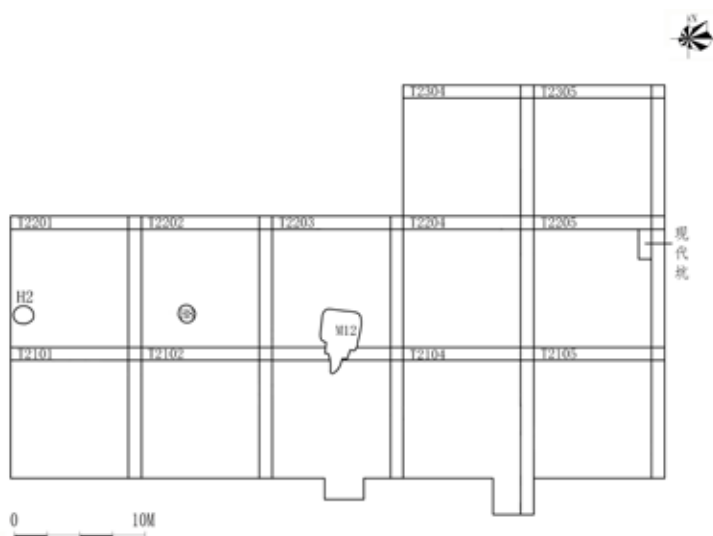
海淀区香山一期安置房项目（A、C-2、D 地块）位于海淀区四季青镇祁家村，具体范围为杏石口路以北、瑞府路东侧，其东南距北京市中心约 15.7 千米，东距海淀区政府约 6.3 千米（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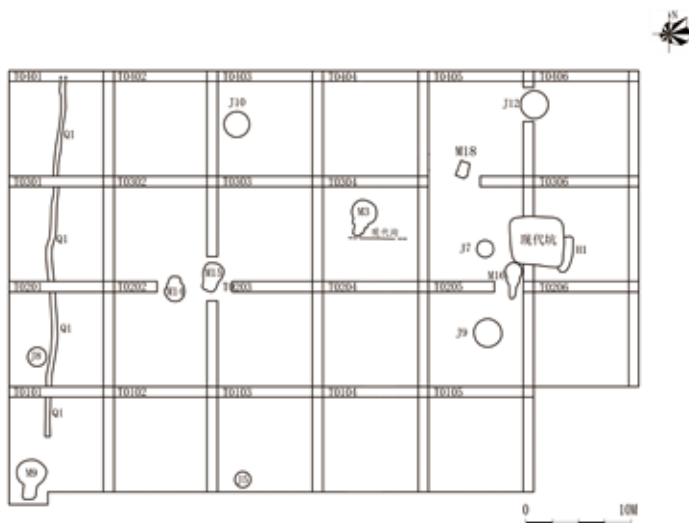
图一 发掘区位置示意图

为配合该项目建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时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11 日、2019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29 日分两次对 A 地块和 C-2、D 地块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辽金遗存包括墓葬 9 座、灰坑 3 处、井 6 口、窑址 1 座、房基 1 处（图二—图四）。墓葬中除 M1、M2、M4 位于 A 地块外，其余 6 座（M9、M14、M15、M16、M18、M20）均位于 C-2、D 地块南部发掘区。A 地块的 3 座墓葬分布较为集中，且墓葬形制、朝向基本一致。而 C-2、D 地块南部发掘区中的 6 座墓葬分布较为分散，墓葬形制和朝向较为多样。三座灰坑均分布在 C-2、D 地块中，其中 H2、H8 位于北部发掘区，H4 位于南部发掘区。6 口辽金时期的水井全部位于 C-2、D 地块南部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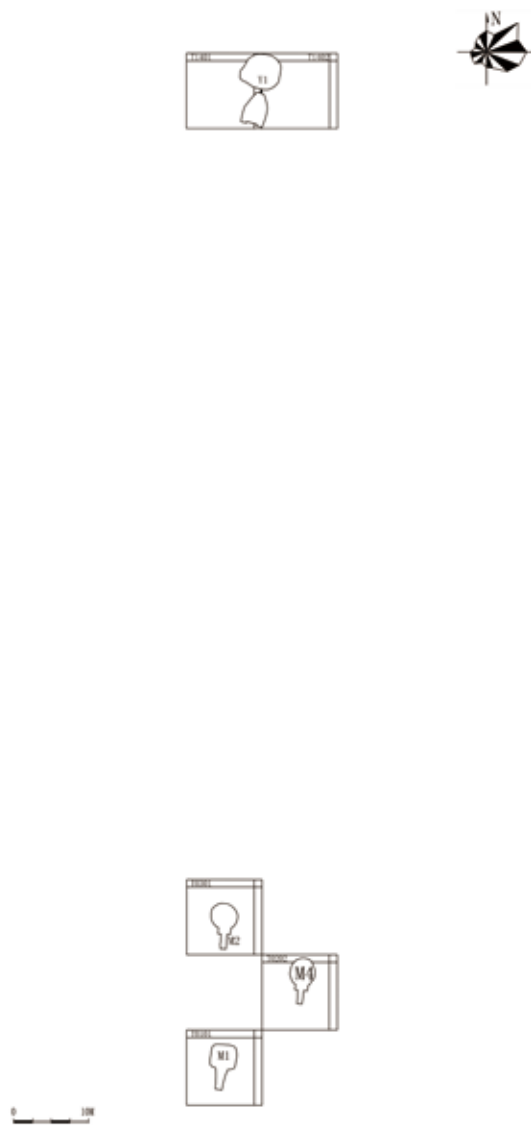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图二 C-2、D 地块北部辽金遗存分布图



图三 C-2、D 地块南部辽金遗存分布图



图四 A 地块辽金遗存分布图

掘区，填土为黄褐色沙土，夹鹅卵石，未出土器物。窑址 Y1 位于 A 地块，形制保存较好，出土有陶盆器底残片一件。房基 Q1 位于南部发掘区，基槽内发现 3 个方形柱洞，前后均有水井分布。

一、墓葬

按照整体形状和墓室构造大体分为三种形制：一种是“甲”字形土坑竖穴砖室墓，共 6 座，包括 M1、M2、M4、M9、M15 和 M16；一种是“甲”字形土坑竖穴墓，共 2 座，分别是 M14 和 M20；一种为梯形土坑竖穴砖室墓，仅一座，为 M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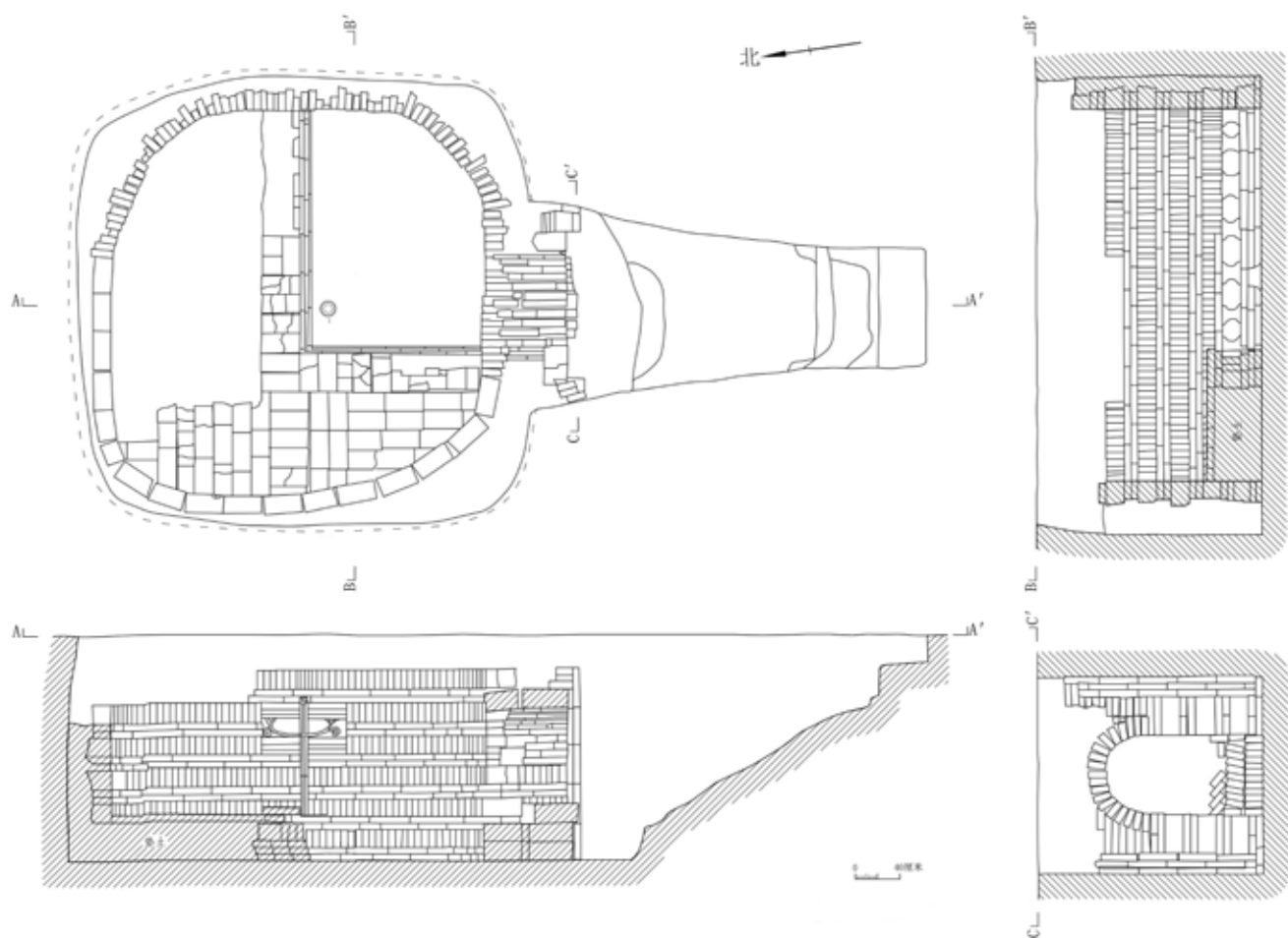
（一）“甲”字形土坑竖穴砖室墓

择取 M1、M9、M15 3 座墓葬进行介绍。

1.M1

该墓位于 A 地块 T0101 中部，方向为 186° ，“甲”字形土坑竖穴砖室墓，自南而北依次由墓道、墓门及墓室组成。开口于现地表①层下，向下打破生土，墓口距现地表 0.8 米，墓底距墓口 2.06 米（图五）。

墓道位于墓室南侧，平面呈梯形，北宽南窄，墓道开口长 3.12 米、北宽 1.76 米、南宽 1.06 米，墓底距墓口深 2.06 米，墓道上端、底端呈阶梯状，中部呈斜坡状。上端有台阶两层，第一层台阶距开口深 0.25 米，台阶高 0.3 米、宽 0.44



图五 M1 平面、剖面图

米；第二层台阶紧贴第一层，距开口深 0.55 米，高 0.1 米、宽 0.56 米；中部斜坡道紧挨第二层台阶，上端距开口深 0.66 米，坡长 3.6 米，坡度 30° ；最底部一层台阶紧挨斜坡道底端，距开口深 1.75 米，高 0.2 米、宽 1.06 米。内填灰褐色花土，土质较硬，包含砖块、碎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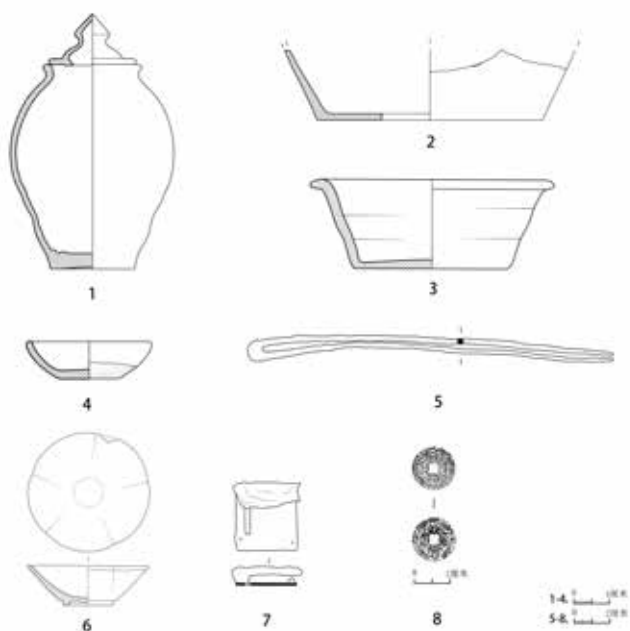
墓门位于墓道与墓室之间，墓门上部为券顶，破坏较严重，仅余三排砌筑砖券，墓门下部用砖封堵，封门砖呈“人”字形垒砌而成，残高 1.8 米、宽 1.8 米。

墓室位于墓道北侧，平面呈圆角方形，土圻南北宽 4.1 米、东西长 4.26 米，墓室长 3.5 米、宽 3.5 米、深 2.06 米。墓室券顶已被破坏无存，仅存周壁墙体，周壁用砖砌墙，采用两平一竖的方式垒砌，残存 14—17 层，残高 1.4—1.7 米，单砖规格为：长 0.36 米、宽 0.18 米、厚 0.06 米，均为素面。墓室内北部和西部有曲尺形棺床一座，长 2.8 米、宽 2.2 米，棺床表面为长条砖大面横竖平铺而成，北部基本已被破坏，床沿为上部一层长条砖平砌，底部为三层长条砖平砌，中间夹一排垒砌而成的壶门，棺床上未发现人骨及随葬品。东壁砖墙上有仿木结构一处，造型为一连枝灯，长直杆，中上部分叉向两侧分出灯盘，灯高 1.08 米，两侧叉出部分长 0.3 米。墓室内填黄褐色花土，土质较疏松，包含碎砖块。

出土器物 8 件。其中陶罐 1 件、黑釉瓷碗 1 件、铜钗 1 件、铜钱 1 枚、铜带銙 1 件、陶盆器底残片 1 件、陶盆 1 件、白瓷碗 1 件，均出自填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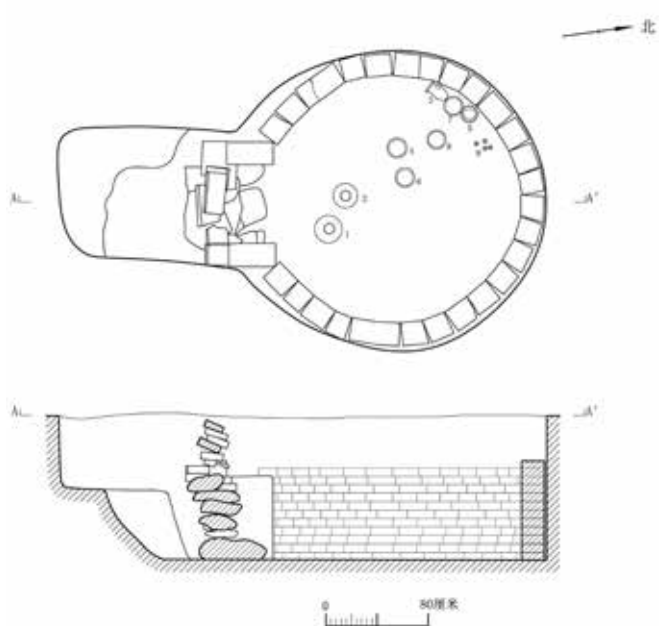
陶罐 1 件。M1 : 1，泥质灰陶。盖呈圆帽形，顶部凸起成纽，短捉手，盖沿上翘，盖口内敛，弧壁，素面。罐身侈口，折沿，圆唇，短束颈，溜肩，鼓腹，下腹斜弧收，平底，肩至下腹有数道凹槽。通高 26.6 厘米、口径 10.4 厘米、腹径 17.2 厘米、底径 8.8 厘米（图六，1；照片一）。

陶盆 1 件。M1 : 7，泥质橙黄陶，敞口，折沿下卷，圆唇，腹斜，平底，素面。通高 9.7 厘米、口径 26.6 厘米、底径 17 厘米（图六，3；照片二）。



图六 M1 出土器物

1. 陶罐 (M1 : 1) 2. 陶盆器底残片 (M1 : 6) 3. 陶盆 (M1 : 7) 4. 黑釉瓷碗 (M1 : 2) 5. 铜钗 (M1 : 3) 6. 白瓷碗 (M1 : 8) 7. 铜带跨 (M1 : 5) 8. 铜钱 (M1 : 4)



图七 M9 平面、剖面图

1、2. 瓷碗 3. 陶罐 4—7. 陶盆 8. 陶釜 9. 铜钱

黑釉瓷碗 1 件。M1 : 2, 芒口外敞, 圆唇, 斜弧腹, 平底内凹, 素面。灰胎, 内腹壁及内底满施黑釉, 外上腹及中腹施黑釉, 流釉至下腹。通高 3.4 厘米、口径 11.6 厘米、底径 5.6 厘米 (图六, 4; 照片三)。

白瓷碗 1 件。M1 : 8, 已修复。葵口外敞, 尖圆唇, 斜直腹, 圆足。白色瓷胎, 施青白釉。内壁对应葵口饰五条竖向弦纹。通高 4.4 厘米、口径 12.9 厘米、底径 5.6 厘米 (图六, 6)。

铜钗 1 件。M1 : 3, 略变形, 体分两股, 一端较尖锐, 细长、弯曲, 素面, 表面锈蚀。通长 20 厘米、通宽 1.15 厘米 (图六, 5)。

铜带跨 1 件。M1 : 5, 一侧呈方形, 保存较完整, 开方形孔, 内侧两处圆形凸起; 一侧锈蚀严重, 整体素面, 青绿色。残长 3.8 厘米、残宽 4.1 厘米、厚 1 厘米 (图六, 7; 照片四)。



照片一 陶罐 (M1 : 1)



照片二 陶盆 (M1 : 7)



照片三 黑釉瓷碗 (M1 : 2)



照片四 铜带跨 (M1 : 5)

陶盆器底残片 1 件。M1 : 6, 泥质灰陶, 下腹斜直, 平底, 素面。残高 8.8 厘米、底径 28 厘米 (图六, 2)。

铜钱 1 枚。M1 : 4, 圆形, 方穿, 外郭较宽, 内郭较窄; 正面有郭, 铸“乾□□□”四字, 字迹锈蚀不可辨认, 楷书。背面有郭, 穿左右铸满文“宝□”, 纪局名, 字迹锈蚀不可辨认。直径 2.5 厘米、穿径 0.6 厘米、外郭厚 0.08 厘米、内郭厚 0.06 厘米 (图六, 8)。

2.M9

位于 T0101 的西南部, 方向为 188°, “甲”字形土圻竖穴砖室墓, 自南而北依次由墓道、墓门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开口于①层下, 向下打破②层、③层和生土, 墓口距地表深 0.65 米 (图七)。

墓道位于最南侧, 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 墓道上端为一层阶梯, 距墓口深 0.58 米; 下端为斜坡状, 坡长 0.7 米,

坡度 43°。墓道口部长 1.38 米、宽 0.98—1.07 米，底部宽 0.7—1.07 米。

墓门位于墓道与墓室之间，保存较差，宽 0.62 米、残高 1.1 米，仅见墓门内下端用石块、上端用残砖进行封堵。墓门外两侧刷有一层白石灰。

墓室位于墓道的北侧，平面近圆形，直壁向下，土圻长径 2.4 米、短径 2.36 米、深 1.13 米，砖室内直径 1.94 米、残高 0.78 米。墓室券顶已被破坏无存，仅周壁残存部分用砖的痕迹。墓砖长 0.36 米、宽 0.18 米、厚 0.06 米，均为素面。墓内填土为黄褐色沙土，土质致密，包含较多残砖块。砖墙内侧用白石灰进行粉刷，墙面上见有红色壁画痕。仅余骨渣，葬具、葬式不明。

出土器物 12 件。其中瓷碗 2 件，位于墓室前部；陶罐 1 件，位于墓室西侧；陶盆 4 件，位于墓室西侧；陶釜 1 件，位于墓室西侧；铜钱 4 枚（元祐通宝 2 枚、天圣元宝 1 枚、天祐元宝 1 枚），位于墓室后部。

瓷碗 2 件。M9 : 1，敞口，尖唇，斜弧腹，平底，浅圈足，外上腹饰一圈凹弦纹。灰褐胎，外上腹、口沿至内底先施一层白色化妆土，再施青釉，釉面部分剥落。内底有七处近圆形支钉痕迹。通高 4 厘米、口径 19.6 厘米、底径 7.6 厘米（图八，1；照片五）。M9 : 2，敞口，圆唇，斜弧腹，平底微凸，浅圈足。灰褐胎，外上腹、口沿至内底施青釉，外上腹流釉至底。内底有三处柳叶状支钉痕迹。通高 3.6 厘米、口径 12 厘米、底径 4 厘米（图八，2）。

陶罐 1 件。M9 : 3，泥质灰陶，口沿缺失部分，敛口，圆唇，束颈，溜肩，口沿至肩部置一髹，微鼓腹，下腹缓弧收，平底。外施红褐色陶衣，部分剥落。通高 13.6 厘米、口径 8.4 厘米、底径 5.2 厘米（图八，8；照片六）。

陶盆 4 件。皆为泥质灰陶。M9 : 4，敛口，方唇，束颈，鼓腹，下腹斜弧收，平底，内口沿至内底施红褐色陶衣。通高 4 厘米、口径 15.2 厘米、底径 6.4 厘米（图八，3）。M9 : 6，敛口，圆唇，口部有一小流，上鼓腹，下腹斜弧收，平底微凹，浅假圈足，内上腹至内底数道旋痕。通高 4.8 厘米、口径 13.8 厘米、底径 5.2 厘米（图八，7；照片七）。M9 : 7，敞口，折沿下窄，方唇，鼓腹，下腹斜弧收，平底，浅假圈足，素面。通高 4 厘米、口径 14.4 厘米、底径 7.2 厘米（图八，5）。M9 : 8，敞口，折沿，圆唇，鼓腹，下腹斜收，平底，浅假圈足，素面。通高 4.6 厘米、口径 14 厘米、底径 6.8 厘米（图八，6）。

陶釜 1 件。M9 : 5，泥质灰陶，敛口，圆唇，上腹微鼓，中腹外置一周凸棱，下腹斜弧收，平底。外施红褐色陶衣，大部分剥落。通高 6.4 厘米、口径 9.2 厘米、腹径 13.2 厘米、底径 5.2 厘米（图八，4；照片八）。



照片五 瓷碗 (M9 : 1)



照片六 陶罐 (M9 : 3)



照片七 陶盆 (M9 : 6)



照片八 陶釜 (M9 : 5)

元祐通宝 2 枚。圆形，方穿。外郭较宽，内郭较窄；正面有郭，铸“元祐通宝”四字，篆书，旋读；背面有郭，光背。M9 : 9-1，直径 2.4 厘米、穿径 0.7 厘米、郭厚 0.08 厘米（图八，9）；M9 : 9-2，直径 2.5 厘米、穿径 0.7 厘米、郭厚 0.15 厘米（图八，10）。

天圣元宝 1 枚。M9 : 9-3，圆形，方穿。外郭较宽，内郭较窄；正面有郭，铸“天圣元宝”四字，楷书，旋读；背面有郭，光背。直径 2.5 厘米、穿径 0.65 厘米、郭厚 0.12 厘米（图八，11）。

景祐元宝 1 枚。M9 : 9-4，部分缺失，圆形，方穿。外郭较宽，内郭较窄；正面有郭，铸“景祐元宝”四字，楷书，旋读；背面有郭，光背。直径 2.5 厘米、穿径 0.7 厘米、郭厚 0.1 厘米（图八，12）。

3.M15

位于 T0202 的东北部、T0302 东南部和 T0303 西南部，方向为 195°，“甲”字形土圻竖穴砖室墓，自南而北依次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开口于①层下，向下打破②层、③层和生土，墓口距地表深 0.4 米（图九）。



照片九 陶鼎残片 (M15 : 3)

墓道位于墓室南侧，平面呈梯形，阶梯状，长0.8米、宽1.18—1.34米、底部宽0.8—1.1米。台阶共2层，错位层叠，从上至下，第一层台阶距开口深0.2米、长0.35米、宽1.18—1.24米、高0.12米；第二层台阶距开口深0.32米、长0.23米、宽1.24—1.29米、高0.18米。

墓室位于墓道的北侧，平面呈椭圆形，直壁向下，土圻南北长径1.9米、东西宽径1.86米、深0.5米。墓室西侧仅存一层平砌的砖墙。墓砖尺寸为长0.36米、宽0.18米、厚0.05米，均为素面。墓内填土为黄褐色土，土质较致密。人骨朽尽无存，葬式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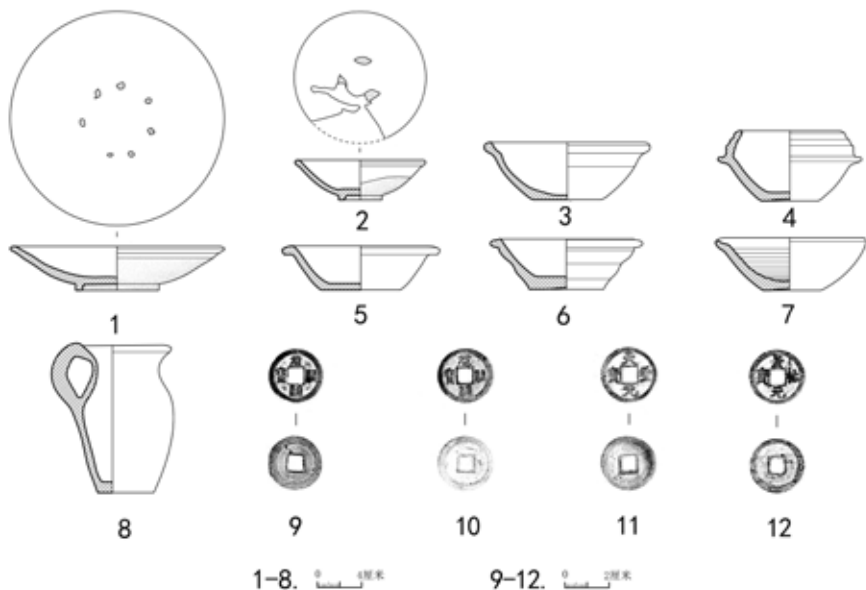
出土器物6件。其中铜钱2枚（至道元宝1枚、开元通宝1枚）位于墓室后部，陶钵3件、陶鼎1件，均位于墓室前部。

残陶钵3件。皆为泥质灰陶。M15 : 2，敞口，折沿，圆唇，上腹壁斜直，下腹斜弧收，平底微凹，整器外壁有修坯痕迹。残，通高4.8厘米、口径16.8厘米、底径8.8厘米（图一〇，1）。M15 : 4，敞口，折沿，圆唇，上腹壁斜直，下腹斜弧收，平底，素面。残，通高5.6厘米、口径18.4厘米、底径8.8厘米（图一〇，4）。M15 : 5，敞口，圆唇，斜弧腹，平底，浅假圈足。外施红褐色陶衣，部分剥落，整器有修坯痕迹。残，通高7厘米、口径15.6厘米、底径7.2厘米（图一〇，5）。

陶鼎残片1件。M15 : 3，泥质灰陶，上腹及以上缺失，中腹微鼓，下腹弧收，平底，蹄足，外施红褐色陶衣。残高12厘米、腹径14厘米（图一〇，2；照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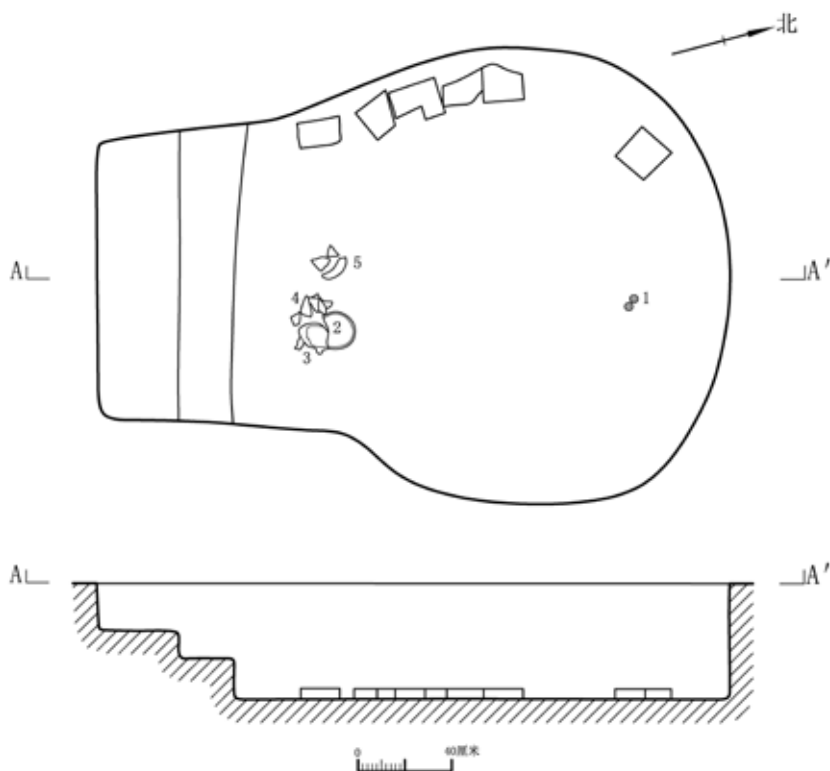
至道元宝1枚。M15 : 1-1，小部分缺失，圆形，方穿。外郭较宽，内郭较窄；正面有郭，铸“至道元宝”四字，草书，旋读；背面有郭，光背。直径2.5厘米、穿径0.55厘米、郭厚0.08厘米（图一〇，3）。

开元通宝1枚。M15 : 1-2，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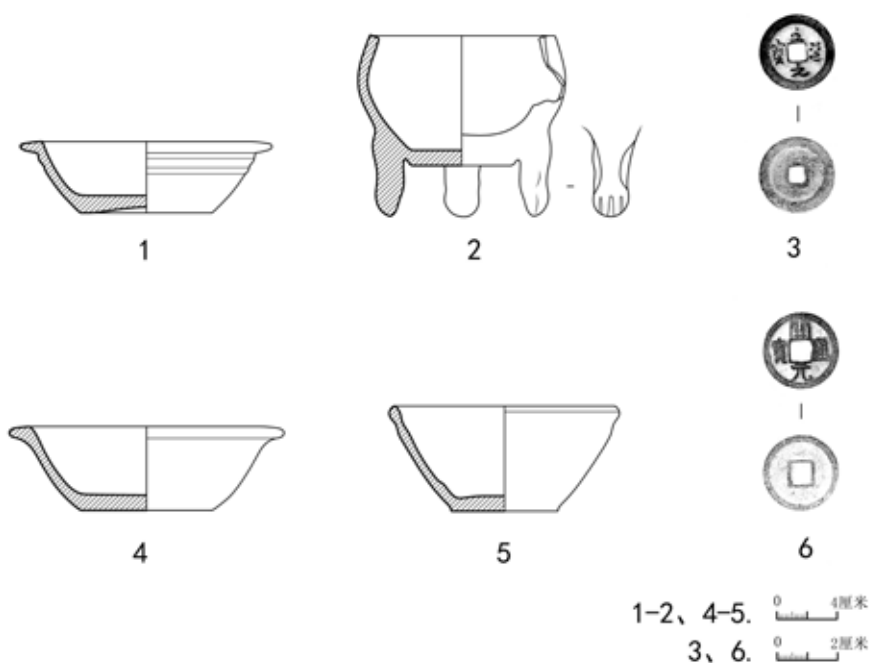
图八 M9 出土器物

1、2. 瓷碗 (M9 : 1、M9 : 2) 3、5-7. 陶盆 (M9 : 4、M9 : 7、M9 : 8、M9 : 6) 4. 陶釜 (M9 : 5) 8. 陶罐 (M9 : 3) 9、10. 元祐通宝 (M9 : 9-1、M9 : 9-2) 11. 天圣元宝 (M9 : 9-3) 12. 景祐元宝 (M9 : 9-4)



图九 M15 平面、剖面图

1. 铜钱 2. 陶钵 3. 陶鼎 4. 陶钵 5. 陶钵



图一〇 M15 出土器物

1、4、5. 残陶钵 (M15 : 2、M15 : 4、M15 : 5) 2. 陶鼎残片 (M15 : 3) 3. 至道元宝 (M15 : 1-1) 6. 开元通宝 (M15 : 1-2)

类椭圆形，直壁向下，长 3.07 米、宽 2.25 米、深 0.55 米。墓内填黄褐色土，土质较致密，夹少量石块。人骨扰乱较为严重，葬式不明。

出土器物 9 件。其中陶碗 1 件、陶釜斗残片 1 件、陶盂 2 件、陶三足盆 1 件、陶罐 1 件（带盖），均位于墓室后部；陶器盖 1 件、陶罐 1 件，位于墓室右侧；陶环残片 1 件，位于墓室前部。

陶碗 1 件。M14 : 1，泥质灰陶，敛口，圆唇，斜弧腹，平底，浅假圈足，内中腹至内底有刻划凹槽。通高 4.2 厘米、口径 11.6 厘米、底径 4.8 厘米（图一二，1；照片一〇）。

陶盂 2 件。皆泥质灰陶。M14 : 3，敞口，折沿下斡，方唇，腹斜收，平底，腹壁有修坏痕迹。通高 5.6 厘米、口径 6.8 厘米、底径 8.4 厘米（图一二，3；照片一一）。M14 : 4，残，口沿及腹部部分缺失。敞口，折沿，圆唇，上腹壁内凹，中腹折弧收，下腹缓弧收，平底微凹，浅假圈足，外施红褐色陶衣，部分剥落，假圈足底部有旋痕。通高 6 厘米、口径 16.8 厘米、底径 8.8 厘米（图一二，4）。

陶罐 2 件。皆为泥质灰陶。M14 : 6，盖圆帽形，顶部凸起成纽，短捉手，盖沿上翘，盖口内敛，弧壁；罐侈口，翻折沿，圆唇，微鼓腹，

形，方穿。外郭较宽，内郭较窄；正面有郭，铸“开元通宝”四字，楷书，对读；背面有郭，光背。直径 2.5 厘米、穿径 0.75 厘米、郭厚 0.1 厘米（图一〇，6）。

（二）“甲”字形土圪竖穴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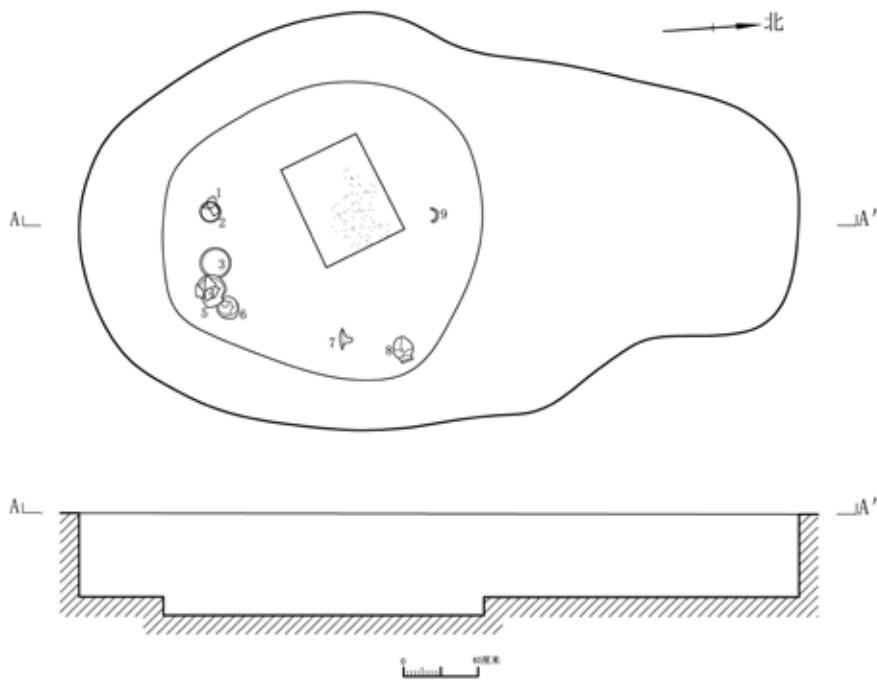
下面择取 M14、M20 进行介绍。

1. M14

位于 T0202 北部、T0302 南部，方向为 5°，椭圆形土圪竖穴墓，自北向南依次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开口于①层下，向下打破②层、③层和生土，墓口距地表深 0.6 米（图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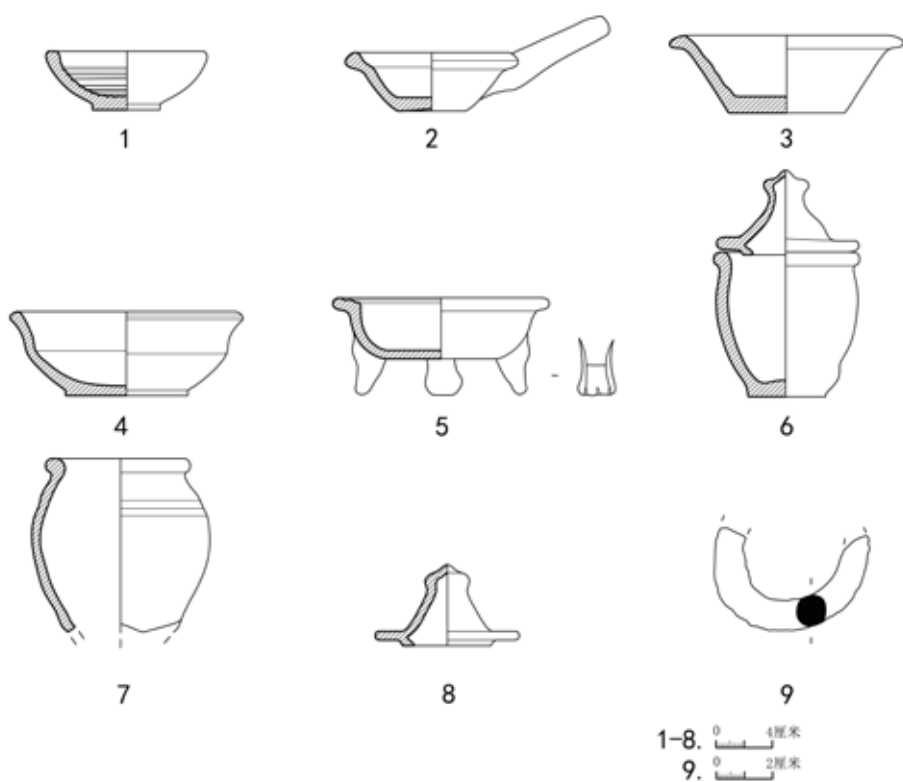
墓道位于墓室北侧，平面呈椭圆形，长 0.78 米、宽 0.76 米。

墓室位于墓道的南侧，平面呈



图一一 M14 平面、剖面图

1. 陶碗 2. 陶釜斗残片 3. 陶盂 4. 陶盂 5. 陶鼎 6. 陶罐（带盖） 7. 陶器盖 8. 陶罐 9. 陶环



图一二 M14 出土器物

1. 陶碗 (M14 : 1) 2. 陶釜斗残片 (M14 : 2) 3-4. 陶盂 (M14 : 3、M14 : 4) 5. 陶三足盆 (M14 : 5) 6-7. 陶罐 (M14 : 6、M14 : 8) 8. 器盖 (M14 : 7) 9. 陶环残片 (M14 : 9)

陶碗 1 件。M14 : 1，泥质灰陶，敛口，折沿上仰，圆唇，斜弧腹，平底微凹，四棱柱状柄，外施褐色陶衣。通高 6.8 厘米、口径 12.4 厘米、底径 4.8 厘米（图一二，2；照片一二）。

陶三足盆 1 件。M14 : 5，泥质灰陶，烧造略变形，口部略呈三角形，敞口，折沿，圆唇，上腹壁近直，中腹微鼓，下腹弧收，平底，三蹄足，沿面饰两道凹弦纹。通高 7 厘米、口径 15.6 厘米、底高 2.6 厘米（图一二，5；照片一三）。

陶器盖 1 件。M14 : 7，泥质灰陶，圆帽形，顶部凸起成纽，短捉手，盖沿上翘，盖口内敛，弧壁，外施白陶衣，残留部分红色彩绘。通高 5.8 厘米、口径 6.4 厘米（图一二，8）。

陶环残片 1 件。M14 : 9，残存 1/2，泥质灰陶。圆环状，横截面略呈圆形。长 5.6 厘米（图一二，9；照片一四）。



照片一〇 陶碗 (M14 : 1)



照片一一 陶盂 (M14 : 3)



照片一二 陶罐 (M14 :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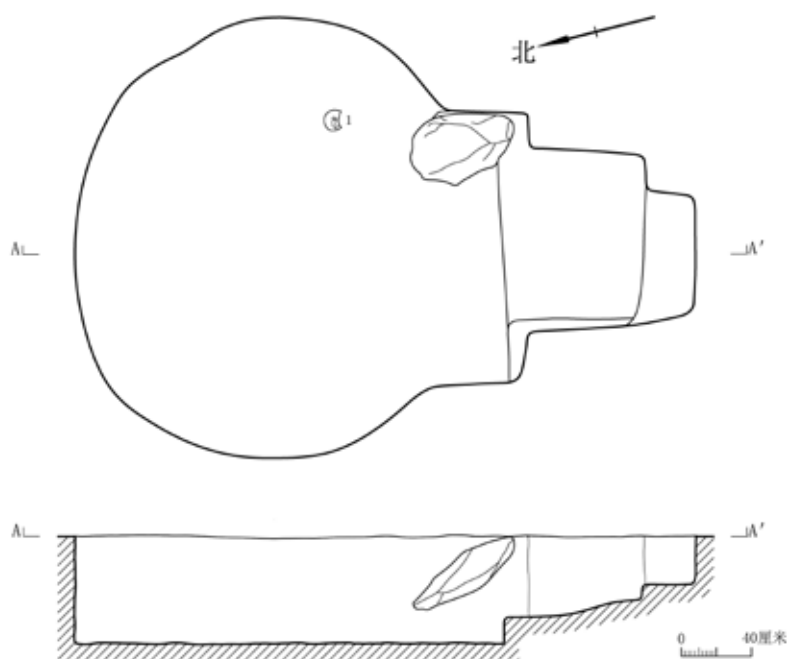
照片一三 陶三足盆 (M14 :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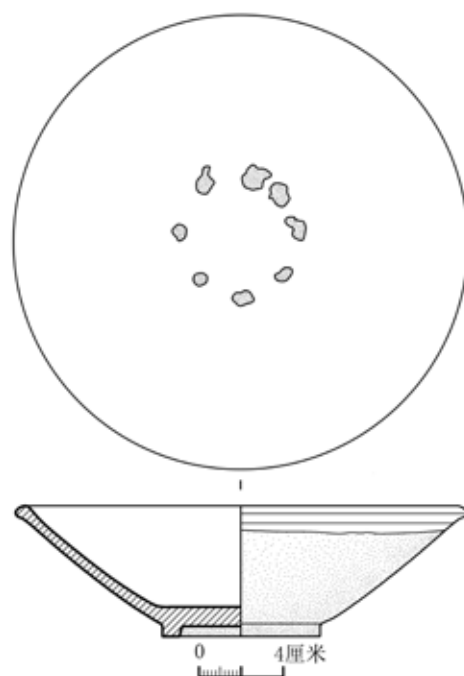
照片一四 陶环残片 (M14 :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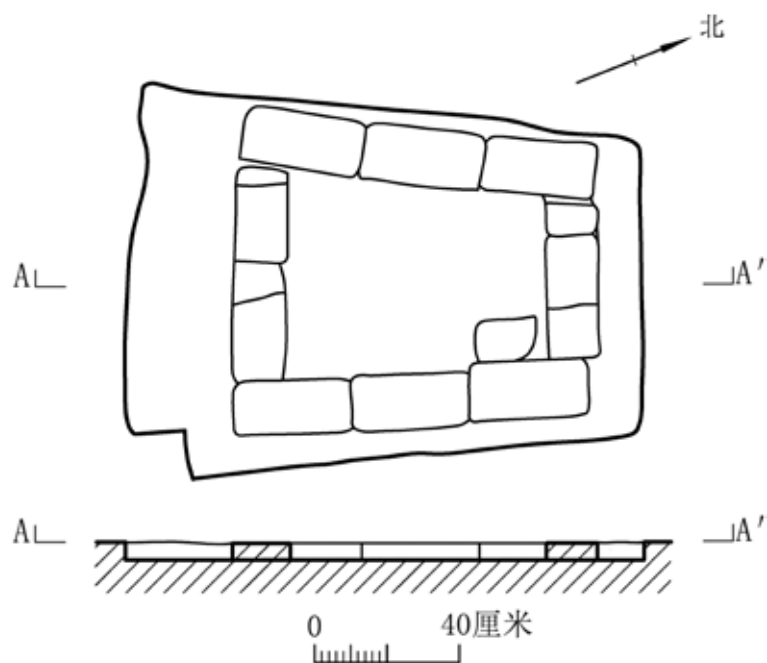
照片一五 瓷盘 (M20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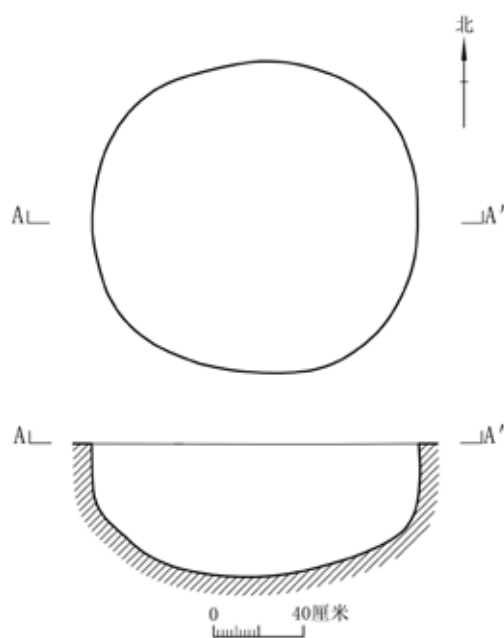
图一三 M20 平面、剖面图
1. 瓷盘



图一四 M20 出土瓷碗 (M20: 1)



图一五 M18 平面、剖面图



图一六 H2 平面、剖面图

2.M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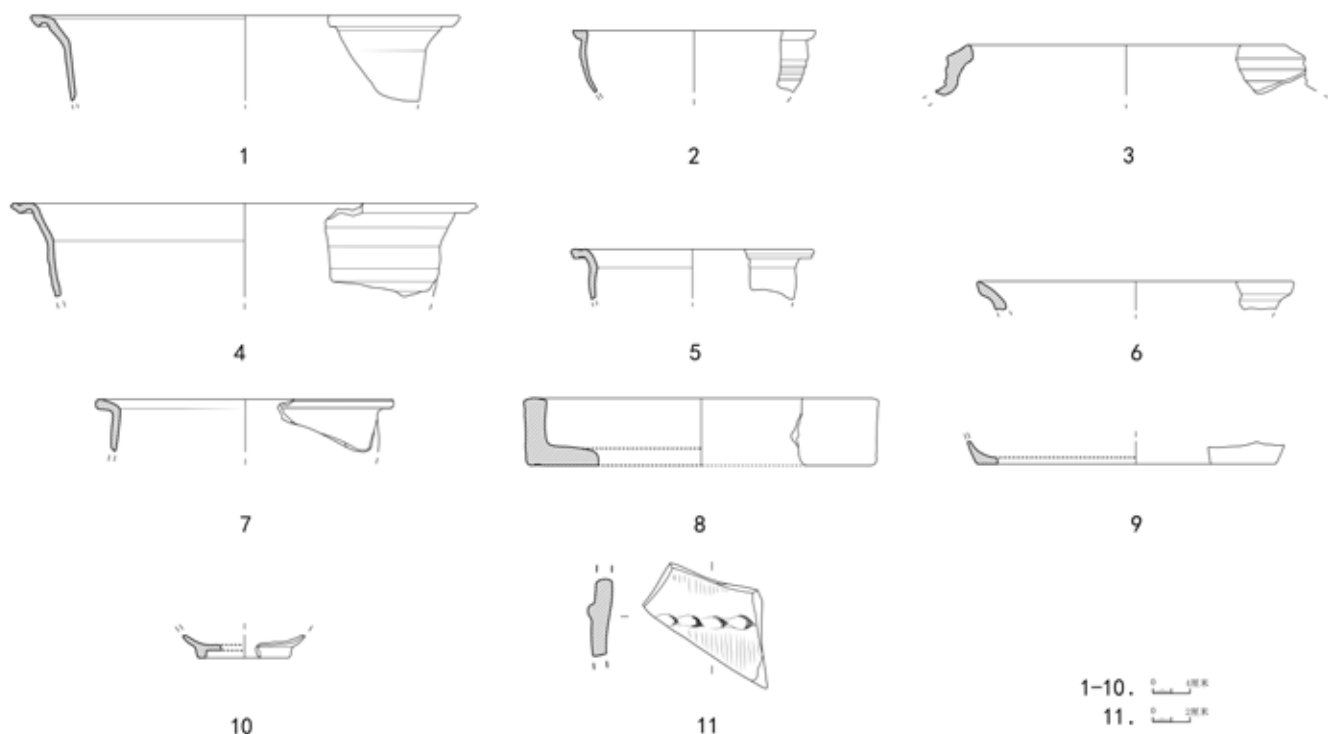
位于 T0304 的北部，方向为 195° ，“甲”字形土圪竖穴墓，自南而北依次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开口于①层下，向下打破②层、③层和生土，墓口距地表深 0.6 米（图一三）。

墓道位于墓室南侧，平面近长方形，长 0.94 米、宽 0.64—1.04 米。

甬道位于墓道与墓室之间，平面呈近长方形，长 0.46 米、宽 1.52—1.56 米。

墓室位于墓道北侧，平面呈椭圆形，直壁向下，长 2.5 米、宽 2.1 米、深 0.6 米。墓内填土为黄褐色土，土质较致密。未见人骨，葬式不明。

出土瓷盘 1 件。M20 : 1，敞口，方唇，斜弧腹，平底，浅圈足，灰褐胎，外上腹、口沿至内底先施白色化妆土，



图一七 H2 出土器物

1、4—7. 陶盆口沿残片 (H2 : 1、H2 : 5、H2 : 4、H2 : 10、H2 : 11) 2. 陶盂残片 (H2 : 2) 3. 陶瓮口沿残片 (H2 : 6) 8—10. 陶盆器底残片 (H2 : 7、H2 : 9、H2 : 8) 11. 陶片 (H2 : 3)

再施白釉。内底有八处近圆形支钉痕迹。通高 6.2 厘米、口径 21.6 厘米、底径 7.6 厘米 (图一四; 照片一五)。

(三) 梯形土扩竖穴砖室墓

1 座, 为 M18, 位于 T0405 的西南部、T0305 的西北部, 方向为 20° , 梯形土扩竖穴砖室墓。开口于①层下, 向下打破②层、③层和生土, 墓口距地表深 0.85 米。墓坑长 1.45 米、宽 0.8—1.1 米、深 0.05 米。砖室长 1.03 米、宽 0.76—0.92 米、残高 0.05 米, 仅存一层墓砖。墓砖长 0.34 米、宽 0.16 米、厚 0.05 米, 均为素面。墓内填土为黄褐色土, 土质较疏松。人骨朽尽无存, 葬具、葬式不明。未出土器物 (图一五)。

二、灰坑

辽代灰坑 3 处, 其中, H1 位于 C-2、D 地块南部发掘区, H2、H8 位于 C-2、D 地块北部发掘区。由于 H1、H8 与 H2 形制类似, 且无器物或较少器物出土, 现仅就出土器物较多的 H2 进行介绍。

H2 位于 T2201 西南部, 开口于①层下, 向下打破②层、③层和生土层。坑口平面呈近圆形, 直壁, 圜底。坑口距地表 0.2 米, 坑口东西长径 1.46 米、南北短径 1.4 米、坑深 0.6 米。坑内填土为黄褐色土夹灰褐色土, 土质较疏松 (图一六)。

出土器物共 11 件, 多为残片。其中陶盆口沿残片 5 件, 陶盆器底残片 3 件, 陶盂残片、陶瓮口沿残片、陶片各 1 件 (片)。以泥质灰陶为主, 夹砂褐陶次之, 可见纹饰有凹弦纹、凸弦纹等。

陶盆口沿残片 5 件。H2 : 1, 泥质灰陶, 侈口, 折沿, 方唇, 束颈。唇面有一道凹槽。残高 9.2 厘米、口径 46 厘米 (图一七, 1)。H2 : 5, 泥质灰陶, 侈口, 折沿, 方唇, 束颈, 溜肩。唇面饰一道凹弦纹, 肩部有修坯痕迹。残高 10 厘米、口径 50 厘米 (图一七, 4)。H2 : 4, 泥质灰陶, 侈口, 折沿, 方唇, 束颈。沿面及唇面各饰一道凹弦纹。残高 5.4 厘米、口径 26 厘米 (图一七, 5)。H2 : 10, 夹砂褐陶, 侈口, 折沿, 圆唇, 素面。残高 3 厘米、口径 34 厘米 (图一七, 6)。H2 : 11, 泥质灰陶, 侈口, 折沿, 方唇, 束颈。沿面内侧饰一道凸弦纹。残高 5.6 厘米、

复原口径 32 厘米（图一七，7）。

陶盃残片 1 件。H2 : 2, 夹砂褐陶, 仅余口沿及上腹, 侈口, 折沿, 圆唇, 溜肩, 肩饰数道凹弦纹。残高 6.6 厘米、口径 26 厘米（图一七，2）。

陶瓮口沿残片 1 件。H2 : 6, 泥质褐陶, 敛口, 方唇, 素面。残高 5.4 厘米、口径 34 厘米（图一七，3）。

陶盆器底残片 3 件。H2 : 7, 泥质灰陶, 下腹壁近直, 平底, 素面。通高 7.2 厘米、口径 38 厘米、底径 37.6 厘米（图一七，8）。H2 : 8, 夹砂褐陶, 浅圈足, 素面。残高 2.4 厘米、底径 9.6 厘米（图一七，10）。H2 : 9, 泥质灰陶, 下腹斜直, 平底, 素面。残高 2.4 厘米、底径 30 厘米（图一七，9）。

陶片 1 件。H2 : 3, 泥质灰陶, 平面呈梯形, 侧面微弧。饰一道盘索纹及数道纵向凹弦纹。残长 7.7 厘米、残宽 5 厘米（图一七，11）。

三、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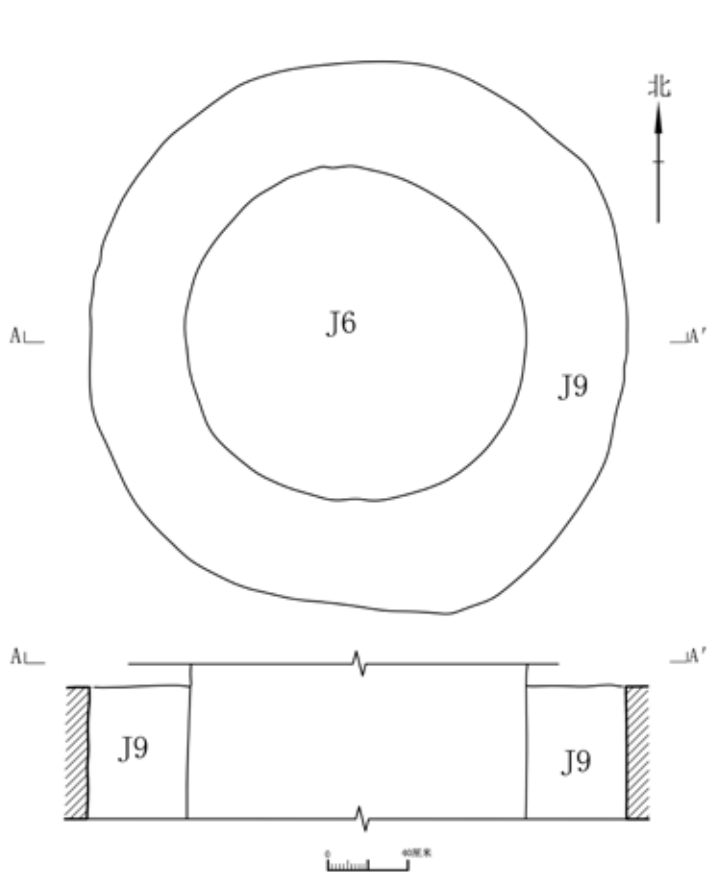
辽金时期井 6 口, 分别为 J5、J7、J8、J9、J10、J12, 均位于 C-2、D 地块南部发掘区。井中均未发现器物, 由于形制类似, 下面择取 J9、J10 进行介绍。

1.J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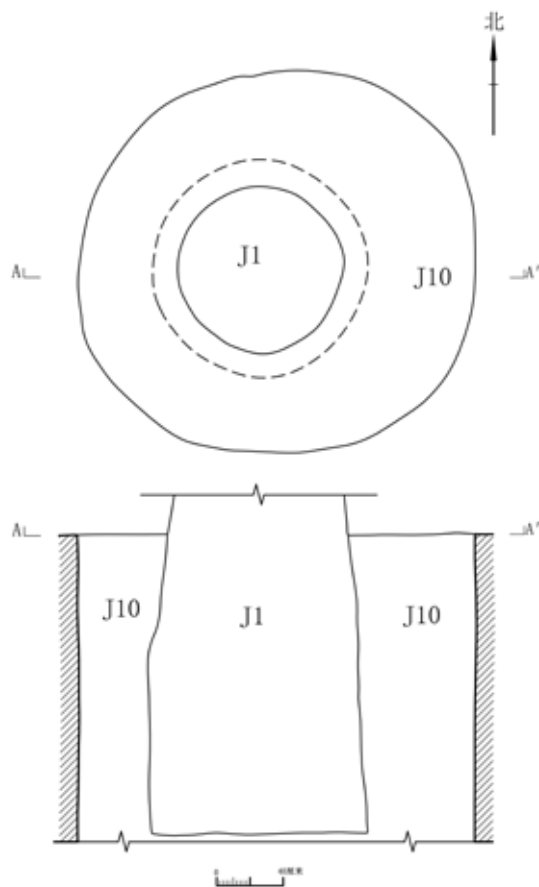
位于 T0205 的东部, 土坑竖穴井, 开口于①层下, 被清代遗存 J6 打破, 向下打破②层、③层和生土。井口形状呈近圆形, 近直壁。井口距地表深 0.7 米, 口南北长径 2.75 米、东西短径 2.7 米, 清理至深 0.7 米, 未到底。井内填土为黄褐色沙土, 土质较致密。未出土器物（图一八）。

2.J10

位于 T0403 的西部, 椭圆形土坑竖穴井, 开口于①层下, 被清代遗存 J1 打破, 向下打破②层、③层和生土。



图一八 J9 平面、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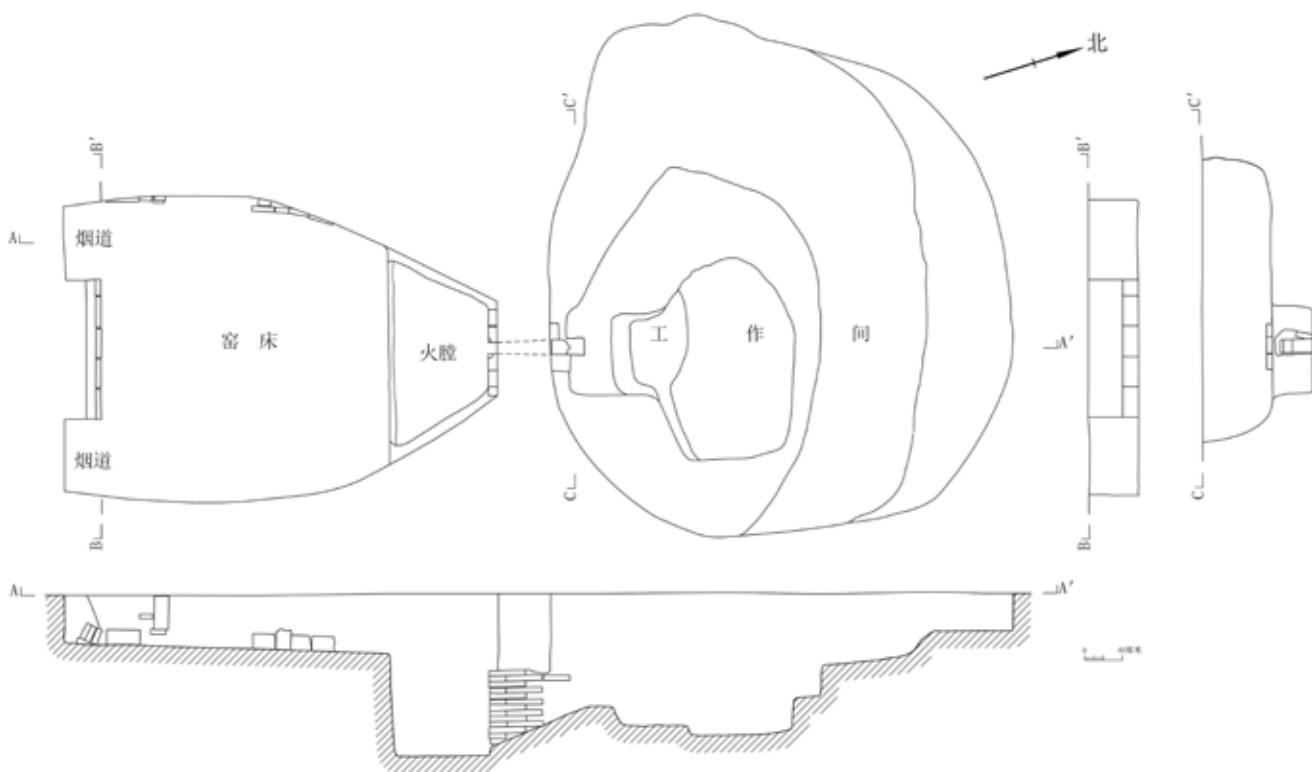
图一九 J10 平面、剖面图

井口形状呈椭圆形，近直壁。井口距地表深 0.7 米，口东西长径 2.4 米、南北短径 2.3 米，清理至深 1.8 米，未到底。井内填土为黄褐色沙土，土质较致密。未出土器物（图一九）。

四、窑址

辽代窑址 1 座，为 Y1，位于 A 地块。

Y1 位于 A 地块 T1401 东部、T1402 西部，开口于现地表①层下，向下打破生土，窑口距地表深 1.05 米，平面呈马蹄形，南北向，方向为 17° ，总长 10 米、宽 1—5.5 米。自北而南依次由工作间、火门、火膛、窑室、烟道等部分组成（图二〇）。



图二〇 Y1 平面、剖面图

工作间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南北宽 4.86 米、东西长 5.5 米，深 0.4—1.5 米，呈阶梯式，北高南低。工作室位于窑室的北边，通过火门与窑室连接。

火门位于工作间与火膛之间，正面为长方形直壁，长 1 米、宽 0.14 米、高 0.8 米，内连火膛。火门底部有一长方形通风口，宽 0.2 米、高 0.6 米，呈斜坡状，有四块残长条砖封堵，两壁上部有青色烧结面，厚度为 0.05 米，较为致密。通风口直通北部工作间，火门内壁为各规格长条砖错缝垒砌，残高 0.6—0.8 米。

窑室平面呈马蹄形，由火膛、窑床、烟道三部分组成，上部已被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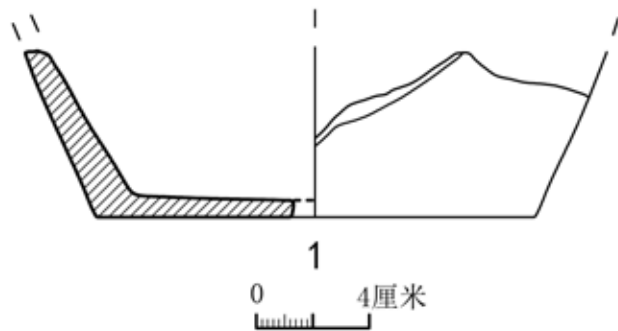
火膛平面呈梯形，东西长 1—1.9 米、南北宽 1.04 米，底距开口深 1.7 米，火膛底部到窑床面的深度为 1.1 米，火膛内壁为青色烧结面，厚度为 0.05 米，烧结面较硬，不甚致密。

窑床平面为不规则形，东西长 3.46 米、南北宽 3.2 米，底距开口深 0.5—0.6 米。窑床表面为青色烧结面，厚度为 0.05 米，烧结面较硬，致密。东西两壁应为砖砌窑壁，现仅存底部少量几块残长条砖。

烟道位于窑室南壁上，两条烟道东、西分布，平面均呈长方形，烟孔均长 0.76 米、进深 0.4 米，烟道内被破坏，

仅存红烧土及少量青色烧结面，质地不甚紧密。东侧烟道与西侧烟道相距 1.48 米（图二〇）。

出土 1 件陶盆器底残片。Y1 : 1，泥质灰陶，下腹以上缺失，下腹弧收，平底，素面。残高 6 厘米、底径 16 厘米（图二一）。



图二一 陶盆器底残片（Y1 : 1）

五、房基

1 处，为 Q1。位于 T0101 北部、T0201 中部、T0301 中部和 T0401 中部，开口于①层下，向下打破②层、③层和生土。平面形状呈长条形，直壁，底较平，口距地表约 0.8 米。口长约 44 米、宽 0.3—0.55 米、深 0.25—0.4 米。基槽内发现 3 个方形柱洞，柱洞口边长约 0.4 米、深约 0.3 米。通过勘探，探知其继续向北延伸了约 7.5 米，后转向西。未出土器物（照片一六）。

六、小结

该项目辽金时期遗迹丰富。M14 出土的陶三足盆（M14 : 5）、陶碗（M14 : 1）与北京华能热电厂墓葬^①出土的陶三足盆（M3 : 1）、半釉陶碗（M5 : 15）及北京通州次渠墓葬^②的陶碗（M5 : 8）相近；器盖（M14 : 7）与大兴区小营^③墓葬中的罐盖（M1 : 6）相近；M9 出土的陶釜（M9 : 5）及 M9 出土的瓷碗（M9 : 1、M9 : 2）与密云大唐庄^④辽金墓的陶罐（M64 : 3、M6 : 15）、瓷碗（M14 : 25、M14 : 21）类似。出土铜钱有元祐通宝、天圣元宝、景祐元宝等宋钱。M1、M2、M4、M9、M14、M15、M16、M18、M20 墓室多为圆形，初步推测其年代为辽金时期。其中 M1、M2 及 M4 位置集中，墓葬形制相同，朝向一致，结合地层与出土器物可以判断，这三座墓葬可能为家族墓葬。其余墓葬也存在部分较为集中和朝向一致的情况，由于分布较为分散，因此不好判断墓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排除其中也会有属于同一家族的墓葬。



照片一六 辽金遗迹 Q1 清理完成照

这个遗址共发现水井 12 口，其中辽金时期水井 6 口、清代水井 6 口，而清代又有 3 座水井与辽金时期的 3 座水井存在打破关系。这 12 口水井都很浅，大部分深度仅有一米多，而且均为圆形土坑竖穴井，说明该地区从辽金时期至清代整个区域的水资源都很丰富，所以这个地区的水位线都很高，掘土稍深都能取得生产或生活所需的水源。可以证实海淀区历史上就是一个水资源丰富的区域。

附记：本次发掘领队为董坤玉。参与资料整理工作的人员有董坤玉、刘娜、高一琦、贺娅芳、方浙跃、王静蕾等。照片由方浙跃拍摄，插图由刘娜、高一琦、贺娅芳绘制，拓本由贺娅芳制作，器物描述工作由王静蕾完成，修复工作由高一琦、贺娅芳完成。

执笔：董坤玉

-
- ①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华能热电厂墓葬考古发掘简报》，《北京文博文丛》2017年第4辑。
 - ②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通州次渠唐金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15年第1期。
 - ③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大兴区小营出土金代墓葬》，载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第6辑），民族出版社，2004年。
 - ④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密云大唐庄白河流域古代墓葬发掘报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绿松石文物光谱分析技术的应用探讨

郑王文元

绿松石属于三斜晶系的含水铜铝磷酸盐矿物。其晶体常以隐晶质集合体形态出现，颜色多呈天蓝、蓝绿或绿色，条痕为白色。绿松石主要在表生氧化环境里，通过含铜、铝的原生矿物发生化学分解与迁移后在裂隙或者孔洞中沉淀形成。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绿松石在中国享有重要的文化和装饰价值^①，随着科技的进步，绿松石文物的分析检测技术已经不止于简单的物理观察。深入研究和发发展绿松石文物的检测分析技术，对于考古科学和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一、绿松石的考古研究情况

绿松石文化发展兼具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演进。在中原地区，绿松石制品最早见于裴李岗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周代，不同阶段的绿松石制品在形制、用途上不断演变，制作工艺也越发精湛。研究中原地区出土的绿松石，可以探讨早期人类的资源获取、文化交流、社会等级等问题^②。

（一）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绿松石制品

山西临汾下靳墓地的绿松石制品体现了古代中国对珍贵材料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利用，尤其在宗教与权力象征方面。张登毅等人研究表明，该遗址中出土的绿松石文物具有复杂来源，通过物相分析技术如拉曼光谱仪与同位素铅镉分析，确认这些绿松石除来自本地矿源外，还从湖北竹山喇叭洞和陕西洛南辣子崖等地输送至此，揭示了古代社会网络中的商贸和文化交流路径^③。通过光谱技术，这些研究共同表明绿松石在古代社会中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和经济资源，其分布和使用揭示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动态的交流模式。

（二）先秦时期遗址的绿松石制品

先秦遗址中的绿松石制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与文化交流的广泛性，尤其是在生产和流通方面展现出高度发达的技术与经济网络。

先怡衡等人对洛南河口遗址发现的绿松石进行了深入的产地特征研究，发现该地绿松石的化学成分与其他地区有显著差异，这一发现对理解古代绿松石贸易路线具有重要意义^④。综合地质、化学及地理数据，不仅确定了洛南河口绿松石的独特来源，还推测了古代交易网络的可能范围和路径，为认识古代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互动提供了新的证据。而绿松石器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证明了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价值^⑤。

（三）新疆等地早期绿松石文物制品

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象征，新疆等地早期的绿松石文物是探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代表性器物，但同时相较于中原地区的绿松石文物具有一定独立性。

先怡衡与樊静怡等对新疆地区早期绿松石制品的研究显示，绿松石的使用远在丝绸之路贸易前就已广泛存在于中亚至西亚地区^⑥。李延祥等人对黑山岭古代绿松石矿业遗址进行了初步踏查，通过拉曼光谱锁定绿松石制品矿源，对解决新疆乃至西北地区早期绿松石的来源和矿料的获取技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亦对新疆早期绿松石“西来说”提出疑问^⑦。结合近年来新疆绿松石采矿遗址考古发现，基本否定新疆早期绿松石来源的“西来说”^⑧。

总的来说，在当前绿松石考古研究中，光谱分析技术已成为矿源追溯等研究工作的核心手段，并常辅以同位素

分析法增强结论可靠性。相较于传统研究依赖器物类型学与时空分布提出假说（如早期绿松石“西来说”争议），以光谱分析为代表的新型科技手段通过对矿物成分、物相特征的精准检测，实现了矿源与流通过程的实证性溯源，可以有效打破理论桎梏，推动学术演进。

二、绿松石文物科学检测的光谱技术热点

物相判定是指确定样品中存在的物相及其相对含量。在绿松石的检测中，物相判定可以帮助鉴别绿松石的真伪、是否经过优化处理以及其他伴生矿物的种类和含量。光谱分析作为物相判定的重要手段较为简单直观，但需参考可靠的标准光谱库。

（一）红外光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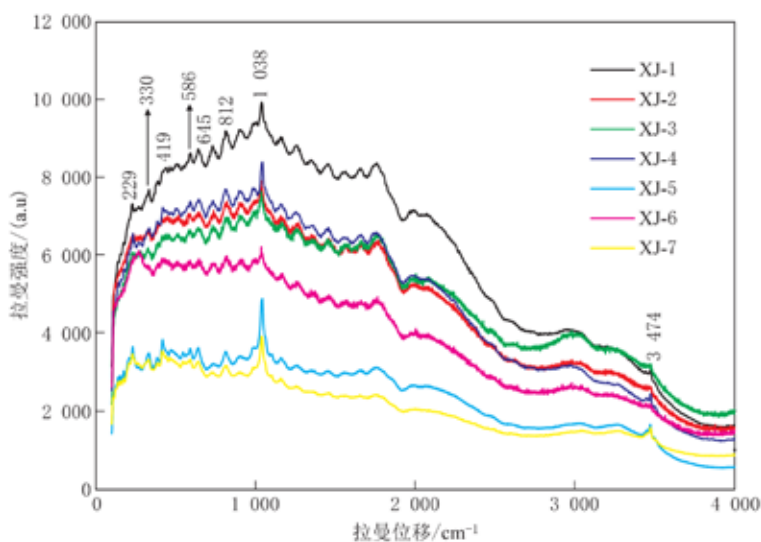
红外光谱分析在检测绿松石的有机聚合物填充物中广泛应用。测量样品对红外光的吸收特性，分析分子振动模式（如羟基伸缩振动、水分子弯曲振动），适用于鉴别优化处理与染色剂。绿松石结构中，羟基（Al-OH）基团和水分子（H₂O）的存在会影响矿物的颜色和稳定性。以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为代表的分析技术被广泛用于对天然和处理过的绿松石的详细分析比较。同时，红外光谱可以揭示各种元素对绿松石颜色的影响。例如，用Fe和V替代Al会增强磷酸基团的极性，影响绿松石颜色并产生强烈的IR吸收带。其优势为可直接扫描文物表面，无须取样，适合珍贵器物；且单次检测仅需5—10分钟，能批量区分天然与注塑绿松石（注塑品在1730cm⁻¹处有C=O特征峰）。但红外光谱无法区分Al-OH与Fe-OH振动差异，难以准确判断颜色成因且依赖标准库，对罕见矿源识别率较低。

（二）拉曼光谱及物相判定

拉曼光谱是基于拉曼散射效应的一种光谱技术。当激光照射到样品上时，大部分光子会发生弹性散射，即瑞利散射，其频率与入射光相同。然而，小部分光子会与样品分子发生非弹性散射，导致频率发生变化，这种散射光称为拉曼散射。拉曼散射光的频率与样品分子的振动和转动能级有关，因此通过测量拉曼散射光的频率和强度，可以获得样品分子的结构和成分信息^⑨。它的光斑直径可至1—2μm，可进行微区分析，适合检测绿松石孔隙中的伴生矿物；不同矿源因形成环境差异，拉曼峰位会有细微偏移还可以产地溯源，作为“矿源指纹”。但深色样品对激光吸收强，需多次扫描累加信号且设备成本高，普及度低于XRF。

绿松石是一种含水的铜铝磷酸盐矿物，其化学式为CuAl₆(PO₄)₄(OH)₈·4H₂O，在拉曼光谱中显示出一系列特征峰，其中最强峰位于约1047cm⁻¹处，对应于PO₄³⁻四面体的对称伸缩振动。较弱峰位于约465cm⁻¹、580cm⁻¹、630cm⁻¹和1120cm⁻¹等处，分别对应于绿松石的其他振动模式（图一）。图谱对比法将待测样品的拉曼光谱与已知绿松石及其他矿物的标准拉曼光谱进行对比，通过比较特征峰的位置和强度来确定样品中存在的物相。

应用拉曼光谱进行绿松石研究时，研究人员会系统记录并分析各种样本的拉曼峰值。这些峰值与矿物内部结构的振动频率直接相关，



图一 典型绿松石拉曼光谱图及特征峰

可以作为识别不同矿物来源的依据。通过比较不同地理位置出土的绿松石样本的拉曼光谱，研究人员能够追踪推测绿松石的矿源地，还能揭示样本经历的环境变化和歷史处理过程。

（三）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LA-ICP-AES）是一种用于分析固体样品中元素组成的技术。该技术检测限达 ppm 级，可高精度区分同一矿源不同矿脉的微量元素差异。此外，结合移动平台，可生成元素分布热图，揭示镶嵌工艺中的材料选择逻辑。但单次剥蚀会产生约 50 μm 深的凹坑，具有破坏性，不适用于脆弱文物；且耗时久，单样品分析需 30 分钟以上。

在绿松石的研究中，LA-ICP-AES 分析可用于确定绿松石中的元素含量和分布，从而推断其产地、形成环境和加工工艺等信息。研究人员通过分析绿松石中的微量元素组成，与已知产地的绿松石进行对比，从而推测其产地来源。此外，LA-ICP-AES 分析还可用于研究绿松石的形成过程，通过分析其中的稀土元素分布，推断其形成的地质环境和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LA-ICP-AES 分析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术人员，且样品制备过程较为复杂。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和使用。同时，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还需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和数据分析。

（四）X 射线荧光光谱

X 射线荧光光谱（XRF）结合了光谱学和化学分析的特点，通常用于分析绿松石的元素组成，尤其是影响其颜色的 Cu、Al、P 和 Fe 等元素，CuO、Al₂O₃、P₂O₅ 和 Fe₂O₃ 等存在显著影响颜色的矿物。较高的 CuO 含量导致蓝色色调，较高的 Fe₂O₃ 含量则导致绿色色调。XRF 的分析仪器分为便携式 XRF 仪和实验室型 XRF 仪。便携式 XRF 仪适合考古现场快速筛查，重量 1—3 kg，检测时间 30—120 秒；实验室型 XRF 仪分辨率更高，可检测轻元素。XRF 的优势为无须接触样品，距离 1—5cm 即可检测，适用于壁画、墓葬出土未清理器物，还可同时测定多种元素，快速判断颜色成因。但其穿透深度有限，无法反映内部元素分布，需结合拉曼光谱。

在地质研究中，XRF 已被用于区分绿松石和其他矿物，但由于其斑点尺寸较大，在识别混合矿物方面相较于激光诱导击穿光谱（LIBS）存在一定局限性。在绿松石文物分类中，XRF 有助于将绿松石成分与地理历史背景联系起来，揭示元素组成与考古归属之间的密切相关性^⑩。

XRF 因其非破坏性而受到青睐，适用于分析珍贵而精致的样品。XRF 与其他光谱方法相结合，有助于识别经过处理或仿制的绿松石。作为绿松石研究中的一种多功能工具，XRF 可以用于分析元素组成、考古研究、无损检测以及检测处理和仿制品^⑪。

三、结合人工智能与绿松石光谱检测技术的展望

人工智能在绿松石科学检测技术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以与光谱分析技术相结合，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和效率。在光谱检测以外的研究中，通过绿松石的微观结构和特征识别，可以对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进行分析。王璇等人使用多项式函数对模型进行拟合，可以克服传统人工经验分级重复性差、主观性强的弊端^⑫。此策略优化了绿松石颜色分级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虽然不能很好地分析绿松石元素的含量，但其“数字化检测—构建函数筛选模型—自主研发设备”项目产业化逻辑清晰，值得借鉴。

目前已有针对绿松石光谱检测技术的药物应用，其侧重点局限于鉴别绿松石原矿样品与优化处理绿松石（或伪绿松石）。如吴金泉等提出了绿松石在线鉴别系统概念^⑬，并设计了实验样机。样机使用在考古中未被应用的高光谱成像技术，通过双尺度下（400—1000nm 和 400—600nm）的相关性分析分拣天然绿松石。虽然实现了高效分拣，但仍存在光谱区域选择不智能、样本数量较小等现实问题，且高光谱成像设备昂贵、生成数据量大、设备移动性差。而考古研究中仍需要使用便携设备通过对文物不同区域分别进行检测，且多数科研单位的光谱检测设备并不允许自行拆解或改装，因此在考古研究环境中多数情况下还需依赖笔记本电脑对主要文物数据进行简单分析处理。在实现分类指导作用后，返回实验室进一步依托人工智能模型进行精细的数据分析工作。

辨别矿物光谱需要消耗一定人力，完全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文件资料库进行统一管理，在此基础上实现各类矿物光谱数据的大数据学习和 AI 模型统一，进而进一步实现对于文物的细化分类，甚至于实现绿松石产源溯源的智能识别。例如，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搭建了全球矿物光谱数据库（RRUFF），包含了少部分天然绿松石标准红外光谱和拉曼光谱数据并无偿开放下载。这一尝试初步论证了绿松石光谱数据库的统一或标准化的可行性，绿松石研究领域可以模仿此策略搭建文物的“数字身份证”。

在对绿松石文物进行更进一步的细化分析时，则需要考虑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光谱数据维度较高且在多数考古研究中样本偏少，使用传统模型存在过拟合问题，因此需要在数据过程中提

取关键光谱特征实现数据降维。在地球化学全岩分析方向，任秋兵等提出了一种遗传算法优化神经网络耦合判别方法（GA-NNDM）^④。该方法结合了遗传算法和神经网络，对地球化学数据进行降维，并优化算法寻求最优参数，在玄武岩样品分类方面显示出高准确性，而这一耦合判别方法或可拓展到绿松石分析研究中。具体来说，考虑到绿松石的光谱特征由 PO_4^{3-} 、 OH^- 和 H_2O 等振动主导，可以筛选不同振动特征的通用矿物光谱库（如羟基磷酸盐类矿物）进行模型预训练，使用小样本绿松石文物数据作为测试集，所获得的绿松石 GA-NNDM 模型可以进一步迭代遗传算法以实现联合优化（图二）。使用这一策略可以最大化利用小样本绿松石文物数据，实现大样本降维训练和小样本特征微调。

现有人工智能数据收集重点问题还在于样本分散，各机构数据不互通，文物确认为绿松石制品后无须二次确认等。结合客观的研究环境，多数研究单位确有分享文物信息和文章发表的需求，但囿于学习成本不能实现快捷分析。因此，需要鼓励绿松石研究在发掘早期、低成本的条件积极共享，共建小样本光谱数据。而为了实现学术数据的共享，应由权威实验室率先牵头，利用现有的绿松石文物数据进行人工智能小样本学习，并搭建一个跨学科友好的分析参考标准且不依赖人工智能，从而真正解决其他团队的科研难点痛点，使得各个团队愿意使用该分析策略对文物进行测量研究、文章发表和数据共享，才能进一步扩充数据库体量形成正向反馈，依赖更大样本的数据库实现更为精确的分析策略并共享数据。具体而言，相关分析方法仅需定期在数据库网站进行更新即可。即使在项目初期，各科研团队也不需更新任何检测设备，仅需携带一台个人电脑即可初步实现文物特性的快速判别。

结合现有领域内的技术性尝试，对于绿松石文物的人工检测或可分两步走：一是由资源丰富的团队牵头合作，依赖于小样本数据或通用大样本的校正后数据为光谱分析验证可靠的分析方法并共享为便携易操作的电脑软件，保证在数据采集过程中的便携性与易操作性；二是通过正向激励来保证公共数据库的生命力，依赖于前述方法可以加快绿松石研究和数据共享的步伐，进一步在实际应用中不断优化和改进光谱分析方法，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和效率，形成正向循环，为绿松石文物的研究和保护提供有力支持。

四、结论

本文围绕绿松石检测技术研究趋势展开探讨。在考古研究方面，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先秦时期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绿松石制品，有助于了解古代社会的资源获取、文化交流、社会等级情况。而光谱技术在绿松石文物检测中



图二 人工智能辅助绿松石光谱数据分析流程示例图

至关重要：红外光谱可快速鉴别优化处理的绿松石，无损检测表面有机物；拉曼光谱能微区分析伴生矿物、追溯矿源，但设备成本高；激光剥蚀光谱可以高精度分析元素分布，却具有一定破坏性；XRF 适合现场快速筛查元素组成，需结合拉曼光谱提升准确性。

长久来看，人工智能与光谱技术结合是趋势。当前面临样本分散、数据共享不足等问题，可通过建立统一光谱数据库（如借鉴全球矿物光谱库），利用遗传算法优化神经网络等方法，实现小样本数据降维与模型训练，推动产地溯源等精细分析。未来需鼓励科研团队早期共享数据，从基础相关性分析入手，逐步构建更精准的人工智能检测体系，助力多学科交叉研究。

综上，光谱技术为绿松石文物研究提供了关键支撑，融合人工智能将提升检测效率，推动古代社会文化、技术等领域的深入探索。

-
- ① 张荣红、黄琳、王心雨：《基于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古代绿松石文化属性探析》，《宝石和宝石学杂志》（中英文）2022年第5期。
- ② 孔德安：《浅谈我国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及制作工艺》，《考古》2002年第5期。张登毅、李延祥：《山西出土先秦绿松石制品初步研究》，《华夏考古》2015年第4期。先怡衡、樊静怡等：《新疆出土早期绿松石制品研究》，《西域研究》2023年第2期。张登毅、李延祥、黄可佳等：《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出土绿松石制品的矿源研究》，《矿物岩石》2022年第3期。
- ③ 张登毅、李延祥：《山西出土先秦绿松石制品初步研究》，《华夏考古》2015年第4期。
- ④ 先怡衡、梁云、樊静怡等：《洛南河口遗址出产绿松石产地特征研究》，《第四纪研究》2021年第1期。
- ⑤ 张昌平：《从绿松石器看晚商王朝与李家庄文化的关系》，《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2期。
- ⑥⑧ 先怡衡、樊静怡等：《新疆出土早期绿松石制品研究》，《西域研究》2023年第2期。
- ⑦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若羌黑山岭古代绿松石矿业遗址调查简报》，《文物》2020年第8期。
- ⑨ 吕宁晨：《绿松石镶嵌金饰件考古出土和复原故事》，《武汉文史资料》2020年第4期。
- ⑩ Federico Carò, Deborah Schorsch, Louisa Smieska, Brunella Santarelli, Non-invasive XRF analysis of ancient Egyptian and near Eastern turquoise: A pilot stud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Volume 36, 2021, 102893.
- ⑪ Sharon Hull, Mostafa Fayek, Frances Joan Mathien, Phillip Shelley, Kathy Roler Durand, A new approach to determining the geological provenance of turquoise artifacts using hydrogen and copper stable isotop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ume 35, Issue 5, 2008, Pages 1355-1369.
- ⑫ 王璇：《基于人工智能的绿松石颜色分级数字化研究及其装置》，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2022年9月22日。
- ⑬ 吴金泉、王馥、熊伟等：《基于高光谱成像技术的绿松石在线鉴别系统研发》，《光电工程》2021年第7期。
- ⑭ 任秋兵、李明超、韩帅：《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神经网络的玄武岩构造环境判别及对比实验》，《地学前缘》2019年第4期。

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再社会化路径研究

——以北京地区早期铁路车站为例

左 什 陈思粤 贾丰源

一、引言

铁路作为近代工业文明的代表，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工业遗产的重要门类，铁路遗产的意义远超单纯的交通设施遗存^①，是承载着国家发展、科技进步与文化记忆的复合价值体系，具有深刻的历史、科技及艺术价值。

铁路遗产可分为铁路可移动文化遗产和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两类，其中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由于其物理特征上呈现出的占地面积较广、体量较大等特点，使其与铁路可移动文化遗产相比，更易体现出见证性突出、文化内涵丰富的特征，同时也存在保护难度较大、利用方式有限等局限。按照功能及用途划分，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可分为铁路站房及附属建筑、铁路线路（区段）及相关设施、铁路历史建筑（群）等大类。

自中国铁路诞生以来，北京地区一直是铁路发展的核心和枢纽，在北京地区留存了大量珍贵的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不仅见证了北京铁路的发展历程，更是展现中国铁路文化的重要窗口。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颁布的《中国工业遗产名录》显示，分布在北京的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包括：京张铁路、二七机车厂、京奉铁路、北京站等。保护和利用这些文化遗产，对于推动北京地区旅游业发展，提升城市形象，增强文化认同，传承地域文化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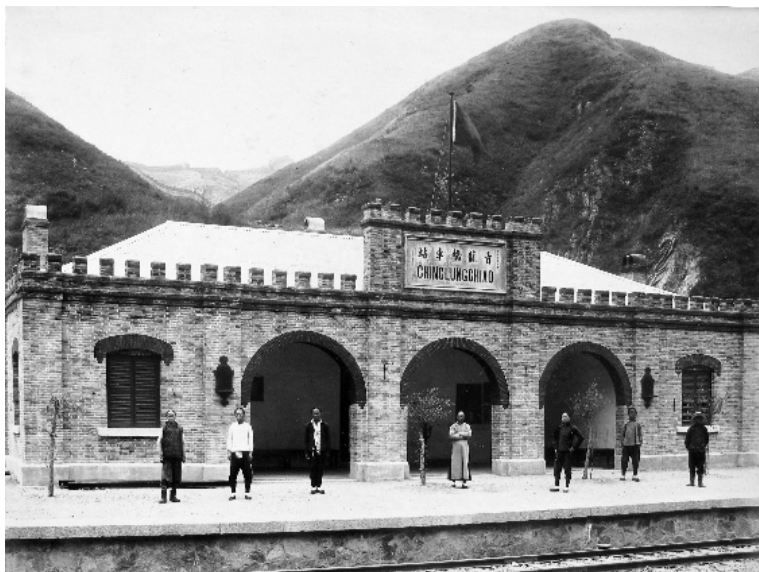
本文将入选《中国工业遗产名录》的早期北京地区铁路车站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其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探究如何实现北京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再社会化路径，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发挥文化、社会及经济属性，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

二、早期北京地区铁路车站保护现状

（一）青龙桥车站

青龙桥车站被誉为京张铁路的“咽喉”，因著名的“人”字形铁路顺应山势在此处折返而闻名遐迩。京张铁路的主要设计者、享有“中国铁路之父”美誉的詹天佑先生之墓及其雕像等珍贵历史遗迹均保存在此（图一）。

京张铁路按照业务繁简程度，将全线车站从高至低划分为一至四等，其中青龙桥车站按照三等站样式修建，前排设站房5间，后排设站房2间，中间有通道和庭院相连，墙面为灰色砖石，拱窗、女儿墙上绘有红色装饰线^②。车站站名由京张铁



图一 京张铁路开通初期的青龙桥车站

作者单位：中国铁道博物馆



图二 改造一新的青龙桥车站（潘之望摄）



图三 清华园车站原貌



图四 改造前的清华园车站

路会办关冕均题写，右侧标有“光绪戊申秋季”，证明了站名的题写时间为1908年秋季。

青龙桥车站是京张铁路保存最为完好的车站，其与“人”字形铁路的保护与利用长期受到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13年，京张铁路南口至八达岭段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便包括青龙桥站及“人”字形铁路线路。2024年，北京市延庆区组织对青龙桥站及“人”字形线路进行了最新修缮（图二）。在车站内部打造文化展厅，为车站和线路两旁增设路灯和休憩座椅，使车站和“人”字形线路成为融合“长城+铁路”的多点化文化景观^③。

（二）清华园站

京张铁路清华园车站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清华园车站并非京张铁路最初规划的车站，京张铁路通车初期，列车从西直门出发后最近的车站便为清河站。1910年，为了便利运输，才增设了清华园车站（图三）。清华园车站为三等车站，清华园车站匾额上标有“宣统二年冬季”及“詹天佑书”字样，证明了清华园车站的建站时间为1910年。这张匾额也是京张铁路站房匾额中唯一留存下来的詹天佑手书，因而尤为珍贵。

与青龙桥车站相比，清华园车站的保护和利用几经波折。清华园车站是中共中央到达北京的第一站，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乘坐专列从西柏坡出发，于3月25日早6时抵达清华园车站并由此开启了“进京赶考”之路。但这座见证新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车站，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未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利用。20世纪80年代，为了修建职工宿舍楼，清华园车站老站房被拆除五分之二，未拆除部分也被用作职工宿舍。1988年后，清华园车站被彻底废弃，一部分老站房甚至被出租，私搭乱建现象屡见不鲜，几乎和大杂院相差无几（图四）^④。

图四反映了清华园车站被修缮前的保存状态，可以看出，车站的保护情况十分堪忧。不仅门窗、墙面破损严重，还有私拉电线、油漆随意涂抹等情况。“铁皮防盗门、笼子一般的防盗窗格外突兀，甚至其中一间站房被出租用作饭馆，在墙上又打窗户又掏洞排烟，把老站房弄得面目全非。”^⑤

2019年，北京市“新中国成立主题片区”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启动。清华园车站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再次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2021年，清华园车站被列为北京市首批革命文物名录。海淀区及国铁北京局共同对清华园车站旧址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和修缮。仅用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居民腾退及站房修复工作，将清华园车站匾额进行加固，更换地面和墙面的砖石，最大程度还原了清华园车站的原貌。修缮工程结束后，老站房内部被改造为党史学习教育展厅，并在车站旧址周边区域建设了绿地廊道。2023年，清华园车站旧址被列为第九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清华园车站终于实现了从破败民房到文博场所的转变（图五）。



图五 保护利用后的清华园车站

（三）西直门车站

西直门车站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建成于1906年8月（图六）。西直门车站是京张铁路在北京城内的唯一一座一等车站。车站兼营客货运输，货运以到达为主，是京张铁路南端的中间站。车站主站房、月台、连接两个月台的跨铁路天桥、机车库及宿舍等设施均为詹天佑亲自设计。

20世纪20年代，西直门车站经历了扩建改造，在线路东侧修建了二层站房。据考证，车站平面近似矩形，主站房面积2300平方米，车站正面入口为三孔外券廊，朝站台一面用连廊，站台为并列式，旅客进站方向与站台垂直，

建有跨越铁道的铁架天桥。站房建筑为西式建筑风格，但在装饰上十分简洁有力，体现了工业时代的设计风格^⑥。



图六 西直门车站旧貌



图七 改造一新的西直门车站

西直门车站的名称多次变化，建成之初名为“京张铁路西直门车站”，1923年京张铁路通车至绥远，车站更名为“京绥铁路西直门车站”，

1928年北京改称北平，车站再次更名为“平绥铁路西直门车站”。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站名改为“西直门车站”。1988年，更名为北京北站。1995年，西直门车站旧址被列为第五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北京北站开始改造工程，2009年，新建北京北站主站房正式启用，西直门车站旧址站房、站台、天桥等历史建筑设施得到完整保存（图七）。

与青龙桥车站和清华园车站的现有利用程度相比，西直门车站的社会化利用程度稍显不足，尽管按照原貌进行了充分修缮，但由于车站没有被改造为博物馆或其他展示场所供游人参观，因而如今西直门车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已不及青龙桥车站和清华园车站。

（四）正阳门东车站

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于1906年建成。建成后至1959年作为北京站使用，是当时北京乃至全国最大的火车站（图八）。20世纪60年代，为了地铁施工线路避让，对正阳门东车站建筑主体进行了改造，将原有钟楼左侧部分建筑拆除，在钟楼右侧按原样进行复建。



图八 正阳门东车站原貌



图九 作为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使用的正阳门东车站

正阳门东车站曾被作为铁道部科技馆、铁路职工俱乐部、商城等使用。2001年，正阳门东车站旧址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正阳门东车站被改造为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图九）。2021年，正阳门东车站被列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由于被改作博物馆，正阳门东车站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对其建筑外立面、内部排水、电网、空调管路等设备设施进行的多次翻修和维护，使这座百年建筑保持良好的使用状态。博物馆内部设有“中国铁路发展史”常设展及展示铁路科技发展成果的临时展览区，实现了从交通枢纽到文化展示场所的成功转型，既保护了历史建筑，又发挥了其文化教育功能。

（五）北京站

北京站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建成于1959年，是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而建造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北京火车站建筑雄伟壮丽，浓郁的民族风格与现代化设施设备完美结合，是当时国内水平最高、功能最完善的客运火车站，其建设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人称奇^⑦。

北京站落成前夕，毛泽东主席曾亲自视察并亲笔题写“北京站”站名。北京站车站大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座大规模、高技术、设施齐全的大型铁路车站，是中国铁路客运的重要枢纽之一，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历史性发展，对于留存车站的历史记忆具有重要意义（图一〇）。



图一〇 北京站落成典礼

北京站的建筑设计风格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车站外观以新结构与民族风格相结合，具有雄伟而新颖的面貌，表达出伟大祖国 6.5 亿人民首都的“大门”，同时标志着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在建筑技术与艺术水平的高速度发展中的成就^⑧。

2016 年，北京站被列入首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名录。2019 年，北京站车站大楼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 年被列为北京市第二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与其他被列为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车站相比，北京站时至今日仍然承担着繁忙的运输任务。北京站年旅客发送量超 1800 万人次，巨大的客流和繁重的运输任务无疑对车站历史建筑的保护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2022 年，北京站本着尊重历史、还原本貌的原则，对站内进行原貌修缮，2024 年改造工程完成。改造后，进站口外部的临时验票罩棚被拆除，站房外立面色调、风格统一，重现了主楼历史原貌（图一一）。车站内部将视觉色彩还原至建站初期效果（图一二），站房中央大厅还原了 1225 平方



图一一 改造完成后的北京站车站大楼外观



图一二 改造完成后的北京站车站大楼内部

米的绿色双曲扁壳穹顶，北京站主体建筑独具特色的琉璃黄墙体、钟楼、角楼以及一万多盏不同造型的灯具也都比照历史原貌进行修复和还原，使旅客仿佛置身建成初期的北京站，实现了历史建筑与现代化用途的有机结合。

三、北京地区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展与挑战

（一）保护进展

1. 文物身份明确

前文对北京地区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铁路车站保护现状进行了分析，总结而言，部分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已被列为文保单位，如青龙桥车站、北京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华园车站、西直门车站、正阳门东车站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如清河车站老站房、康庄车站建筑群等文物遗迹也均在各方努力下被认定为市级、区级不可移动文物。可见，作为见证北京地区工业进程的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已基本得到身份明确，为开展保护与利用奠定了基础。

2. 有效修缮及周边环境改善

以青龙桥车站和清华园车站等为代表的车站不可移动文化遗产近年来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重视下，已经实现了有效修缮。对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修缮主要体现两项特征，一是“修旧如旧”，按照历史资料尽量还原建筑原有特点，恢复历史面貌；二是改造利用，在保持原有建筑的基础上，对文化遗产内部进行翻新升级，改造成博物馆、展览馆等文博场所，充分展示铁路特色历史文化，实现了公共空间的再利用。

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也得到了整治及改善，如位于居民小区内部的清华园车站，通过为小区接通燃气、修铺绿道，为距离站房最近的居民楼增加隔音处理等方式，使其在解决居民生活与遗产保护相适应问题上取得了较好效果。

3. 提升保护意识与公众参与

近年来，通过政策支持、公众教育、志愿者项目、社区参与、数字化保护以及多方合作，社会各界对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认识充分提升。在社交媒体宣传、学校教育、社区宣传、志愿者普及等方式的影响下，公众对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显著增强。如清华园车站将每年的3月25日定为主题活动日，邀请周边居民、大学生等群体以志愿者身份参与文化宣传，为到访的游客服务。这一举措不仅增强了他们对文物保护者的身份认同，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社会公众关心和参与铁路文化遗产保护。此外，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也进一步扩大了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影响力。这些举措共同推动了北京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4. 加强制度与法规保障

北京市通过制定和完善专项法规和政策，如《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明确了包括铁路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责任与措施，并将其纳入城市发展规划，确保保护工作与城市建设相协调。同时，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推动政府、学术机构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保护工作，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保护体系。2025年3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施行，进一步明确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范围，从重点保护升级为全面保护，这无疑对大量尚未得到有效保护的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是巨大利好。这些制度与法规的落实，为北京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有效促进了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二）主要问题

1. 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维护不到位

尽管被纳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大多进入了相关部门的保护范畴，但仍有一部分铁路文化遗产由于年代久远、自然与人为破坏等因素未能得到有效保护，如部分车站、机车库及建筑群由于受到长期的风雨侵蚀、自然老化，建筑墙体、屋顶、门窗等构件发生锈蚀、开裂、变形、糟朽等情况。此外，由于部分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位置较为偏远，加之保管不善，存在受到自然灾害破坏或人为因素影响，可能发生盗窃、违建等情况，对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2. 产权属性复杂及缺乏保护手段

部分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产权归属情况较为复杂，而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需要协调地方政府、铁路部门、企业或其他单位等多方主体，容易发生保护责任不明确、管理混乱、协调受阻等问题，致使部分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在保护过程中难以取得有效进展。

此外，一些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产权部门缺乏专业的保护技术和人才，而铁路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建筑学、历史学、考古学、材料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导致保护工作难以系统化、科学化地开展，使部分遗产无法得到科学有效的修复和维护。

3. 资金投入不足

对不可移动文化遗产进行建筑修复、文物保护应用、周边环境整治等保护和修缮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由于相关部门文保资金有限且由于产权归属不明导致各方在“谁来出资”问题上存在分歧，致使不少铁路不可移动文

化遗产虽被纳入文保范畴，但却难以达到理想的保护效果。

4. 面临城市开发压力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铁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需要与城市整体规划相协调，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与城市土地开发、交通规划等方面可能存在冲突，存在影响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可能性。

另外，一部分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受到地理位置偏远、配套设施不足等情况的限制，在开发上存在一定的制约，利用潜力不足。

四、北京地区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再社会化路径

（一）铁路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

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旅融合的优质资源。通过创新开发与活化利用，可以将其转化为独具魅力的旅游景点，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铁路文化的深厚底蕴。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文旅开发，可以以废旧线路及建筑物改造、旅游专线开发等为抓手，通过生态修复、场景活化、科技赋能等方式，让铁路文化遗产焕发新生，成为区域文旅的新名片。

如借鉴巴黎绿荫步道、纽约高线公园等工业遗产改造利用模式，参考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等项目，将北京地区的废弃的铁路轨道改造为观光步道、骑行绿道，保留枕木、道砟、信号灯等铁路特色元素，使游客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感受工业与自然的交流与融合。依托老车站、机车库等建筑，打造铁路文化博物馆、主题公园，通过文物展陈、场景复原、互动科技等手段，生动展现铁路发展历程。如运用AR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让游客“穿越”至蒸汽时代，体验售票、扳道等铁路工作。还可以利用传统线路打造旅游专线，如以重走京张线为主题，将南口、居庸关、青龙桥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来，打造工业遗产旅游线路，开展铁路特色研学活动。

（二）铁路文化创意产业，让历史遗产焕发新生

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不仅是凝固的历史，更是激发创意灵感的宝库。通过深度挖掘铁路文化元素，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让文化遗产以更生动鲜活的方式走入现代生活，是实现铁路文化遗产再社会化的又一有效路径。

利用铁路文化遗产开发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从文创产品设计、文化空间利用、文化跨界联动等方面入手，如以铁路建筑、机车车辆、运营场景等为灵感，融合现代元素，开发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文化创意类产品，使铁路文创产品走入大众视野。或将铁路空间进行艺术性活化与利用，利用车站候车厅、机车库等空间，打造沉浸式文化创意活动，让历史空间焕发新活力。还可以与知名设计师、国潮品牌等进行联动，推出铁路主题文化用品，扩大铁路文化产业的影响力，使铁路文化在创新中传承与发展。

（三）铁路遗产与社区共生，开发人文活力新空间

铁路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不能单纯依靠传统的“博物馆式”保护模式，而是应该走向以社会覆盖范围更广的以社区为主体的再社会化路径。利用社区的庞大体量进一步扩大铁路遗产保护、利用与传承的覆盖面与影响力。

北京丰台区的京铁家园社区铁路博物馆便是铁路文化与社区共生的典型代表。该馆依托铁路老职工和老居民捐赠的文物、实物，打造了北京市首个“社区铁路博物馆”，使周边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铁路文化的熏陶。其他社区也可以效仿该社区博物馆，通过打造社区图书角、文化驿站等，在社区营造学习与传承铁路文化的良好氛围。此外，在一些铁路老职工、居民集中居住的社区，还可以进行口述历史征集、铁路老物件展等活动，构建起独具特色的社区文化认同体系，实现“铁路记忆不褪色，社区生活更精彩”的共生局面。

（四）活化铁路遗产，营造科普教育新园地

铁路文化遗产是开展创新教育与科普实践的理想载体。通过依托铁路老火车站等遗址，打造实景研学基地和展教中心，结合实践教育和文化传承活动，构建“实地参观+课程学习+实践体验+数字延伸”的全方位教育体系，

将铁路文化遗产打造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公众科学普及的特色平台、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基地、文化传承创新的示范窗口。

通过挖掘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教育功能，让凝固的铁路遗产“活”起来，使工业文明瑰宝焕发新的教育生命力，成为传承铁路文化、培育科学素养的重要平台，在教育体验中传承铁路精神，培育创新人才，为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养贡献独特力量。

五、结语

以早期铁路车站为代表的北京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记录并见证了北京地区的工业发展历程，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丰富的文化价值。实现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再社会化，需要在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社会发展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点与契合点。对不可移动文化遗产进行本体保护、功能再利用、文旅开发、公众深度参与等多维度挖掘，越来越多的铁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正以崭新的姿态融入现代社会生活，成为连接过去与现代的文化纽带，在增强社会文化凝聚力、提升城市文化形象等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
- ① 欧振宇、赵志庆、张轲：《铁路世界遗产保护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新建筑》2024年第5期。
 - ② 金靖、白鸿叶：《图说京张铁路百年变迁》，天津出版社，2023年，第118—119页。
 - ③ 李祺瑶：《百年车站变身长城文化展览馆》，《北京日报》2024年6月14日第2版。
 - ④ 黎熙：《老站新生》，《大学生》2024年第2期。
 - ⑤ 景一鸣：《清华园车站的“新赶考”之路》，《北京日报》2025年3月14日第7版。
 - ⑥ 赵又霖：《揭秘京张铁路百年西直门站》，《人民铁道》报2018年5月17日B4版。
 - ⑦ 严冰、叶子：《北京站，见证“金名片”闪亮》，《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9月28日第1版。
 - ⑧ 刘亦师：《第一“国门”：北京站营建史考论》，《建筑史学刊》2022年第4期。

启民智之先

——新文化精英的博物馆建设理念与实践

刘欣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和青年学生开始反思与探索，倡导和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新道德、新文学。新文化精英，是指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和纽带而结合形成的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提出的反孔主张、文学革命，触及当时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演变与发展中的困境与问题，吸纳了不同学术派别、不同文学流派、不同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参与和支持，他们的思想主张趋于一致，互相影响而聚合在一起，被称为《新青年》同人。尽管《新青年》同人只是几个人，但他们却是以一个独立存在并持续发挥着自己独立社会作用的知识分子阶层而出现在中国社会上的，是以自己独立的社会要求和社会思想要求作用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并且具有发挥自己独立社会作用的独立的方式和途径：科学和文艺^①。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从“器物”转向对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关注。只有从思想文化的层面落实到社会运作的层面，新文化的建构才能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意义，而科学传播需要借助于博物馆之类的规范组织形式作为价值体系的物质承载^②。建设博物馆成为新文化建构的路径之一，承担着教育普及和启迪民智的作用。

在既往的博物馆史研究中，针对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兴起与发展，学者或从“公共性”探讨近代中国博物馆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③，或梳理近代中国博物馆的多样化形态，论述博物馆学先驱对博物馆概念的认知思想^④，或从古物观念与科学观念的变迁中探究博物馆智识范式的形成^⑤。关于新文化运动与博物馆建设关系的探讨，有学者论述了新文化运动与博物馆在根源上、地理位置上以及人事上的联系^⑥，还有学者聚焦北京大学人与故宫博物院，梳理新文化运动人物、北大学人如何以北京大学为阵地参与故宫博物院的建立^⑦。以上研究已经关注到新文化精英对博物馆理念传播与建设的贡献，但并没有系统梳理出新文化精英的主要博物馆理念，也并未涉及人物之间的关联。本文力图阐释新文化运动思想对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建设影响，通过研究新文化精英的学术主张，梳理其代表性博物馆理念；从新文化精英参与的博物馆实践活动中，明确博物馆作为提供实物资料的资源，对于学术研究的促进作用，以及新文化精英在对推动中国的博物馆事业现代化转型的积极影响。

一、民主与科学：博物馆建设的思想先导

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启蒙、普及教育为主要内容，其倡导者对于博物馆的认识以博物馆的公共性和教育性为主，把建立公共博物馆作为开启民智、普及教育的方式和手段之一。新文化运动时期，博物馆被纳入社会教育的范畴之中，博物馆建设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实践路径。新文化精英多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的经历，也曾考察或参观过博物馆，他们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着手建设本国的博物馆。这不仅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对西潮冲击下的反应，更是带有自我意识的觉醒。可以说，新文化精英的思想和主张无不影响着近代中国博物馆的建立，新文化运动的理性批判精神、民主与科学精神对近代中国博物馆建设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民主”思想推动文化共享意识的生成

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宣扬进化论观点、提倡个性解放与文学革命，

让自由、平等、民主、科学、法制的观念和精神深入人心。而博物馆的创建是建立在平等与民主的文化共享基础上的，这正与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精神高度一致。将新思想普遍于全国有多条实践层面的路径，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行实践正是新文化运动精神外化的一种形式，以博物馆来承载新文化的价值体系，新文化运动的“民主”思想就体现在了博物馆为社会而立的“公共性”。

陈独秀在《新青年》著文《新教育是什么》提出：“新教育对于一切学校底概念，都是为社会设立的。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⑧陈独秀倡导教育改革，注重启发式的教育方法，提倡教育要与社会紧密结合，而博物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启发民智，开风气之先，是公共教育的重要设施，让民众平等享受文化权利，正是陈独秀所强调的教育面向社会的一种体现，是新文化运动“民主”思想的表现。

蔡元培较早看到了博物馆作为一所教育机关的重要性，并且强调博物馆的公开与平等。蔡元培在考察欧美博物馆后，肯定其在普及教育的作用：“博物院陈列所等皆为公开，且无论何处皆有之。”^⑨“大学中各博物馆之开放，如生物、物质、人类学、古物学等。”^⑩他将博物馆定位为公共资源，还提出博物馆应采取定时开馆、免费开放等举措，以强调公共机构的民主与共享。

（二）“科学”精神拓宽科学研究方法与视野

新文化运动提倡将系统学理的科学方法渗入文物的研究与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中。“科学”精神提供科学研究史料的方法，蕴含新文化价值体系的科学传播需要以博物馆机构组织为载体。

作为“科学救国”论者的蔡元培认为“欲救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⑪，面对当时中国人不了解何为科学的状况，蔡元培认为：“现在中国人多不知科学为何物，最要先输入科学思想。”^⑫博物馆是普及科学思想的重要机构，在考察欧洲教育之后，蔡元培指出欧美各国利用博物馆进行科学普及工作：“伦敦博物院包罗万象，自浅而深，自简而繁，自古而今。”^⑬在收藏与陈列上注重科学性，同时注重科学知识的普及。

胡适等人号召“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集中体现了新文化的科学精神。1923年，胡适呼吁：“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⑭这一治学的态度和精神，也极大地影响了博物馆的学术研究思路。比如故宫的藏品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也为考古学、历史学与民俗学提供了材料，拓宽了古物收藏正面价值的维度。在20世纪30年代末，以“史学本是史科学”为主张的史科学派逐渐形成，新材料不断被发现，不同类型的资料相互印证，科学的史料运用成为一股新潮流，为博物馆建立科学研究文物的方法打下了基础。

在新文化运动兴盛的唯科学主义影响下，科学观从狭义的自然科学概念转向广义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形成注重史料的实证取向和注重规律的史观取向的两种历史科学路径^⑮。新文化精英始终秉承着这种科学观念，博物馆的建设正是将思想层面的精神与方法落实到实践的探索中，让博物馆“从私化公”的收藏观念更具有现代的价值，并助力于中国本土的博物馆学、考古学、民俗学的发展。

二、启发民智：新文化精英的博物馆建设理念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精英，最初主要是依靠地域、师友等人际关系因缘，而后来则逐渐发展为思想主张的互相影响与吸引，通过思想主张的认同、一致而结合^⑯。在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上，新文化精英也始终保持着思想、主张的趋同，尤其蔡元培对博物馆事业上做出了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贡献，鲁迅则推行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并形成自己的美育观念，马衡、傅斯年等人在参与部分博物馆建设的同时，也曾提出针对博物馆的学术研究方法与观点。以下将从博物馆的职能划分为出发点，梳理新文化精英的博物馆学理念。

（一）博物馆作为改良社会的教育机构

社会教育是民国教育所关注的热点，时人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良社会。教育改良社会则有两种途径，一种

是通过学校教育培育人才来改良社会，另外一种是通过社会教育来改良社会。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尽管他没有直接参与博物馆的实践活动，但是他所提出的新青年教育思想，所提倡的启发式教育与社会紧密结合的教育思路，对于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的确立、博物馆教学方法的形成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性。陈独秀曾说：“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底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①陈独秀始终强调教育要与社会紧密结合，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都是为社会而设立的，结合以人为本、求实勿虚的教育方针，融合启发式、适合于社会发展的教育方法，采用尊重科学、经世致用的教学内容，定能让教育成为改造社会的工具，让教育之力塑造新国民、创造新国家。

蔡元培是明确提出博物馆是社会教育机构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照现在教育状况，可分为三个范围：一、家庭教育；二、学习教育；三、社会教育。”^②教育机关不仅仅在学校，学校以外的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戏院等都有教育的作用。其中，博物馆是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是学校教育的有力助手，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部门，也是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设施，并且，博物馆的教育作用还重在科学和美育。

在蔡元培担任教育部总长之时，他聘任鲁迅到社会教育司任职，主管博物馆、美术馆工作。鲁迅曾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结合中国实际，指出美术可以表现文化、辅翼道德、辅翼教育、救援经济，推行美术必须有利于社会：“美术必有利于世，悦其不尔，即不足存。”^③在播布美术的具体措施中，鲁迅提到建设美术馆是“建设事业”的首位，“建设事业美术馆当就政府所在地，立中央美术馆，为光复纪念，次更及诸地方。”^④鲁迅还明确提出了推行美育的社会意义。他对于美术馆、美术展览会、文艺会、剧场等传播美术与实施美术教育的公共场所的解读，是建立在唤醒民众、提高民众审美情趣的时代发展需求上的，这也与博物馆的教育职能相契合^⑤。

（二）博物馆作为提供科学史料的研究机构

博物馆作为实物资料的收藏之地，为学术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蔡元培认为，博物馆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部门，也是重要的研究机构。尤其是中国要发展高等教育，不仅需要人才，还需要资料。大学内要设立供教员和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研究所，并要设标本陈列所。国立或市立所建设的博物院，也要给大学师生开展学术研究利用的权利^⑥。1922年，在蔡元培的积极提倡和规划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国学门各学会相继筹设陈列室，收集古物、档案、民俗、歌谣等方面的资料，陈列室公开展示，供学校内外的人参观研究，尽管当时没有建立大学的博物馆，但是陈列室已经成为学科教育的助手，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已经发挥了博物馆收藏、研究与教育的职能。

沈兼士指出学术研究在重视实物资料研究的同时，还要与文献书籍相互佐证：“研究所国学门于古代研究，则提倡考古学，注意古器物之采集；于近代研究，则侧重公家档案及民间风俗。持此纵横两界之大宗新材料，以佐证书籍之研究，为学者辟一新途径。”^⑦

傅斯年把史学研究建立在史料基础上，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⑧。他所讲的史料范围不只是停留在史籍上，还应当扩大到史籍材料以外的金文、甲骨文、敦煌石藏，内阁档案等。将中国传统文化史料化，并做学科式的整理，使传统的古物收藏向现代化的博物馆收藏转化，史料化的藏品也明确了博物馆的学术性，专业化的学者对史料的研究与整理有助于提升博物馆的专业性。

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建立在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史料的基础之上，体现近代中国有识之士中西融合的学术主张，是在旧文化内部的调和与创新，从而建立我们自己的博物馆学科。博物馆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确立，也是新文化精英公共意识与社会责任感体现。他们力图通过收集、整理、保存、研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三）博物馆以秩序化之展览给予精神启迪

五四人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其实多来自生物进化论（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意味着严复版的“天演论”而已），逐渐成为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方法^⑨。1921年，蔡元培在详细阐述不同类型博物馆的陈列内容和思路上，无不体现了进化论的思想。科学博物馆、自然类博物馆以及历史博物馆，尽管所陈列的物品不同，但都应按照时代顺序、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由此体现出“进化”的秩序^⑩。关于具体的展示方式，蔡元培对陈列品的位置、距离、光线予

以重视，他说：“美术作品的光色，非值适当的光线，不容易看出；观赏者非在适当距离与方面，也不能捉住全部的优点。巴黎卢佛儿对于文西的摩那丽赛，荷兰国之美术馆对于兰勃朗的夜巡图，都有特殊的装置。”^②

鲁迅的展览思想则体现在展览的意义与影响层面。鲁迅为了倡导新兴木刻运动，曾经策划过多个美术展览，他将自己多年收藏的外国原拓版画公开推介给中国的木刻青年，给青年以启迪和借鉴。鲁迅认为：“展览会很有益于美术家，在那里可以增加他们的艺术兴趣，同时也锻炼了鉴别作品优劣的欣赏能力。因为单看一幅画，不容易分辨好坏，比较看来，优劣立见。”^③因此，看展览不仅能够锻炼鉴赏能力，还能够提高审美能力。并且，鲁迅将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的思想融入展览策划之中，他要求艺术家的作品“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④。在鲁迅看来，展览的价值不仅仅为公众提供材料参考与审美教育，而是期望展览主题、展品的内涵能够产生精神层面的思考，让展览的举办更适合于中国革命的需要，并为社会发展服务。

三、使命之实践：探索建设近代中国的博物馆

新文化精英最先意识到中国“旧文化”“旧文学”对人们的束缚，极力倡导“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在总体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并逐渐构建起一套中国现代的价值观念体系。博物馆作为公共的教育机构，是以科学的方法践行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场所，是践行新文化运动思想的途径之一。蔡元培、鲁迅、马衡、傅斯年等新文化精英，倡导建立公共博物馆的思想和主张是建立在社会教育或文化的需求上的，他们以自己独立的文化创造作用于整个社会，积极参与博物馆的建设工作，为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初具带动整个社会发展的端倪。

（一）“集体”参与故宫博物院的初建

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从呼吁将旧宫旧藏收归国有，成立公共博物馆，到故宫早期物品的整理工作，蔡元培、鲁迅、李石曾、马衡等新文化精英几乎是“集体”参与。从故宫博物院的筹建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化精英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新文化精英是故宫博物院筹建的倡导者、领导者和实施者，是利用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思想对封建思想、专制制度进行改造的过程。

1924年“北京政变”后，溥仪被驱逐出宫，清室古物的公私划分问题引起政府的重视，一时成为社会热点。李石曾积极建议成立委员会，办理故宫古物的整理点查工作。李石曾早年在法国留学时，在巴黎参观过法国大革命后由皇宫改为博物馆的卢浮宫，他希望等中国革命成功后，将清宫改为博物院^⑤。在李石曾的推动下，1924年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承担点查清室古物的重任，李石曾被聘为委员长，蔡元培（蒋梦麟代）、陈垣、沈兼士等14人为委员，胡适、朱希祖、鲁迅等人被聘为顾问。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第一届董事、理事会名单中，蔡元培名列董事，沈兼士、马衡等人为理事。

辛亥革命后不久，蔡元培就提出在故宫建立博物馆，对公众开放。1925年，蔡元培当选为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董事。1928年，在故宫“存废之争”中，蔡元培支持保存故宫博物院，就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九一八”事变之后，推动古物南迁，使国宝得以保存。

故宫刚刚开放，马衡就撰文，评价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在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吾国博物馆事业，方在萌芽时代。民国以前，无所谓博物馆。自民国二年政府将奉天、热河两行宫古物移运北京，陈列于武英、文化二殿，设古物陈列所，始具博物馆之雏形。此处，大规模之博物馆尚无闻焉。有之，自故宫博物院始。”^⑥

（二）积极投身全国多个博物馆的创立

除了参与故宫博物院的筹建外，新文化精英还直接参与了全国多个博物馆的建设。这些新文化精英的直接参与，不仅推动了西方博物馆理念在中国的传播，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建了中国自己的博物馆发展道路。他们接受当时西方刚出现的陈列方式和博物馆建设的理念，但同时保留中国传统审美和意趣，创立中国化的近代博物馆。下文将以人物为中心，简要概述新文化精英参与中国近代博物馆建设的过程与贡献。

蔡元培深刻认识到教育改革与建立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必要性，他一方面在文章与演讲中阐述博物馆的价值，另一方面利用自己在教育部门的职务与地位，努力将博物馆纳入中国教育体系之中，积极促成各类博物馆的建立。1912年1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同年2月发表《对新教育之意见》一文，其中提出的美育思想为博物馆、图书馆等社会教育机构的建立奠定基础。同时，对教育部机构设置进行调整，改五司为三司，主张增设社会教育司，与普通教育司和专门教育司同列。蔡元培希望通过博物馆、美术馆、调查古物等事业的发展，加强社会教育³²。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蔡元培提倡设立大学院及观象台、动植物园、历史美术科学博物馆等。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国立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西湖博物馆等纷纷建立。尤其是前文提到的故宫博物院，他更是付出了大量心血。

鲁迅主张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在教育部任职期间，参与了多个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希望通过美育来辅助德育，以博物馆为载体实施国民教育，从精神层面改造国民性。1912年，鲁迅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开始主管关于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及美术展览、文艺、音乐、演剧、调查及搜集古物等事项。例如，鲁迅曾参与《四库全书》的迁运工作，在《图书馆学季刊》刊登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奉记》中明确记载了鲁迅当时的职责“选派科长周树人，……同内务部人员等于二十七日起赴保和殿检查，……，于八月五日点交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子安查收，起运返奉天”³³。由于职责关系，鲁迅还参与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的选址、调查与文物搜集、文物保管、文物研究、筹办展览等诸多事务。国立历史博物馆于1926年10月10日正式开馆，是近代中国第一座由政府筹设并直接管理的公立博物馆。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主持筹办了“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之后又自己独立策划“世界版画展览会”“德俄木刻展览会”“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将收藏、研究与展示相贯通，极大发挥了展览的教育价值与启迪民智的作用。

马衡是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奠基人。他在金石学、考古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并成为故宫博物院的管理者。1927年，马衡组织北京文物维护委员会，以保护古都古物免遭军阀破坏。1928年，瑞典方拟赴我国西北探检，马衡组织成立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一同前往，防止境外人员窃取我国的科学资料，并投身考察资料“居延汉简”的先导研究工作。马衡主张历史考古的工作当重视探检、调查、发掘，对中国金石学向考古学过渡，起到推动作用³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马衡被聘为古物查点委员，于1929年被聘为副院长。他亲自率领职工，整理库房，参考其在北大考古学会拟定的古物管理办法，制定了故宫古物登记、编目、保管等工作的规则。1933年，马衡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在机构管理、学术研究、文物保存、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做出了大量贡献，为我国近代博物馆学科建设、博物馆发展打下了基础。

傅斯年极其重视史料和新史料的获得，曾抢救和整理明清档案、科学发掘河南安阳殷墟。1933年，傅斯年任中央博物院的筹备处主任，后被聘为中央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秘书。为了保存国家文化遗产，教育民众，促进博物馆的建设，改进博物馆的管理工作，傅斯年与马衡、袁同礼等人共同筹办中国博物馆协会，该协会于1935年5月18日在北京成立。此时国民政府已定都南京，北京已成北平，且中央博物院也在积极筹划中，但是国内主要的博物馆仍以北京、天津为多，虽然中国最早由外国人创办的博物馆和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博物馆都在江浙一带，但是北京能够在二十多年间建设最多的博物馆，不能不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

新文化精英各自的博物馆建设实践，在不同层面对中国近代博物馆建设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蔡元培是倡导建设博物馆的最主要呼吁者，在他的推动下，鲁迅等人积极投身博物馆的建设，将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以文化教育体系改革为基础，推动博物馆的建立与科学普及。马衡、傅斯年等人从科学的史料研究出发，开创中国考古学，为博物馆的学术研究提供科学的研究范式。李石曾、沈兼士、刘半农等人也是博物馆事业的有力支持者。中国博物馆从一开始就是使命型的博物馆，政府和有识之士认为博物馆的科学价值和教育价值是社会改造所需要的。作为这种价值载体的博物馆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而在中国得以诞生和发展³⁵。新文化精英则是以新文化思想推动近代中国博物馆建设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四、结语

新文化精英从一开始就以思想启蒙、文化复兴为己任，博物馆与学校、图书馆等被视为教育普及和思想启蒙的公共机构，被纳入新文化运动的范畴。所以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博物馆被赋予了启蒙和教育普及的重任。博物馆作为改良社会的社会教育机构，同时体现着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核心思想。

早期新文化精英的知识结构多元，通过同人们的思想呼应与文化互动，科学思想逐渐与博物馆的实践相融合，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化精英对于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与其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主张是趋于一致的。他们在博物馆建设的不同环节发挥重要作用，比如确立博物馆建设在体制上的合法性、明确博物馆的“公共性”、规范博物馆收藏与研究的科学性，并有意识提升博物馆在救亡图存、文化启蒙方面的作用。新文化精英作为独立于社会并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知识分子，其对于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建设性探索，不仅是新文化运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思、民族发展道路构思的一种尝试，也初步让博物馆成为实践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工具，今天其博物馆建设的科学观念与实践精神依然值得思考与借鉴。

-
- ① 王富仁：《“现代性”辨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 ②⑬ 关昕：《道器之间：近代以来“科学”观念嬗变与博物馆智识拓展》，《东南文化》2021年第4期。
- ③ 徐玲：《博物馆与近代中国公共文化》，科学出版社，2015年。
- ④ 徐玲、刘秀娟：《近代博物馆概念的再思考——兼论中国博物馆学先驱之思想》，《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4期。
- ⑤ 李飞：《旧物维新：古物观念变迁与近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东南文化》2016年第3期。关昕：《道器之间：近代以来“科学”观念嬗变与博物馆智识拓展》，《东南文化》2021年第4期。
- ⑥ 陈为：《新文化运动与博物馆的关系——兼述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初步发展》，《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5期。
- ⑦ 朱朱：《80年前的故宫与北大》，《紫禁城》2005年第5期。许凯：《北京大学对故宫博物院早期事业的贡献（1924—1933）——以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故宫学刊》2012年第1期。史珺昕、郑昭琪、王思渝：《近代知识群体与故宫博物院的初建（1924—1930）——以北京大学为中心》，《文博学刊》2022年第4期。
- ⑧ 陈独秀：《新教育是什么》，《新青年》1921年第8卷第6期。
- ⑨⑫⑬ 蔡元培：《在中国科学社北京社友欢迎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4—415页。
- ⑩ 蔡元培：《向中国科学社北京社友演说要点》，《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2页。
- ⑪ 蔡元培：《复任鸿隽函》，《蔡元培全集》第1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9页。
- ⑭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3月14日第2版。
- ⑮ 杨琥：《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
- ⑯ 陈独秀：《平民教育》，《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
- ⑰ 蔡元培：《美育实施方法》，《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68页。
- ⑱⑳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7—48页。
- ㉑ 刘欣：《展览会：鲁迅的美术教育实践》，《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1期。
- ㉒ 蔡元培：《大学教育》，《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95页。
- ㉓ 沈兼士：《方编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序》，《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343页。
- ㉔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3页。
- ㉕ 罗志田：《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五四时期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 ㉖ 蔡元培：《何为文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4页。
- ㉗ 蔡元培：《美术批评的相对性》，《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12页。
- ㉘ 马蹄疾：《鲁迅讲演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5页。
- ㉙ 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0页。
- ㉚ 蒋复璁：《李石曾先生与国立故宫博物院》，《李石曾传记资料（三）》，天一出版社，1981年，第6页。
- ㉛ 马衡：《故宫博物院开放》，《晨报》1925年10月12日。
- ㉜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354页。
- ㉝ 《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奉记》，《图书馆学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
- ㉞ 傅振伦：《马衡先生传》，《浙江学刊》1993年第3期。
- ㉟ 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5页。

融媒体时代公众考古大众传播的探索与实践

——以北京市考古传播工作为例

白燕飞

一、融媒体时代公众考古大众传播的内涵

所谓公众考古，指的是“面向公众的考古学”。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金斯（Charles R. McGimsey）1972年出版的《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一书中首次提出公众考古学的理论^①，并探讨了考古学与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不同社会元素之间通过协作方式保护历史资源的构想。中国的公众考古活动始于中国考古学发端之时，国内学者对公众考古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苏秉琦先生就是重要的公众考古践行者，他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被选入1988年全国高考语文阅读题；《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以通俗的话语总结了他毕生的研究成果，苏先生称此书为“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的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吴汝康的《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被收入“名家讲演录”科普系列书系，向公众普及人类起源与进化方面的知识^②。

而融媒体时代公众考古大众传播模式主要指的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变革产生的新媒体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书籍等传统媒介进行深度融合，并进而复杂演绎，从而将文化考古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风趣幽默的内容恰当地传达给公众，从而引起公众对于考古的新认识、新理解，以便推动考古事业的全面发展^③。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介与新的音视频媒介相融合，进行传播方式的重组与演化成为大众传播的主要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融媒体传播的定义也逐步清晰，那就是采用文字、声音、影像、动画、网页等多种媒体表现手段，利用广播、电视、音像、电影、出版、报纸、杂志、网站等不同媒介形态，通过融合的广电网络、电信网络以及互联网络进行传播。

二、融媒体时代公众考古大众传播的特征

融媒体时代公众考古大众传播的模式及特征的探究对于公众考古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提升公众对考古工作的兴趣。公众考古一直以来与普通公众存在着一定的隔阂，既有时间上的也有空间上的。从时间上讲，一项考古项目的申报从开始到完成，有的甚至需要几年，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没有办法长时间将注意力集中在一项具体的考古工作中；而从空间上来讲，公众不能亲临考古现场观摩考古工作，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考古与普通公众的隔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考古工作本身的特殊性、神秘性，与普通公众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是即便公众对于考古有浓厚的兴趣，但是缺乏信息传递的渠道及有效的媒介，让考古工作长期以来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而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拉近了公众与考古之间的距离。公众可以通过报纸、杂志、书籍等纸质媒体，以及广播、电视等音视频媒体，或者PC端互联网、移动端互联网等互联网新兴媒体多种渠道了解考古工作。这种模式下，公众可以更广泛了解考古发掘内容，理解考古工作状况。

有助于促进考古事业的发展壮大。考古学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为己任，在本质上属于基础人文学科。可是，从大的社会环境来讲，考古学的社会生存环境并不乐观。在经济发展的大浪潮中，考古学向来以“冷门”行业示人，就业面窄，岗位容纳量小，在招生、就业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此外，考古部门缺乏主动的媒体传播意识和媒体传

作者单位：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

播能力，逐步落后于其他行业，从而使考古部门自身的发展壮大受到限制。而融媒体时代的到来，让晦涩难懂的考古知识通过媒体介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公众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考古工作的意义，了解考古发掘的具体过程，极大程度促进考古事业的发展壮大。

三、融媒体时代公众考古大众传播面临的问题

也正是因为融媒体时代的到来，考古学家们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不仅要面对考古发掘和日常研究等工作内容，还需要考虑如何将考古发现公之于众，让更多的人了解考古发掘的内容、意义及其历史渊源，这也给公众考古工作带来了挑战。

（一）公众考古的专业性与大众传播的普及性之间存在矛盾

考古作为科学性、研究性的专业学科，需要学术的、缜密的调查研究和严谨的表达方式，所得的结论，是经过考古学家仔细发掘、认真研究之后得出的学术性结论。在没有得出确切考古发掘结论的时候，考古工作者会面临无法确切说明考古发掘结果、无法准确表述考古内容的尴尬局面。这与公众关注考古过程所产生的期待是有距离的。但大众传播需要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因此，公众考古的专业性与大众传播的普及性之间的矛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公众考古的复杂性与大众传播的简明性之间存在矛盾

在传播的过程中，大众关注的热点会实时更新，且由于资讯较多、热点变化迅速等原因，大众传播的内容和语言不仅需要通俗易懂，而且要求简明扼要，需要以适合公众接受的方式，进行更准确、更广泛的传播。但是，由于考古是一个专门性的学科，在其进行融媒体宣传过程中，牵涉许多专业名词、专业术语，还有古文献、古文字等，考古发掘的专业性和特殊性与融媒体时代大众接受新闻的肤浅性和直白性形成了突出的矛盾，产生了一定的差距。这成为融媒体时代公众对于考古新闻的接受度和理解能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采取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语言，平实的文字，易理解的内容，从整体上把握考古热点新闻的传送，让更多的大众关注和接受考古新闻，成为新时代文物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考验。

（三）公众考古的长期性与大众传播的时效性之间存在矛盾

公众考古的长期性与大众传播的时效性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随着“文博热”的出现，大众对考古工作的关注度的提升，考古工作在开展初期会有不少大众媒体进行宣传报道，但是随着公众考古工作的深入，公众对于此前报道的内容也随之淡忘。另一方面是公众考古作为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其宣传特点往往是在得出科学的结论后面向公众发布。而大众传播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大众媒体希望针对考古事件和内容进行详细、及时地跟踪报道。因此，如何保持大众对于公众考古的持续性的热情与关注度，协调好公众考古的长期性与大众传播的时效性之间的矛盾也是融媒体时代公众考古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融媒体时代公众考古大众传播实践探索

（一）充分发挥融媒体传播优势，拓宽宣传阵地

融媒体时代，把握宣传主阵地，开展精准化、专题化宣传报道形式更为凸显。让看似严谨、深奥的考古知识快速便捷地走向公众的渠道除了各种形式的考古活动外，媒体的力量也不容小觑。以北京房山琉璃河考古遗址的宣传报道为例，根据整体宣传口径和时间节点，首先，通过广发新闻素材形式，邀请各媒体单位广泛报道，引起公众关注；其次，适时协调中央、市属新媒体进行了专题报道、深入报道等工作，分阶段、分层次大力宣传琉璃河考古遗址成果及北京市考古工作成果；最后，与重点媒体进行深度对接，采取不同的发布内容、发声方式及发声节奏，推出系列报道。

为了争取让更多的公众了解此次考古工作，北京市文物局与北京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深度合作，推出了琉璃河考古直播，通过考古现场直播、专家讲解、公众互动等方式，以五代考古人76年的历程为线索，以遗址发掘、博物馆、考古实验室等五大场景为框架，深度阐释了2021年琉璃河遗址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和保护过程。3.5小时的直播，350万人次的观看量，让关注房山琉璃河考古遗址的公众更加直观、通俗地了解房山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工作。

（二）主动设置热点话题，搭建公众互动平台

对于考古的广泛认识和大众传播虽面临一些挑战，但公众考古的未来依然让人期待。因此，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大众传播的特点和方式，扩大公众考古传播范围，吸引公众关注。其中，特别需要主动设置话题引导大众传播兴趣。所谓主动设置话题，是指有计划、有序地设置传播内容，照顾受众习惯。例如，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设置为每年固定的日期，这样的设置使得大众对于固定的日期的特殊活动有所期待，同时，对在这个日期所举办的纪念活动也变得有所期待。

（三）举办公众考古活动，提升公众参与度

为解决公众参与度低的问题，北京市从2021年起，组织开展了“北京公众考古季”活动，为首都人民呈献了一套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以首届北京公众考古季为例，首届北京公众考古季采用“2+6+N”的活动体系。“2”代表开幕式和闭幕式，对整体考古季活动安排和意义阐释起到引领和总结的关键环节；“6”代表各承办单位开展的6大版块系列活动，即公众参与、考古体验、专题展览、云端展示、学术讲座及延展活动，构成考古季的主要内容；“N”代表各区文旅部门、各遗址管理单位、各高校为营造考古季社会氛围自主策划推出的相关活动，是考古季的有力补充。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组织了“一铲千年——考古研学旅行”，围绕“认识考古、以史育人”的主题，加强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开展京津冀、洛阳、故宫、云南、北京五条线路的研学，引导青少年、教师群体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承办了“考古开放日”系列活动。以通关打卡的形式，精选“石器打制”“骨器制作”“陶器制作”等九个深度体验项目，让观众通过实际动手亲自体验并发现我国古代先民的聪明智慧，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最终“曙色·初心——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展”使大家接受了精神洗礼，现场超300人参加。“小小考古学家”活动吸引了160多个家庭参与，参与活动的青少年及儿童年龄在1.5—13岁，学龄前群体占比33.33%，小学阶段群体占比63.58%，中学阶段群体占比2.46%。公众考古季的举办极大提升了公众的参与度，推动了北京考古事业的发展。

（四）推出考古文创衍生品，增强大众获得感

在公众考古大众传播的链条中，创作和设计有品质、受欢迎的考古衍生品，通过更有亲和力的融媒体进行推广，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年轻受众的喜爱和关注，也可以反作用于公众考古的深度发展^④。近年来，北京推出了系列考古文创衍生品，如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推出的“特色印章”“北京城之源书签盲盒”等文创产品，深受大众喜爱。大众在购买衍生品的同时得到相关知识的普及，参与公众考古相关活动，了解考古未来进程，也会对公众考古的未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① Charles R. McGimsey, Public Archaeology. London: Seminar Press, 1972, p.5.

② 吴汝康：《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③ 李强：《浅谈融媒体时代公众考古大众传播》，《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年第20期。

④ 高大伦：《年轻人让考古事业充满活力》，《大众考古》2013年第6期。

新时代博物馆社教活动品牌的创立和实施

——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太学·寻迹”主题社教活动为例

燕京

新时代背景下，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和实现馆校融合，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积极发挥自身文化资源优势，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于2019年起以“太学·寻迹”为主题，开发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社教活动，逐步打造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品牌。2020年至2022年，拓展线上学习渠道，推出“云课堂”，保障文化宣传工作的持续开展，同时也为后期社会教育活动的线上线下联动打下坚实的基础。2022年“太学·寻迹”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丰硕成果。2023年，在馆内主题活动继续深化内容革新、开发主题课件，馆外与东城区教科院合作，对东城区中小学教师开展关于传统文化的师资培训，馆内馆外相辅相成，拓展了教育模式。与此同时，寒暑假期间开设的副品牌“太学召集令”主题研学活动不断更新和丰富，使得“太学·寻迹”社会教育活动品牌日臻成熟，服务更加完善。

一、新时代背景下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现状

（一）博物馆社教活动的指导思想及主要类型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叮嘱广大文物工作者要“发挥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①。博物馆作为历史文化的宝库，尤其肩负着向青少年展示文化、引导传承的重任，应该发挥其自身文化资源的优势，深入挖掘并展示传统文化的内涵与魅力。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结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教委素质教育改革的双重目标，推动馆校融合的政策落地显得尤为关键。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对知识及文化需求的提高，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博物馆社教活动以深入浅出的知识内容，更具趣味性、互动性、多样性的活动形式与青少年观众之间构建桥梁，发挥着重要的教育作用。总的来说，未来博物馆应继续探索创新社教活动形式和内容，提升活动质量，吸引更多观众参与，为推动文化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随着公众对文化教育需求的日益增长，博物馆社教活动也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展形式多样的社教活动，在形式上不断创新，以提升观众的参与度和体验感。同时，博物馆也在不断探索如何将社教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提升活动的专业性和学术性。

目前博物馆社教活动常见的类型包括知识类、互动体验类和手工类。讲座活动是一种常见的社教活动类型，通过邀请专家学者或知名人士举办讲座，向观众传递更深入的知识和专业解读。讲解活动则是由讲解员带领观众参观博物馆，讲解文物背后的故事，提供专业的解答和解读，以面对面的方式增加观众对博物馆内容的参与度和理解度。互动体验则是通过设置各种互动环节，让观众亲身体验和领悟知识，有助于观众更好地理解 and 记忆。手工类活动是一种创作或制作类型的活动，包括绘画、陶艺、手工制作等，能够增强观众对文化、艺术的兴趣。

（二）博物馆社教活动发展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博物馆社教活动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

首先，博物馆社教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较为单一，缺乏创新性。目前，大多数博物馆的社教活动停留在传统的讲解和展示层面，形式上缺乏针对不同年龄段和文化背景受众的多元化活动设计，内容上缺乏娱乐性和教育性的平衡^②。同时，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博物馆社教活动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如线上云课堂、直播等新型活动形式，考验博物馆的线上平台功能建设能力。

其次，博物馆社教活动的宣传和推广力度较弱。大部分博物馆在策划和组织社教活动时，未能充分重视活动的前期宣传和后期推广，导致活动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有限。此外，部分博物馆的社教活动缺乏与学校和社区的深度合作，使得活动的影响范围受到限制。

再者，博物馆社教活动的师资力量参差不齐。优秀的讲解员和教育工作者是社教活动成功的关键。目前很多博物馆在社教人员配备上存在不足，尤其缺乏具备专业知识和教育经验的讲解员，直接影响社教活动的质量和效果。

综上所述，博物馆社教活动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形式单一、宣传不足、师资力量不均等问题。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下^③，博物馆需要深化合作机制，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为了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需要博物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加强创新和合作，提升活动质量和影响力。

二、“太学·寻迹”社教活动品牌创立与实施的路径探索

（一）明确博物馆社教活动定位与目标受众

北京国子监始建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是元、明、清三朝的最高学府，被称为“太学”，担负着历代立德育材的教育职责。北京孔庙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依照“庙学合一”的古制修建，是历代皇家祭孔的重要场所。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依托国子监优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及皇家规制建筑，便于组织开展各类社会教育活动。

“太学·寻迹”是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社教部主导设计和策划的社教品牌活动，主要面向青少年观众，旨在通过导览、研学、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让青少年观众亲身探索孔庙和国子监这两座历史底蕴浓厚、人文历史丰富的建筑群，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实现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和教育职能，激发青少年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根据青少年群体的需求、兴趣和行为特点，策划集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于一体的活动内容，并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形式，为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观众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广泛参与的社教活动。

“太学召集令”作为“太学·寻迹”主题系列活动的补充，主要面向寒暑假期间的青少年观众，召集广大学子一同走进孔庙和国子监，深入拓展研学内容，逐步完善“太学·寻迹”品牌社教活动的完整性。

从品牌的角度来看，博物馆社教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在于其能够塑造独特的文化形象，提升博物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品牌建设，博物馆能够更好地传递其教育理念和价值，增强公众对博物馆的信任感。同时，品牌的建设也有助于博物馆在激烈的文化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吸引更多社会关注，助力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二）构建社教活动品牌内容与体系

围绕受众群体和品牌定位，“太学·寻迹”主题社教活动共策划三类活动形式，分别为到馆观众参与的线下研学活动、为线上观众开设的“云课堂”以及在馆外开展的社教活动，并开发了不同的活动内容和活动教具，在确保内容的高质量 and 丰富性的同时，构建完善的活动流程和体系，满足学习需求。

1. 线下探索型研学活动

此类活动强调观众的主动探索和参与，通过设计一系列富有创意和启发性的任务，引导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加深对展品和文化内涵的理解。这种互动式的学习方式能激发观众的学习兴趣，同时提升学习效果。

2019年暑期的“太学·寻迹”社教活动以研学手册作为活动核心，通过文字介绍相关历史知识和文物故事，并搭配相应的活动任务（图一）。任务集推理、互动、美拍、猜谜、动画、音乐、教育、古建、名人于一册，扫描



图一 2019年暑期“太学·寻迹”活动现场

二维码还可参与线上互动环节，获取更丰富的学习资料。文字资料提供详细的背景信息和解释，帮助观众更深入地了解展品和相关知识；动画资料通过生动的画面和音效，将复杂的历史事件呈现得更加直观易懂；模型资料提供立体的展示效果，让观众更直观地欣赏到建筑内部的形态和结构。这些通过互动和解谜所获取的文字、动画、模型等多种形式的扩展资料，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提高了观众的参与度。观众在互动和解谜的过程中，不仅能收获知识，还能体验探索和发现的乐趣，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记忆相关知识。

活动采用线上报名、线下活动的方式开展，现场凭借报名信息直接领取活动手册，避免人多拥挤、排长队的问题。整场活动仅需两名工作人员完成现场组织、物料发放、答疑解惑、盖纪念章等工作，人员配置需求较低，可联合志愿者团队培养志愿服务人员，便于活动的高效开展。

从活动数据和观众反馈来看，活动共有约3000人参与，线上关注人数达5000人以上，以亲子组合参与活动的占比突出。在观众的后续评价和反馈中，活动内容别具一格、过程简洁流畅、形式寓教于乐等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较高，是活动成功的要点。

2021年是北京国子监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60周年纪念。“太学·寻迹”社教品牌活动于“5·18国际博物馆日”举办专场互动活动，在已有内容基础上增加了额外奖励机制，即题目全部答对的观众能够获得孔庙国子监文创纪念品一份，并能在自己的研学手册上加盖“国保”60周年纪念印章留念。博物馆与“首都之窗”网站合作，于5月18日同步推出“太学·寻迹”线上答题互动活动，既弥补了未能到现场参加活动的观众的遗憾，又利用了互联网平台的优势，向更广泛的公众传播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活动既丰富了观众到馆参观的体验内容，又扩大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影响力，标志着孔庙和国子监活动品牌建设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同时也是对于“让文物活起来”的一次积极探索。

活动通过研学手册而非固定讲解点进行引导，从休闲娱乐或参观学习的平衡性方面入手，给予了观众更大的自由度，满足不同的游览目的和需求。探索型社教活动还有助于培养观众的主动思维和创新精神。在探索过程中，观众需要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想象力去解决问题，这无疑是对思维能力的一种锻炼，在博物馆社教活动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教育价值。

2. 线上云课堂

2020年，绝大多数博物馆进入了“云”状态，发展出了云课堂、线上游、数字展览等众多形式，这对博物馆的线上平台建设和综合技能提出了挑战。“太学·寻迹”通过线上云课堂活动，将线下内容转移至线上，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习平台。这种新型教育形式不仅丰富了博物馆的教育途径，提高了宣传效果，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普及。

线上云课堂的特点在于其灵活性与互动性。观众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参与学习，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同时，云课堂采用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搭配课后习题，使得学习过程更加生动有趣。通过多角度选题，云课堂全面阐述知识、深入剖析孔庙和国子监的人文历史（表一、图二）。

表一 2020年至2023年“太学·寻迹”云课堂目录

序号	播出时间	名称
1	2020/02/22	博物馆与你在一起：云游北京国子监
2	2020/04/05	北京孔庙的祭孔文化
3	2020/06/12	走进辟雍
4	2020/06/13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策划 拓碑技艺展示
5	2020/06/23	北京孔庙国子监碑刻文化及石碑的保护
6	2020/07/06	聊聊科举那些事儿
7	2020/08/24	走进“太学生”的大学生活
8	2020/10/01	佳节同庆 相聚太学
9	2021/03/05	“牛”状元张謇精神解读
10	2021/04/05	孔庙奉祀人物之历代先贤先儒
11	2021/05/18	国学圣地百年变迁与保护
12	2021/06/14	祭孔乐舞
13	2021/08/28	云游太学 乐享假期
14	2021/09/10	礼敬先师 感念师恩
15	2021/09/21	国子监后院的佳话——敬一亭与东西厢
16	2021/10/01	非遗面塑制作“嫦娥奔月”
17	2021/11/17	为官以德 天下己任——中国古代官德文化展
18	2022/03/05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
19	2022/04/02	追思先贤 传承文化——北京孔庙的祭祀文化
20	2022/05/18	国子监的古树名木
21	2022/06/03	祭孔乐舞（重播）
22	2022/06/11	乾隆石鼓
23	2023/03/05	文人风骨 民族脊梁——王懿荣
24	2023/04/05	匾联系列（一）
25	2023/06/22	匾联系列（二）
26	2023/09/29	匾联系列（三）
27	2023/11/26	匾联系列（四）

云课堂前期采取直播的形式，以其即时性和真实性吸引了大量观众。通过直播，观众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参与学习，与专家学者进行互动交流，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这种形式不仅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也提高了博物馆教育的实效性。例如，2020年8月“太学召集令”专题直播“走进‘太学生’的大学生活”，以及2021年5月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直播“国学圣地百年变迁与保护”等活动中，讲解员们通过镜头，带领观众在线上一睹孔庙国子监的风采。因播出效果及后期回放剪辑等需要，后期的云课堂调整为录播形式，以便结合技术手段呈现更为优质的“课堂”效果。

综合来看，线上云课堂具有鲜明的特点。它打破了传统博物馆教育的时空限制，使得更多人能够接触到传统文化，同时也提高了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它不仅丰富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普及。线上活动既保持了博物馆的热度，也借助网络平台进行了更广泛的宣传。截至2023年底，云课堂已累计播放26万余次。“太学·寻迹”系列主题云课堂在2021年北京市文物局开展的“北京地区博物馆优秀教育活动评选”中荣获优秀教育项目。



图二“太学·寻迹”云课堂视频

3. 面向馆外开展社教活动

为了响应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的意见》，深化馆校融合合作机制，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积极利用文化资源优势，推进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并通过“太学·寻迹”主题社教活动内容的深入挖掘，开发了针对性课件，包括“国子监里的太学生”“小贤带你游孔庙”两个专题（图三），通过生动的图文及动画形式，向广大师生介绍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丰富知识和历史。

在课件开发初期，我们对孔庙和国子监的历史背景、建筑结构、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整理，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同时，精选了大量高清图片、太学生的学习生活场景复原图等作为手绘材料，让师生在视觉上得到充分的享受。在内容设置上，“小贤带你游孔庙”介绍祭祀孔子的相关准备和祭祀礼仪等，“国子监里的太学

生”联系古今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们感受古代太学生的学习生活。借助这种形式主动把博物馆文化“送出去”，让传统文化进校园、进社区，共同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



图三“太学·寻迹”主题课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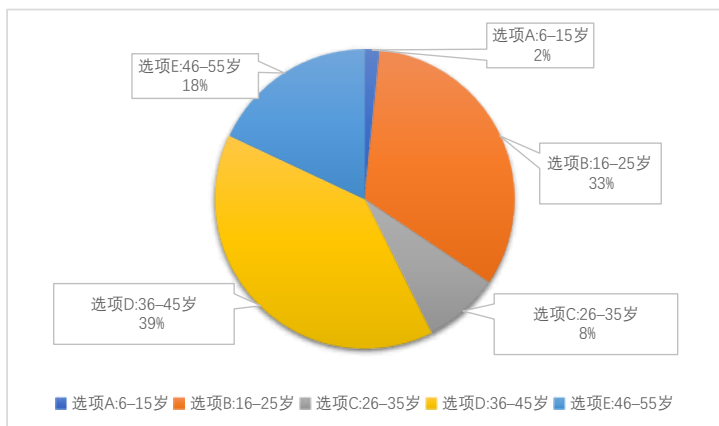
（三）强化社教活动品牌建设推广

注重品牌建设是社教活动长远发展的基石。在“太学·寻迹”主题活动的实践中，不断增强博物馆社教活动品牌的辨识度和广大观众的信任度，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活动的社会影响力，更可为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社教活动初期，大多是对合作院校或特定机构定向开展。“太学·寻迹”的公开化使得更多社会大众能够参与其中，这一举措极大提升了活动的影响力，同时也对支撑品牌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要求。建立完善的线上报名通道和服务平台，不仅能为公众提供公开的信息渠道和便捷、高效的参与途径，节省时间和人力成本，同时也符合现代社会的数字化趋势，促进博物馆自身数字化水平的提高。

相较于定向开展活动，面向社会的活动在扩大宣传面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社会效应。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宣传、多平台官方账号更新相关内容等方式，活动信息能够迅速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中，不仅可以提高博物馆及社教活动的社交媒体曝光度，也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太学·寻迹”社教活动逐渐将规范化作为提升品质的关键，这不仅体现在活动的组织和执行层面，更体现在对活动内容建设上。随着“太学·寻迹”云课堂的常态化发展，我们逐步统一标题，以确保活动的专业性和一致性，使得每一期内容都能准确传达其核心价值 and 意义。同时建立完善的、渠道通畅的品牌评价与反馈机制，定期收集数据和分析受众的反馈意见（图四），了解品牌运营中的问题和不足，促进及时调整和优化。



图四“太学·寻迹”云课堂观众年龄构成调查

三、“太学·寻迹”主题社教活动品牌的发展趋势与策略

（一）设计深度内容，开展线上线下联动的社教活动

2020年国家文物局提出博物馆教育资源要与学校教育需求有机衔接，强调博物馆教育课程的开发应与教育目标、教学内容相辅相成，实现有机融合^④。在此背景下，深度内容的设计开发有助于博物馆扩大教育覆盖面、提高教育可及性、增强教育互动性并提供个性化学习体验，促进博物馆更好地发挥其教育职能。

随着技术不断迭代更新、研学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以及观众需求日益多样化，博物馆社教活动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定制化服务，面向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爱好的观众，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社教活动和体验。同时与其他文化机构、



图五“太学·寻迹”社教活动研学讲解与礼仪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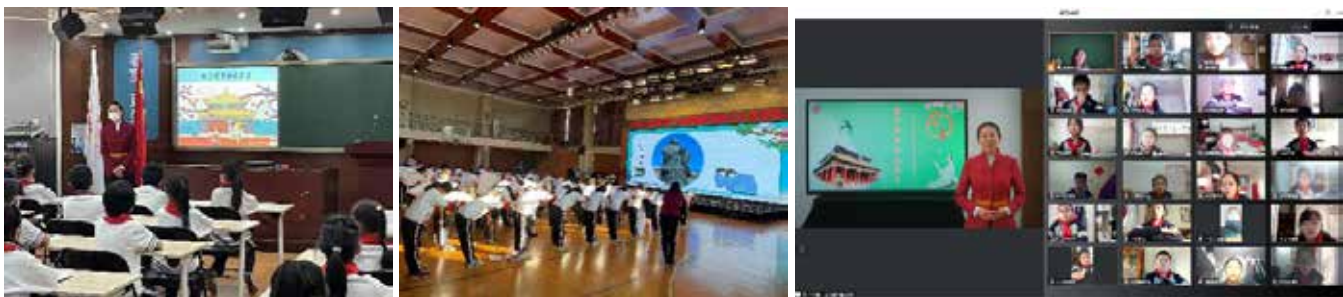


图六“太学·寻迹”社教活动传统文化体验

教育机构、企业等进行跨界合作，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丰富社教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提升品牌影响力。在调查和研究广大观众需求的基础上，结合前期活动的实践和反思，“太学·寻迹”持续深化并拓展博物馆社教活动内容。2023年，围绕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重要传统节日时令，开展线下“太学·寻迹”节令主题社教活动，线上“太学·寻迹”云课堂同期上线，副品牌“太学召集令”也同步开展。

2023年“太学·寻迹”新春答题活动为期6天，经评估，活动参与人数控制在约500人次，观众反响热烈。活动不仅增加了博物馆参观的趣味性，还使观众对博物馆的文化内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2023年4月，“太学·寻迹”清明节主题活动以“慎终追远 缅怀圣贤”为活动核心，包括博物馆讲解参观、手工花制作、孔子像前行礼、献花等环节，强调了源自上古时代的祖先信仰与春祭礼俗。清明节当天推出“太学·寻迹”云课堂“匾联系列（一）”。2023年6月，“太学·寻迹”端午节主题活动通过线上平台招募了10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内容包括由社教部老师带领参观博物馆主体院落及主要陈列，随后开展室内制作香囊的手工活动。端午节当天，“太学·寻迹”云课堂“匾联系列（二）”在官方平台上线播出。2023年9月，“太学·寻迹”中秋节主题活动同样分为线上云课堂及线下主题活动两个部分。中秋节当天，“太学·寻迹”云课堂“匾联系列（三）”在官方平台上线播出，线下则开展了“游太学、话传统、做灯笼”中秋节主题活动。活动中，观众在跟随讲解老师参观后，更多地了解了中秋节的由来及传统习俗，并亲手体验了中秋彩灯的制作。为进一步增进与属地街道党群活动的联动协作，丰富博物馆周边地区老年人的文化活动，2023年10月，“太学·寻迹”重阳节主题活动“爱在重阳 乐享非遗”在安定门街道党群活动中心举办，博物馆的老师通过课件向大家介绍了重阳节的起源及节日习俗，并结合博物馆相关的文物向大家介绍我国敬老爱老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渊源，同时向参加此次活动的各位老年朋友表达了节日的问候。活动特邀非遗面塑技艺传承老师现场讲述并教授非遗面塑技艺，老人们通过亲自动手制作来了解非遗面塑文化，从中感受传统文化的乐趣。“太学·寻迹”云课堂“匾联系列（四）”在此之后上线播出。

传统节令活动中的场馆研学讲解、传统文化体验和场景互动等，极大地丰富了社教活动的内容与形式（图五、图六）。场馆讲解提供了专业而深入的知识解读；结合“节令”的手工体验则让参与者能够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实践加深理解和记忆；场景互动则营造了沉浸式的体验环境，使参与者仿佛置身于古老的时空之中，增强了对节令文化的感知和认同。这些活动形式共同拓展了社教活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线上活动实现了活动覆盖范围的广泛化，线下活动则提供真实的互动体验，加深参与者的印象。线上交流



图七 “太学·寻迹”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



图八 馆校融合

与线下实践相互补充，提升了活动效果。此外，这种联动模式有助于收集更全面的活动反馈，优化活动内容，提高活动质量，是一种值得深入探索的活动组织形式。

（二）多方合作交流，促进共建、共赢、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目标。为响应这一号召，我们加强了博物馆与学校、教师的交流合作，促进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推动馆校教育结合，并丰富了博物馆教育形式，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职能（图七）。2022年10月，“太学·寻迹”主题社教活动先后走进陈经纶中学崇实分校小学部、陈经纶帝景北校区小学部，11月又在线上分别为八十中管庄分校汇星校区、北京市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学、第二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师生开展传统文化课程。“太学·寻迹”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市5所小学内开展，授课4200余人，收集观众满意度调查问卷5741份，满意结果高达100%。

2023年3月起，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与东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携手开展传统文化校本课程师资培训。双方发挥各自优势，依托博物馆丰富的教育资源，以期进行长期、深入、全面的合作，实现共建、共赢、共享。培训加强了教师与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沟通与交流，有望利用博物馆资源为校外教育做出更大的贡献（图八）。2023年9月，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与东城区府学小学合作开展“太学·寻迹——探儒学文化之美”综合实践活动。在博物馆老师的指导下，不同年级的府学学子们将自己对于国子监文化内容的理解通过宣讲、短剧、微电影等形式进行表达，在深入了解博物馆文化的同时，同学们用自己的方式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收获了宝贵的成长体验。

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正契合“发挥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的要求。博物馆将继续优化教育服务，深化馆校融合，发展志愿者队伍，为公众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深入人心的文化服务。通过这些努力，博物馆将助力大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切实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三）重视人员培训，提升综合素质与技能

在当前的博物馆社教活动中，工作人员不再只是引导者、解释者，而是全面参与社教活动策划和执行过程，承担着多重角色。在“太学·寻迹”云课堂上线初期，博物馆讲解员完成了内容编写、脚本撰写、形式设计及出境讲解等内容，主动向复合型人才转型，提升综合性工作技能。由此可见，对工作人员进行系统全面的培训至关重要，综合素质的提升逐步成为人员培训和发展的核心目标及方向之一，这将为博物馆社教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社教人员在教育和服务一线的长期工作经验，为其不断创新活动内容和形式奠定了基础，也有助于塑造品牌形象、

打造精品社教活动、加强宣传推广，从而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志愿者队伍是博物馆文化宣传的有力补充。博物馆志愿者培训对博物馆社教活动开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系统培训，志愿者能够深入了解博物馆的历史背景、文物知识及展览特点，掌握专业的讲解和引导技巧。这不仅提升了志愿者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使他们能够辅助博物馆社教活动的开展，也保证了参观者能获得准确、生动、有趣的信息，满足传播需求。此外，志愿者培训还有助于增强志愿者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服务意识，提升博物馆整体社教活动的效果。志愿者作为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桥梁，他们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服务能够激发公众对博物馆的兴趣和热爱，从而推动博物馆社教活动的深入开展和宣传。2022年，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志愿者之一获评“北京地区博物馆优秀志愿者”。博物馆每年定期举办志愿者工作总结交流会，促进志愿者之间积极互鉴与交流，肯定志愿者的辛勤付出与努力，鼓励他们为博物馆宣传优秀传统文化、打造金色品牌贡献力量。

四、结论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凭借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充分挖掘和利用馆藏资源，打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教育活动品牌。这些活动以深化和拓展教育内容为核心，通过线上线下联动、馆内馆外合作的形式，有效扩大了博物馆社会教育的覆盖范围，为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充分发挥和博物馆事业的稳定发展探索了新的方向和模式。

在创立和实践社会教育活动品牌的过程中，博物馆工作人员展现出严谨的研究态度，深入实践学习、积极整合资源，对受众需求进行细致的分析。我们注重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致力于打造既有教育意义又生动有趣的活动，使参与者能够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博物馆加强品牌规范化建设，以确保活动的专业性和系统性。针对以往社会教育活动存在的问题，如内容单一、推广力度不足以及师资力量薄弱等，博物馆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加大了内容设计的深度，注重活动的互动性和趣味性，以吸引更多受众的参与。除加强自身建设外，博物馆还加强了与其他文化机构的合作与交流，通过多方平台的推广，扩大了活动的影响力。此外，博物馆注重人员业务培训，提升师资的综合素质，为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新时代背景下，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活动不仅提升了公众对博物馆知识的认知和理解，更增强了大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些活动通过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文化精髓，提升公众的文化自信，为文化强国的建设贡献力量。同时，博物馆还通过开展社会教育活动，积极履行其社会责任，为社会和谐发展注入正能量。

① 孟哲：《人民网评：多一些和博物馆的深度接触》，<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4/0309/c223228-40192139.html>。

② 陈何毅：《博物馆教育活动模式分类研究》，《中国民族博览》2022年第13期。

③ 北京市文物局：《市文物局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扎实推动主题教育提质增效》，<https://wwj.beijing.gov.cn/bjww/362760/362767/326089209/326089210/326137358/index.html>。

④ 新华社：《让“课堂”与“殿堂”紧密携手——教育部、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解读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學的意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0967480131392270&wfr=spider&for=pc>。

“博物馆之城”建设视阈下北京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面临的问题与发展路径刍议

王业鑫

2020年，北京正式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战略部署。回顾国内关于博物馆之城的描述，最早见于吕济民先生的《基辅历史文化保护区兼博物馆城纪闻》，文中指出基辅佩切尔国家历史文化保护区在28公顷的城内拥有4个国家博物馆和7个展览馆，因此被称为“博物馆城”^①。2008年我国推进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后，博物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全国有近三十座城市先后提出了建设“博物馆之都”“博物馆强市”等口号，在我国博物馆学界的研究语境下，“博物馆之城”与“博物馆城”“博物馆之都”等概念的含义基本相同^②。“博物馆之城”建设成为擦亮首都城市文化名片的重要手段。

一、“博物馆之城”建设下的北京红色文化

2020年4月北京市委宣传部、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正式发布《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年—2035年）》，指出坚持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的“四个文化”基本格局^③。北京是我国的文化与政治中心，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五朝古都，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作为我国的首都，北京地区博物馆数量及质量均位居全国前列，拥有较好的“博物馆之城”发展基础，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几座国家级革命类博物馆已成为首都红色文化的名片，“博物馆之城”的发展导向，必然不能缺少红色场馆的有力支撑。

（一）“博物馆之城”是建设世界文博强国的必然要求

2021年5月，中央宣传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探索在文化资源丰富地区建设‘博物馆之城’‘博物馆小镇’等集群聚落。”^④202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并提出：“探索在文化资源丰富地区建设‘博物馆之城’。”^⑤这是我国首次明确将“建设‘博物馆之城’”纳入国家发展的五年规划中。2022年12月，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并指出，全国博物馆总数达6183家，相比2012年（3069家）增长了1倍。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达1222家，增幅达59.9%，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21.1%。近年来我国博物馆建设速度与建设质量得到巨大提升，因此，建设“博物馆之城”成为助推我国构建世界文博大国与文博强国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准备。

（二）“博物馆之城”是推进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抓手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文化资源禀赋深厚，北京地区的博物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位于全国前列，文博事业发展如火如荼。“博物馆之城”的建设历程是中国博物馆发展的缩影，也是博物馆之于城市软实力提升作用的写照^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北京市共有204家各类博物馆，每年平均举办展览600多项，年均接待观众超过5000万人次。从管理属性来看，全市共有央属博物馆65家，市属馆47家，区属馆47家，非国有馆45家；从质量等级来看，有一级博物馆18家，二级博物馆10家，三级博物馆11家，国家一级博物馆数量居于全国首位^⑦。“博物馆之城”已成为在文博领域推进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抓手。

（三）“博物馆之城”是打造北京红色文化高地的时代契机

近年来，北京持续加强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方向指引，健全首都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四次莅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加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或胜利纪念活动；2018年香山革命纪念馆开始投入建设，2019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202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纪念馆在北大红楼正式对外开放，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了上述纪念馆及相关主题展览。自此，北京形成以上述三家革命类博物馆为核心，涉及建党、抗战、建国为主题的红色文博场馆群。2021年11月，北京市文物局牵头制定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明确了：“实施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抗日战争、‘进京赶考’建立新中国等三大主题片区的整体保护利用。”北京依靠革命类博物馆场馆盘活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打造红色文化高地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明晰。

二、以博物馆为中心的北京革命文物资源梳理

2021年12月，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程。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国家统筹、区划完整的原则，建设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创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体制机制，推进革命文物的整体规划、连片保护、统筹展示、示范引领，助力革命老区脱贫攻坚。”革命文物的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程为北京“博物馆之城”的红色场馆群建设指明了具体工作抓手。北京形成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大红楼）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片区，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核心的“抗战”主题片区，以香山革命纪念馆为核心的“‘进京赶考’建立新中国”主题片区的首都红色文博场馆群，成为构建“博物馆之城”的重要砝码。

“展览展示”是开展博物馆业务的核心，是连接上游史学研究、文物征集修复保管、资料编辑出版等工作，和与下游博物馆社会教育、文创开发、媒体宣传、对外传播等工作的“桥梁”。因此，片区内红色场馆群是否拥有常设红色主题展览便成为衡量是否能称之为“博物馆”的重要标志。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片区

该片区的现有红色场馆多为100多年前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北京唤醒民智、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组织、发动工人运动的革命旧址。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片区包含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主要包括1915年至1923年6月期间，北京地区与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有关的重要会议场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重要党史人物故居以及重要纪念设施等31处^⑧。目前31处革命活动旧址分三个类别进行保护和提升，第一类：重点保护提升，10处，在旧址举办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专题展；第二类：一般保护提升，11处，由管理使用单位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维护修缮、恢复原貌，征集文物、丰富陈列，或者挖掘内涵、深化研究等工作，如实再现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场景，进一步提升宣传利用效果；第三类：维持原貌，立牌存念，10处，由属地和责任单位视情况开展周边环境整治，设立图文并茂的标牌，展示其历史作用和独特价值。经查阅相关资料及实地走访，现革命旧址中设有常设展览，有条件能实现基本的博物馆职能的红色场馆有如下这些场馆（表一）。

表一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片区文博场馆群

片区核心场馆	片区其他文博场馆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 (北大红楼)	北大二院旧址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李大钊故居
	李大钊烈士陵园
	长辛店二七纪念馆
	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
	陶然亭慈悲庵
	京报馆旧址
	中法大学旧址

（二）“抗日战争”主题片区

“抗日战争”主题片区是北京三大革命主题片区中时间跨度最长、资源遗存最为丰富、社会影响力最为突出的一个。北京丰台永定河畔的卢沟桥与宛平城，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地，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从这里打响，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便坐落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四次莅临纪念馆出席纪念活动或参观抗战主题展览，纪念馆每年都会在全民族抗战爆发纪念日举办国家级的重大纪念活动，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极其深远。此外，在京郊还有星罗棋布的抗战遗存，且保存利用程度较好，其中形成革命类博物馆规制的就有十余个，有如下场馆（表二）。

表二 “抗日战争”主题片区文博场馆群

片区核心场馆	片区其他文博场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
	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
	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
	鱼子山抗日战争纪念馆
	白乙化烈士纪念馆
	抗战名将纪念馆
	承兴密联合县政府旧址抗战纪念馆
	京西山区中共第一党支部纪念馆
	古北口长城抗战纪念馆
	怀柔第一党支部纪念馆
	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
	房良联合县第一农村党支部纪念馆
	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
	房良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遗址纪念馆

（三）“‘进京赶考’建立新中国”主题片区

“‘进京赶考’建立新中国”主题片区是以香山革命纪念地（包括香山革命旧址和香山革命纪念馆）为重点，以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所进行的不懈奋斗和有效探索为主线，涵盖了广泛的革命遗址遗迹和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以香山革命纪念馆和天安门广场为核心，辐射带动西山地区、“进京赶考之路”沿线、北京城内等区域的红色遗存和纪念设施^⑨。经查阅相关资料，有常设展览的文博场馆有如下几个（表三）。

表三 “‘进京赶考’建立新中国”主题片区文博场馆群

片区核心场馆	片区其他文博场馆 ^⑩
香山革命纪念馆	双清别墅
	来青轩
	双清别墅东侧平房
	小白楼
	丽瞩楼
	镇南楼·镇南房
	思亲舍
	多云亭
	清华园车站旧址
	颐和园景福阁、益寿堂
	八大处长安寺、灵光寺
	毛主席纪念堂
	天坛
	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
	北京宋庆龄故居
	八宝山烈士公墓

三、当前“博物馆之城”建设视阈下北京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面临的问题

（一）片区文博场馆之间联系协同不够紧密

北京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当前亟须解决的便是片区内各红色场馆的协同问题。因片区内各文博场馆上级主管单位或革命旧址产权归属多不一致，有的是部委单位管辖，有的是市属单位，有的还是区属单位；有的文博场馆归属宣传口单位、有的归属文旅口单位、有的归属退役军人事务局；文博场馆有的归属于国家公产，也有的归属集体组织，甚至还有私人资产。片区内的场馆情况错综复杂，直接影响了各场馆之间的协同，从而影响了北京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推进，进而限制了推进构建“博物馆之城”的实施。

（二）革命文物资源保护挖掘不够深入

当前，相关主题片区内各红色场馆的展览展示水平差异较大。一般来说，文博单位的展览展示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开展水平相对较好，而一些非文博类单位、乡村一级的革命类纪念场馆更多地依然停留在对文物和展览进行基础的展示，对文物的研究及其他利用水平普遍较低；此外，片区内的核心场馆与其他场馆在对革命历史、文物、精神等领域的研究能力和成果差距较大，区级场馆的研究水平有待提高，乡镇村一级的红色展示场馆对革命文物的研究与挖掘尚处于起步阶段，整体水平不高。

（三）革命文物传承利用水平有待提高

在革命文物传承利用方面，片区内处于核心地位的大型红色场馆与地处远郊区的中小型的场馆也存在较大差距。博物馆最基本的传播载体便是展览，其次是基于展览内容衍生的社会教育活动，再次拓展至如文创、讲座、宣传等其他外延。目前片区内还有相当一部分革命纪念场馆因各种因素缺少展览展示作为支撑，至于社教活动等其他传播形式更是无从谈起。一些郊区场馆虽有常设展览，但作为基础性利用传承工作的讲解也无法得到保证，利用水平尚处于发展较不均衡的阶段。

（四）红色场馆集中整合力度不够充分

按照“博物馆之城”的建设理念，以及革命文物集中连片的发展思想指引，当前各片区内的整合协同还不够充分，特别是在红色旅游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三大主题片区的红色旅游线路呼之欲出；核心场馆因馆藏资源、办展水平、社会影响等方面有着与地处远郊的中小型规模场馆不可比拟的优势，核心场馆对中小型场馆在文博业务及管理领域的帮扶、带动作用体现也不够充分，片区博物馆群的品牌构建并不理想。

（五）文旅融合协同创新机制不够健全

相较于传统综合类博物馆，红色场馆因多位于革命纪念地，旅游属性更强。香山红叶、卢沟晓月等文化品牌早已成名在外，守着如此顶流的文化资源和品牌，红色文化与之互动、嫁接的举措却不曾发现，文旅融合发展迟缓。文旅主管部门虽推出了一系列红色旅游线路，但缺少落地的旅游产品、研学产品，红色文化目前还没有调动起社会资本参与的关注度，产业运行机制不成熟、不健全，从而制约了北京“博物馆之城”的红色文化传播。

四、“博物馆之城”建设视阈下北京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发展路径

在“博物馆之城”的建设理念下，北京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指引：对革命文物资源进行梳理、摸清家底，以三大红色主题片区建设为抓手，对各片区内的革命文物资源进行挖掘、整理、展示利用与弘扬传播，集中革命文物资源，形成各具特色、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社教展示的革命类博物馆，提升北京地区红色主题博物馆的“量”与“质”，从而使革命类博物馆成为首都“博物馆之城”建设的强有力支撑。

（一）统筹协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顶层设计

“博物馆之城”建设下的北京革命类博物馆建设首先应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顶层设计，全市的革命文物工作应当统筹谋划，协调各相关单位及部门的资源及力量，形成工作专班，推进具体工作。市委宣传部统筹，市

文物局牵头，协同文旅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公园管理中心、在京各革命文物资源所属的中央单位和各区县政府机构等，对全市所有革命文物资源进行梳理摸底，按在革命历史中的重要性、保护利用难度、文旅开发利用情况等因素综合评估，逐步分批次落实革命文物腾退、复原、征集、展示、利用等工作。压实责任，明确分工，新开放一批革命类博物馆；对现有红色主题场馆的常设展览进行升级改造，并进行“博物馆化”运营；对已经成立并开放的革命类博物馆进行业务指导，丰富馆藏，加强研究，提升展览展示与传播教育水平，提升博物馆的服务质量。

（二）集中连片，强化片区核心场馆示范引领作用

以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为工作指引，强化片区内核心场馆对其他中小规模博物馆的帮扶带动作用。2021年和2022年北京市分两批公布了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88处、可移动革命文物2646件（套），北京革命文物资源的家底基本摸清。片区内的核心革命博物馆梳理属于本地区的革命文物资源，对片区内红色场馆的革命文物馆藏资源、展览展示与社教服务水平等进行评估，并对相对发展水平滞后的场馆进行有规划、按步骤地帮扶提升，提高现有场馆的展览展示水平，并对还未形成博物馆规制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资源进行再挖掘，对有条件设立博物馆的场地进行博物馆化改造，逐步提升北京革命主题博物馆的“质”与“量”，进而推动“博物馆之城”的建设。

（三）资源共享，各场馆间文化资源成果互通有无

北京三大红色主题片区内的文博场馆之间应加强馆藏资源的交流与研究成果间的互动，作为同地区、同性质的红色主题场馆，反映的革命史与革命事件也有较大关联，为加强各场馆间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2022年联合片区内的15家抗战主题纪念馆，推出“烽火印记——北京抗日战争主题片区特展”，成为强化片区内场馆联动的有力成果；此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筹备将多年前在馆内展出的“光辉典范——抗战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展”输出至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盘活了闲置馆藏资源的同时，又丰富了兄弟场馆的展陈教育资源，加强了“博物馆之城”建设理念下相关主题场馆的业务协同。

（四）强化研究，注重由学术成果向展览社教转化

对革命史、革命文物的研究和挖掘是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基础，而将对革命资源的研究成果转化为革命主题展览和社会教育资源，便是革命类博物馆的最终目的。同样是革命史料研究，革命类博物馆在研究目的和成果利用等方面，还是有别于近现代史研究院所及高校的。革命类博物馆的学术研究的成果转化并不是以学术论文、学术出版物等为最终目的，而是需要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对公众教育的素材。当前“博物馆之城”建设理念下，北京地区革命类博物馆的数量及办馆质量均有待提升，因此，强化对北京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非常重要，同时，亦应注重研究成果向展览及社教活动等博物馆特有的成果形态转化。

（五）盘活形式，突出红色文化的数字沉浸式体验

目前，文化传播领域“数字化”与“沉浸式”是最火的两个关键词。革命文化与红色精神因其传播内容相对抽象，意识形态属性更强，极易陷入说教的误区，而数字化的文化产品形态与沉浸式文化体验将成为助推革命类博物馆内容传播的重要抓手。数字化与沉浸式体验，突破原有图文展板展示和讲解员导览的固有模式，以文化科技融合的理念，助推博物馆文化传播再升级。2022年9月，海淀区旅游咨询服务中心、香山公园和香山革命纪念馆联合开展了海淀红色文化景点沉浸式云游览活动，活动依托“小鹅通”线上传播平台的科技支撑，创新旅游服务新形式，用可视化、故事化的方式，生动形象地为游客讲解了党中央在香山停驻期间为新中国诞生奋斗的光辉历史。

（六）文旅协同，吸纳社会资本参与红色文化传播

革命类博物馆与红色景区有着天然的联系，文旅融合基础更为坚实。过去，红色文化传播更多的是依靠纯公益体制下革命类博物馆的文化输出，而忽视了发挥革命场馆自身的旅游属性，以及与周边革命纪念设施的联系互动。社会资本是公共文化服务经费来源的必要补充，文旅产业在文化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越发凸显，尤其是近年来发展迅猛的红色文旅产业，已成为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又一片蓝海。在“博物馆之城”建设理念的感召下，革命类博物馆应该利用好文旅协同的工作抓手，以调动社会资本参与为目标，借助文化产业的手段，盘活红色资源。门头沟斋堂

镇马栏村自发保护革命文物遗址，村民集资建设旧址陈列馆，深挖红色文化资源，通过“红色记忆”书屋、特色体验项目、红色演艺项目创作等形式传播革命精神，积极发展以红色旅游为主导的集体经济，全村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

（七）跨界融合，借力相关产业助推革命文化升级

在“博物馆之城”建设指引下，博物馆文化力求跨越式发展，离不开与相关产业的跨界融合。革命类博物馆常规展览展示手段已激发不起观众主动走进博物馆展厅的热情，博物馆和其他文化产业业态的互动，将借助其他产业优势，推动革命类博物馆红色 IP 再升级。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多次与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组密切互动，邀请《觉醒年代》主创人员齐聚北大红楼，将这个新开放的纪念馆直接推到了流量的中央；2022 年 12 月 31 日，纪念馆又联合相关单位在北大红楼共同举办“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 文学中国跨年盛典”活动，让纪念馆成为文化传播的发源地。

（八）构建品牌，策划精品活动和热点话题提升品牌

文化品牌的构建需要有亮点活动的持续输出，策划热点活动，通过抓住青年人这个传播力、消费力最强的群体，助推红色文化顺利“出圈”。红色文化不是枯燥的革命精神教育，反而可以变得年轻化和接地气。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邀请国内“直播带货一哥”李佳琦，明星许魏洲、朱桢，带领观众打卡上海红色文化地标，聆听先辈们的革命故事，在流量明星的带动下，成功让红色文化出圈。2021 年 6 月，上海市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四大纪念馆景区获评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上海之于全国红色文化中的党建品牌最终确立。“博物馆之城”下的革命博物馆集中利用工作，上海经验值得北京借鉴。

结语

“博物馆之城”的建设是确立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实现路径，是助推博物馆文化事业发展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红色文化作为北京“四个文化”中的主要载体，首都革命文物资源禀赋优异，无论在文化资源数量还是质量上，均位于国内前列，北京也是国内最重要的红色旅游目的地，革命类博物馆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博物馆之城”重大战略的实施，也助推了北京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进一步提升，以集中连片为指引，建立北京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为具体工作抓手，推动首都革命类博物馆提质升级。

-
- ① 吕济民：《基辅历史文化保护区兼博物馆城纪闻》，《东南文化》1989 年第 3 期。
 - ② 李晨、耿坤：《“博物馆之城”建设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路径研究》，《东南文化》2022 年第 4 期。
 - ③ 徐秀丽：《〈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 年—2035 年）〉出台》，《中国文物报》2020 年 4 月 14 日第 1 版。
 - ④ 《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国文物报》2021 年 5 月 28 日第 3 版。
 - ⑤ 《“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中国文物报》2021 年 11 月 9 日第 3 版。
 - ⑥ 宋珂欣、黄洋、焦丽丹：《理念与实践：关于中国“博物馆之城”发展的思考》，《博物院》2022 年第 4 期。
 - ⑦ 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探索》，《博物院》2022 年第 4 期。
 - ⑧ 《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中国文物报》2022 年 1 月 4 日。
 - ⑨⑩ 以上内容参考：香山革命纪念馆：《“进京赶考”建立新中国主题片区红色资源拉网式调查情况调研报告》，《“新赶考 新答卷”第三届香山革命精神与历史文化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下册）。